

縱論國是續新篇

——紀念丁酉之難60周年

胡顯中◎著



開放出版社 OPEN BOOKS

人生自古誰無死？

換取此書遺後人。

丁酉年八月十五日凌晨一時許

放眼窗外，夜色正濃，靜坐待旦

縱論國是續新篇

——紀念丁酉之難六十周年

胡顯中◎著

OPEN

縱論國是續新篇

作 者：胡顯中

發行人：金 鐘

編 輯：葉 子

設 計：Max

出 版：開放出版社（OPENBOOKS）

電 話：（852）9020 6757

E-mail: open@opencomhk

網 址：<http://www.open.com.hk>

POBox20064HennessyRoad,HongKong,

總經銷：田園書屋

電 話：（852）23858031

傳 真：（852）27702484

地 址：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56 號 2 樓

出 版：2017 年 10 月

定 價：港幣 80 元

國際書號：ISBN 978-962-79345-6-1

序：反右教訓與整人報應

——武宜三

『拔劍四顧心茫然，我的仇人在哪裡？！』這是胡傑導演、攝影的《遼西紀事》中右二代尹俊驊的怒吼，殺父之仇、國仇家恨化做一股衝天冤氣，直上牛鬥。尹俊驊的父亲尹紹堯（1920—1960）是遼寧大學貿易系講師，1958年被『補充』為極右分子，1960年被活活餓凍而死在淩源山區勞改場，拋屍荒野。2006年，尹俊驊等8個兄弟姐妹到淩源尋找父親的『墓地』。

胡顯中先生也是右派分子，只是他『福大命大』活到了現在。胡先生1948年入中共閩浙贛邊區城工部，開始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1949年，該組織被認為是叛徒組織，許多同志、戰友被自己人殺了；胡躲過初一，沒躲過十五，1955年被當作『胡風分子』隔離反省。1957年又上當，輕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承諾，寫《胡風等人是反革命嗎？》、《再論胡風問題》為胡風辯護。終於跌入陷阱，受苦受難20多年，九死一生。反右運動過去60年，施害者仍然不肯承認錯誤、賠禮道歉、賠償受難者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損失。

（一）

根據維基百科《各國諾貝爾獎得主人數》顯示，中國在四

種科學獎項中基本上空白，因為屠呦呦其實是『中華民國』的產品；而周邊國家地區——日本 22 個、俄羅斯 16 個、印度 6 個、台灣 1 個、香港 1 個。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德國、蘇聯等，都拿到『四種科學獎』。中國的創新幾乎是零，連抄襲、複製也不及格，從奶粉到珠港澳大橋、太空火箭，再到航空母艦，有一樣讓人放心的嗎？這不是『新中國』人的恥辱嗎？！

為什麼中國的社會科學不行，物理、化學、醫學、數學也大大的落後呢？這就一、『歸功』於毛澤東在 1957 年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從此，『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行之有效的辦學經驗被徹底拋棄；外行領導內行，文盲霸道、泥腿子橫行，大學和科學機關淪為製作『螺絲釘』生產線，文革期間居然把所有大學、中學、小學一起關閉整整十年；現在更變成養豬場，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除盛產貪官汙吏、叛黨叛國分子之外，離它們天天吹牛的『第一流大學』也不知道還有幾萬幾千公里！只是這些不知羞恥的官僚仍然屍位素餐，假裝睡著。

天天吹噓『崛起』、標榜『世界第二經濟體』，但是錢到哪裡去了呢？一、世界銀行報告顯示，中國大陸 1% 的家庭掌握了全國 41.4% 的財富，高收入的國營企業高級主管與社會平均工資差距達 128 倍（RFA2010-06-09）。這是 2010 年的數據，現在當然更加嚴重。即使『北京、南京等地城鄉低保標準』也不過每人每月 710 元（北京）或者 700 元（南京）人民幣；老百姓仍然是『看不起病、讀不起書、買不起房子』。

就是這一點可憐的低保，仍然被層層克扣，造成農民的極度貧窮、絕望。甘肅康樂縣 28 歲農村婦女楊改蘭在 2016 年 8 月 26 日用斧子砍死 4 個年幼子女後，服毒自殺；8 天后，楊改蘭的

丈夫李克英也上吊而死。造成如此惡性案件的政府官員僅僅受到『留黨察看一年』頓是『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中共官員工資福利取自民脂民膏，受處分卻享受團體的保護和照顧！）

二、滿世界撒錢，中國援建斯里蘭卡的馬特拉機場、港口等工程，耗資20多億美元。中國援建烏茲別克的『亞洲最大隧道』和公路，耗資數百億。中國投資在利比亞的300億美元、伊拉克的200億美元、委內瑞拉500億美元，在敘利亞、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菲律賓等地的巨大投資，都無望收回了。

一帶一路修往歐洲的43條鐵路幹線，42條沒貨物可拉，都在賠錢，各省市政府必須給每節車皮3500—5000美元補貼，以保持各鐵路幹線的繼續空轉……

這些都是反右派運動後『大躍進』傳統，不要內行，不要科學，不要人大批准。

在《世界各國人均月收入一覽表（已折合為人民幣）》的70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70位，連保加利亞等前『社會主義國家』都跑在中國前面；可憐也夫，可恥也夫：

- | | |
|----------------|---------------|
| 1、列支敦士登 46,520 | 2、盧森堡 46,123 |
| 3、挪威 37,435 | 4、阿聯酋 31,137 |
| 5、冰島 31,055 | 6、愛爾蘭 29,479 |
| 7、瑞士 28,502 | 8、丹麥 27,806 |
| 9、美國 24,921 | 10、卡達 23,539 |
| 11、瑞典 23,359 | 12、芬蘭 22,283 |
| 13、荷蘭 22,274 | 14、奧地利 21,827 |
| 15、日本 21,814 | 16、英國 21,410 |
| 17、聖馬利諾 21,236 | 18、比利時 20,799 |
| 19、澳大利亞 20,377 | 20、法國 20,191 |

- | | |
|-----------------|--------------------|
| 21、加拿大 19,930 | 22、德國 19,610 |
| 23、科威特 18,865 | 24、義大利 17,486 |
| 25、西班牙 16,370 | 26、歐盟 16,164 |
| 27、新加坡 15,828 | 28、中國香港 15,366 |
| 29、紐西蘭 15,358 | 30、汶萊 14,235 |
| 31、塞普路斯 12,509 | 32、希臘 12,449 |
| 33、以色列 12,109 | 34、巴林 11,796 |
| 35、中國澳門 10,924 | 36、斯洛維尼亞 10,016 |
| 37、葡萄牙 9,944 | 38、韓國 9,574 |
| 39、中國臺灣 8,889 | 40、捷克 7,305 |
| 41、沙烏地阿拉伯 6,884 | 42、匈牙利 6,436 |
| 43、阿曼 5,989 | 44、斯洛伐克 5,257 |
| 45、克羅埃西亞 5,074 | 46、墨西哥 4,379 |
| 47、智利 4,221 | 48、利比亞 4,022 |
| 49、波蘭 3,903 | 50、俄羅斯 3,868 |
| 51、馬來西亞 3,344 | 52、南非 3,208 |
| 53、委內瑞拉 3,184 | 54、土耳其 3,069 |
| 55、阿根廷 2,796 | 56、羅馬尼亞 2,665 |
| 57、巴西 2,464 | 58、哈薩克 2,264 |
| 59、保加利亞 2,182 | 60、阿爾及利亞 1,854 |
| 61、秘魯 1,711 | 62、安哥拉 1,709 |
| 63、哥倫比亞 1,675 | 64、伊朗 1,666 |
| 65、突尼斯 1,660 | 66、泰國 1,591 |
| 67、厄瓜多爾 1,581 | 68、塞爾維亞 1,536 |
| 69、亞塞拜然 1,185 | 70、中國 1,155 (天涯論壇) |

經過反右派、大飢荒、四清、文革，中國政治環境一步步惡化。

終於到了『人人生活在恐懼之中』，從國家主席、總書記到販夫走卒，概不例外。

把知識分子、把擁護自己的老百姓、把同志戰友當作敵人，對他們搞陰謀詭計（即使詭辯是『陽謀』，又有什麼區別呢），『誘敵深入，圍而殲之』，把幾百萬知識分子推入火坑，在條件嚴酷的勞改場所，造成知識精英、優秀幹部的大面積死亡，因此帶來的文化斷層、人才斷層至今仍然無法修復。

一生都致力於打倒傳統、毀滅文化、摧毀教育、破壞學校、消滅知識分子的毛澤東及其一夥，為什麼對中國、中國人民有如此刻骨的仇恨呢？

（二）

商鞅、李斯，作法自斃，自斷后路，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未俊臣、周興，沒有好下場。

李韶九、夏曦，殺人無數，功勞如山，最后死於非命。

康生、謝富治，僥倖善終，骨灰還是被扔出八寶山，禍延子孫。

文強、王立軍、何挺、丘進、馬建、周永康，九九歸一，結果都是階下囚。

陳紹基、朱明國、周永康，都是雙規別人的人，如今被人雙規。

史達林的衛隊長從雅哥達、葉若夫到貝利亞，中國的從楊尚昆到令計劃，心狠手辣，『忠心耿耿』，到底祇保衛了別人，而不能保衛自己。

『陳泊、陳坤案』是 1949 年開國后公安系統最大的人為冤案。廣東省公安廳幹部被抓 700 多人，廣州市公安局幹部被抓 300 多；被酷刑審訊，羅織構陷，給黨國帶來巨大傷害；雖

葉劍英也無法保護其手下愛將。

因為羅瑞卿拿的是毛澤東的尚方寶劍，親自南下廣州抓人辦案。

到 1966 年，意氣風發的羅瑞卿也被逼得跳樓自殺，這時不但劉少奇、鄧小平熱嘲冷諷，葉劍英也幸災樂禍，吟詩曰：『將軍一跳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羅點點含恨至今！

羅瑞卿接班人李震自殺、謝富治被秋后算賬。公安保衛，權力太大，也最危險。權力太大，奉旨殺人、隨心殺人，殺人沒商量，血債太多，難免有報應，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舉頭三尺有神明』，手執鎮壓之權的人，你們的后背不發涼嗎？

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林彪、張霖之、田家英、吳晗……固然被整死；但是，毛澤東一死，江青、毛遠新即被下獄。毛澤東立馬成了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家屬』，為天下笑，報應之快。翻掌之間。

毛澤東當年在《沁園春·詠雪》中發的正是帝王復古夢。有人批評他是黃巢、李闖之流，沒錯，毛澤東是成功了的黃巢。民間傳說『黃巢殺人八百萬』，已是『空前』，卻未能『絕后』，被毛殺死、害死、餓死的中國人是八百萬的十倍八倍。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又哭又鬧：『一個兒子在朝鮮死了，另一個瘋了。『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無后乎？』說得好，也是現世報應！毛澤東肯定『空前』了，但是否『絕后』？就看我們能否徹底清算毛澤東和反右派運動。

想劉少奇攜妻王光美，到處吹捧『桃園經驗』，得意洋洋；1966 年還『依樣畫葫蘆』想在學生中抓右派，真是利令智昏。

昨天還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親密戰友』、『可靠接班人』，

今天成為『反革命分子』、『走資派』或者腐敗分子。

昨天如果你反對他們，犯的可是『攻擊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陰謀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罪，今天，他們被打倒了，你卻不一定能翻案。例如，林昭、劉文輝、張志新，雖然被『平反』了，卻仍然不能見光。

內鬥不斷，殺人如麻，殺的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什麼不學習香港、臺灣的成功經驗——公佈官員財產、開放輿論監督、把選票還給老百姓呢？

總結反右教訓，改變整人傳統，實現憲政，人人免於恐懼。

（2017.10.22）

前言：一份試卷 雙方共贏 三點啓示

——胡顯中

這篇前言是第三稿。前兩稿爲什麼放棄？因爲其內容大都是人所共知、而又毫無約束力的東西，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5 條關於言論自由的條款，還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3 章第 19 條的規定。雖然這後一文件早在 1998 年就被我國政府駐聯合國代表秦華孫大使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但時隔近 20 年，迄今並未交付全國人大討論通過。

如果這兩個文件具有權威性和法律效力，那麼，我們今天現實生活中許多令人遺憾的事情就不會發生。既然發生了，就說明這兩個文件沒有起作用，無法約束權力。

遙想當年，『國家主席』劉少奇在面臨突如其來的災難時，爲了捍衛自己的人身安全 and 人格尊嚴，曾以《憲法》爲自衛武器。結果如何？人所共知。國家憲法應該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但連國家主席的人身安全都捍衛不了，遑論普通老百姓？

爲什麼在一個號稱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裏，憲法如此不被重視、毫無權威？請聽毛澤東的一段話：

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

害的……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在1954年憲法討論會上的發言；1957年秦皇島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的講話。現存於中央檔案館一室）

這就是答案！

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興師動衆、費神勞力去制定這個文件呢？答曰：用來做道具。

什麼叫『道具』？請看京劇『貴妃醉酒』裏，貴妃娘娘手裏那把扇子：忽而左手，忽而右手，忽而打開，忽而折上。極盡其妙，極顯其美。有了這把扇子，再配合貴妃娘娘那婀娜多姿、儀態萬方的身段，和婉轉纏綿的唱腔，還有那三分醉態、七分媚態、攝人心魄、引人遐思的表情，才能相得益彰，才能令人流連忘返、百看不厭、常看常新。因此，這個『道具』非常重要。

觀眾都知道：這把扇子根本就不是用來扇風納涼的。如果有哪個大傻瓜真的用它來扇風，那就叫不懂規矩，或者說：破壞了規矩！就得被勒令出局！

既然只是爲了好看的，我在前兩稿裏提到《憲法》管用嗎？好比對一個無神論者談論上帝、真主、佛呀等等，會聽你的嗎？

對前面兩稿都不滿意，正在考慮另辟蹊徑的時候，看了廣州出版的《隨筆》第三期上一篇吳鈞先生的文章《小蘇罵皇帝》，頓時眼前一亮：好！好在內容令人耳目一新。於是寫出了這個第三稿。

小蘇者，何許人也？就是被中國人民所津津樂道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轍；也是人們如雷貫耳的大詩人蘇軾（蘇東坡）之弟。小蘇的文采和名望雖然不及乃兄，但僅僅『罵皇帝』這篇杰作就彰顯出無人能及的膽略和勇氣。

被罵者誰？大宋王朝第四代皇帝——趙禎。由于其在位期間廣施仁政，死後被贈予『仁』的謚號，可謂名至實歸。

具體情節如下：公元 1061 年，宋仁宗嘉佑六年，蘇軾、蘇轍兄弟二人同時參加當時選拔人才最高級別的『制舉』考試。在這命運和前程悠關的關鍵時刻，這個 23 歲的青年在試卷上寫下了六千多字的答卷。在答卷中，肆無忌憚地把當朝皇帝罵了個痛快淋漓。他寫道：

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陛下賦斂繁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今凡百姓所爲，莫不有稅，茶烟酒鐵，關市之徵，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

在這段話裏，把當朝皇帝罵得比昏君還壞：昏庸無能，稅斂無度，百姓苦於無助，大臣昧於無能。簡直就要『罷免』他了！如此以下犯上，可忍孰不可忍？

尤有甚者，小蘇在試卷裏，竟然干預皇帝的宮中生活：

『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

這是公開抨擊皇帝喜好女色，怠慢政事。

自古以來，哪個皇帝不是三宮六院、七十二偏妃？根據史料所載，仁宗皇帝在私生活方面還是比較節制的，他甚至多次放宮女出宮，既減少宮中靡費，更讓人家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兩全其美。但小蘇根據道聽途說就大膽放言無忌，膽敢冒犯天威。說他『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污蔑領導』應該不過分吧？

許多懷才不遇的人經常自嘆『生不逢時』。小蘇則恰恰相反，可謂生逢其時。如果早生一千多年，在秦始皇時代，像他這樣放肆地攻擊皇帝，豈能容得下他？

如果晚生九百年呢？又趕上了秦始皇的鐵杆粉絲——毛太祖時代，如此『攻擊』偉大領袖，何其囂張，何其惡毒！千刀萬剮不足贖其罪，碎尸萬段方泄心頭恨。

這段歷史離我們並不遙遠。上個世紀 70 年代，特別是 1970 年前後大規模血腥屠殺的高潮中，多少人因為『惡毒攻擊』而血濺刑場，魂飛天外。其實這些人的所謂『罪行』不過是幾句閑言碎語，甚至僅僅一兩句話罷了。哪裏敢像小蘇那樣長篇大論、指名道姓地『攻擊』皇上？比較起來，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小蘇的幸運就在於：恰恰不早不晚，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最開明、最寬宏大度的朝代——宋朝；而且又碰上了那位特別寬厚的仁宗皇帝。

『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自古以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就是把自己『貨與』（即賣給）當朝皇帝，以尋求一條實現自我價值的快車道——入仕，小則安身立命，大則經邦濟世。

既然你是賣方，買主就是皇帝。像小蘇這樣的賣方，能獲得買方的歡喜嗎？肯定不能。因此，面對這分答卷，大部分考官都不同意錄取。

如果在今天高考試卷中發現這樣一份『政治上極其反動』的卷子，閱卷人還敢通過嗎？可以肯定：沒有一個評委膽敢通過，只能判定為『0』分。這個年輕人一輩子就別想上大學了！更別想當什麼『國家公務員』，你就老老實實在農村『修理地球』吧！

在閱卷過程中，還真有極個別的大臣，堅持錄用（如著名的人物司馬光）。當雙方爭執不下時，只好上交到皇帝手裏了。但哪個皇帝願意錄用如此大膽的狂徒？

歷史上還真就有這樣的主子：久負盛名的唐太宗就是一個。可惜小蘇沒趕上。但小蘇趕上了另外一位寬厚仁慈的主子：宋仁

宗力排衆議，竟然錄取了小蘇！小蘇在參加『制舉』以前就是個小官——澠池縣的主簿，這次竟然提拔爲商州軍事推官。

仁宗皇帝何以如此寬厚呢？請聽他的理由：

『設制科本求直言，蘇轍小官，敢言，特命收選。轍雖妄說，果能誑天下之人哉？』

（點評：這就叫自信！是真正的自信）

他還說：

『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

（點評：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任何人都應該有所敬畏，尤其是掌握生殺大權的皇帝，更應該懂得敬畏，才會有所遵循，不敢胡來，不敢任性。）

事情到此，並沒有結束。諫官楊畋提議：此爲美事，可傳至後世，當付史官記錄下來。

在這場試卷風波中，小蘇應該感謝皇帝的寬宏大度；而仁宗更應該感謝小蘇，正是這個小蘇的『反趙行爲』和大膽『攻擊』，才彰顯了自己的寬容大度。

青史留美名，美名傳千古。

這段歷史給我們的啓示之一：每個知識分子都應該有『看齊』意識。向誰看齊？當然是向蘇轍這樣大智大勇者看齊。學習他那種不計利害、敢於直言、『文以載道』的精神。

什麼是『道』？就是真理、正義。不論說話、寫文，都必須傳達真理與正義。

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說得最到位的應該算魯迅先生：『真的知識階級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真的知識階

級是不顧利害的……他們對於社會永遠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

但在那個令人詛咒的年代，在榮與辱、生與死的考驗面前，多少文人學者一個個放棄人格、出賣靈魂、背叛良知，做出了賣友求榮、落井下石的無耻勾當。芸芸衆生，也都一個個鉗口無言，默默地承受着專制高壓，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士可殺而不可辱』，這個話說得好！但現實生活中做得到嗎？士不僅可殺，也可辱；可以先辱後殺，也可以先殺後辱……正因為如此，才彰顯極少數杰出人物的可貴與可敬！

自古以來，罵皇帝者不少。但都必須付出慘重的代價，甚至生命。毫髮無損、全身而退者，唯小蘇一人。因為他遇到了『明主』。

啓示之二：值得尊敬的還應該包括趙禎這樣的皇帝。身為一國之君，有權不用，反而放下身段，傾聽民意。

趙禎難道就不能把這個『最最最反動分子』抓起來，投入監獄？非不能，乃不爲、不屑爲也！堂堂國君，豈能鼠肚雞腸、睚眦必報？

海峽對岸那位傳奇人物蔣經國有句名言：『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嗜權如命，用權如狼，古往今來多少政客都是這個德性。而蔣經國却是一個可貴的例外，因為他雖身居高位，却仍然保持一份難得的清醒。

縱觀趙禎一生，在位42年，政績斐然。人們在戲劇舞臺上經常看到、並且津津樂道的『包公』，就是在他的手下爲官。從地方官升遷到朝廷擔任監察御史。

且說這位仁宗皇帝，也有犯渾的時候。爲了討好張愛妃，忽然想要提拔她的親叔叔張堯佐擔任三司使（主管中央財政的高

級幹部，地位僅低于副宰相）。滿朝文武雖然明知不妥，但無人敢于公開阻擾。因為專制社會乃是“家天下”，官員的烏紗帽就是皇帝的囊中物，皇帝想給誰就給誰，哪個管得了？哪個敢管？

唯有這位包拯挺身而出，不計利害，面折廷爭。在進諫時，慷慨陳詞，情緒激動，甚至把吐沫星子噴到仁宗的臉上，大失君臣之禮。如此放肆，哪個皇帝能容忍？但仁宗僅僅以衣袖擦拭一下，繼續傾聽其陳述。最後還是接受了包拯的諫阻。古往今來，哪個皇帝有如此海量？

在其治下，人才濟濟、名臣輩出。最著名的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流傳千古。警策了歷代多少讀書人？為官的視其為楷模，在野的視其為偶像。

中國歷史上久負盛名的唐宋八大家，宋朝就佔了六位；而這幾位的傳世名作大都產生于仁宗時代。中國人民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其中三項（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藥）就產生在大宋朝，而且恰恰集中于仁宗時期。

這一切政績，難道是偶然的嗎？非也！

哲學原理告訴我們：偶然性的背後，一定有必然性在支撐。

政寬則民富，民富則禮義生；禮義生則文教盛。如此良性循環，就是歷史的必然性！由于趙禎個人的明智和寬容，在上述必然性的作用下，才在歷史上留下一個『仁宗盛世』的佳話。

今天，人們經常說『雙贏』，什麼叫『雙贏』？小蘇和仁宗就是最具有說服力的典型。

啓示之三是：毛澤東時代強調『階級鬥爭』，鬥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結果如何？歷史已經做出了雄辯的結論：刑場上飛濺的鮮血並沒有帶來所謂『紅彤彤』的共產世界，更不可能實現其

稱雄全世界的野心。恰恰相反，成為他自己晚年揮之不去的夢魘。

今天是不是可以換一種思維：互相成全，實現『雙贏』，豈不美哉？

營養學家勸導人們：吃慣了精米白面的人，應該適當吃一點粗糧，比如小米、玉米、蕎麥、燕麥之類。這就叫做：營養平衡、合理膳食。

同理，聽慣了順耳之言、吹捧之聲，何妨也聽聽逆耳之言、勸誡之音？這叫什麼？這就叫做：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逆耳之言未必都是真理，但那些專門投其所好，專門說順耳的話、吹捧和恭維話，專門揣摩領導人性格、愛好，用花言巧語、甜言蜜語，包圍領導人，讓領導人心花怒放、飄飄然，同時也陷入昏昏然無底深淵的人，可以斷言：沒有一個好東西！

何以見得？有史為證：從齊桓公時期的易牙、豎刁、開方，一直到毛澤東手下的林彪、康生等等，無一例外，哪個是好東西？

有鑒于此，2013年初，恰逢中國人民傳統佳節，剛剛上位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各民主黨派、各界人士共度新春佳節時發表講話中，曾經這樣向全國人民昭告：

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黨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講真話，敢于講逆耳之言，真實反映群眾心聲，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希望同志們積極諫諍言、作批評，幫助我們查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幫助我們克服工作中的不足。

君無戲言！

孔子教導人們：『言必信，行必果。』

目 錄

序：反右教訓與整人報應·····	武宜三
前言：一份試卷 雙方共贏 三點啓示 ·····	胡顯中
應該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50年後的反思 ·····	1
錄以備考：又一本紀念反右運動著作被查禁·····	24
中國大陸人權理論的三大誤區·····	31
歪曲醜化與揭示真相 ·····	40
按權分配是當今中國社會轉型的最大障礙·····	45
對大陸高校培養目標的質疑·····	53
且看毛澤東是如何『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69
對共產黨理論基礎徹底顛覆之作 ——喜讀《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	83
第三隻眼睛看朝鮮戰爭·····	94
中國知識分子百年遭遇的縮影 ——《心遠——一個教育世家的百年滄桑》讀後感 ·····	99

「地下黨 16 字方針」完全是歧視與偏見的產物	104
歧視與偏見的又一鐵證	109
對精英人才大量流失的沉思	115
為何否認《鄧穎超日記》?	120
駁斥李慎明為專制暴君毛澤東招魂的謬論	123
為歷史化妝、整容 莫如與過去切割	130
一個中科院院士為其洗脚的右派——陶懋順	138
海外緝貪固然好 首選『衙內』必更佳	146
異化的輿論失去監督而成為導向	149
文革：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怪胎	156
細說文革史，重評毛澤東	
——中國人所面對的必答題	173
毛澤東『進京趕考』的成績如何?	183
一場暴風雨 右派知多少?	
——為反右派 60 周年而作	201
當年的『罪證』 今日的『文物』	
——丁酉之難幸存者的回憶	209

【 附 錄 】

沉痛的悼念 深切的緬懷

——追思李健、張自旗二位南昌地下黨領導人	216
----------------------------	-----

挽張自旗聯·····	225
八十自壽·····	226
桑榆晚景 爲霞滿天 ——《人生第二春徵文》·····	227
親歷『文革』期間的『涼鞋』事件·····	229
一個『右派』眼中的『文革』 ·····	234
孟子民本思想新探（節錄）·····	246

【未刊稿】

一個震撼人心的嚴重問題	
——從溫家寶總理的內疚談起 ·····	257
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歷史考察	
——兼議「吃飯」與「砸鍋」 ·····	266
中共宣傳中的三大謬誤·····	272
自信何須維穩？維穩談何自信？·····	284
《長恨歌》——白居易的一大敗筆 ·····	289
後記 ·····	292

應該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

——50 年後的反思

50 年前，在中國政治大舞臺上，演出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活劇。對於這場改變了幾百萬人命運、同時也改變了新中國發展方向、更進一步影響到中國社會民主化、現代化進程的重大事件，應該如何評價呢？中共中央早在 1981 年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里已經承認：『反右派鬥爭被嚴重擴大化了』。10 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的 70 年》這本權威性的著作里，進一步批判道：『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這就成為後來黨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一次又一次犯擴大化甚至無中



本書作者在反右 55 周年研討會上發言

生有的錯誤的理論根源。』

在當時的條件下，這個結論對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和啓蒙作用。但是，關於那場影響深遠、後果嚴重的重大事件的評論，是不是就到此爲止了呢？不會的！

歷史在不斷地發展，社會在不斷地進步，人們的認識無疑也應該「與時俱進」。先來考察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在建國以來所取得的成就面前，中共高層領導之間產生了明顯的分歧。毛澤東看到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劉少奇和另一位副主席、主管經濟工作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日隆，深感到自己的最高權威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因此，他在私下里頗爲不滿地說：我就不相信，我不能管理經濟工作！於是，他直接插手經濟工作，批評第一個五年計劃有些經濟指標太保守，並繞過國務院直接向有關部、委下壓高指標，結果造成物資供應全面緊張、國民經濟發展嚴重失衡，致使建國以來第一次出現財政赤字。

人們應該記得：早在 1943 年 3 月 20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新的書記處，毛爲主席；並且根據劉的提議：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毛有最後決定之權。作爲回報，毛則在改組書記處時使劉從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躍而成爲黨內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毛的第一助手^①。毛與劉之間，完成了一樁政治上的交易。當然，在這場交易中，獲益最大、最多的還是毛。到了 1945 年中共的「七大」，劉少奇在大會報告里有 104 次熱情洋溢地提到毛澤東的名字，並且提出把「毛澤東思想」列入黨章，作爲指導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原則。從此，毛在全黨的威望也如日中天，達到了頂峰。可是在 11 年後，也就是在 1956 年的「八大」上，同一個劉少奇在報告里就只有 4 個地方提到毛的名字，而且其中一個地方還是頌揚毛堅持黨的民主集

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尤其令毛不能容忍的是，「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這一條竟然被刪除。對此，劉後來在「文革」中被迫回答紅衛兵小將的質詢時，是這樣解釋的：『對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有了成熟的經驗，並且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可是，現在我們面臨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對於這樣一個新的任務，我們暫時還沒有成熟的經驗。因此，還是不提為好。』

人們自然要產生懷疑：這股向毛的絕對權威挑戰之風是從那里刮起來的呢？1956年2月，在國際上發生了一件大事情：蘇共召開第20次代表大會。在會議臨近結束時，赫魯曉夫作了以揭露斯大林大搞個人迷信和肅反擴大化、濫殺無辜為主要內容的《秘密報告》。毛澤東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感到：『這勢必會波及我們中國』（毛對江青語）。另據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胡喬木的回憶：『毛主席在很長的時間都認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蘇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這對毛主席的刺激得非常深的。』②

毛的預感是對的。據最近解密的資料：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兩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只能連任一屆；要限制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制。這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聯名提議，並由17名政治局委員中的15人贊成通過。（毛澤東、林彪二人棄權）。（該資料是200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30周年時，剛剛解密的鄧穎超日記檔案裏的詳細記載。日記所記是1975年11月22日，周病危時的談話。從其中可以看出周那時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是一種內疚和懺悔，後悔沒有堅持這一條）從這裡明顯可以看出：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數成員已經有了預感，並且做出了莊嚴的規定，以防止斯大林現象在中國的重演。遺憾的是，這個決

議並沒有得到認真的執行，流於形式，變成一紙空文。

1957年1月召開的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毛說：蘇共20大以後，我們黨內大多數人是正常的、穩定的。但也有少數人有波動。下雨以前總會有螞蟻出洞，在中國也有少數螞蟻想出洞活動活動。我看對待這些螞蟻，不一定用滾水澆，用掃帚打掃一下也就把他們掃除干净了。這就是他對當時形勢的判斷。但其他領導人却另有自己的看法：劉少奇在1957年初政治局會議上說：『這些年，我們還是少提毛澤東思想，多提馬克思主義，不要讓蘇聯同志認為我們是在搞個人崇拜。個人崇拜的最後結果必然是破壞黨內民主，不利於黨的集體領導的發展。』與其相比較，聰明的鄧小平的說法就顯得十分委婉和策略：『毛主席一個特點就是善於總結經驗、接受教訓。今後我們不搞個人說了算，採取集體領導，避免斯大林晚年悲劇的重演』。把他們幾位的觀點比較一下就不難發現：其中有着重大分歧：毛澤東首先是不同意「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在「八大」閉幕僅僅三天以後，在天安門城樓上，就對劉少奇說：「八大」決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有問題（據王光美的回憶）。其次，他明確表示：不同意蘇共糾正斯大林錯誤的做法，更反對在中國批判個人崇拜。他認為：國內有一股右傾、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一定會利用這個時機跳出來。他說：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非跳不可。爲了讓他們在對我們有利的時候跳出來，就只好引蛇出洞了。於是就有了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但是劉少奇並不同意這個「引蛇出洞」、陷人入罪的做法。他在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出籠10天後，即5月7日，在聽取楊獻珍的匯報時，針鋒相對地指出：『整風就是要強調同一性，因爲原來就是有同一性的，我們沒有必要強調鬥爭，故意

地、人爲地使矛盾激化，使鬥爭緊張起來，似乎要創造鬥爭的樣子我們才舒服』。

《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人民日報》見報以後，毛澤東又指示：《人民日報》和一切黨報在5月8日到6月7日這段時間里，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也暫時不做反批評；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黨組織，對於錯誤意見也暫不予回擊。這還不算，毛澤東還親自出馬，先後作了《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報告。爲的是虛構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和自由、民主的良好氣氛，好讓人們相信：似乎真的要實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方針，以引導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就是所謂的「引蛇出洞」，也就是他後來頗爲得意地承認的所謂「陽謀」！

一個月後的6月8日，毛澤東開始收網：停止整風，進行反右派鬥爭。刹時間，雷鳴閃電、暴風驟雨，參加鳴放的人們一個個都被澆成了落湯雞。又過了10天，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這篇權威性的文章是根據原來毛的口頭講話，但同時又做了許多重要修改和補充，最爲要緊的是加上了區分香花與毒草的所謂「六條標準」。直到這個時候，那些在毛澤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誘惑下，積極響應、幫助中共整風的衆多善良的人們，才醒悟過來，但是已經太遲了！正如朱正先生在其《1957年的夏季》一書里所言：『看到赫然在目的六條標準，才發覺自己已經誤入白虎節堂，叫苦不迭了』③朱先生所說的「白虎節堂」乃是《水滸傳》里高太尉爲了陷害林冲而設下的陷阱。在京劇《林冲夜奔》（或叫《野猪林》）里，林冲誤入白虎節堂以後，面對高太尉，發出了義正詞嚴、悲憤滿腔的控訴。那段對白以及唱腔，仍然久久地回蕩在

人們的耳邊，引起多少人強烈的共鳴。

曾經有這樣的說法：似乎毛澤東本來是真心打算開展整風運動，後來是因為這些「牛鬼蛇神」鬧得太不象話，甚至叫囂要推翻共產黨，要殺人……才迫使毛澤東改變主意，開始反右派鬥爭④。這個辯護是徒勞的，也不符合歷史實際。最了解事實真相的不是別人，正是毛自己。恰恰是毛澤東自己公開承認，他是採用「引蛇出洞」的辦法，並且不無得意地發明了一個新詞：這不叫陰謀，而是「陽謀」。還可以舉出曾經參加延安整風的何方根據親身經歷所寫的《黨史筆記》里所提供的實錄：當年整風的先行步驟也是以放為主，不許壓制。毛澤東認為，這樣做的目的正是為了「讓有錯誤思想的人盡量表現其錯誤觀點……還可以使內奸利用我們的民主政策，認為有機可乘，以便誘使他們盡情暴露出來」⑤。瞧！這不就是 1957 年反右前期「大鳴大放」的原始版本嗎？看來，毛澤東對於這個手段已是輕車熟路，因而運用自如了，他也就成為搞所謂「陽謀」的行家里手。

經過 20 多年的實踐以後，1978~1980 年「落實政策」，對右派進行甄別。甄別的結果是：在全國 552,877 名右派中，不予改正的只有 96 人，佔全部右派分子的 0.00018%。也就是說 99.99% 都屬於錯劃，錯案率為 99.99% 以上。人們習慣地說「擴大化」，到底擴大了多少？答案是：5,000 倍。每名貨真價實的「右派」要用 5,000 多名無辜者來陪綁！當年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共產黨」。幾十年後，毛為了抓一個右派，竟然不惜用 5,000 名無辜者來陪綁。真是「青出於藍而甚於藍」，老毛超過了老蔣 5 倍！

也許又有人出來辯解說，右派分子大部分沒有被殺害。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那些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生存狀態和下場如何。

到底有多少「右派」死在勞教、勞改隊里？一直是中共當局嚴守的「機密」，但我們可以從許多個案材料來推算一下。首先應該提到的是的《夾邊溝記事》（作者：楊顯惠 2003 年出版）該書記述甘肅酒泉境內一個名叫夾邊溝的勞改農場，3000 名右派，最後只剩下幾百人。再根據《九死一生》（作者：戴煌 1999 年出版）第 25 章的記載，在遼寧省錦西煤礦勞動的 1200 多名右派分子中，直到作者本人「死里逃生」離開時，已經死了 1001 人。還有一份網上的資料：『一份《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的發現』（作者：大陸自由撰稿人 傅國涌）。在這份材料里寫道：『僅僅這本 1963 年 7 月登記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與莫桂新（女高音歌唱家張權的丈夫——引者注）一樣死在興凱湖農場或北京的清河農場、北苑農場勞動教養的右派，就有 94 人。這是一個極不完整的記錄，但就是這個記錄已足夠觸目驚心。美學家高爾泰等夾邊溝的幸存者曾見證了無數右派同伴的死亡，靠的是記憶，這次發現興凱湖等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是官方的記錄，具有別樣的意義。無論是這樣的官方性質的檔案材料，還是幸存者的記憶，無疑都是一座座山一樣的紀念碑。』還有其他好幾本有關書籍的記載就不必一一列舉了。從這些資料可以推算出來，右派分子的死亡率超過 80%；55 萬多右派最後僥幸活下來的恐怕不到 1/4；即使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也是身心備受摧殘、傷痕累累。由此可見，毛澤東采用的是慢性殺害的辦法，也就是用鈍刀子割肉，讓被害人受盡折磨，最後痛苦地死去。比較一下，很難說哪一個辦法更仁慈，或哪一種辦法更殘忍。

至於那 96 位不予改正者的具體「罪行」是什麼？我們在後面還要分析。就「不予改正」這一點來說，恐怕也是爲了保持毛澤東的面子、維持他那「偉大領袖」的威望，爲了證明反右派運

動沒有全錯，勉強地留下幾個？這樣看來，這 96 位也就成了政治需要的犧牲品。

* * * * *

反右派運動的後果如何？首先是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確立了他在黨內「一言堂」的地位，形成了黨內的「家長制」。對此，鄧小平在復出以後多次談到：黨內的「家長制」和「一言堂」現象就是從 1957 年開始的。仔細研究以後就不難發現：鄧用「家長制」和「一言堂」來概括毛的錯誤，其實是很委婉的說法。「一言堂」的實質就是：一切國務大事都由皇帝或不戴王冠、不穿龍袍的現代皇帝一個人「朝綱獨斷」。這不就是封建時代的君主專制制度嗎？因此，也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正是通過反右派運動開始一步一步地實現其封建復辟活動（按照中國最具有權威的《康熙字典》的解釋：辟者，君也。復辟就是恢復君主專制制度）。到了「文革」時期則是其復辟活動的最後完成。還可以進一步斷定：毛澤東才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皇帝，即真正的「末代皇帝」；而中國封建社會史的下限則應該劃定在 1976 年最後一個封建皇帝的駕崩。令人不能理解的是，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把毛的像掛在天安門前，這意味着什麼？傳遞着什麼信息？中共經常批評日本國家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理由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可是中共仍然掛毛澤東這個暴君的頭像，難道就不傷害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及其家人的感情嗎？『己所不欲，毋施於人』這是古人的明訓，也是中國人做人的基本道德信條。

其次，是敗壞了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形象。1936 年 12 月 28 日毛澤東在批評蔣介石的聲明時，曾經理直氣壯地要求蔣氏實踐「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毛還警告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⑥。當全國人民讀了毛那篇文章時，一定會認為：毛澤東應該是

天下最講信義的人。可是事實恰恰相反，21 年以後，毛就把自己不講信義、不擇手段的痞子形象暴露無遺了。黨內德高望重的老前輩楊獻珍當時就抨擊道：『一個堂堂的執政大黨，不敢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的態度，竟然鬼鬼祟祟地采取兩面三刀的手段，實在太不象話！』⑦。1957 年以後，在老百姓看來，共產黨已經變成了言而無信、口是心非、專門搞「陽謀」的政黨。不僅如此，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國際社會的信用檔案里，中國共產黨已經被列入了最無信用者的黑名單。

反右派運動的第三個惡果是：斷絕了一切言路，從此再也沒有人給共產黨提意見了。這一方面表明：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革命黨變成了專制獨裁的黨。鄧小平說過：『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⑧既然制造了「鴉雀無聲」的局面，還有資格自稱為革命黨嗎？另一方面也敗壞了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從反面教育人們：不能做老實人，要做偽君子！於是在全國掀起了人人說假話、空話、大話、套話的大高潮。『中國人詭詐、缺乏公義、見風使舵、投機主義、功利至上，這些惡劣品行在全人類中都是出類拔萃的。為什麼如此？第一是政治生存環境惡劣』⑨。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先生說得更到位：全民說假話，這才是真正的「國耻」，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那應該說是「國難」。今天大陸各行各業都在制假販假，假風盛行、假貨泛濫、欺詐橫行，其源蓋出自毛澤東當年搞的所謂「陽謀」；所以說，毛才是一切假冒偽劣和欺詐橫行的始作俑者！共產黨內著名思想家兼作家李普先生說得更深刻：『經濟損失幾十年可以彌補，而思想僵化、民風敗壞、素質滑坡、道德淪喪則需要 1~2 百年、幾代、十幾代人才有望扭轉。』⑩

反右派運動的第四個惡果是：把一大批精英人才驅趕到國

外，更阻斷了大批愛國知識分子回國服務、報效祖國的渠道。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的知識分子本來就不多；對於十分稀缺的精英人才，更應該百倍地愛護、千倍的關懷、萬倍的珍惜。可是在毛澤東的倒行逆施政策下，特別是在反右壓力下，許多精英人才被迫流亡海外。據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的回憶：『當錢偉長被劃為右派時，有許多留學生、科學家正準備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事業，甚至都已經到了香港、或東京。可是忽然聽說像錢偉長這樣杰出的科學家也被劃為右派。於是趕快回到美國，並立即申請加入美國國籍。』(11)又據法國《歐洲時報》報導，旅美華人由40年代的10多萬人猛增到60~70年代的120多萬人。其中華人學者達10多萬。被公認為一流的科技人才即有3萬多，佔美國一流科技人才的1/4以上。許多華人學者在美國的著名大學、科研機構中、大型工商企業里擔任重要職務。例如：美國著名大學里，1/3以上的系主任是華人。著名的電子計算機企業——國際商業機械公司有800餘名工程師，半數以上是華人。美國電腦研究中心有4,000多名華人擔任研究員，該中心19個部級主任中，12名華人，參加阿波羅登月工程實驗的華人科技人員達1,400多人，佔總數1/3以上。此外，在政界，也有許多華人嶄露頭角，一展才華。美國社會流傳一種說法：『美國的財富在猶太人的口袋裡，美國的智慧則在華人的腦袋裡』。在這裡，不由得想起了古代大思想家孟子的名言：『為淵驅魚者，獯也；為叢驅雀者，鷦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頻繁的政治運動、殘酷的階級鬥爭、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把千千萬萬的優秀人才驅趕到異國他鄉，為別國效勞、貢獻聰明才智。這種行為不就是「為湯武驅民」的夏桀與殷紂王嗎？因此，對於孟子上面那句名言應該作這樣補充：『為美國驅趕精英人才者，毛澤東也』。今天的美國之

所以科技發達、經濟繁榮、社會進步，頭號功臣不是別人，正是明里反對美帝國主義、而實際上却在不斷地爲其驅趕精英人才的毛澤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毛澤東黑暗統治下，天天抓美國特務，搞得人人自危。其實，真正的、頭牌美國特務不是別人，恰恰就是毛澤東自己。他打着反美的旗號，實際幹的却是不斷地、持久地爲美國社會驅趕精英人才，爲美國今日的繁榮提供最大的支持。這難道不是歷史的最大諷刺嗎？

最後，反右的第五個惡果是「錯批一個人，多生三個億」。毛澤東本人在反右之前也曾有過要節制生育的表示，黨內以穩健著稱的領導人陳雲更是積極主張計劃生育。黨外人士中，以馬寅初、邵力子爲代表的許多人都曾經呼吁：控制人口迫在眉睫。但是，一貫出爾反爾、反復無常的毛澤東突然變了卦、改了口，大批什麼「中國的馬爾薩斯」。並且說：『人多是好事，人多議論多，熱情高、幹勁大。』在這一荒謬「理論」的指導下，全中國展開了一場全面的、持久的生育大競賽。中國人口列車以不可阻擋之勢，呼嘯而進，中國人口從 1957 年 6.4 億迅速增長到 1981 年超過 10 億。可以斷言，如果在 1957 年就接受馬寅初老先生等人的建議，把中國人控制在 6 億左右（1953 年 6 月 30 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中國人口數字是 601,938,035）或者如地理學家孫本文教授於 1953 年所提出的將中國人口極限控制在 8 億以內，今天中國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必定比現在要高一倍以上，早就在扣響富裕王國的大門了。我們今天所面臨的許多社會難題：失業下崗、貧困人口、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等等，無不與人口過多有關，無不是當年人口決策失誤所造成的惡果。13 億人口的重負大大延緩了而不是加快了中國人民奔向富裕境界的步伐，大大阻礙了而不是促進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

充分顯示，大大推遲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國人民第二步、第三步戰略目標實現的日程表。因此，今天的中國人、甚至我們的子孫後代都不得不吞咽毛澤東反右鬥爭及其錯誤人口決策所釀就的苦酒。

反右派運動的惡果很快就顯現出來了：由於毛澤東日益增長的威望和權力，沒有誰再敢說一個不字，助長了他那飛揚跋扈、獨斷專行的氣焰。從此，他可以為所欲為：大躍進、人民公社、浮誇風等等都是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天等於 20 年」等荒誕的口號下相繼出籠的。其惡果是把國民經濟引到崩潰的邊緣。1955 年中國 GDP 佔世界總量的 4.7%，而 1980 年則下降為 2.5%；1960 年中國的 GDP 與日本相當，到了 1980 年則只有日本的 1/4。⁽¹²⁾另據學術界權威人士胡鞍鋼先生最近的研究結果，1957 年中國的 GDP 佔全世界的 5.5%，而到了 1978 年則下降到 4.9%。⁽¹³⁾這兩則資料由於口徑不同，有相當的出入，但都反映了一個趨勢：全世界都在進步和發展，而經過了反右派運動以後的中國却倒退了、落後了，綜合國力大幅度地下降了。全國人民大受其害，却又敢怒而不敢言。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毛澤東到死還念念不忘「要解放世界上 2/3 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可是在他君臨中國 27 年之後，仍然留下了佔總人口 1/4 的 2.5 億絕對貧困人口，還有比這個數字更大的相對貧困人口。他把這個沉重包袱留給他的繼任者。而繼任者却不得不借助於世界上許多被認為「帝國主義者」，也就是昔日「敵人」的直接或間接（通過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的援助才不斷地使這些人脫貧。直到今天，這個任務仍然沒有完成。據官方公佈的數字，大約還有 5,000 萬（包括城市和鄉村）絕對貧困人口在溫飽線上艱難地掙扎着。如果按照聯合國所設定的貧困綫（每人每天生活費用 1 美元）標

準，直到目前，中國仍然有 2 億貧困人口。

當黨內穩健人士開始反思這一切的時候，彭德懷又一次公開站出來向毛澤東提意見，其結果是衆所周知的。最後引向文化大革命那災難的深淵。應該說：反右派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或者說是一次精心準備的彩排。毛經常強調說，要在戰爭中學會戰爭，在游泳中學會游泳。現在，毛本人就是要在運動中不斷地學習，學會掌握運動的一切要領和秘訣。因此可以說，沒有這次彩排，毛導演也很難全面把握整個劇情的進展，演員的調度、甚至舞臺的佈置等等細節。正是通過這次彩排，毛導演積累了經驗，增強了信心；而更重要的是樹立了作為一個導演所必要的權威：所有演、職人員都必須聽從毛導演的安排和調度。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為反右派運動定性：這是毛澤東篡奪包括各民主黨派和廣大知識分子在內的全國人民反蔣鬥爭勝利成果、貪天下之功為己有，通過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封建復辟的途徑，實現多年夢想、圓其皇帝美夢的第一個大戰役，是他邁上皇帝寶座的第一步；因而也是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一次嚴重的反動，對世界文明進步潮流的一次嚴重的挑戰。從這個運動的惡果中，可以斷言：反右派運動是反文明、反民主、反人類、逆世界進步大潮而動的反動事件。今天，應該全部否定、徹底否定。否定得越早越好。

否定反右派運動的理由如下：

1、99.99% 以上的人都搞錯了，那麼，那 0.00018% 的人即維持原來結論的幾個人的情況又如何呢？在中央一級不予改正的右派有 5 位，他們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應該說，他們都是曾經與中國共產黨並肩戰鬥過的親密戰友，他

們爲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以彭文應爲例，就曾經從經濟上接濟過周恩來。事過 30 多年以後，周再次見到彭先生的時候，向陳毅介紹說：『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一定要記住這位老朋友！』(14)正是因爲有了這樣一大批左派知識分子的『理性選擇』，才使毛澤東有了一個日益強大的精神支柱，而蔣介石却不得不同時面對兩個戰場，腹背受敵。當然，歷史不可能重演，但我們不妨假設：如果這一大批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能夠預見到日後所發生的一切，他們用不着委身於蔣氏政權，只要政治上保持中立，中國革命的進程無疑必將十分漫長、十分曲折，也許會是另外一種圖景。老毛也就不可能那麼快地登上全中國最高統治者的寶座。誰能預見到：有朝一日，毛一坐上這個寶座，就翻臉不認人？竟然向着昔日並肩戰鬥的戰友開刀！

同時他們又都是共產黨最坦誠的諍友。共產黨號召提意見，他們聞風而動，毫無保留地、坦誠地把自己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感，在共產黨所主持的會議上公開說出。何罪之有？

2、他們的意見被歷史和實踐所證明，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就拿羅隆基建議的「平反委員會」來說吧。其實在他之前，毛澤東就公開主張過。1957 年 2 月 27 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12 個問題中第 2 個問題就是談肅反的。他在談到斯大林錯誤時指出：這兩類矛盾容易混淆，我們也不免混淆。在肅反工作中，把好人當作壞人去整的事情也時有發生。怎麼辦？毛認爲應該搞一次大檢查，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中央一級的問題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主持。羅隆基只是把毛的意見作了一點發揮而已。在他之後，還有民革中央常委朱蘊山也就這個問題發言。而朱却没有被劃爲右派。奇矣怪哉！

再來說說實踐方面：20 年以後，在每個單位、每個部門都設立過這樣的機構，不過，不叫「平反委員會」，而稱為「落實政策辦公室」，其實任務是一樣的：平反一切冤假錯案。

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右派——章伯鈞。他的「罪行」是提出「政治設計院」。這不就是今天的人大常委會嗎？不過章先生所建議的是四個這樣的設計院：政協、人大常委會、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這有什麼不好？問題的要害就在於：他否定了中共的一黨專政。這就和儲安平的「黨天下」異曲同工。那麼，當年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中共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到底是爲了什麼？難道不是爲了在中國實現民主、共和，而是爲了取而代之、以暴易暴？今天看來，結論正是後者。

再來看「輪流坐庄」的說法，當然也是對中共權力的挑戰。其實，只要實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然要實行「輪流坐庄」。也可以說：「輪流坐庄」正是民主共和制的靈魂，是杜絕一切專制獨裁的制度保證。哪有像袁世凱那樣由「終身總統」進而「登基」做皇帝的民主共和國？就是中共自己不也曾經於 1956 年 9 月 29 日做出過『黨的主席規定只能連任一屆』的正確決議嗎？再來看看今天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國家主席和黨的總書記不也是「輪流坐庄」嗎？

寫到這裏，不由得想起了馬克思在談到德國農民戰爭的時候說過的話：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成爲這次農民革命運動「遺囑的執行人」。在反右派鬥爭過去 20 多年以後，當年右派分子的許多「遺囑」都先後被「執行」了。正如作家丁東先生在其《反思歷史不宜遲》一書中所說：在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有許多人是看出了體制的弊端所在，並且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他們正是 1978 年改革的先聲⁽¹⁵⁾。

再舉一例：拿「反蘇」這一條來說，當時那真是不得了的大罪行。可是幾年以後，在與蘇聯公開爭論時，在「九評」裏面，就有許多論點或是出自當年某些右派分子的言論，或者與當年某些右派分子的意見不謀而合。當我們在執行「遺囑」的時候，千萬不應該忘記當年提出這些「遺囑」的人，更不應該無端定人以罪。應該說，他們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其功就在於最先提出了正確的主張。

「輪流坐庄」還有另外一個解釋，就是實行多黨制，輪流執政。在西方各國，這已經是很正常的現象。多黨輪流執政的好處首先表現在競爭產生激勵機制，激發各黨派努力為選民謀福利，為國家提出正確的政策主張。其主觀動機當然是為了爭取選票，但客觀效果却是極大地增進了人民的福利。其次是糾錯機制。執政黨做了錯事，在野黨批評（或者按照中共的說法，叫「攻擊」），很快被糾正過來；或者被趕下臺。這樣就使執政黨的錯誤或醜行給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災難減少到最低限度。為什麼「文革」的災難延續長達10年之久？就是因為沒有反對黨，共產黨一黨獨裁。

頗有意思的是，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本人已經看出了一黨獨裁對於國家的嚴重危害。他說過：『斯大林破壞法制，這在英、法、美這些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美國發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學習之處。我們反對它的只是反對其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看來還是幾個黨好』⁽¹⁶⁾奇怪的就是，既然「還是幾個黨好」，那為什麼就不能在中國實行呢？

據說多黨制不適合中國國情。什麼「國情」？說穿了就是的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現狀不能改變，也就是說，他們的既得利益不能放棄；因為天下是共產黨打下來的。且不去辨析共產黨包打天下的結論是否正確、是否符合歷史實際。我們只是想知道，當

年那些志士仁人反對國民黨統治而前赴後繼、拋頭顱、灑熱血，難道不是爲了解放全中國人民，而僅僅是爲了取而代之，以攫取實際利益嗎？

好，就算共產黨一黨專政有理，但其前提必需是共產黨永遠正確、不犯錯誤，不會損害中國人民的利益。可是歷史雄辯地證明：所謂「中國共產黨一貫正確、光榮、偉大」的東方神話早已被實踐無情地戳穿了，粉碎了。即使對於小學生來說，這類虛偽的政治說教也顯得十分蒼白無力！因此，當年提出「黨天下」、「輪流坐庄」的「右派」實際上是在對具有濃厚封建性質的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作最後、最悲壯的抗爭，也是爲推進中國民主化事業作了最英勇的努力。他們的暫時失敗給我們留下的不應該是失望和灰心，而應該是深刻的思考和總結。

3、就算他們說錯了，那也只是言論問題。在 1954 年《憲法》第 87 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難道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也只是官樣文章，是爲了寫給外國人看，而並不打算真正實行的嗎？還有 1956 年共產黨公開許諾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難道也是空頭支票嗎？所有的公開文件都表明：沒有任何理由僅僅根據某一個人的言論就隨意定罪。

毛澤東又說了：他們不僅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今天我們提倡人民有參政、議政的權力。這很好。參政、議政不是一個人自己所能夠完成的事情，而需要有兩個以上的人參加，一個人自己對自己說話，那叫「自言自語」不是交流，更不是參政、議政。既然要求人民參政、議政，就應該允許人家「行」；不去「行」，如何參政、議政？

毛又說：右派分子「策劃於密室」。允許參政、議政，也就

必須要說話，當然也就要有一定的地方，或者就稱呼為「密室」吧。那個單位開會不需要一定的地方？有些會議暫時需要保密的，就不可能讓更多的人知道。難道共產黨每次開會都是公開的？沒有任何秘密？

總而言之，反右派運動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完全是庸人自擾，是毛澤東『與人鬥爭，其樂無窮』人生哲學的一次重大實踐，也是封建專制勢力對民主、自由運動的一次大扼殺，是從秦始皇開始、直到清朝歷朝歷代文字獄的現代版。

* * * * *

《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發表已經 25 年了。當時那個結論是根據鄧小平「反右派沒有錯，只是擴大化了」的權威性意見一錘定音的。時代的脚步又跨進了 1/4 世紀，今天，我們難道只能停留在那個時候的認識水平上嗎？

鄧小平對於中國改革事業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無可否認的。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任何人都會有局限性，包括來自歷史和時代、知識和經驗、思維能力等三個方面的局限。黨內著名的思想家、民主派領軍人物李銳在自己的文章里還加上一條：個人品德。(17)既然如此，鄧小平也不可能例外。正是鄧本人就非常清醒地自我評價說：『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就很好了。』(18)對待毛澤東，我們早已批判過兩個「凡是」；同樣，對待鄧小平，我們也不應該搞新的「凡是」。當年鄧小平下的結論對不對？我們應該開動自己的大腦，想一想。

在「八大」以前，鄧小平在政治局裏的排名第 12 位，「八大」以後上升到第 6 位，並由中共中央秘書長提升為政治局常委兼黨的總書記。可見在毛澤東的眼里，他是一員得力的幹將。對於毛和他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鄧的態度十分鮮明、行動更是非常積極：

即完全支持毛的部署。僅舉一例：在反右派運動的初期，中央黨校沒有抓出一個右派。劉少奇和鄧小平把楊獻珍等黨校的領導人找去談話。問：你們抓了幾個右派？答：一個也沒有。劉說：你們站在右派的立場去查，怎麼能查得出右派呢？鄧更嚴厲地對楊說：我看你就像個右派！於是，楊獻珍被停職，由別人來主持運動⁽⁹⁾。從這件事情看來，要求當年積極參與反右派運動的鄧小平來完全否定反右派運動，就好像要求毛澤東自己來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樣，是緣木求魚，是南轅北轍、不可思議的事情。中國民間有句俗話：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一個人超越時代和歷史的局限，去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來糾正前人所沒有做好、或者沒有打算做的事情。就好像鄧小平當年勇敢地站出來糾正毛澤東的錯誤一樣。

是時候了！我們是 21 世紀的人，應該有新的頭腦和眼光、新的視野和思維能力、新的勇氣、膽識和魄力！應該去做前人所沒有做好的事情！

* * * * *

公開、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有什麼意義呢？這樣做，不僅僅是爲了那沒有改正的 96 位所謂的「右派分子」，也不僅僅是爲了那 55 萬曾經被錯劃的人及其親屬，而有着更爲深遠的、重大的意義，而且首先就是爲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利益。

第一，表明中國共產黨恢復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從建國以來，以毛澤東爲代表，對於所有的失誤，幾乎都沒有進行過任何公開的、認真的自我批評。這決不是一個對中國人民負責任的、執政大黨所應有的表現；更違背了自己所一貫倡導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如果今天能够大膽地公開承認反右派運動

是完全錯誤的，必將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贏得好評，更必然會重新贏得中國人民的信賴和擁戴，也有望取得全世界人民的諒解和信任。請聽聽列寧是如何教導的吧：『一個政黨對自己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她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20)

其次，也表明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具有「與時俱進」的優良品格。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提倡過「與時俱進」品格。什麼叫「與時俱進」？就是要牢牢地把握時代的特點和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人類前進的大方向。當今，在世界範圍內，人權鬥爭如火如荼，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席卷全球。無論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里，言論自由已經成為最起碼的人權要求。當年反右派運動正是嚴重破壞言論自由的違法、違憲行為。今天如果公開否定它，無疑就表明中國在保障人權方面有了重大的進步，也說明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不但在不斷地與時俱進，而且在與世俱進，與世界通行的行為準則接軌。

第三、更是為了重塑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和提升信用等級、刷新自己的信用記錄。大家都知道，市場經濟社會首先應該是信用社會，人人都必須講信用。有信用可以走遍天下，相反，不講信用則必然會寸步難行。當今中國領導人和謀士們反反覆復地、不厭其繁、不厭其詳地在國際上宣傳「和平崛起」，還信誓旦旦地宣告：中國的發展和強大絕不會構成對任何國家的威脅云云。可是許多外國朋友就是不相信，不斷有「中國威脅論」的出現。這是為什麼？難道是宣傳不賣力、不到位？非也！關鍵是自從1957年以來，人家根本就不再相信中國共產黨了。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最好老師。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做了些什麼吧。想當年，共產黨羽翼尚未豐滿之時，

爲了奪取天下，用盡了花言巧語、甜言蜜語來團結所有的黨派、團體，口號就是「聯合政府」。可是一旦大權在握，就翻臉賴賬，搞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毛澤東在私下里對其心腹毛遠新說過：『想監督共產黨？笑話！天下是誰打下來的？』毛的理論是「槍杆子里面出政權」，也就是封建王朝通常所說的「馬上得天下」。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早年毛澤東在批評蔣介石的時候說過：『看蔣介石的昨天，就可以知道他的今天和明天』。毛爲我們發明了一個觀察、判斷一切黨派、團體和領導人普遍適用、屢試不爽的有效方法。如果我們忘記了或者忽視了這個好方法，那實在辜負了毛留下的那筆精神遺產。今天，人家當然也要用同樣的方法來判斷共產黨那些關於「和平崛起」、鋪天蓋地的宣傳，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會不會有朝一日，有了足夠的實力以後，同樣會翻臉賴賬，把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做法放大到全世界範圍內？

關於中共稱霸全球的政治野心還可以從毛澤東的詩作里看出端倪：1963年元旦馬屁文人郭沫若爲了逢迎討好，寫了一首《滿江紅》，最後一句是：『迎東風革命展紅旗，乾坤赤。』幾天以後，毛寫了一首和詩，其最後一句則是：『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瞧！這一主一奴的詩詞唱和，把他們的政治野心暴露無遺：要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赤化」，也就是把妨礙其稱霸野心的一切力量全部消滅干淨。瞧！老毛妄想成爲全世界共產主義教父和全球霸主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嗎？爲此，今天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自由的朋友們不能不心有餘悸。因此，今天的國際社會很難再相信，因爲心裏實在沒有底啊！

今天，我們要實現「和平崛起」的宏圖，首先就需要消化掉一切阻力，並化阻力爲助力。而這又要求人家相信我們「和平崛起」的諾言是真誠的、負責任的，而不是虛偽的、輕率的。怎

樣才能使人家相信呢？首先就應該檢討和清算過去的一切不講信用、失信於民、失信於世界的錯誤，特別是公開承認 1957 年的特大錯誤，並對當年的責任人進行明確而不含糊的譴責。徹底地告別昨天，正是爲了爭取今天的成功和實現更美好的明天。

最後，還說明今天新一代領導人具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寬廣的政治胸懷、「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遠大的政治眼光。而不是固步自封的保守派，更不是只會亦步亦趨地重復前人的「凡是派」，恰恰相反，新一代領導人是善於思考、明辨是非、敢於創新、勇於改革的革新派。

宋詞云：『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歷史老人最是無情。凡是做了錯事、醜事、壞事，因而對不起國人和世人的黨派、政府都必須付出相應的代價，決不可能長期隱瞞、掩飾，不了了之。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領袖林肯說得好：『你可以暫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長期欺騙少數人，但不可能長期欺騙所有的人。』騙局早晚要被揭穿，問題在於時間的早晚而已。如果今天的中共領導人不去做這件事，那只好留待以後的領導人去做，這樣，也就是把這個建功勛、樹形像的大好機遇拱手讓給未來的領導人。智乎，愚乎？深望今日的中共當局三思！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畢生奉行的人生信條，更是這位偉人留給後世所有政治家的警世箴言！

①⑤何方：《黨史筆記》（香港利文出版社 2005 年版）349、351；333、369 頁

②《胡橋木談中共黨史》第 122 頁

③ 朱正：《1957 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177 頁

④ 《新華文摘》2006 年第 10 期 第 57~59 頁

⑥ 《毛澤東選集》第 228 頁

⑦⑱ 《我所親歷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年）第 30 頁

⑧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134 頁

⑨ 焦國標：共產黨不是千年的烏雲（網上材料）

⑩ 《炎黃春秋》2002 年第 10 期 李普文

⑪ 〈千家駒 70 年經歷〉第 255 頁

⑫ 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295 頁

⑬ 《新華文摘》2006 年第 8 期第 11 頁

⑭ 胡平：《苦難的祭壇 1957》（廣東旅遊出版社 1998 年）第 257 頁

⑮ 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1999 年）第 5 頁

⑯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293 頁，鄧只引述了毛的前一段話。整段話見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385 頁

⑰ 李銳：〈直言——60 年的憂與思〉今日中國出版社 1998 年 第 447 頁

⑱ 《鄧小平文選》第 2 卷 第 35 頁

⑳ 《列寧選集》第 4 卷 第 213 頁

【發表於《民主中國》2007 年 5 月 8 日】

錄以備考：又一本紀念 反右運動著作被查禁

【筆名：賈恭河】

幾個月前，難友胡顯中很高興地給我發來一個好消息：『我的書終於快要出版了』，並且告訴我書名就叫《一個幸存者的思考——為紀念反右派運動 50 周年而作》，在附錄裏還特地給我發來了封面的掃描圖象，他說這是他自己設計的，為的就是要突出「幸存者」三個字；另外還特地給我發來了他的「自序：一個幸存者對先烈們的責任。」我看了以後很受感動，感受到他那顆仍然火熱的心，他那沉重的責任感、使命感。

這位胡兄是 1957 年「陽謀」中被打入社會最底層的 55 萬「另類分子」中幸存者之一，也是 2007 年春天上書黨中央和人大、國務院公開信的 61 人中的一個。此外，他還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早在讀中學時，就在當地的報紙上發文藝作品，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並因此受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注意，不久就被報館里的一位編輯介紹參加了中共，還奉命發展了 4 名黨員，因而被任命為這個中學的黨小組長。可是 9 年以後，卻被打成右派，並投入監獄。經歷了死里逃生、大難不死而僥幸活到了今天，深感到有必要把自己這幾十年思考的成果集結成書。今



過這句至理名言。如果還沒聽說過，那麼，現在就給他們送上這句話，請他們對照一下自己的行為，然後三思而行。如果早就知道這句話，但是不屑一顧，仍然我行我素，那就沒有什麼辦法了。「哀莫大於心死」對於一個根本就不講傳統道德和普適倫理的人或政黨來說，很難有溝通和對話的渠道，我只能說「道不同，不相與謀」。

我還記得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說過這樣的話：『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

泡影。自由的一種形式制約着另一種形式，正好象身體的這一部分制約着另一部分一樣』。不知道中共當局還記得自己老祖宗的這句名言否？如果早就忘記了，那麼現在應該提醒提醒：這些年來，中共也在不斷地改善自己的形象，並且屢屢表示要和國際接軌。作為一個大國，而且是正在進行偉大復興事業的大國，應該有大國的風度、大國的胸懷、大國的氣量，更應該珍惜自己在國際上不斷改善的形象。因此，對於那些專門做「自毀形象蠢事」的官吏們，也要多作批評教育，叫他們「與時俱進」，不要老抱着過去的管理辦法來處理新時期的新問題、新事物。

最近中共十七大開過了，在十七大的文件里就有關於給人民「表達權」的許諾。如果這個許諾只是說給外國人聽的，並打算認真實行，也就罷了。如果是真心實意要兌現的話，那還是

應該從每一本書、每一本報刊的放開做起。不要害怕一本書或一篇文章就會真的推翻自己的統治，還不至於如此虛弱吧？一個大黨應該有這樣的自信。

幸虧我手頭還保存着他發來的自序、目錄和封面圖象，爲了讓更多的朋友能夠從中看到一個幸存者的真實思想，現在就借貴刊一席之地，把這些東西公開出來，請讀者朋友評判一下，這樣的作品是鮮花還是毒草？應不應該讓她出版？這樣的作品難道真的會威脅到中共的統治嗎？

* * * * *

該書的扉頁是這樣寫的：謹以此書敬獻給：

在 20 世紀 50~70 年代毛澤東極權統治下，爲維護真理而抗爭、而吶喊、而獻身的英雄群體（包括張志新、林昭、王申酉、遇羅克、史雲峰、李九蓮等爲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的先驅們），同時獻上作者最崇高的敬意。

在中國極權統治下，被監禁、摧殘、折磨，最終被奪去生命的無數亡靈（其中包括我的中學同學、戰友鍾純民），同時表示作者無限的思念與同情。

作者的自序：一個幸存者對於先烈們的責任

1898 年 9 月 21 日，清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發動政變，把實行百日的維新運動扼殺在起步階段。被殺害的「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當時正在寓所裏和梁啟超密商。消息傳來，梁建議他立即逃走。他則堅持讓梁走，而自己堅持赴死。他說了一段氣貫長虹、震古爍今的話：「不有死者，無以報皇上；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今吾與君分任之，可也！」

譚嗣同這段話揭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在任何一個重

大的政治變革面前，必然有兩種人：用生命和血肉之軀和反動勢力作最後的拼搏，以死來報答皇上（或祖國、或人民）；用保存生命的方式以圖將來。前者是偉大的、可敬的。因為在生與死的抉擇中，毅然選擇了去死，視死如歸。後者雖然不那麼偉大，但却是歷史發展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人物。如果所有的志士仁人都去慷慨赴死，結果如何呢？那就會被反動勢力殺光、死絕。誰圖將來？正因為如此，那些有幸存活下來的人，就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即把那些先烈們為之奮鬥的事業繼承下去，把他們來不及完成的思考和努力繼續下去。否則就對不起那些用生命和血肉之軀和封建勢力作最後的拼搏、衝刺，英勇就義的亡靈，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逃避。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有着豐富的優秀文化資源。例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氣，「三軍可奪其帥，匹夫不可奪其志」藐視強權的大無畏氣概，「橫眉冷對千夫指」「怒向刀叢覓小詩」的魯迅硬骨頭作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為真理而獻身的勇氣……這些都是我們偉大的先輩們所留下的珍貴精神遺產。遺憾的是，長期以來，這一切全都被人們徹底遺忘了！本來應該成為時代先驅、社會良知代表、真理代言人的知識分子群體，一個個低頭彎腰、服服貼貼、唯唯諾諾地拜倒在、繼而是跪倒在權力的魔杖之下。歷史上中國人民所固有的骨氣、志氣、浩然正氣統統不見了！

古人云：「士可殺而不可辱」。毛澤東則反之：對知識分子大部分不殺，但却千方百計地「辱」之，沒完沒了地「辱」之。這還不算，還要在「辱」完了之後，勒令被「辱」者再反復地自辱、自污、自我作賤，把自己罵成最大、最壞的惡魔。大陸一時

風行的「檢討文化」就是在毛澤東強權壓迫之下形成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把作為人的、最起碼的尊嚴通通拋掉，來換取苟活的機會，像狗一樣苟且偷生，可憐地、毫無尊嚴地活下來。可就在這「萬家墨面」、「萬馬齊喑」的時候，竟然有人甘冒生命風險，傲視強權，用自己薄弱的生命和身軀勇敢地衝擊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專制極權勢力，發出了正義的吶喊和抗議。其結果當然可想而知。

對於這些勇敢的反叛者，也許有人會貶斥為「以卵擊石」、「不自量力」、「蚍蜉撼樹」等。可正是他們才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是魯迅先生所說的「捨身求法的人」，是「社會的脊梁」，應該受到全體中國人民的尊敬和懷念。一想起他們，就令人肅然起敬。作為那場空前浩劫的幸存者，有責任、有義務，把自己的余生投入到中國民主化事業中去，用自己的頭腦去繼續他們未完成的思考；用自己的筆，把他們來不及思考、或來不及完成的事情繼續下去，並把這一切忠實地記錄下來。本着這樣的信念，在這 25 年時間里，寫作和發表了百餘萬字。從其中選出一部分，自認為值得流傳後世的，集成此書。既是對先烈的告慰，也可以說是對於歷史和後人盡到一份責任吧！

馬克思有言：『思考使人受難，受難使人思考』。綜觀本人的一生，基本上印證了這句話：前半生，和 55 萬多善良的識分子一樣，就是因為思考、因思考而表達，而陷入了毛澤東的「陽謀」之網，倍受苦難的煎熬。後半生則有幸看到了中國政治舞臺上一幕幕新的表演，也在不斷地咀嚼苦難的同時，更進一步思考、因思考而表達。

本書大體上按照前、後半生而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收

集前半生陷入「陽謀」之中的所謂「罪行」，即在「鳴放」時期所寫的三篇文章。下篇則收集經受了 20 多年的苦難之後進一步思考的成果。

【發表於香港出版的《明報》月刊 2008 年 6 月號】

人必須先有說『不』的勇氣，
才可能爭得說『不』的權利。
——當代大儒 梁漱溟

中國大陸人權理論的三大誤區

【內容提要：保障人權應該是一切主權國家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最高原則；也可以說，是否保障人權，乃是檢驗這個主權國家實行真民主還是假民主的試金石。《零八憲章》的精髓就是限制政權，保障人權。】

近年來，中國大陸經常宣傳說：今天的中國人權狀況是歷史上最好的。同時當局也承認，仍然有許多不足之處。對這些宣傳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和批判。

長期以來，大陸當局對於『人權』一詞採取貶斥的態度。其原因首先是由於人權概念與中共集權統治的體制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水火不兼容的兩極，無法兼容、並存；其次還因為中共當局頑固地堅持冷戰思維，認為『敵人所贊成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所反對的我們就要贊成』（毛澤東語錄）；從歷史上看，人權是資產階級最先所提出來的理念，因此無產階級當然就應該反對。這種封閉、保守的狀況一直延續了幾十年，直到『改革開放』的初期，仍然如此。1979年3月22日的《北京日報》第一版在顯著位置，用特別顯眼的楷體字，發表了《『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文章說：『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它從來就不是無產階級的戰鬥旗幟。不能把人權這個早已成為粉飾資產階級

反動專政的破爛武器也搬來作為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良藥。文章還質問：在人民當家作主的今天，提出『要人權』，究竟是向誰要人權？文章的口氣顯得盛氣凌人、咄咄逼人。看來是大有來頭，顯然是代表了官方的立場，而且是高層官員的意見①。可見直到這個時候，『人權』問題仍然是一大禁區，仍然被看成資產階級的『專利』。

直到近年來，在國際社會的推動下，同時也由於中共新的領導層大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並且多次出訪西方發達國家，耳聞目睹，對於發達國家所尊奉的社會公共倫理有了比較清醒、比較理性的認識，因而才逐漸接受了『人權』這個概念。1998年，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中共的文件——15大報告；2003年，在16大報告中，再次提到要「尊重和保障人權」；並且於2004年正式寫入修改後的《憲法》中。所有這一切，當然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但是如果對這個進步作過高的估計，顯然是太樂觀、太輕信了。因為大陸的人權事業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實踐方面都仍然存在着不少問題。而現實生活中許多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究其根源又在於理論指導的誤區。

最大的誤區就是所謂『主權高於人權』之說

『主權高於人權』說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主權的保護，便談不到人權。可是，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一下：如果没有人權，這主權又是什麼性質的呢？換而言之，這個主權是誰的主權？對老百姓來說有什麼意義？老百姓能夠享受到嗎？

對此，我們可以舉出古今中外許多實例來證明。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最切近的例子莫過於50~70年代。當時這個國家對

外當然有主權；但是對內來說，有人權嗎？沒有！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在那「人妖顛倒」的年代，不用說普通的老百姓毫無人權可言，就連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莊嚴選舉』產生的、堂堂的國家主席的人權都無法保障，一張莫名其妙的大字報就可以置他於死地。當他拿出《憲法》來企圖捍衛自己的人身權利時，竟然被一群用仇恨之火所煽動起來的紅衛兵打得遍體鱗傷。可見在集權統治下的中國，根本就沒有『人權』可言，有的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皇權』。由於造神運動日甚一日，皇權彌漫，人權掃地。這樣的『主權』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說，有什麼意義呢？

再舉一個現實的例子：有一個國家自稱是什麼『人民』『共和』國，但是實際上統治這個國家的却是世襲的、終身的統治者，不管叫什麼名稱：總統也好，主席也好，委員長也好……實際上都不過是現代君主制下的皇帝。這個國家還不斷地對西方大國叫板，表面上是爲了維護主權，可實際上不過是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已。在其專制統治下，老百姓不允許有收音機，普通人不經過批准不能打電話，離開本地需要憑路條才能通行②。在經濟方面，連老百姓的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要不斷地向國際社會求援。這個國家的人口不過 2,000 多萬，但卻擁有 110 萬人的軍隊，佔其人口總數的 5% 以上（軍民之比恐怕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還要發展什麼核武器，其目的不過是爲了保護他們一家一姓的永久統治。這樣的主權，對人民有什麼積極意義？對歷史有什麼進步作用？對世界又有什麼示範作用？幾十年來，不斷有人從這個集權國家出逃（包括曾經擔任過高級職務的官員），就是最好、最雄辯的證明。

通過以上許多實例，可以說明：任何國家的主權應該是服

務於、並服從於本國的人權。值得一提的是，『主權應該服務於、服從於人權』的說法，和最近中共高層所提出的『執政爲民』目標應該說是一致的。既然你們執政是爲了老百姓，那麼，老百姓的人權當然應該就是這個國家主權所爲之服務的對象。這是合乎邏輯的結論。反過來說：如果仍然堅持所謂『主權高於人權』的理論，人們必然要對當局近年來所宣傳的「執政爲民」口號的誠意產生理所當然的質疑了。

保障人權應該是一切主權國家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最高原則；也可以說，是否保障人權，乃是檢驗這個主權國家實行真民主還是假民主的試金石。同樣，實行法治的主權國家的最高利益也正是爲了實現人權；沒有人權保障的『主權國家』，也許有冠冕堂皇的憲法，但那只是爲了掩耳盜鈴，實際上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這樣的主權對於老百姓來說，沒有任何意義，老百姓不會也不可能真心實意地擁護她。而區別一個主權國家是實行人治還是實行法治的最好標準，就是看其是否尊重並且切實保障人權。正如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斷言：『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無權躲在主權背後侵犯人權』。

大陸政權長期以來強調主權高於人權，其消極的後果必然給當權者無限擴大、膨脹政府權力、任意剝奪公民權力、侵犯人權提供冠冕堂皇的借口。許多惡劣的罪行都是在保衛國家主權的口號下進行的，發生許多冤案也就不足爲怪了。

另一個誤區：『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

大陸一貫自詡在解決人民的生存權方面有過輝煌的業績，因而強調生存權才是最基本的人權。可是，古代的大思想家孟子

說得好：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矣。他認為：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只有那麼一點點而已。雖然是『一點點』，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點』。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人有理性，會思考。古代的西方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說得非常正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人之所以成為人，就在於人的社會性，人不僅僅需要溫飽和生存，而且需要尊嚴、需要關懷、需要實現自我價值——這一系列的心理需求都應該得到滿足。如果不能滿足這一切，只有生存權，那麼，人的確就和其他動物沒有什麼區別了，那豈不是太可悲了嗎？我們還可以舉出《聖經》里的話來證明：《聖經》里說：『人的生活不僅需要麵包，還需要被承認、被接受、被關愛，還需要一種使其生命富有意義的精神生活。』

由以上可知，人權應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其中生存權和其他權利之間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只要不健忘的話，我們應該記得在 60 年代之初，由於毛澤東一意孤行搞烏托邦的實驗，餓死了好幾千萬老百姓。準確的數字因為中共當局諱莫如深，一直沒有公佈過。但是，中國近代人口史的記錄却是無情的；從中可以推算出來，大約餓死了 3,000~4,000 萬人。國防大學教授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澤東》書中的數字是 37,558,000 人；而楊繼繩先生在《墓碑》書中的數字則是 3,600 萬。楊著並形象地做了一個非常精確的比喻，即相當於 1945 年 8 月 9 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 450 多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 450 多枚原子彈。又相當於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 150 多倍。也就是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 150 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一千多萬人）大饑荒的慘烈程度也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更超過中國歷史

上所有的災荒所造成的後果。

這好幾千萬饑民的生存權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剝奪了，他們的生命就成了毛澤東好大喜功、浪漫幻想的犧牲品。我們不妨假設想一下，當時，農民都有自由勞動權，可以由自己來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用什麼方式結合在一起生產……（就像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情況那樣）還會發生那樣的大饑荒嗎？如果老百姓都有自由發言權，可以自由地表達對國家大事的看法，讓國家領導人多一點清醒、明智與民主，還會發生那樣的大倒退、大逆轉、大災難嗎？由此可見，其他各項權利的有無，同樣可以決定生存權的能否實現。這是幾千萬被餓死的冤魂用他們的生存權為代價留給我們的慘痛教訓。因此，生存權是基本的人權，其他權利同樣是基本的人權。如果只讓人吃飯，却不允許人民說話，這樣的所謂『基本權利』無異於對待動物，而不應該用來對待人。對人，就應該既讓人家吃飯，更要讓人家說話（包括言論自由和發表言論的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著名的學者海倫·達比希兒說得好：『言論自由是一項與其他人權不可分割的基本權利。她是享有和保障其他權利所必須的權利。沒有言論自由和獲得信息的自由，就無法參與有關政府經濟政策的國事辯論，就不能對酷刑……等等侵權行為進行抨擊。』正是因為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社會和公眾沒有公開抨擊司法不公的合法渠道，所以才屢屢發生許多冤假錯案。這難道不是十分深刻的教訓嗎？

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6月在維也納召開的第二次世界人權大會上，通過了《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在這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里，明確無誤地宣告：所有的人權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聯系、不可分割的整體；其中的發展權是基本人權的組成部分。以劉華秋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盛會並且在宣

言上簽了字。發展權當中就應該包括受教育權、政治參與權、知情權、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發表言論的自由……等在內，則是人所共知的常識。由此可見，僅僅強調生存權是基本人權，實際上就是貶低其他各項人權的重要性。這樣的宣傳，如果不是由於無知，就是別有用心和動機。什麼動機？說穿了，就是一來轉移國內老百姓的注意力，希望他們僅僅滿足於吃飽、穿暖而已，而不去追求作為一個人的、更高的生活境界；二來是為了在國際社會和國內輿論的雙重壓力下，進行狡辯。

最後一個誤區：所謂的『輿論導向』

中共自從執掌政權以來，從來沒有放松過對輿論的控制，一直強調所謂『輿論導向』。經過仔細分析就不難發現，輿論導向的實質就是：我導你向，官導民向。官員是『導』的主體，人民是被『導』的客體。官員如何『導』，人民便應該如何『向』。官指向東，人民不得向西。在『導向說』理論發明者的視野里，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不見了，國家的根本性質即人民民主共和國當然更無從體現，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中關於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人這一原理更是被粗暴地閹割了。人民選出來的公僕一下子變成了高居在人民之上、發號施令、任意擺佈人民的政治強人。國家的主人反而變成了任憑公僕隨意導向、指揮和安排的群氓，聽話的、馴服的工具，這難道不是主僕關係的大顛倒嗎？這難道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大背叛嗎？如果說，人民公僕變成了官老爺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現象，『導向說』就是這種異化現象的理論表達。『輿論導向』的最終目的是什麼？說穿了，就是保持中共當局對於話語霸權的絕對壟斷，與此同時，

也就必然是對老百姓的話語權利的徹底剝奪，對民意的粗暴強姦，對基本人權的任意蹂躪。

如果追溯一下歷史的話，這『導向說』的發明專利權並非屬於中共宣傳部門，而是沉睡在地下 2,000 多年的秦國宰相李斯。他在上書秦始皇建議燒毀一切書籍的同時，爲了滿足老百姓的精神需要，他建議：『以吏爲師』，也就是一切向當朝的官員學習，以官員的是非爲是非，隨官員的喜怒而喜怒，按官員的愛憎來愛憎。瞧！這不就是『導向說』的最原始說法嗎？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來：李斯所倡導的『以吏爲師』和今天的『導向說』之間具有濃濃的血緣關係。也可以這樣說：『導向說』是『以吏爲師』的現代版，而『以吏爲師』就是『導向說』的老祖宗。再進一步來看，『吏』是爲皇帝服務、一切行動聽從皇帝意志的奴才而已，『以吏爲師』實際上，必然是以皇帝的意志爲意志。『天子聖明，奴才該死』。於是我們從『導向說』背後的陰影里，看到的竟然是專制制度的幽靈。

一個自稱反帝、反封建旗手的中國共產黨在執政以後，竟然繼承了封建專制制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手段——對人民進行包括思想、言論在內的全面控制。這難道不是歷史的大倒退、時代的大悲劇嗎？

其實，從『輿論』一詞的本源來看，應該是指來自基層人民群眾的呼聲。『公衆輿論是人們表達意志的隨機方式』（黑格爾）『輿論就是多數人意見公開表示於外者』（梁啟超）『輿論就是衆人的議論』（《辭海》第 689 頁）……既然輿論本來就是群眾的呼聲，却變成了官方用來引導人民的工具，這真是匪夷所思！也可以說是又一種『異化』現象吧！

其實，從近年的實踐效果來看，所謂『輿論導向』也到了

山窮水盡的地步了。你導你的，老百姓心中如何想？信不信？那就很難說了！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說得好：『宣傳也好象貨幣。鈔票發行得越多，就越貶值』。中共宣傳部門的官員似乎並不懂得這個非常淺顯的道理，恐怕正是因為『當局者迷』吧？

最後，套用孫中山先生在『遺囑』里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維權尚未成功，人民仍需努力！

注：

①《北京日報》1979年3月22日頭版頭條

②香港出版的《廣角鏡》第390期第27~28頁

【發表於《民主中國》2009年11月26日】

人民中間，特別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不是簡單地要求有飯吃，還要求當主人翁，參與國家大事……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感覺到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回答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

中國共產黨前任總書記 趙紫陽

歪曲醜化與揭示真相

——評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最近的講話

最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黨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非常引人注目。習在講話中表示要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揭示和宣傳中共在長期奮鬥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形成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他還說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

對前一句「要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我舉雙手贊成，120 個擁護。但對後一句「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却很難理解，不知道何所指？為此特地查閱了衆多工具書。根據《辭海》的定義：『歪曲』就是故意改變事物的真相，把好事說成壞事。『醜化』大體也是如此。再打個通俗的比方：一個女人本來是守身如玉的節婦，有人却罵她是婊子，這就是「歪曲和醜化」。可是如果這個女人本來就是人盡可夫、傷風敗俗的淫婦，却要求大家一致表彰她，並且還要立貞潔牌坊。豈非太滑稽、太荒唐？大家當然不會同意，並且還要揭露她的醜行和醜惡面目，這就不是「歪曲和醜化」，而是揭示真相。

現在按照習近平同志的教導「要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研究的結果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

以來 60 多年中，當然作了許多好事，並且取得不少的成績。否認這一點是不對的。但是我們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共產黨也做了許多錯事、壞事。否認這一點同樣是錯誤的，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更不配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我們按照習近平同志的教導，實事求是地研究這些錯誤、壞事，找出經驗教訓，那對於未來的工作無疑是有益的。

今天的問題恰恰發生在這裡。就拿去年大張旗鼓地宣傳什麼『輝煌 60 年』來說吧，就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不僅老百姓不能贊同，就連黨內高級領導人中也有不同的聲音。例如最近從網上看到，有位高級領導人說：『我一直就不同意「輝煌 50 年」、「輝煌 60 年」的提法。這不符合事實的。大躍進困難時期那三、四年，「文革」動亂那十年，總不能說是輝煌的吧，宣傳用的詞，也要講究精準，要符合基本事實。你不把那幾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會扣掉的，歷史學家也會扣除的。普通黨員也會那麼做的。在 90 年代的那幾年，我說過不止一次，政治宣傳離事實太遠，那叫什麼？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蠻的宣傳。』

又例如：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的六名發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華人朱傳渠老先生在自己的書中回憶道：『1980 年，我回祖國大陸時，見到了鄧小平先生。鄧小平先生一見我就講：『朱先生啊，你看這怎麼好啊，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對不起人民啊，共產黨怎麼才能挽回嘛……』

請注意：鄧小平說的是「對人民犯了罪」。而不是什麼「輝煌」的政績。既然黨內高級領導人都勇敢地承認，中國共產黨的確做了許多錯事和壞事，甚至是「對人民犯了罪」，那麼，為什麼不能向人民群眾坦率地說清楚，直到今天仍然保密，捂得死死的。這難道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應有的態度嗎？這不是徹頭

徹尾的愚民政策嗎？爲什麼這樣做呢？還是那位高級領導人說出了根源。他說：『這些事情要是讓工人、農民、老百姓知道了，那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

爲了維持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就只好隱瞞真相了。於是拾起曾經被魯迅先生所抨擊過的『瞞與騙』的伎倆。

中國共產黨歷來是主張走群眾路綫的，要依靠群眾。依靠的前提是必需真心實意地相信群眾，把真實情況告訴人民群眾，不要有隱瞞。因爲任何隱瞞都是不能持久的，早晚會被揭穿。

『瞞與騙』伎倆最典型的『傑作』就是去年關於『輝煌 60 年』的宣傳。在這 60 年當中，『文革』10 年早有定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明明白白地寫着：『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請中共的宣傳部門聽清楚了：『文革』是一場『內亂』，根本就不是什麼『輝煌』政績。而中共宣傳機構却公然違背中央早已做出的定性，不顧事實、閉着眼睛瞎說，用『輝煌』二字來概括，試問：你們置這個權威性文件於何地？看來是宣傳部煽了十一屆六中全會的耳光！此外，在 1959~1961 年 3 年中，在內無天災、外無戰爭的和平環境下，竟然活活餓死 3,755 萬人。還有：1957 年搞『陽謀』，把 300 多萬社會精英人物打成敵人，活生生制造無數的人間悲劇。1989 年血洗天安門廣場，以至於中外嘩然、一致譴責，使中國多年陷入孤立的尷尬境地。這些都算是『輝煌』政績嗎？

總的算下來，10 年加 3 年、加 1 年、再加 1 年，共計 15 年，佔 60 年的 1/4。毛澤東經常用 9 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比喻，那麼，

1/4 應該是幾個指頭？

今天，許多報刊和書籍都企圖通過對歷史的反思來總結經驗教訓。這局面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要求共產黨認真反省自己過錯的心情和願望。這種要求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顯然不應該看成是歪曲、醜化行爲。

作爲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當然有義務堅持黨和國家的利益至上的原則來說話和辦事。但同時作爲人子，同樣不應該忘記的是：令尊大人習仲勛先生的遭遇。這位老革命在 1962 年 9 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因爲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 16 年之久。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到平反。往事歷歷，你習近平應該記憶猶新吧，更應該有切膚之痛吧？難道這一切都忘記了嗎？如果沒有忘的話，就應該從中進一步思考一下，從而對極權專制政體的危害有比別人更爲清醒的認識，更爲深刻的批判意識，並且利用你目前和未來可能取得的地位做一些有利於改弦易轍的工作。這樣做的目的完全是爲了挽救共產黨自身，使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能够長治久安。

在國門緊閉、中外隔絕的時代，老百姓只能聽到一種聲音。當局的宣傳和隱瞞，尚可安撫人民群眾一時。但是只能欺蒙群眾一時，而無法長期欺蒙，更不可能永遠欺蒙。特別是改革開放的今天，老百姓都學會了睜開眼睛看世界，通過中外對比，例如從前的東德和西德，今天的朝鮮和南韓，還有我國大陸和臺灣，同文同種，人是同樣的人，地也是同樣的地，可幾十年以後，却是一貧一富。誰優誰劣，立刻顯現出來。人民群眾還會傻乎乎地相信當局那些自我吹噓的所謂『偉大成績』嗎？共產黨不是經常宣傳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通過二戰以後 60 多

年的實踐，反復對比，全面考核，這個『唯一標準』不是早已做出了絕對公正的裁判嗎？

最近有位學者撰文說：『中國民衆的教育程度越高，對其它國家政治文化了解越多，中共獲得國內民衆心理認同和政治支持的難度越大』。（見《南方周末》2010年6月24日版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正漢文章）尤其是在互聯網廣泛應用的今天，再企圖喋喋不休地吹噓什麼偉大成績、光榮歷史、一貫正確云云，恐怕是徒勞的。用不着別人來『醜化』和『歪曲』，因為這完全是中國共產黨自己所作所爲。實事求是就應該承認歷史事實，恢復真相，而不是粉飾、塗改、隱瞞。

【《民主中國》2010年8月5日】

我們的歷史是光明的，還是陰暗的？是光彩的，還是不光彩的？每個在臺上的人都要經受檢驗。歷史是混不過去的。

——中國共產黨前任總書記 胡耀邦

按權分配是當今中國社會 轉型的最大障礙

最近有位老朋友來電話。他很興奮地告訴我：最近，他用『馮慈』的筆名發了一則博文，內容是抨擊分配不公的現象。大致是說：據報載：像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水均益的月工資 26 萬，是我們這些離休老幹部、正高級職稱的 50 倍。至於和農民工比，則差距更大得離奇了。這位老朋友並就此徵求我的意見。

爲此，我打開電腦，利用『百度』搜索到有關資料。原來這位水均益 26 萬元人民幣是年薪，平均下來，每月也就 2 萬多一點。如果和離休老幹部、高知比較，大致是 5-7 倍而已。至於和農民工比，還應該考慮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合理差距問題。可見這位老朋友所根據的資料並不準確，而是誇大了 12 倍。雖然如此，但却由此引起我對當前的分配問題的研究興趣。於是利用電腦的『百度』搜索功能查了一下，當即嚇了一大跳。從中得知：當今中國億萬富豪中 90% 以上是高幹子女。這個結論是由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聯合提出的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中披露出來的。

該報告還詳細地披露了這些高幹子女一夜暴富的具體途徑：（一）以引進外資（包括駐外中資到內地投資）從中獲取回扣。（二）進口、引進成套設備，一般比國際市場高出 60%

至 300%。例如，從意大利引進制造皮鞋的自動流水綫，國際市場價 200 萬美元，廣東、江蘇引進同一型號，報價分別為 600 萬美元及 720 萬美元。一套年產 50 萬噸化肥成套設備，國際市場價 2.2 億美元，山東、遼寧以 4 億美元報價引進。（三）操控國內資源、商品，出口獲利。（四）國土開發、地產倒賣，靠銀行借貸，無本獲暴利。（五）走私、逃稅，每年走私進入市場的日本、歐洲轎車 3 萬至 4 萬輛。（六）金融機構無抵押信貸，資金外流到個人口袋，這也是金融機構壞帳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獨家或霸佔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 85% 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當地高幹親屬。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獲利 700 萬至 1,100 萬。（八）抽逃資金到個人帳戶，一般通過金融機構、中資進行。（九）操控證券市場，制造假信息勾結金融、傳媒造市，從中獲利。該資料甚至顯示了這些『衙內』父輩的具體職務。例如：廣東省 12 家大地產商都是高幹子弟，其父親包括前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前政協主席、前省長等。上海市 10 家大地產商，有 9 家是高幹子弟為老板；15 家工程建築承包商，除 2 家屬於國企外，13 家都是高幹子弟。江蘇省有 22 家大地產商、15 家工程建築承包商，清一色由幹部子女操控，其父親包括現職副省長、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書記、前省法院院長等。

事後不久，有關當局出面進行了所謂『辟謠』，但給廣大網民的印象却是『越描越黑』欲蓋彌彰，恰恰說明：『此地無銀三百兩』。既然這個報告是『謠言』，被暴露出來的那些官員為什麼不敢把自己子女的具體姓名、工作單位、擔任職務向廣大群眾公開呢？你們怕什麼？怕見陽光吧？再說：為什麼你們不敢向天下的老百姓公開自己及子女、近親的財產？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產權是私有的，絕大部分社會財富分散在資本家手中，資本家沒有必要貪污本來就屬於自己的任何財富；政府官員雖然有可能貪污，但政府掌握、分配的社會財富只佔很小的比重，官員們施展貪術的余地相對來說比較小，同時民主政治中有議會、民意代表和新聞媒體的監督，政府官員如果動用國家權力謀取私利，會受到種種制約，或被曝光而受到懲處。

反觀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情形，絕大部分生產資料集中在政府手中。實際上是掌握在主管部門官員的手里；社會主義公有制事實上演變成國家所有制、官有制、黨有制，因為只有黨政主管部門的負責官員才有權支配、運用、處置名義上仍然屬於國家或全民的財產，並從中獲取各種利益。假如每個黨和政府的官員都是廉潔奉公、嚴格律己、潔身自好，守身如玉的好公僕，那麼，他們運用、支配這筆龐大的社會財富，或許還能出以公心、為國辦事，為民謀利。這恐怕也正是馬克思，恩格斯創建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時所抱的初衷和出發點。但是，世界社會主義將近一個世紀實踐的歷史却雄辯地表明，把社會主義國家各級官員都當成天使的假設是多麼的荒誕可笑，多麼虛幻，簡直距離現實生活十萬八千里。

在現實生活中當然也能找到極個別的，如馬克思所設想的人民公僕，如焦裕祿、張鳳岐、孔繁森等，世人對這樣的幹部當然是敬重、懷念的。但現實生活也無情地告訴我們，像王寶森、閻健宏、陳良宇這樣的假公僕為數更多，他們充分利用了掌握大量社會財富的權力，以權謀私、貪污自肥，而這種支配權力是資本主義體制下政府官員所望塵莫及的。這恰恰是中國貪官多如牛毛，『雄冠全球』的根本原因。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多次與蘇聯、中國打交道，他在《領

袖們》一書中根據其訪蘇的所見所聞，總結性地斷言：

『共產黨的特權階層比任何一個資本家更接近於馬克思對一個統治階級所下的定義』。

尼克松對蘇聯領袖們所作的判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大陸的絕大部分官員。例如，已被揭露出來的成克杰、胡長清、陳良宇等等。這些人在生活上腐化墮落，窮奢極欲，是西方國家的官員們所望塵莫及、自嘆弗如的。人們當然有理由推論，如果這些人並未被揭露，今天仍然在臺上手握重權，誰敢揭露他們的醜惡行爲和糜爛生活？人們更有理由進一步懷疑，今日赫赫在位的衮衮諸公有沒有步他們幾位後塵者？如果真的還有這樣大搞腐敗的高層權要，但在政治上並未被打倒，有哪個吃了豹子膽的中國人敢出來公開抨擊？

在當今中國，數以萬億計的國有資產，960 萬平方公里國土，都是『官有制』或『黨天下』的囊中物，只要有權，想拿多少就拿多少。真是應了那句成語：『探囊取物』。打天下者坐天下，這是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反復上演的連續劇，也是這些『開國功臣們』最普遍的補償心態的兌現。此外，除了坐天下，誰來接班呢？當然是自己的子女最放心、最可靠。這些囊中物、這 " 天下 " 的財產不傳給自己的子孫又傳給誰？所以當今中國億萬富豪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幹子女，也就不足爲奇了。

再來看看中國社會在收入方面的差距：中國公務員工資最高工資是最低工資的 6 倍（世界平均是 2 倍）；中國國企高管的工資是最低工資的 98 倍（世界平均爲 5 倍）；中國行業工資差距高達 3000%（世界平均則是 70%）。面對如此嚴重的懸殊差距，人們不能不進一步追問一下：什麼人能夠進入國企高管的行列？除了極少數憑個人努力、拼搏，再加上運氣獲得成功者以外，絕

大多數富豪都是憑借權力衍生的結果。如前所引資料：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暴利行業中擔任主要職務的，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幹子女，他們實際上已形成了新的官僚資產階級。

這就是中國當前分配不合理的癥結所在。許多人的高收入並非憑着本人的能力或貢獻，而是憑着父輩的功勞、地位等等，也就是所謂『高幹子弟』或者叫做『紅色貴族』。這種差距與本人能力大小、是否奮鬥無關，而是天生的、鐵定的，不用努力，坐享其成。他們名義上是搞『社會主義』，按照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應該是按勞分配。可是現實却存在大量的按權分配。這就是最大的『中國特色』。

按權分配既不是資本主義的分配原則（資本主義按照市場經濟原則，按生產要素分配），更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而是不折不扣、貨真價實的封建制度的分配原則。在封建社會里，最高統治者是皇帝，以下是各級官吏和王公貴族。這些特權階層按照地位的高低、權力的大小，分別享有不等的特權，包括土地和俸祿。此外還有許多政治方面的特權：可以超越王法之外，可以隨意殺害、傷害任何普通的老百姓等等。

這些掌握着中國的絕大部分財富的高級幹部子女或親屬們，也就是所謂『紅色貴族』，和封建社會下的王侯貴族有什麼區別？沒有。如果一定要找點區別，那也只是名稱和服裝的區別而已：過去的王侯穿蟒袍大褂，今天的高幹及其子女穿的是西服領帶；在封建社會里就被批判為『剝削』、『不勞而獲』等等，今天則被美化為『為人民服務』或『分工不同』云云。

一個社會的絕大部分財富和收入都集中到『紅色貴族』手里，我們稱之為按權分配。按權分配，首先徹底揭穿了所謂『利為

民所謀』的虛偽性、欺騙性。根本原因在於：胡錦濤的所謂『三民』還缺少一民：『權爲民所授』（已故的朱厚澤先生一語中的）這一條其實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條。沒有這一條，不管三民、五民、乃至八民、十民，都是沒有任何保證的空話，未必兌現的空頭支票。

其次，按權分配牢牢培植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這些人組成一個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把持着黨、政、軍、商、文教衛等各個領域的領導權。任何深化改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都不可能提上日程；任何要求中國社會實現轉型的呼聲都早早被扼殺，被封鎖。請別忘了：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千古不易的原理，是鐵則。政治必需爲經濟利益服務，政權必然要爲保衛既得利益者效勞，必然要拒絕任何觸犯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和轉型。即使在整個領導層中，偶爾出現個別清醒的、理性的人士，發出某些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實現社會轉型的聲音，也必然被絕大多數保守勢力所淹沒、所封閉、所排斥，最後只能是力不從心、孤掌難鳴。

最後，關於既得利益者的實例，僅舉兩個典型人物：一個是早年在訪問德國期間被人用臭雞蛋、西紅柿亂砸、狼狽而逃、並且被全世界人民斥之爲『北京屠夫』的那位。他的公子和公主都是當今了不起的國企高管，一個是電力行業的掌門人；另一個做國企高管積累了大量財富以後，又來個『華麗轉身』改而從政，當上內地某省的副省長。真是奇矣怪哉：他這一子一女，難道都是了不得的天才嗎？從他本人在電視上講話時表現出來笨得出奇的樣子，根據遺傳基因原理可以斷言：其子女不可能有多麼高的智商。憑什麼就能有如此成就呢？這真應了『文革』期間那句順口溜：『龍生龍、鳳生鳳』、『老子英雄兒好漢』。

再舉一個毛太孫的例子：在網上看到這位『少將』、『博士』雙銜人物的『墨寶』真是令人大開眼界：我真佩服其人的膽量，敢於亮出自己的『絕活』。一般人都知道『藏拙』二字，自己是什麼水平應該有點自知之明，盡量避免露拙。而這位毛太孫公然把自己那些拙劣、彆腳的幾筆字拿出來『曬』，也不怕公衆見笑。可能他自己還自我感覺良好吧？人們心里怎麼想？這位毛太孫是不是有點弱智？再來聽聽這位毛太孫的名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我爺爺和斯大林共同領導，才取得勝利的』。請全世界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衆都來聽聽：這就是『歷史學博士』所掌握的歷史知識！如此水平竟然獲得『歷史學博士』頭銜！這真是中國學位制度的悲哀，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悲哀，更讓中國這個泱泱大國在全世界面前丟人現眼！更爲奇怪的是，那些真正有水平的博士和正在讀博的碩士們，竟然能够默默地忍受這樣的悲哀和耻辱。還有一樁：他的少將軍銜又是根據什麼戰功取得的？那些軍隊中一個個憑着真刀真槍、靠刺刀見紅而取得各種軍銜的將軍們、校官們，怎麼能和如此水平的所謂『少將』爲伍？這難道不是中國軍隊、中國軍人的耻辱嗎？看到這位毛太孫，就令人聯想到中國歷史上那個白痴皇帝。白痴爲什麼能當上皇帝？因爲是家天下，整個國家都是皇帝自己的，按照血統繼承法，皇帝的兒子理所當然地接班當皇帝。誰個管得？

以上兩例說明什麼？過去封建社會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天只要改動一個字就對了：普天之下，莫非黨土。既然一切都是黨的，那麼，當然可以任憑黨來支配。而首先應該得利、得利最多的，當然是黨魁的子女了。其次則是最忠於皇上的一品大臣及其子女，以下利益逐步遞減。輪到普通老百姓頭上，就只剩下『緊跟共產黨、繼續幹革命』的份兒了。

由此可以斷言：今天中國的一切亂像，根本原因在於：絕大部分財富和利益都是按權分配。

由此更可以斷言：當今中國社會轉型的最大障礙不是別的，而是奉行按權分配規則的既得利益權貴集團。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按生產要素分配，這乃是世界大潮流和大趨勢。反觀中國却在搞按權分配，難道不是逆世界潮流而動，不是反動是什麼？

按權分配是封建社會按王位分配的變種。那是 18-19 世紀以前封建社會最流行的分配原則，今天都 21 世紀了，咱們中國還在搞這種按權分配，豈不是最落後嗎？現在提倡人權和平等，要求人人憑勞動、憑本事賺錢，按權分配恰恰違背人性，挑戰人人生而平等的神聖原則，這難道不是最醜陋的分配方式嗎？所以說按權分配是最反動、最落後、最醜陋的分配方式。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是最大的所謂『中國特色』。

【附記】前面所提到的那位用『馮慈』筆名寫博客的朋友就是我的老同學、老戰友，同時也是難友、誼友胡康新。令人痛心的是：老朋友已於 5 月 19 日因病在南昌去世，享年 85 歲。

在此謹向故人表示哀悼，並祝他在天國過得愉快。

【原發表於《觀察》2010 年 8 月 25 日；《民主中國》予以轉載】

對大陸高校培養目標的質疑

1、一群不會說話的大學校長

秋高氣爽，又到了大學新生入學的季節。著名大學的校長們照例都要對新生發表一通演說，諄諄教導，或進行勉勵、或寄予厚望。剛剛跨入大學校門的莘莘學子也非常希望傾聽作為一校之長的老前輩能夠給予自己有益的教誨，或治學之理，或修身之道，或治國之法。但是，他們都失望了。

最近《南方周末》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報道，標題是『校長的腔調』副標題是「不會說話的中國大學校長」。內容說的是：過去的校長習慣於說「八股」，今天則變成了「八卦」，使那些新生不知所云，更談不到有所體悟或收獲了。還有更令人憤慨的是公然說謊（《南方周末》的文章沒有涉及）。例如北大校長周其鳳在今年的迎新講話中說『我們的老校長蔡元培曾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理念，成就了北大的輝煌。100多年來，包容始終(?)都是北大人所堅守的傳統』。周校長此話是在粉飾太平、塗改事實、偽造歷史。請問周校長：1957年，北大包容了林昭這位杰出的女學生嗎？包容了那716位（佔全校師生總數的7%）敢於說真話的師生嗎？沒有！1989年，北大包容了要求推進政

治改革、反對官倒和一切腐敗現象的熱血青年嗎？也沒有，沒有！60 多年來，和其它所有的學校一樣，北大這個曾經是民主運動堅強堡壘的著名學府同樣墮落成爲中共專政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成了這個警察國家的一個派出所。當然，其責任未必要北大來承擔，但作爲一校之長，理應勇敢面對，坦率承認，而不應該當衆說謊、欺騙年輕而單純的青年學生。這應該是每個教育工作者起碼的道德底綫。校長公然對學生說謊，悲乎，哀哉！

說到大學校長的演說，人們很自然地想起了開創一代新風的幾位老前輩。例如：蔡元培先生在 1917 年就職北大校長時的名言：『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並且宣佈『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以及教授治校等辦學原則。這些原則一直流傳至今，成爲大學校園里的『硬道理』。又如被尊爲「清華大學終身校長」的梅貽琦先生在 1931 年就職典禮上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那麼如何培養「大師」呢？他的答案是『自由探索』。『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爲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爲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此外，在上個世紀早期還有許多著名的教育家都曾在大學開學典禮或其它重要場合發表過激動人心的演說，在學子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對此，人們至今記憶猶新、如數家珍。

和那些老前輩的光輝榜樣比較起來，今天的大學校長們的表現可就「慘不忍睹」了。

大學校長應該都是滿腹經綸、學富五車的學界泰斗、人中翹楚，怎麼忽然變得不會說話了呢？原因何在？

他們的身份首先不是教育家，而是官，是共產黨的官（什麼正廳級、副部級之類），在官本位這個大染缸里浸淫既久，渾

身官氣，說的也是官話。講官話習慣成自然，就不會講人話了。這是其一。

其次，其實他們也確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們有當年蔡元培、梅貽琦那樣寬松的政治環境、可以自由發揮，可以用個性化的語言說話嗎？不行！他們講話不能出格，不能涉及禁區，不能違背主旋律，不能超越意識形態的「籠子」……諸多限制，使這些人中豪杰宛如被關在籠子里跳舞一樣。誰敢突破繁多的清規鐵律？難道就不怕摘烏紗帽嗎？不怕敲掉飯碗嗎？其尷尬、其無奈就可想而知了。在不得不講話的時候和場合，就只好說些不痛不癢、不咸不淡、像白開水一樣的套話，以平庸而保安全，實非得已啊。

2、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提起大學校長的演說，人們萬萬不應該忘記，1958年在中國科技大學開學典禮上，大文豪、大科學家郭沫若那番說辭。他慷慨激昂地號召同學們，要成為『紅透專深』的人才。並且誓言：要把我們的學校辦成百分之百的黨校。從邏輯上來分析，這一小段話就產生了一個不大也不小的矛盾：「百分之百的黨校」當然實現了『紅透』的目標，但『專深』二字從何保證？名為「科技大學」，却要辦成「百分之百的黨校」，「科技」還有立足之地嗎？何不干脆改為「某某黨校某某分校」，豈不名正言順？大科學家應該具備最起碼的邏輯思維能力，違反邏輯的話公然拿到開學典禮上去對廣大學生宣講，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應該承認的是，郭沫若的話實在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殊氛圍和要求，並不是他個人的獨出心裁、創新發明。幾十年來，中共當局對於青年學生和所有知識分子的要求概括而言就是『又

紅又專』，即兼有「紅」與「專」兩個字。這既是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指導下對文化人的選拔標準，也是幾乎所有知識分子自覺追求的目標，更是關乎每個人在社會上榮辱、地位、待遇的決定性因素，還涉及對個人進行社會評價的首要條件。所以，幾乎所有新、老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無不用這兩個字來要求自己、策勵自己，務必做到「又紅又專」，甚至達到郭沫若所說的『紅透專深』就更好了。

可是幾十年來的實踐結果却不盡如人意。許多在學術方面有所建樹的教師、研究人員乃至青年學生幾乎都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的典型。前些年，有位同班的老同學透露：已故的、當年我們的班長劉某曾經對他說過這樣的悄悄話：『凡是學習好的人，在政治上都不可靠，容易犯錯誤』。相反，有些被認為「根紅苗正」者，在學術上往往乏善可陳、令人不敢恭維。幾十年的實踐雄辯地證明：這兩個字是不可能兼得的，就好比要求公牛產乳、牝雞司晨一樣，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兩個標準是水火不相容的。

「專」對客觀事物的取捨標準是：是與非、對與錯、真理或謬誤；而「紅」對事物的取捨標準則是：利與害、得與失。兩者采用的是根本不同的取捨標準，豈能融合在同一個人身上？

所謂「專」是學術標準，要求學者和學生們認真地探索客觀世界的規律，有所發現、有所發明，要求在求知和求真的道路上，一往無前、心無旁騖。「專」的最高目標是求真，而追求真理的首要條件是勇敢無私的品質，決不能計較個人得失、利害。『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評價「專」與不「專」的標準只能是專業水平的高或低、求真的態度誠懇與否。因此，允許每個學者和青年學生大膽探索、獨立思考，不迷信任何權威，

更用不着言必稱某某思想、某某理論、某某核心，破除迷信和神話乃是實現「專」的必由之路。在邁向「專」的道路上，需要具有超常的創新思維能力，並且對客觀世界一切現象刨根問底的濃厚興趣，因而敢於揮動智慧的長矛，在科學研究的廣闊天地里，大膽地向一切未知領域宣戰。為此，需要有一個允許自由思考、自由發表與交流、自由爭論、言者無罪的民主氛圍。

所謂「紅」，也就是政治標準。就是在政治上緊跟，永遠緊跟共產黨走，永遠聽黨的話，黨叫幹啥就幹啥（「我是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黨需即我願」云云）。在實際運作中，黨又是、永遠是由某個領袖支配的，因此所謂「緊跟黨走、聽黨的話」實際就演變成「緊跟領袖、聽領袖的話」。而領袖的意志有時多變，所謂「朝令夕改」，要求全黨都來緊跟，事事緊跟、時時緊跟，事實上很難做到。更為重要的是，某個領袖又不可能永遠在位，即使是在實行終身制的歲月，也要受個人壽命的限制，這個領袖的指示到了繼任領袖時也許就不再時興了。所以，「紅」的標準往往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多變性。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是也。一旦跟不上，「紅」就可能變成「白」，甚至是變成「黑」，那下場可就慘了。這樣就要求人們時時觀察領袖的愛好及其變化，要求按照領袖的意志來思考，跟隨領袖的好惡來愛憎，迎合領袖的喜怒而取捨。在這裡，成功與否的關鍵不同於求真，不是要求明辨是非，而是計較利害、得失。同時也絕對不允許獨立思考，因為思考的任務僅僅屬於某個領袖人物專有，其他的芸芸衆生都只能緊跟領袖的思想和戰略部署，好比棋盤上的棋子，任由領袖撥弄、調遣。每個人的聰明才智都只能在服從並服務於領袖的意圖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承認。否則就可能被認為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黨離心離德」等等，「紅」更無從談起。

一個「專」字要求人們勇敢地追求真理，辯明是非、善惡；一個「紅」字，要求的是觀顏察色、迎合領袖意志。這兩個字如何能夠統一起來呢？兩個互相矛盾的目標、兩個互如水火的標準，却要求統一在一個個具體的人身上，豈不難矣哉！所以，實踐的結果只能是：或者因為追求真理而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或者做到了「紅」而不專。總而言之，真正做到了專，就不可能做到紅。相反，如果「紅」了，就不可能「專」，也許是「專」於逢迎、討領袖一時喜歡，但也長不了（如陳伯達、戚本禹之流）。

如果要舉具體的人來做例證，那可就太多了，不勝枚舉。鼎鼎大名的陳寅恪教授，大概沒有人能夠否認他是個大學問家、思想家吧，遙想當年，他竟然膽敢向當局提出：不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你說他「紅」不紅？當然一點也談不上紅；但是却是無可置疑的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專」家學者。再看普通人中，一個極端的例證則是那位交了白卷的「英雄」人物——張鐵生，在那個年代真是紅極一時啊，可他有何「專」？以上是極端的例證，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芸芸衆生，都不得不在這二個目標之間不斷地游走、徘徊、彷徨、掙扎，最後也很難實現兼顧，或者是專而不紅（表面上也許要言不由衷地喊幾句流行的口號以敷衍一下），或者是紅而不專（盡管這些人也許擁有若干個學者的頭銜，但是骨子里却是不學無術之徒，即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在這裡不妨再舉個例證：最近經常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上露臉的閻崇年先生應該算是一位學有專長的專家吧！他的個人資料顯示：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按照「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應該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去「繼續革命」、去奪權、造反、去斗走資派，而他對這些『大是大非』問題却毫

無興趣，竟然每天泡在圖書館里埋頭看書，當起了「逍遙派」，這無疑是個走「白專道路」的典型。但是，今天却成就了一位清史研究領域里的權威專家。如果拿他和陳寅恪做一個比較的話，頗為耐人尋味：陳老是先有了「專」的資格作為資本，然後才有條件公開拒絕「紅」（一般知識分子是沒有這個資格的）。而閻崇年則是先巧妙地、消極地抵制「紅」，然後才有條件成為「專」。陳與閻二位先生，無論是那種情況，都說明一個道理：專與紅二字是水火不相容的。

還可以舉兩個人為例：1957 年的馬寅初和黃萬里二位先生都是「專」的典型。這二位學者從學術良心和社會責任感出發，分別就控制人口和三門峽建壩問題提出了非常專業的真知灼見。但是因為和領袖所支持的主流意見不一致，當然被革除出「紅」的隊伍，黃萬里被無情地打入「右派分子」的行列；馬寅初老先生則在被全國大批判後，撤銷北大校長職務，在家「閉門思過」。

就是這『紅透專深』四個字，籠罩着全中國的知識分子，歷數十年，沒有任何人敢於提出質疑。千千萬萬中國知識分子被這個橫蠻的「緊箍咒」束縛着、痛苦地掙扎着。

3、一大批在『紅專』道路上艱難的跋涉者

在『紅透專深』四個字的摧殘下，老一輩大知識分子大都有切膚之痛。例如那位 23 歲就寫出了傳世巨著《雷雨》因而轟動文壇、一舉成名，爾後又相繼完成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不朽劇作的曹禺先生，到 1949 年以後，却乏善可陳。其密友黃永玉致信直言：『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你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

流……』原因何在？其女萬方在回憶文章中給了精練而準確的答案：『因為心不自由』。他自己也經常沉痛地反思，甚至在睡夢中往往驚呼：『我好慚愧啊！』他慚愧什麼？恐怕就是晚年沒有寫出什麼高質量的新作，蹉跎時光，愧對廣大讀者的厚望吧？難道是大作家「江郎才盡」了嗎？非也！蓋因一個「紅」字，不得不痛苦地放棄那個畢生熱愛的「專」字。

還有更殘酷的例子。那位公開提倡『紅透專深』的大科學家郭沫若早在中共掌權以前，已經是學兼文、史、哲，名聞中外的專家，本來不需要再在「專」字上下功夫了，因此他便專門向「紅」的方向努力。用他的專業知識和學術地位反復地、一往情深地配合、迎合最高領袖的意見，甚至癖好。毛說要為曹操翻案，他聞風而動馬上寫了劇本《蔡文姬》，以表現曹操的大胸懷、大功德；聽說毛最喜歡唐代詩人「三李」，他又馬不停蹄地寫了《李白與杜甫》，用以揚李而貶杜。跟到後來，毛發動以摧毀傳統文化為特徵的「文革」，郭大詩人又迫不及待地表態說：『我過去所寫的東西，統統應該燒掉。』必須承認：這位大詩人的確做到了『紅透』，但從專業方面來看，以上的作品却很難令人恭維。更令人不齒的是，毛澤東去世，這位中外聞名的的大詩人竟然寫下這樣的挽詩：『偉哉領袖比爺親』。（見《隨筆》2009年第6期137頁）首先，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也叫「詩」嗎？這是出自大詩人的筆下的詩嗎？其次，這位大文豪年紀比毛澤東還大一歲，却尊毛為「爺」，豈不滑稽？中國有句成語叫做『如喪考妣』把死者比做自己的父母，已經到了極限。可是大詩人更進一步，把死者尊為祖父輩，自己豈不成了孫子輩？這可真應了那句罵人話『裝孫子』。令人不敢相信的是，這就是那位曾經寫過《女神》、《雷電頌》，幾與魯迅先生比肩的大文豪嗎？讀此挽「詩」真令人無

限惋惜！這個例子說明：郭大詩人晚節不保，墮落至此，可悲、可嘆！

另一個例子同樣發人深省：據最近出版的《墓碑》（作者楊繼繩）一書第22章「糧食問題」的第4節披露：正是在大躍進（實為大瘋狂）的年代里，著名的科學家、被譽為中國『導彈之父』的錢學森先生曾在《大眾科學》和《中國青年》等雜誌上發表文章，聲稱糧食『產量可以無限地增加』，為『大躍進』和糧食產量『放衛星』作了『科學的背書』。在國防大學教授辛子陵所著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的第207~208頁也提到同一位作者、同樣觀點的文章，即發表於1958年6月14日《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斷言：『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錢先生以他著名科學家的名譽作擔保，讓千千萬萬的人相信『大躍進』政策的『科學性』。錢老一生貢獻卓著，『德高望重』，國人都非常敬重。但是在那個非正常的年代，為了緊跟領袖的意圖，也就是為了做到「紅」，不得不違心地說了些很不專業的話。這個教訓是非常深刻的。又一次證明：如果要堅持「專」到底，就必須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堅決拒絕「紅」的誘惑。否則，一旦被那個「紅」字所綁架，說了很不專業的話或做了很不專業的事，那可就毀了自己一世英名，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啊！這個例子再一次說明：大科學家晚節有虧！

除了對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無情摧殘以外，對於年輕學生的戕害更是無法估量。以筆者本人親身經歷：早在50年代的大學里，政治理論課和專業基礎課、專業課大致各佔1/3。所謂「政治理論課」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基礎（以斯大林御批的那本《聯共（佈）黨史》為基本教材）。這四大政

治理論課不但是必修的，而且是必考的，否則不能升級。所花費的學習時間大約佔 1/3 甚至更多。從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些勞什子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半是謊言，半是廢話』。當全世界的青年學生們都在輕裝前進的時候，我們這些「黨所培養」的青年人却要背負着如此沉重而毫無用處的大包袱，蹣跚而行，如何與他們爭鋒、取勝？競賽的結果自然是毫無懸念：必敗無疑。後來的青年們情況又如何呢？我的女兒在大學里仍然要學什麼『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以及皇帝詔曰、御批聖旨之類的東西，讓青年學子們虛耗了多少青春年華？難以估量。

如果思想稍有出格怎麼辦？當「批判的武器」失靈時，當局斷然採取「武器的批判」。君不見：多少青年學子的一腔熱血竟然飄灑在共產黨的刑場上（最知名的要數林昭、任大熊、顧文選、沈元、吳思慧、張錫錕、黃中奇等七位北大俊傑），還有為數更多青年學子在共產黨的監獄里消磨着大好青春年華。

殺一儆百，有了這些先驅者的血和淚，引以為教訓，更多的青年不得不收斂其性格的鋒芒，放棄當年宏偉的專業理想，小心謹慎、規規矩矩，做一個聽話的「好學生」，違心地向「紅」的方向努力，學那些半是謊言、半是廢話的什麼「思想」、什麼「理論」，並且不斷地向黨交心、表忠，犧牲獨立思考以換得平安，踐行着平庸、苟安的人生哲學。

到了『改革開放』，國門大開，青年學子看到了新的希望：惹不起，總躲得起吧！於是紛紛走出國門，留學海外，爭取「綠卡」，長期定居國外，「拜拜了」親愛的黨！這些學有所成的青年人，竟然不得不在異國他鄉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對於急需各項建設人才的祖國來說，既是一種莫大的損失，更是一出絕妙的諷刺劇。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出國定居？上網一查，發現兩組數據：

其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幾年公佈的一項調查報告說，從 1978 年中國放開留學政策到 2006 年期間，總共有 106 萬名中國人出國留學。但是只有 275,000 人學成回國。也就是說，在過去將近 30 年時間里，每十名出國留學的中國人中，學成回國的還不足 3 人。另一組數據是：2009 年教育部召開新聞發佈會，30 年間出國留學 139.15 萬人，回國者僅為 39 萬，佔 28%。由於統計口徑不同，數據互有出入，但滯留海外的比例大致相近，足以說明青年學生中普遍存在着謀求「專」，而躲避「紅」的大趨勢、大潮流。聯想到 20 世紀 50 年代，多少海外專家響應中共號召紛紛回國效力的盛況，真令人不勝今昔之慨！面對人心向背的巨大變化，難道中共當局不應該痛切反省嗎？

面對汹涌的出國潮，官方雖然言不由衷地表示『來去自由』，但內心的震撼和不安是可想而知的。恰好最近在民辦刊物《往事微痕》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曲嘯在美國遭遇滑鐵盧紀實》，作者閻潤濤也是一位留美研究生。內容是曲嘯被國務院派往美國巡回演講，主題當然是宣傳祖國的大好形勢和對海歸人士的優厚待遇及其它優惠政策，目的無非就是兩個字：勸返。可是事與願違，一開頭就不順利，遭遇到有力的抵制，最後竟然落荒而逃，逃回國內，並從此一病不起，嗚呼哀哉了。那麼，究竟是誰敢於公開抵制呢？請看：

聯誼會會長通知大家去聽國內來的曲嘯教授演講，但幾百留學生中只有二三十個人去聽。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曲嘯在國內很紅，但來到海外的人沒幾個知道他是何許人也。另一原因是大家都厭煩了幾十年的政治說教。另有兩位『愛國華僑』教授參加了。這兩位教授是從臺灣到美國留學並留下來當教授的，由於他倆恨透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也就非常熱愛共產黨。其中一人便是

大名鼎鼎的近代歷史學家汪榮祖教授。

事就出在了汪榮祖教授的幡然醒悟。

曲嘯教授的演講非常精彩，第一句話就說：『當年我也有跟你們一樣出國留學的機會，雖然那時只能是去蘇聯。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還進了監獄。』聽到這裡，大家立刻聚精會神地傾聽他的遭遇。曲嘯先生絕對有演講天賦，那聲音時而抑，時而揚，時而頓，時而挫，時而高亢，時而柔和，時而激憤，時而婉約，時而高山流水，時而天地含悲。

他爸爸讓蘇軍卡車壓死了，非但沒有給一分錢賠償，反而把他定為反革命，因為他爸爸被蘇軍卡車壓死了，猜測他心裏必然恨蘇聯，反蘇就是反黨，就是反革命，坐牢 22 年。

曲嘯的演講由於是親身經歷，又經過了無數次演講鍛煉早已熟記於心，幾乎找不到哪怕一點點破綻和前後邏輯不符的地方，甚至連一句病句都很難找到。

對於經歷過三年大饑荒、文革動亂的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他的故事雖然令人震顫，但畢竟沒有我們當年親自看到的被活活打死的地富反壞右那麼悲慘，我們聽起來也就是贊嘆他的演講能力，對得起他那法學家兼心理學家的頭銜。

坐在我旁邊的汪榮祖教授受不了了，他幾次想打斷曲嘯教授的演講而提問題，可是當時不是在教室演講，是一個小屋子，汪榮祖教授在曲嘯教授的右邊靠後，他沒看到汪榮祖教授舉手提問。汪教授也就不再提問了，也許他要問的問題曲嘯教授在他後面的演講里很快就逐一給出答案了。

當我們聽到故事的最後，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同志平反一切冤假錯案而得到昭雪了，我們以為他的演講也就結束了，突然間，但聽曲嘯教授一個『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講還沒完。他後面的

演講應該不算是演講了，而是對年輕人的教育了。『黨就是媽媽，媽媽打錯了孩子，孩子是不會也不應該記仇的！』

聽到他這句話，大家沉思着。也就明白了曲嘯教授來美國巡回演講的目的了。這也是他開始演講時我本能地預料到他最後要說的話。我看了一眼劉中海先生，他此時的眼睛仔仔細細觀看留學生們的表情。

本來會議到這裡也就該結束了。可突然間，汪榮祖教授說他要發言。汪榮祖教授臉色通紅，跟過去判若兩人。他非常憤怒地表達自己的醒悟心情。他說：『我過去只知道蔣介石國民黨是如何獨裁，如何玩政治，不誠實，專門欺騙臺灣人說共產黨毛主席是多麼獨裁，多麼血腥，多麼殘酷地對待不同政見者。對國民黨的宣傳我從來都反着讀，絕不相信國民黨的騙子把戲，而真心相信大陸共產黨的報紙，因為那些報道都是跟國民黨的說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嘯教授的演講，當真是血淚的控訴，句句血，聲聲淚！一個青年學者平白無故就坐牢 22 年！而這些，我在臺灣時也看到過類似的報道，但報道的事件沒有這麼邪乎，沒有這麼真切，沒有這麼令人憤怒。』

聽到這裡，我看了看劉中海先生（即陪曲嘯來美國進行宣傳的領導人——引者注），他已經坐不住了，他的臉色蒼白，表情顯示着後悔、吃驚、恐懼與遺憾。我忍不住去看曲嘯教授，他的嘴唇在顫抖，他的腿也在顫抖，突如其來的打擊如同晴天霹靂打得他暈頭轉向。他不知道是該坐下聽，還是繼續站着等待問問題的講完後給出回答。

相比之下還是劉中海先生比較鎮定自若，在汪榮祖教授停下來的一剎那，便立刻站立起來，想停止汪教授的評論。可汪教授擺手給他往下壓的手勢，意思是他還沒有講完。他繼續着他幡

然悔悟的評論：『什麼黨是親娘，可如此長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還是親娘嗎？比後娘都殘忍，還有什麼資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誠於她？母親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國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汪教授如此憤怒令我震驚。

聯誼會會長一看唯一的辦法就是停止汪榮祖教授的繼續發言，就在汪教授間歇的一剎那，他立刻站起，說二位剛下飛機，匆匆忙忙從國內來到美國，十分疲勞，明天他們還要趕路呢。會議到此結束。

我看得出來曲嘯教授內心的痛苦已經到了極點。這表明他的演講生涯結束了

這極具有戲劇性的一幕，既讓人莞爾一笑，更令人深思。這位汪教授絕對不會是美國或臺灣的特務吧？他一貫反對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曾經痛罵蔣介石，長期以來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說了不少好話。但當他了解中共統治下的黑暗現實以後，才幡然醒悟，嚴正聲斥。人們很自然地聯想到，還有多少像汪教授這樣長期被蒙蔽、被欺騙，而又有良知、有正義感的文化人呢？這些人必將不斷地覺醒，醒悟之後又將有何行動？我們且拭目以待。

4、一個久久揮之不去的幽靈

何謂幽靈？幽靈看不見，摸不着，但却是真實的存在，其能量、其影響，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人人都能感受到。它控制着億萬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學習、娛樂，甚至婚嫁、喪慶；掌握着廣大生靈的榮辱、禍福、生死。所謂『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管子）

這個幽靈不僅控制着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脉，而且控制着一

切物質的、非物質的財富，其中當然包括人才在內。全國的人才必須爲我所用，否則就是叛逆，不聽話者不得食，取消「人民」的資格，戴上高帽，打入另冊。爲我所用，也就是爲黨所用，爲黨效力、效命，甚至爲黨犧牲。在這個大前提下，具體衡量的標準就是那四個字：『又紅又專』。其實「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紅」，即不準懷有三心二意。這樣，實際上形成『人才私有制』或者說『人才黨有制』。

自古以來，衡量人才都是用『德才兼備』四個字，即兩條標準：德與才。很清楚：這個「才」字就相當於「專」字，而把「德」字換成「紅」字却是偷換概念的把戲。德，包括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學術操守等等，是每個公民都應該遵守的做人原則，當然應該成爲每個專家、學者所遵奉的行爲準則。本來這個「德」字沒有任何政治傾向性，沒有規定效忠於哪個黨派、集團。但共產黨卻把這個原則偷換成「紅」字，即要求對共產黨忠心耿耿，枉顧其它。

在封建社會裏，所有文人都應該爲皇帝效命。『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唐太宗那句名言：『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就說得更明白了。順着這條思路，共產黨當權了，當然也要「拿來」爲我所用。於是就有了這個「紅」字的要求和標準。對青年學生，他們習慣這樣說：是黨培養了你，你應該報答黨的恩情云云。對這種說教，值得一辨：請問：黨拿什麼來培養青年學生？黨有私產嗎？沒有！黨只不過是集中全國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首先滿足統治集團首領及其心腹「各取所需」以外，再從剩餘中拿出一點，用以培養忠實於自己利益、爲黨效命的走卒而已。何恩之有？

對老一輩專家則說：你過去是爲反動派效力，今天應該脫

胎換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首先應該感謝黨的挽救云云。總而言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應該、都必須感謝黨、感謝領袖。感謝的最好方式就是走「又紅又專」道路云云。於是許多老專家不得不放棄自己喜愛了幾十年的專業，違心地向「紅」的方向賣力氣。結果却未必讓統治者滿意，更未必放心，因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幾十年來，對以上陳詞濫調的說教，身在大陸的知識分子耳朵都聽出繭子了。明明知道其虛偽性，但誰也不敢公開質疑，更談不到據理駁斥了，只好表面上虛與委蛇罷了。當然，當局也未必真的相信每個知識分子表態的真誠，是否出自內心等等。但他們所要的就是你口頭上的效忠表態，於此足矣。最近看到《炎黃春秋》的主編吳思先生的語錄，其中有一句很有哲理：『他們生產謊言，我們偽裝相信』。

於是『又紅又專』演變成一個誰也不相信，但誰也不敢公開反對的口頭禪，就像那些宗教儀式上的善男信女們一樣，盡管口中念念有詞，心中却另有乾坤。

當人才黨有制這個幽靈被驅散時，中國必將出現一個人才輩出、群星爭輝的大好局面，必將迎來一個嶄新的偉大時代！

【首發於《民主中國》2010年10月29日】

且看毛澤東是如何『發展』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長期以來，中共當局在宣傳中總是喋喋不休地宣揚：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到了「文革」期間，更進一步宣傳：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峰』。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這是毛澤東的名言。前半句無疑是真理，後半句則純系謊言。幾十年的實踐雄辯地證明：共產黨最不講認真。現在就讓我們來「認真」地梳理一下，毛澤東是如何『發展』馬列主義的？

一、關於人口的理論

在馬列主義的理論框架中，有一個十分重要、十分著名的原理，即人自身的再生產與物質資料再生產這兩種生產應該相互適應。恩格斯曾經預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有可能象『對物的生產進行調整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整。』①對於中國的人口問題，早在 1850 年，馬克思在一篇政論文章中十分憂慮地寫道：『在這個國家，緩慢地、但不斷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②。面對着

如此龐大的人口重負，早在 20 世紀初，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也曾以十分清醒的目光認真對待，並用明確的語言向國人呼吁：『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③令人遺憾的是，自詡為馬克思主義忠實信徒的毛澤東却把前輩的教導忘在腦後。

早在奪取全國政權勝利在望時，在與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論戰文章中，毛澤東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口出狂言：中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革命加生產。』④ 1955 年周恩來向毛轉達邵力子和馬寅初二位關於控制人口的建議，毛回答說：『中國革命成功證明了：1、人多好辦事；2、人多熱氣旺』斷然予以拒絕。1957 年 7 月 9 日，毛召見邵力子等多位黨外人士聽取意見時，邵先生再次進言：盡快出台節制生育的政策。毛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次年 4 月，爲了掀起瘋狂的「大躍進」運動，毛更是進一步發揮說：『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情高、幹勁大』，由此掀起了一場持續十多年的全國性生育大競賽。在毛澤東的人口謬論鼓動下，中國的人口列車以瘋狂的加速度呼嘯向前。從 1954 年末 60,266 萬人到 1964 年末 70,499 萬人，10 年時間增加 1 億多人口；1969 年末爲 80,671 萬人，僅 5 年時間就增加 1 億人口；再到 1974 年全國總人口突破 9 億，達到 90,859 萬人，增加一億人口只用 5 年時間。直到老毛駕崩的 1976 年末已經達到 93,717 萬人。5 年以後的 1981 年便突破 10 億大關。

「人多是好事」這是封建制度下自然經濟的人口觀。在那個時代，以手工作業爲特徵的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人構成主要的生產要素，人多勞動力就多，糧食產量就高，經濟實力就強。其次，當時的戰爭頻繁。在戰爭中，士兵是戰鬥力的主要

載體。人口多，兵源自然充足，兵多戰鬥力自然強。『人多勢衆』嘛！總而言之，毛澤東的人口觀完全反映了封建時代自然經濟條件下的現實。因此和現代社會經濟條件下產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人口理論格格不入、南轅北轍。

再從實踐來考察：毛澤東在位 27 年，不僅沒有兌現當年批駁艾奇遜文章中的諾言，更沒有成功地解決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直到他死去的 1976 年，中國人均佔有糧食始終停留在 1956 年的水平（300 公斤左右），更為嚴重的是 60 年代初期由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導致餓死 3755 萬人的全國性大饑荒⑤。

由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及慣性作用，中國人口快車很難立即剎車。以至於直到今天，全國人民仍然在被迫吞下毛澤東親手釀制的苦酒：人口過多所必然造成的就業困難、生活水平仍然很低、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等等。如果在 20 世紀 50 年代就接受邵力子、馬寅初老先生的建議，把中國人口控制在 5~6 億的水平上，或者如地理學家孫本文教授於 1953 年所提出的將中國人口極限控制在 8 億以內，那麼，今天中國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將比現在要高得多，不僅早已解決溫飽問題，邁進小康，甚至在扣響富裕王國的大門了。今天 13 億多人口的重負大大延緩了而不是加快了中國人民奔向小康、富裕境界的步伐，大大阻礙了而不是促進了全國人民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設和完善的進程。一句話，龐大的人口數字是一個不堪負擔的沉重包袱，而不是如毛澤東所盲目斷言的『一件極大的好事』。

二、關於城市化的理論

由於毛澤東錯誤的人口政策，導致人口過多，成為新中國

難以承受的重負。面對龐大的人口負擔，毛澤東的解決辦法是：到農村去。

在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問題上，馬列主義理論有什麼教導呢？請看：

『城市的建造是一大進步』⑥

『總之，共產主義決不會起源於農村，而總是起源於城市』

⑦

『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⑧

此外，恩格斯還用極其形象而生動的筆觸熱情謳歌歐洲許多大城市的繁榮和進步。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里就是這樣描述倫敦的：『像倫敦這樣的城市……250 萬人這樣聚集在一個地方，使 250 萬人的力量增加了 100 倍。他們把倫敦變成了全世界的商業首都……這一切是這樣雄偉、壯麗，簡直令人陶醉……』

在另一個地方，他又這樣描述巴黎：『在這個城市裏，歐洲文明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⑨

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反復教導都在說明一個真理：只有城市才是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廣闊舞臺。中外社會和經濟發展史的實際更雄辯地證明：只有城市才能够實現一切生產和生活要素的集約化使用，做到最大限度的節約；才能充分滿足全體公民物質和精神生活全方位的需求。總之，城市代表着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促進了文化、文明程度的提高、全民素質的提升。可是毛澤東却大反其道，說什麼『農村是個廣闊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55 年 12 月）；『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 年 12 月）好一個土包子理論，

當然更是不折不扣的反馬克思主義謬論！農村只是小農經濟、自然經濟的「廣闊天地」，沒有也不可能有現代化經濟的廣闊天地。把廣大知識青年驅趕到農村去的目的，其實很簡單、也很明顯，就是卸掉城市人口的重負，但却增加了農村本來就嚴重過剩的人口負擔，同時把中國的人口重負推向未來，推給他的皇位繼承人。果然，幾十年後，這些人絕大部分仍然通過不同的途徑又回到了原來的城市。實踐證明：「廣闊天地」不在農村，而在現代城市里。所謂「大有作為」云云，最終變成了「大折騰」。折騰的結果是勞民傷財，同時還人為地制造了許多人間悲劇和社會矛盾，並從此改變了幾千萬青年學生的命運，甚至是毀掉了許多年輕人的美夢和理想。這些青年當中，也許就有未來中國的托爾斯泰、莎士比亞、雨果，或者愛因斯坦、牛頓、愛迪生等等。可是却被葬送在毛澤東那個「廣闊天地」里！20集電視連續劇《孽債》就是對這些社會矛盾和人生悲劇的無情暴露。10多年前，該劇在上海電視臺播出，收視率高達42.7%。由此證明該劇觸到了廣大觀眾心中的「痛感」，因而大受歡迎。無論在上海、在北京及其他大中城市，幾乎是『萬人空巷』爭看該劇。該劇取名為《孽債》，那麼，是誰造的孽呢？這個『孽債』又應該由誰來買單？應該向誰去清算？

再從宏觀來看，更為嚴重的後果是：大大延緩了中國城市化的步伐，同時也大大推遲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統計表明：直到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18%，1997年才達到30%，雖然此後城市化速度有所加快，但仍然大大落後於全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後於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最近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在今年年初首屆中國經濟年會上的發言中所公佈的最新數據，2009年中國城市化率僅為45%，而發達國家平均為80%。根據《發

展模式》一書的作者錢勒裏的發現，當一國人均 GDP 達到 3,000 美元以上時，該國的城市化率應該達到 56~58%。中國在 2008 年的人均 GDP 就達到 3,266 美元，但是城市化率却相差 11 個百分點。在這裏還應該說明的是，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韓俊先生坦言：目前 6 億城鎮人口中，有 27% 雖然在城市打工，但戶籍仍然在農村，因而實際上還應該算做農村人口。這麼說來，45% 的城市化率遠未達到，乃是一個虛假的統計數字^⑩。

城市化率嚴重滯後的最大惡果就是，長期保持二元經濟結構，『三農』問題突出，農業不振，農村落後，農民貧困。（據官方顯然被縮小了的數據：農村消費水平僅為城鎮居民的 1/3。）——內需嚴重不足，以至於不得不長期依賴出口和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這種增長模式顯然難以為繼。當局一再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收效甚微。多年來朝野有識之士都不斷呼吁「要大力啟動內需」，可就是啓而不動，或大啓小動。原因何在？非不為，乃不能也！何以不能？答曰：積重難返。『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澤東執行了 20 多年逆城市化政策所造成的二元經濟結構積弊深重，很難在短期內得到解決。

三、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

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書中，恩格斯在回答 能不能一下子就廢除私有制的問題時，十分明確地說：『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建立公有經濟所必須的程度一樣。因此，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會，並且只有在廢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創造出來以後，才能廢除私有制。』^⑪恩格斯的話是針對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歐洲而言。

在經濟比較發達的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尚且不能一下子就廢除私有制，不能一下子就把生產力擴大到建立公有經濟所必需的程度，那麼，對於一個經濟更落後的中國大陸來說，就更不可能一下子做到上述一切，則是毋庸置疑的。在 1875 年出版的《論俄國社會問題》一書中，恩格斯還有一段深刻的論述：『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發展到甚至對我們現代條件來說也是很高的階段，才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得階級差別的消除成為真正的進步，使得這種消除持久鞏固，並且不致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或甚至衰落。但是，生產力只有在資產階級手中才達到這樣的發展水平。』(12)恩格斯的意見是針對當時俄國情況而言，但同樣適用、甚至更適合於中國（因為經濟上比俄國更落後）

獨斷專行的毛澤東於 50 年代所主持的大規模對私改造運動，正是在廢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尚未被創造出來之前，主觀蠻幹的結果。既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更違背他口頭上信誓旦旦信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毛極其主觀地指望在生產力極落後、小農經濟汪洋大海之基礎上，構築其社會主義的大廈。結果只能是空想和慘敗。正如恩格斯所尖銳諷刺的：是共產主義的諷刺畫，社會主義的烏托邦。(13)也恰如馬克思在《資本論》3 卷裏所諷刺的那樣：『偏偏是自認為探索到規律的人，總想跳過、或者用法令取消發展階段，違背經濟規律，結果失敗了，受到規律的制裁。』

究其根源何在？最有發言權的首先應該數長期擔任毛澤東私人秘書的李銳先生。作為毛的私人秘書，追隨左右，參與機密。對中共幾十年的政治風雲了如指掌。由他來全面評價毛澤東無疑具有無可爭議的權威性和可信度。李銳在《毛澤東晚年「左」的

錯誤思想初探》文章裏直言不諱地寫道：『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提法似已有所偏離。』作者舉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原理為例，即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按照這一原理，生產力是起決定作用的。但是毛澤東的做法恰恰反其道而行。『毛是把改變生產關係放在比發展生產力更重要的地位。』『片面地、過份地誇大變更生產關係的反作用。終於從主觀願望出發，隨心所欲不斷變更生產關係，不斷搞窮過渡……造成嚴重破壞生產力的後果。』(14)

四、關於知識分子的地位問題

對於知識分子的地位問題，馬克思曾經這樣教導：『在學校中，教師對於學校老板，可以是純粹的雇傭勞動者……對雇傭他們的老板來說，却是生產工人……演員對觀眾來說，是藝術家，但對自己的企業主來說，是生產工人。』(15)

再聽聽列寧的意見：『對於專家，我們不應當採取吹毛求疵的政策。這些專家不是剝削者的奴僕，而是文化工作者』(16)

馬、列是這樣教導的，作為對比，毛澤東的觀點如何呢？

根據李銳的研究：『毛澤東政治生涯的開始就對知識分子抱有很深的成見。』證據是：1925年最早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澤東就把知識分子冠以『反動派』的惡謚。他寫道：『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的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專門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個階級與民族革命的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是極端的反革命派。』此外還有『中產階級的

知識分子，是半反革命』的論斷。(17)看到這裡，不禁使人毛骨悚然，感到後脊梁骨涼嗖嗖的，好可怕啊！後來這段文字在集結出版《毛澤東選集》時被刪去了。文字可以根據政治需要隨意刪去，但牢牢存在毛澤東思想深處、烙印在他腦海中、融化在他血液里的、對知識分子敵對情結却没有、也不可能刪去，始終伴隨着毛的一生。雖然在戰爭年代，爲了奪取政權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利用知識分子的文化知識和才幹，從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出發，也曾經言不由衷地講過一些知識分子的好話。但是勝利以後，大權在握，便原形畢露，立刻暴露其凶惡嘴臉，把昔日的盟友一脚踢出去，『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知識分子是 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18)

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都是根據一個人的經濟地位來判斷其階級屬性，而毛澤東却是根據一個人的世界觀或者說是思想傾向來確定其階級屬性，並因此而采取對策。根據唯物主義原理：存在決定意識，人們的經濟地位決定其思想，而不是相反。毛澤東恰恰是從一個人的思想意識來判斷其階級屬性。這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逢先知是長期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專家，也是充分掌握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文獻的權威人物。他就坦率地承認：『用政治思想來劃分階級這樣一個觀點在馬列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好心的人們也許要問一下，毛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美國威斯康星州大學歷史系教授、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專家莫里斯·邁斯納在其《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一針見血地寫道：『以主觀標準劃分階級很容易導致任意把政治上的對手劃成爲階級敵人』(19)。畢竟是旁

觀者清啊！真是一語中的！

毛經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資產階級這張皮不存在了，需要改換門庭，轉而投靠新主人——共產黨，因此就要不斷地改造思想，而且還要『七鬥八鬥』、『脫胎換骨』云云。對於這一套手法，廣大中老年知識分子深受其害，直到今天仍然記憶猶新，人人切齒。

五、關於階級鬥爭學說的來歷

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的學說都十分豐富、精深，任何人窮其一生也難以全部消化、吸收。從大的方面來分，馬克思主義可劃分為三大塊：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哲學體系、以剩餘價值理論為核心的經濟學說、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等。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ABC。毛澤東未必讀了多少這方面的經典著作，更談不到什麼深入的研究。但毛却有膽量僅僅用幾個字就把這個龐大的理論體系概括出來。請聽：1941年在延安的講話中，毛回憶早年是如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情況時這樣說：『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²⁰⁾從此，「階級鬥爭」四個字緊緊伴隨着毛的一生。『與人鬥爭，其樂無窮』成為他的人生哲學。並且把這個哲學具體運用到政治領域來，成為其實現政治野心的最大法寶。

『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一段著名論斷。從

此以後，「政治就是階級鬥爭」這個公式流傳甚廣。爲了增強其權威性，甚至還一度把這個公式的發明權歸到列寧的名下，似乎是根據列寧的著作和教導。這叫什麼？這就叫『拉大旗作虎皮』。目的就是虎人、忽悠人。經過認真查閱，不對了。這根本就不是列寧的話，不但不是列寧的話，恰恰相反。請看列寧是如何批判這種觀點的：

『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舊觀點來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嚴重的錯誤。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鬥爭，政治就是反對世界資產階級而爭取解放無產階級的關係……在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概念中，政治好像是脫離經濟的……其實不然，政治應該是人民的事，應該是無產階級的事……現在我們主要的政治應當是：從事國家的經濟建設，收獲更多的糧食，供應更多的煤炭，解決更恰當地利用這些糧食和煤炭的問題、消除饑荒，這就是我們的政治。』（21）『政治就是參與國事，給國家定方向……』隨後列寧並給政治下了一個經典式的定義：『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22）不僅如此，列寧對於那種泛政治化的作風深惡痛絕。他寫道：『今後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談政治』。（23）

長期以來，毛澤東正是利用這個『階級鬥爭』學說，到處揮舞着『階級鬥爭』的大棒，所向披靡，剪滅一個一個的政敵，也不斷地打倒一個又一個持異見的戰友。與此同時，更產生了極大的威懾力，使所有的官員、百姓，心裏不停地『顫慄』，乖乖地臣服在毛澤東的淫威之下。這是他的拿手好戲，從效果看，也真屢試不爽。所謂『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毛所需要的恰恰就是這種效果，這就是毛一以貫之地堅持『階級鬥爭』謬論的根本原因。

除了「階級鬥爭」這四個字，老毛在「文革」期間，又發

明了另外四個字。他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顯然這四個字的矛頭所向不是別人，正是過去的親密戰友劉少奇及其同黨。瞧！在毛的心目中，所有馬克思主義詞句，全都是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的，可以隨時隨地、隨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概括』。今天概括成「階級鬥爭」，明天又可以概括成「造反有理」。好一個魔術師，可以根據不同的目的，把同一樣道具，隨時變換出各種新花樣來。看來，在其內心深處，馬克思主義不過只是一個工具而已，可以隨意打扮，以服務於自己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目的。

『知君莫如臣』，更進一步來說，知君莫如近臣。林彪跟隨老毛幾十年，對他的了解可以說是深入骨髓。請看他的評論：毛『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架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實際上已成為當代的秦始皇』、『他是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24）

對於「當代秦始皇」這個「雅號」，老毛絲毫不覺得難堪，而且頗為得意地宣告：『我就是要宣稱自己就是當今中國的秦始皇』。這是他的夫子自道！

1981年6月中共11屆6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由於鄧小平的權威地位和利害考慮（不是從是非考慮）出發，仍然承認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可是根據以上幾點強烈的對比，白紙黑字，雄辯地證明：毛澤東根本就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更談不到『偉大』二字了。

時間已經過去了近30年，難道我們還只能停留在30年前那個連鄧小平本人都承認是違心的『決議』水平上嗎？

這幾年，當局似乎也明白：毛澤東這面極其骯髒的旗幟早

應該拋棄了。例如 2009 年 12 月 31 日胡錦濤在《共創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美好未來》的新年賀詞中就没有提「毛澤東思想」這個東西，而是提『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看起來最高決策機構也開始與時俱進了，雖然步伐還不够大，不够快，但值得欣慰的是：堅冰已經開始融化了。

最後，請聽英國詩人雪萊《西風頌》里的詩句：

『既然冬天已經過去，難道春天還會遠嗎？』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145 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64 頁

③《孫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17 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第 1511 頁

⑤《千秋功罪毛澤東》辛子陵著 2007 年，香港出版下卷第 739 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3 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10 頁

⑧《列寧全集》第 19 卷 262 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 303 頁、第 5 卷 550 頁

⑩《新京報》2010 年 2 月 24 日報道

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第 219 頁

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第 616 頁

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卷第 378 頁

⑭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 232~233 頁

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 分冊第 443 頁（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

(16)《列寧選集》第 3 卷第 786 頁（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17)《炎黃春秋》2008 年第 7 期 26~30 頁

(18)《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409 頁

(19)莫里斯·邁斯納着《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第 410 頁

(20)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 114 頁

(21) (23)《列寧選集》第四卷第 370~371 頁，第 397 頁

(22)《列寧文稿》第 2 卷第 407 頁

(24)引自《炎黃春秋》1998 年第 1 期第 15 頁

【發表於《觀察》2012 年】

偉人之所以看起來偉大，是因為我們自己在跪着……站起來吧！

——馬克思《神聖家族》

對共產黨理論基礎 徹底顛覆之作

——喜讀《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

『指導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毛澤東在 1949 年向全世界的莊嚴宣告。60 餘年來，億萬中國人民就是在這個『理論基礎』的統帥下，老老實實、服服帖帖地生活着、忍受着，不敢有片言只語的質疑。一種學說只許無條件地、盲目信奉、不允許任何討論，更不允許質疑，那不是科學，而是宗教教義。真正的科學不但允許懷疑，而且歡迎討論、質疑、辯難。

改革開放 30 年來，不斷有學者發表文章，反思毛澤東統治下的嚴重錯誤，其所持的理論依據也必須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從來沒有人敢於公開質疑馬克思主義的絕對正確性和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

94 歲高齡的離休幹部、資深學者張宣三老先生從上世紀末就開始對自己幾十年來深信不疑、並且極力宣傳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反思。反思的成果是許多篇雄文，積累下來，匯集成冊，並請老革命家李銳為序，就是這本《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全書約 20 萬字，包括《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一）、（二）和

其它幾篇重要文章。寫作的時間跨度從 1999 年直到 2010 年，長達 11 年。

由於作者寫作時間的先後，有許多精彩的論述分別散見於各篇，而未能形成體系。這似乎可以說是美中不足。現不揣淺陋，予以梳理、歸納如下：

1、馬克思關於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的論斷不符合世界歷史實際。

《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地寫道：『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在完成於 2008 年 7 月的《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二）一文中，作者寫道：『在《共產黨宣言》中首先把人類歷史概括為階級鬥爭的歷史，但是歐洲的歷史、希臘羅馬帝國的滅亡，從中世紀轉向資本主義，沒有一次是由於階級鬥爭的原因實現的。我國歷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是與農民革命有密切關係，但每次農民革命都沒有造成歷史的進步。而且從歷史發展來看，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都是在和平時代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戰爭只能產生破壞，不能產生建設。然而馬克思却做出結論：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見該書 133、145 頁）

正是這個「階級鬥爭」理論遺禍無窮。經過斯大林和毛澤東之手，先後在兩個東方大國里，上演了無數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人間慘劇。由於當局刻意封鎖、塗抹歷史，年輕的一代人大多不知道。但中老年人却記憶猶新、餘悸尚存。尤其到了毛澤東手里，更和他那『與人鬥爭，其樂無窮』的好鬥性格不謀而合。他多次公開宣告：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納起來就是一條：階

級鬥爭。

20 世紀以來的生活實踐雄辯地證明：所謂『階級鬥爭』從來就不可能推動社會前進，也不可能帶給人民任何幸福，相反，只能造成人民的大災難、經濟的大破壞、社會的大倒退。中國歷史上多次農民造反的結果更是如此：生產力的大破壞，人民的大逃亡、流離失所，人口銳減。巨大的代價造就了一個新的皇帝上臺，如此而已，社會並無任何進步、制度也無任何更新。季羨林教授曾有詩云：

朝代紛紛排成行，開國明君皆流氓；

如果有人不相信，請看劉邦朱元璋。

《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作者寫道：『從西方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出，在自由和民主得到實現的國家里，很少發生內戰，原因是不同的利益和觀點可以在沒有強制的條件下通過協調和合作的方式來解決……無需訴諸暴力和階級戰爭……美國建國以後到現在，中間只經過一次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從那時到現在 150 多年，美國已經成為科學和生產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國家……因而被馬克思稱為「現代國家最完善的例子。」』（該書第 77~79 頁）

正是對中外歷史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才使今天的國家領導人得出結論：為了發展經濟、推動社會進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需建設『和諧社會』。持家講究『家和萬事興』，經商要『和氣生財』，治國更需要上下一心、同心同德。當局提倡『和諧社會』實際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鬥爭哲學的徹底拋棄和永遠告別。

2、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就要滅亡的論斷與現實嚴重背離。

在完成於 2004 年 1 月的『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一）和其後完成的（二）中，作者多次指出：『馬克思斷言：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須消滅，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到來了。這是馬克思對歷史發展判斷的一個最重要的失誤。馬克思沒有看到商業危機是整個經濟向上發展過程中由於競爭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經濟失衡，是在自由競爭的初期階段人們還沒有經驗來處理好生產和銷售之間的關係時所造成的一時性生產過剩。但是經過一個時期生產停滯和下降，恢復了平衡，生產又以更大的規模向前發展。這說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發展並沒有停止，生產關係沒有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作者並且舉例來證明：羅斯福實行新政，以政府的干預來消除危機所帶來的嚴重失衡，這是人們對經濟發展自覺調節的開始；凱恩斯從理論上論證了危機是可以通過人們的預見，用財政政策的辦法對經濟進行干預來緩解和避免的。

在另外一個地方，作者還用略帶諷刺的語調說：『他（馬克思）在書房里作結論時，整個歐洲却達到從來沒有過的繁榮，資本主義制度正在變得更加穩固，階級關係更加和諧了』。『當資本主義把知識引入生產力，把生產力迅速推向前進的時候，馬克思還在大英博物館里研究資本家是怎麼用剩餘價值來剝奪工人並為此而憤慨不已。』（見該書第 82、137、163 等頁）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馬克思去世後的 100 多年里，科學技術以其突飛猛進、令人目眩的力量，給資本主義帶來了無窮的生命力。以至於我們這些長期生活在所謂『社會主義天堂』里的老百姓，也無時無刻不在享受着資本主義文明和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種種新發明，從而使我們的生活更舒服、更便捷、更快樂。最爲人們熟悉的計算機、互聯網、手機等等，無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家發明創造的偉大成果。即使在目前仍然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那些

專政機構所使用的各式各樣武器裝備、通訊設備、聯絡手段等，絕大部分的發明權也還屬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科學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文化所熏陶、培育、造就的人才所貢獻的。

馬克思曾斷言：『資本主義世界的喪鐘敲響了』。可是一百多年後的現實却是：資本主義制度仍然活躍在世界舞臺上，而且繼續掌握着話語權，引領着世界潮流。相反，被馬克思寄予厚望的社會主義制度，却大批量地消亡、不得不轉型更張；僅存下來的幾個，日子也未必好過：或者經濟仍然落後，人民仍然貧困，或者貧富尖銳對立、社會矛盾劇烈、動蕩不已。到底喪鐘為誰而敲響？尚屬未定之天！

3、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給此後的世界帶來無窮災難。

根據該書作者的研究，馬克思早年就主張把全社會成員的生存條件集中管理，由無產階級「控制」起來。只不過當時還沒有考慮成熟，沒有想出一個恰當的名詞來準確表達這個思想。後來巴黎公社起義發生，不久又歸於失敗。『這確實是一場可歌可泣的戰鬥，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軍隊的戰鬥，但不是無產階級起來要求改變法國政治制度的革命，工人階級也沒有提出明確的政治主張。但是馬克思就把巴黎公社戰爭中全面集中和統一領導的全部經驗拿來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政權以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進行論述。取消三權分立的政府制度，把全部資源絕對集中在政府手里，所有人都拿工人的工資，取消軍隊、警察和官僚等等。這些一切集中、絕對統一領導的戰時體制全部變成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專政的手段。』（該書第 139 頁）馬克思還曾不

無得意地寫信告訴朋友說：階級鬥爭並非是自己的發明，而無產階級專政才是自己的發明，是自己理論的核心。

問題在於：依靠什麼力量來實現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呢？對此，馬克思當時還沒有來得及想明白。這個難題留給後人，並被列寧解決了。列寧認為：應該建立一個組織嚴密、有鐵的紀律的黨來承擔『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任務。而這樣的黨，又只能靠具有特別頭腦的領袖來領導。如此一來，無產階級專政最後便演變成領袖專政，也就是個人獨裁。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政——領袖獨裁，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發展邏輯。而最早揭示這一規律的人是俄國著名的政務活動家、思想家普列漢諾夫。他在 1918 年寫下的《政治遺囑》里就曾指出：『任何一種專政都與政治自由權利和公民自由不兼容……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演變如下：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自由，因為他們一實行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列寧很清楚這一點。』

讀了這段論述，人們不能不以五體投地的佩服來贊美這位杰出思想家的英明預見和深刻洞察。此後，列寧，特別是斯大林、毛澤東所實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無產階級專政雄辯地證明了普列漢諾夫的預言。斯大林、毛澤東更以其殘暴、血腥的記錄和罪行留在 20 世紀的歷史中。

直到今天，「無產階級專政」的後遺癥和陰影仍然在嚴重困擾着中國人民。作者寫道：『打江山、坐江山所造成的極權統治最大惡果就是把權力當成世襲，由他指定接班人……極權統治者不認為權力來自人民，而是打下來的江山自己有權坐……把國家權力當成遺產傳給自己所挑選出來的接班人。（見該書第 25、

122 頁)

此外，作者還指出：馬克思在晚年也曾注意到，在英國，中產階級正在擴大（《資本論》第三卷第 1000 頁）這種現象顯然和他在《共產黨宣言》里『日益分裂成兩大敵對陣營』、『階級關係簡單化』的論斷不相符。但可惜的是，馬克思並沒有繼續前進，進而修改自己的錯誤結論。這又是一大遺憾！

最後，作者坦率地承認：自己『一直是一個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慢慢地從崇拜到懷疑，到後來慢慢感覺到問題都出在他們身上。』這真是肺腑之言。『從崇拜到懷疑』幾乎是許多認真思考的朋友所共同走過的道路。知識分子由於具有獨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因而經常被極權統治者所不能容忍，成為打擊的對象。這是知識分子本人的不幸，更是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悲劇。

* * * * *

在 1999 年 12 月完成的《我國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一文中，這位具有 73 年黨齡的老同志，還對自己畢生追隨、無限熱愛的黨發出如下的忠告：

首先，針對當前官方宣傳中『報喜不報憂』，對成績大張旗鼓、連篇累牘，甚至是喋喋不休、反反覆復、沒完沒了，而對於缺點、錯誤則盡量隱瞞，縮小，自欺欺人的惡劣作風，他沉痛地寫道：『我們不應當僅僅滿足於和自己過去的落後比較，而應該與國際上先進國家比較，並且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才能警策自己，改進缺點，迎頭趕上。』在國門緊閉、中外隔絕的時代，僅僅「和我們自己過去比」從而沾沾自喜，尚可安撫人民群眾於一時。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謊言有效，但也有限』。只能欺蒙群眾一時，而無法長期欺蒙，更不可能永遠欺蒙。特別是改革開放的

今天，老百姓都學會了睜開眼睛看世界，通過中外對比，例如從前的東德和西德，今天的朝鮮和南韓，還有我國大陸和臺灣……同文同種，人是同樣的人，地也是同樣的地，可幾十年以後，却是一貧一富，奇怪嗎？一點也不奇怪。誰優誰劣，立刻顯現出來。人民群眾還會傻乎乎地相信當局那些自我吹噓的所謂『偉大成績』嗎？中共不是經常宣傳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通過二戰以後 60 多年的實踐，反復對比，全面考核，這個『唯一標準』不是早已做出了絕對公正的裁判嗎？

其次，針對宣傳中幾乎把所有問題都找一個『敵人』來推卸責任的慣用伎倆，作者寫道：『把人民對民主和自由的要求說成是外來的影響和西方思想的滲透，而不是人民自己起來爭取應當享受的權利。強調越是改革，越要對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襲進行抵制……』（見該書第 5~6 頁）

把群眾自發的維權行動都看作某個敵對勢力挑動的結果，說是某個『幕後的黑手』所煽動、所操縱、所策劃的陰謀。這是當局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其實這種思維方式恰恰反映了中共自己歷史上曾經運用過的手段。早在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奪取政權的鬥爭中，中共就經常使用這種手段，以挑動群眾和國民黨政府對立，唯恐天下不亂。1947 年毛澤東所謂開辟『第二戰綫』，就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發動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等鬥爭，使國民黨後方不斷起火，蔣介石腹背受敵、如坐針氈。想不到今天中共却借口別人如何挑動群眾云云。其實，這兩者之間有着根本的區別：當年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群眾鬧事，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打倒蔣介石反動派，奪取政權。而今天大量群眾性突發事件的性質則不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教授

最近的研究成果，群體性事件絕大部分都是出於維權的性質，屬於利益之爭，沒有政治目的，並不是要求共產黨下臺，相反，恰恰是在維護中共統治的前提下，要求中共主持公道和正義，來裁判當事者和對方之間紛爭的是非曲直。（見《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于教授文章）這怎麼能和當年中共所搞的『發動群眾』手段相比擬呢？因此，所謂『幕後黑手操縱』云云，顯然是一種借口而已。目的就是恐嚇、威懾群眾，迫使老百姓不得不放棄維權行動，群體事件也就不了了之。最近有位學者撰文說：『中國民衆的教育程度越高，對其他國家政治文化了解越多，中共獲得國內民衆心理認同和政治支持的難度越大』。（見《南方周末》2010/6/24f31版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正漢文章）尤其是在互聯網廣泛應用的今天，再喋喋不休地吹噓什麼偉大成績、光榮歷史、一貫正確云云，恐怕是徒勞的。不僅如此，可能適得其反，使人們越來越反感，產生逆反心理。

讀罷全書，掩卷沉思，思緒萬千，心潮澎湃。筆者和該書作者張先生有着相似的經歷（當然由於年齡原因，我的資歷比張老淺得多）：少年時代就憑着一腔熱血、甘冒白色恐怖和殺頭危險，毅然追隨中國共產黨鬧革命，從事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統治。那個時候，對於馬克思主義當然深信不疑，對於共產黨、毛澤東更是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敬仰。可是生活現實不斷地、反復地校正自己的思想，從盲目信仰到懷疑，由懷疑而思考，因思考而更進一步加深了懷疑，最終掙脫長期禁錮自己的精神枷鎖，跳出思想的牢籠。偉大的思想家孔子曰：『吾十而有五始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何謂『不惑』？就是不再被任何人忽悠，也不再相信那些政客、野心家天花亂墜的宣傳。一切要看實際：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真正提高了沒有？

言論自由實現了沒有？警察是不是可以隨便抓人？隨便請當局不喜歡、不放心的人去『喝茶』？貪官污吏是多了還是少了？官員辦事是不是更認真了，還是更隨便、更敷衍？官員的財產是不是公開了？老百姓是不是可以隨時查閱？官員的配偶、子女是不是自立了，或者仍然在不斷地享受着父輩功勞、地位等等的大量『紅利』？……根據這些選項，基本上就可以判斷一個政權是不是值得信賴？值得擁護？值得熱愛？

老夫年近 80，垂垂老矣。早已無力改變客觀世界的任何事情，但唯一可以改變的就是自己對客觀世界的態度。客觀世界美好，我便衷心擁護之、熱愛之；反之，則厭惡之、批判之。

僅此而已，豈有它哉？

[附]105 歲的周有光談話：『馬克思的許多預言就錯了。馬克思說工業越發展，工人就越多，所以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他沒想到工廠裏面後來沒有工人了。我在日本第一次見到沒有工人的工廠，很大一個車間祇有三個工程師，玻璃牆後面都是自動化作業。後來我又在美國看到沒有農民的農場，在夏威夷，一個農場祇看到 5 個人，都是機械運作。這是馬克思沒有預料到的。再比如，股票制度也改變了資本主義。美國工廠裏的股票一半都是工人買的，工人做了老板，自己又被剝削又是剝削人的，事情就複雜了。

俄羅斯的學者已經有這樣的研究，認為馬克思沒有看到真正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分為三個階段，一戰以前是初級階段，一戰到二戰是中級階段，二戰之後是高級階段，馬克思去世太早（注：1883 年去世），祇看到初級階段的前半部分，因此《資本論》祇是哲學推理，不是科學論證。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被否定，從實踐上也被否定了。但是我們這裏還在捧他，因為我們的旗幟不

能拿下來。』

比如經濟學，中國以前祇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共產主義否定資本家，說資本家是在剝削工人，自己沒有創造價值。可現在連社會主義國家也承認資本家有三種功能：創業、管理和發明創造。創業最難，美國工業發達，依靠不斷培養優秀的創業者。管理是重要的生產力，今天已經成為公認的常識，發展成為許多門學科。蘇聯把資本家都殺光了，沒有人管理，所以經濟失敗。

【發表於 2012 年 7 月《觀察》網刊】

讓我特別痛心的是，有許多人還把對民意的引導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挾持民意為『人質』，來抵制對改革的正當要求，抵制對一些錯誤決策的修正。這造成很嚴重的後果，更是違反政治倫理的。

——第 7 屆全國人大委員長 萬里

第三隻眼睛看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已經過去一個甲子。穿過歷史的迷霧，今天我們有了更多的信息，可以重新探討。因此人們對於這場戰爭的研究熱情突然升溫，并與日俱增。

第一隻眼：毛澤東之眼

在那個時代，全國人民都是用領袖的眼睛來看朝鮮戰爭。只允許遵照毛澤東一個人的『最高指示』來思考、說話，『毛云亦云』。通過毛澤東的『慧眼』，中國人民所看到的朝鮮戰爭是這樣的：一、戰火是由南朝鮮李承晚集團勾結美帝國主義發動的，因而是一場侵略戰爭；二、美帝國主義的野心是想通過朝鮮這個跳板，進一步消滅新中國，即所謂『唇亡齒寒』；三、因此，



中國參加這場戰爭完全是被迫的、正義的、自衛的，即所謂『保家衛國』；四、通過這場戰爭，中國和朝鮮人民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振我國威，壯我軍威，打出了中國人民的威風和志氣。

即使到了1957年，毛澤東搞了一個『陽謀』，誘使衆多知識分子紛紛議論、質疑當局各項政策、措施，在這個『鳴放』運動中，各種質疑的聲音都有：對土改、鎮反、肅反、農村的合作化、城市公私合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等，唯獨沒有對『抗美援朝』的質疑。看起來，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的長期『洗腦』的確見效，至少在這個問題上，做到了老百姓與政府的『高度認同』，實現了『同仇敵愾』。

睜開第二隻眼看事實

直到老毛駕崩，這隻獨裁者的眼睛終於閉上了，被長期隱瞞的真相才開始一點點顯露出來。全國人民開始尋找新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一切，包括朝鮮戰爭。這才有了第二隻眼睛來觀察世界、評價歷史事件。特別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原蘇聯國家檔案部分解密，終於真相大白。真相是什麼？

一、戰爭不是由對方挑起的，而是由我們那位『好』鄰居所挑起。在斯大林的默許下，在中國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下，金日成公然挑戰聯合國的權威，突破其代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共同確定的南北朝鮮分界綫——三八綫，悍然發動戰爭，三天時間就攻下了韓國首都漢城，世界爲之震驚。

二、美國根本就沒有進攻中國的打算。當時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五星上將奧馬爾·布萊德曾經明白指出：『如果我們打入中國的話，那麼，我們將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在一個

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這段話在邏輯學上叫做『假言判斷』也叫『條件判斷』，前提是必須要有一個先決條件，才會產生另一個判斷。可是長期以來，當局的宣傳機器偷偷地把人家前半句刪掉，僅僅取後面那半句話，到處宣傳，成為美國佬認輸的證明。斷章取義，莫此為甚。這也是中共那些筆杆子們所慣用的伎倆！

三、中國之所以參戰完全是被金日成捆綁在他那架戰車上，欲罷不能，所謂『保家衛國』等等完全是欺人之談。

四、戰爭的結局是：以幾倍於對方的傷亡數字，換來了停戰談判、恢復原狀——回歸三八綫。死亡數十萬中國人民的子弟兵，對於豪氣萬丈、一心要做世界霸主的毛澤東來說，根本無所謂。所謂『打出了中國人民的威風和志氣』云云，則與中國老百姓根本不相干。中國老百姓需要的是：平平安安過日子，沒有槍聲、炮聲、轟炸聲；沒有批斗、打倒、黑監牢；沒有洗腦、截訪、維穩辦；當然更不需要『萬歲萬歲萬萬歲』。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當年高唱『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脖子上還帶着紅領巾的娃娃們，今天有的已經成為各級官員了。他們一個個心向往之的不是別的國家，恰恰就是當年發狠咒罵的美帝國主義。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把妻子兒女送往美國定居，自己也都早早準備了護照和『綠卡』。連王立軍這位副部級高官被薄熙來威脅，也偷偷地跑到美國領事館要求庇護。時至今日，當年毛澤東所謂的『威風』安在？『志氣』又何存？當年那場戰爭死亡數十萬熱血青年，不過是成就了毛澤東的一番野心，使他在邁上世界霸主寶座的進程中跨上了一個臺階而已。

從 2003 年出版、北京國防大學教授徐焰的新著《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直到最近的網文《朝鮮戰爭欺騙了歷史》，作

者們的分析都很深刻、到位。這篇網文最後的結論是：朝鮮戰爭的結果是：留下了一個無耻的、獨裁專制的、封閉的鄰居；樹立了一個強大的、民主自由的、開放包容的對手。也就是說：這是一場根據錯誤的信息（認為美軍最終目標是侵略中國）決策而打的、付出了極其慘重代價，因而是得不償失的戰爭。

第三隻眼看韓戰的遺產

如果再進一步思考一下，或者說用第三隻眼睛來看的話，結論也許又不一樣。

這場朝鮮戰爭有沒有積極作用呢？

首先，許多新時期的研究成果幾乎一致肯定：朝鮮戰爭的後果之一是推遲了臺灣的解放。從老毛及其子民們的立場來看，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恰恰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按照毛澤東原來的意圖是：先吃掉臺灣，然後再打南朝鮮。如果歷史按照這個計劃發展的話，我們今天還會有臺灣這個民主樣板嗎？不管今天的中共當局如何反復聲明：絕對不搞西方那一套，因為不符合中國國情云云。但是却不能不面對一個現實問題：同樣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為什麼在臺灣可以搞兩黨制、民主選舉、司法獨立、輿論監督等等，在大陸就不能搞？理由似乎太蒼白了吧？說來似乎也不理直氣壯吧？

再進一步說，按照毛澤東的個性，如果臺灣被吃掉了，勢必『宜將剩勇追窮寇』一鼓作氣地拿下香港、澳門。沒有臺灣這個民主樣板，香港、澳門的『一國兩制』恐怕也無從談起（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實際目的就是為了給臺灣人民一個『樣板』）。那個時候勢必『全國一盤棋』，統一實行一黨專制。首

先給你們這些『長期受殖民主義熏陶的人』洗洗腦，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吧？

如果臺灣被吃掉，香港、澳門都納入中共的統治下，還會有今天臺灣人均收入幾倍於大陸的美事嗎？臺灣、香港的人均收入大大高於大陸的事實，令大陸人民羨慕不已。因此，臺灣、香港、澳門同胞沒有被強制納入所謂的『社會主義天堂』，實在是萬幸。這個萬幸，不能不『歸功』於那場朝鮮戰爭！

其次，在朝鮮戰爭期間，毛澤東早已看好並預定為『皇儲』的那位『毛二世』，被『萬惡的』美帝國主義炮彈擊中犧牲了。我們設想，如果毛岸英仍然活着，其他任何人還有資格接班嗎？中國勢必搞毛二世、毛三世……

整個中華民族勢必倒退到 19 世紀封建世襲的家天下。那時，我們仍然要生活在『皇恩浩蕩』、『奴才該死』的社會制度下，一個個乖乖地當奴才！

當然，這樣的結果並不符合當年那場戰爭的策劃者（斯大林）、發動者（金日成）、積極參與者（毛澤東）原來的意圖，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大相徑庭。

歷史就是如此鐵面無情：一個個獨裁者、野心家、暴君都指望自己的獨裁統治成為鐵桶江山，傳至千秋萬代，但沒有一個能夠如願以償。毛澤東也不能例外。

【發表於香港《爭鳴》月刊 2013 年第 2 期】

中國知識分子百年遭遇的縮影

——《心遠——一個教育世家的百年滄桑》讀後感

「教授村」——榮耀與苦難的見證

去年九月由中國官方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一本詳細記述中國知識分子一個特殊群體的書《心遠——一個教育世家的百年滄桑》。全書三十餘萬字，文筆流暢，可讀性強。該書通過對江西省南昌市心遠中學百年變遷個案的敘述與分析，見微知著，映照出整個中國知識分子命運。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私人辦學非常發達。心遠中學就是由南昌市近郊的月池村熊姓家族集資興辦並傳承百年的名校。

提起月池熊家，那可是名聞遐邇的大家族。族中人才輩出，大多是讀書人，其中還出了許多知名教授。因此，2002年南昌市當局授予該村「教授村」之美稱，並樹立「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碑。

該村更不乏鍾情於「聚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有識之士。熊育錫（1868——1942）老先生乃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就是心遠中學的創辦人。

該校本來是專供熊氏子弟就讀的，後來才面向社會招生。

從此，家族學校擴大為全社會的學校。其教學質量和水平在南昌教育界一直穩居前列。

熊氏家族的受難者

該書忠實地記錄了近、現代熊氏家族及心遠人百年來的滄桑巨變，通過這些人和事，雄辯地證明了一個事實：一九四九年後，知識分子群體遭受到「史無前例」的毀滅性打擊。

首先拿來祭旗的是熊大綬先生（1913——1939年）。大綬先生於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曾與錢偉長等著名學者同學；其恩師就是中國物理學的泰斗、清華四大哲人之一的葉企孫大師。在校期間，熊大綬特別鍾情於「紅外」技術，後來的事實證明，這項技術對國防事業具有極高的使用價值。1937年，他本來已經考取赴德國留學的資格，但在「七七事變」爆發、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他抱着一腔熱血，毅然告別清華，投身軍營，進入呂正操領導的冀中平原根據地，擔任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他本來可以為偉大的抗日戰爭做出一番貢獻的，孰料在1939年夏秋之交，突然被根據地鋤奸部當作「特務」抓起來，嚴刑拷打，百般折磨。在某次軍區機關轉移過程中，又被押運人員私自處決（該書第155-170頁）。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就這樣隕滅了。他不是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槍炮下，而是死在名為「抗日」的中共軍隊之手。更令人髮指的是：他們為了節約子彈，采取最原始的方式——用石頭活生生把他砸死。

中共建政以後，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更是不斷升級。僅一九五七年那場「陽謀」中，就有近十位熊氏後人被劃入「右派」的行列：

熊正瑾（1898——1961年）1918年公費赴美國留學，十年後回國，先後在廈門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多所高校任教，並幾度兼任外語系主任。1958年他在四川大學被打成「右派」，經歷了難以想象的苦難，1961年含冤而逝。所幸他的外孫，也就是其女熊大質之子邵予博士事業有成，擔任中國石化集團公司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在邵予先生的策劃下，以心遠中學為主綫的電視劇《心遠》順利完成，將在全國放映。

此外，被「陽謀」收入網中的還有以下諸位：

熊正琥（1898——1961）1920年畢業於唐山工學院，曾任江西省公路局總工程師；

熊正珽（1908——2000）1927年第七期黃埔軍校學員，曾擔任江西萍鄉中學教師；

熊正珽（1910——1970）1935年廈門大學生物系畢業，南昌二中教師；

熊正珀（1917——1985年）1940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曾任長江流域規劃委員會高級工程師；

熊大純（1907——1992年）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研究院工商管理碩士，曾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外業務局國外處副處長；

熊大道（1923——1967年）1943年全省會考中名列第一，就讀於唐山鐵道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

熊秋思（1927——）1952年畢業於湖南大學電機工程系，留校任教，後被評為教授。

（以上各位的情節見該書第144-146頁）

心遠中學的幾例受難者

除了熊氏家族以外，與心遠中學有關的其他人也不乏被劃為右派者。例如：清末著名思想家嚴復之子嚴叔夏（1897——1962），在中共政權下曾雄心勃勃地想要報效祖國、建功立業，並擔任過福州市副市長，1957年也被劃為右派。由於身心嚴重受創，病逝於3年人禍時期，時年65歲（該書第257頁）。這位嚴叔夏先生的大女婿就是兩岸會談中備受關注的臺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

早在1948年，心遠中學就建立了該校第一個共產黨小組。到了1957年那場席卷全國的「陽謀」中，這個地下黨組織六人中有三人被劃為右派，其中命運最為悲慘的是鍾純民。他在甘肅省花紗布公司被劃為右派，並被迫害致死，死時年僅29歲（該書第282-283頁）。在這個組織中，還有位劉振輝，早在1955年就被打成「胡風分子」而關進「人民的」監獄。由於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迫害，終於瘋了，後來也慘死（該書第283-284頁）。

除了1957年那場「陽謀」，還有許多人在其後的歷次劫難中先後被整、被鬥，乃至於被迫害而死。例如：

熊氏家族第二代傳人、該書作者祖父熊冰先生的同學兼摯友、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驌，曾經留學美國，回國後曾任中正大學校長。1968年7月16日，被批鬥後突發心肌梗塞而死（該書第124頁）。這位科學巨匠的銅像現樹立在廬山植物園中，供後人憑吊。當地的解說員可以如數家珍般介紹其譽滿全球的學術成就，却絕口不提他是如何被整死的。筆者特地查閱《辭海》，在「胡先驌」的詞條中，也是僅僅介紹其學術成就，對於他被批鬥而死的慘劇却不着一字。

《心遠》的悲涼是時代的悲哀

該書名爲《心遠——一個教育世家的百年滄桑》，筆者讀後深爲感動。此書實際上是一個「縮影」，映照出中國知識分子百年來，主要是 1949 年以來的悲慘遭遇和悲涼心境。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就有以天下爲己任的萬丈豪氣，有「橫眉冷對千夫指」、糞土王侯的沖天傲氣，有登高能賦、出口成章、令人傾倒的才氣，更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凜凜骨氣。但是，1949 年以後，這一切都被剝奪，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剩下的僅僅是一腔怨氣，一肚子低眉俯首、苟延殘生的窩囊氣，一身搖尾乞憐的窮酸氣，甚至還有那種認賊作父、賣友求榮的市儈氣。

耐人尋味的是，這本書有很多「不合時宜」的內容，屬於當局所嚴厲禁止披露的歷史真相。今天竟然出版了，難道不足以令人深思嗎？

【發表於香港《爭鳴》月刊 2013 年第 3 期】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詩人北島

「地下黨 16 字方針」 完全是歧視與偏見的產物

早在本世紀之初，有位老戰友寄給我一份資料，就是關於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地下黨的 16 字方針。這位朋友很怕因此被扣上『泄密』的罪名，所以再三告誡我：千萬不要外傳，更不要在寫文章時引用。近年來，先後看到《炎黃春秋》上穆廣仁先生及其他朋友的文章中，公開披露了這個 16 字方針。最近又讀到《潮汛》第一期 105 頁的内部文件，也是曝光此事。看來，這個東西已經不再是「黨內秘密」，因而可以公開討論了。

我認為：這個 16 字方針是非常錯誤的。所謂「16 字方針」全文是：

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整個方針根本就不提「團結」二字。建國之初，百廢待舉。急需團結全國各方面人士共同建設新中國，因而首先應該強調的就是「團結」。黨內更應如此。對於黨內、自己的同志，竟然絕口不提「團結」，反而強調什麼『控制』、『淘汰』，敵對心態歷歷呈現，真是荒謬至極。

首先，「降級安排」顯然是偏見與歧視的產物。

當革命鬥爭火熱進行時，大敵當前，生死存亡系於一綫，必須萬眾一心，同仇敵愾，不分彼此、不計利害；方能够眾志成

城，方能堅無不摧、攻無不克。可是，當大功告成，坐穩天下、論功行賞時，問題就來了：如何分配勝利果實？誰的功勞更大？誰應該坐第幾把交椅？換而言之就是：整塊勝利的蛋糕該如何切割、分配？

這取決於誰來切蛋糕？即刀把子掌握在誰手中。

歷史安排了毛澤東來切這塊勝利的蛋糕。因此，他掌控的黨中央才搞了這個內部文件。文件規定：不管原先有什麼功勞，現在都要降級安排。為什麼不能「一視同仁」呢？1949年9月17日鄧小平在南京市幹部大會上有個內部講話。他說：革命勝利一是靠黨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瞧！在功勞簿上排座次，地下黨被排在最末位——老三。

在革命隊伍中，有各個戰綫、各個部門，都是有機體的組成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無法互相攀比的。一定要在武裝鬥爭和地下鬥爭之間，分個高低，排個前後，就好像要區分女人和男人誰更重要一樣，是荒謬絕倫的。又好比要區分人的各個器官哪個更重要一樣，同樣是違背常識、無知的表現。前些年有個相聲叫『五官爭功』（好像是姜昆和他的徒弟們合說的吧？）最後也難以分辨出哪個更重要？這個相聲無疑就是諷刺這種既無知又無聊的人。

但既然有人提出了按功勞排序的問題，我們也不妨研究研究。世界上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因此不能籠統地排序，而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看在什麼事情上。例如：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蔣介石圍剿蘇區時，曾經制定過一個『鐵桶計劃』。如果這個『鐵桶計劃』實現，必將把蘇區和紅軍全部消滅乾淨。那麼此後的一切都不存在，更不可能有毛澤東登上「寶

座」。歷史偏偏出現怪異，就在這個時候，有個叫莫雄的人，他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因而有資格參加那個在廬山召開的極其機密的高級軍事會議，才獲悉『鐵桶計劃』的全部機密。可他又是中共的密探。在得知這個機密之後，馬不停蹄地立刻轉告了中共中央，並且派出叫「項與年」的人，歷盡千辛萬苦把情報送到蘇區，從而挽救了紅軍，保存了這顆革命的火種。才有此後的「星火燎原」，才有此後的一切。在這件事情上，誰的功勞是第一位的？不言而喻。沒有莫雄和項與年，就沒有此後的一切，哪里還會有什麼黨中央、毛主席？什麼解放軍？

其次，即使是在軍事鬥爭中，如果沒有地下黨的配合（提供情報、實行策反等等）哪里能夠如此順利地、勢如破竹地奪取全國勝利？

因此，那個排序的功勞簿既違反邏輯和常識，更不符合事實，完全是從實力出發，誰的拳頭硬，誰就是老大。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地下黨成員的情況復雜云云。任何人都生活在社會環境中，每時每刻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各種人發生來往，產生關係。地下黨的成員如此，根據地的幹部也不是從外星空降到地球上來的，同樣會有各種社會關係。未必就那麼單純、清白。毛澤東本人就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而且高喊過『蔣委員長萬歲』。如此說來，是不是也應該算個『反動黨團的骨幹』？毛澤東的老婆江青，曾經被捕過，經過自首才出獄。那麼是不是也應該算個『叛徒』？為什麼這些人不復雜，而唯獨地下黨人的情況就「復雜」呢？

第二句話是『控制使用』四個字，沒有主語。誰來控制？當然是延安派來的和南下的幹部了。這『控制使用』四個字就埋下了各地區、各部門中南下幹部與地下黨幹部之間矛盾和糾紛乃

至內鬥的定時炸彈。有了『控制使用』這把「尚方寶劍」那些南下幹部就可以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地對待地下黨人。矛盾的解決一定是南下幹部克服地下黨員幹部，糾紛和內鬥的結果當然是地下黨人被批評、處分、最後被淘汰。

最後一句是「逐步淘汰」。所謂「淘汰」者，實際就是消滅也。難道說地下黨人都是階級敵人？應該淘汰和消滅？是的，歷史事實正是把這些人當成階級敵人，一個個地消滅。前面所提到的那個莫雄先生的遭遇就雄辯地說明了一切。

解放後，在葉劍英親自寫信盛情邀請下，莫雄從香港回到大陸。可是兩年之後便被家鄉地方政府當作『反動官僚地主惡霸』逮捕，並被陶鑄批准『槍決』。幸虧有位中共要員古大存仗義執言。他說：『過去莫雄是用腦袋來保革命同志的，共產黨人怎能過河拆橋？今天他所需要的只不過是幾句公道話，竟然無人做聲！』這才得以保命。但後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坐監、勞改、批鬥、游街，一次一次審查交待，沒有一次幸免。文革時更升級為『江南第一大特務』。直到 1980 年去世時，頭上仍然戴着「反動官僚」的大帽子。可以說：死不瞑目。而那位曾經為莫雄慷慨陳詞、仗義執言的古大存後來也被打成『嚴重右傾』和『地方主義』分子；在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時，『古大存保莫雄』竟然成了一條重罪。以至於在文革開始，即遭受迫害，1966 年 11 月 4 日含冤逝世。

其餘的地下黨員，也大部分在 1957 年那場政治風暴中，身陷「陽謀」。即使逃過了 1957 年，也逃不過 1966 年，最後都沒有好下場。更令人詛咒的是：有位周居正的命運更為悲慘。他經歷了九死一生，才有幸逃出渣滓洞，因而被稱為『脫險革命志士』。在國民黨的監獄中，當他們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的消息時，立即撕下被面歡欣鼓舞地同羅廣斌等人一起，在獄中

綉制五星紅旗（此事迹後來却被張冠李戴、移植到電影《烈火中永生》的『江姐』的身上）。但後來竟然被打成右派，發配勞改。1964年春，竟被冠以『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罪』，殺害於四川永川縣新勝勞改茶場。這位革命者不是死在國民黨的槍口下，而是死在共產黨的槍口下。這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中國共產黨自己製造出來的荒唐劇。還有許多人也是在勞改、勞教等等艱苦的環境下，累死、餓死、打死，一個個地含冤而亡。

對地下黨人的歧視、排擠、打擊以至消滅的方針，和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一貫態度是密切相聯系的。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自己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把知識分子列入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勢力。只是後來形勢發展、出於功利主義的考慮，在收入《毛選》時已作過大量刪改，以至於面目全非了。雖然在文字上可以改動，但牢牢扎根在毛澤東思想深處、烙印在他腦海中、融化在他血液里、對知識分子敵對情結却没有、也不可能刪去，始終伴隨着毛的一生，支配他的所作所為和全部施政方針。

我還記得當時還有個專門針對國民黨留用人員的16字方針，全部文字我實在回憶不起來，但只記得最後一句也是「逐步淘汰」四個字。看來，這個文件是把地下黨和留用人員同等看待，列入要消滅的對象了。這個文件的精神總起來看就是排除異己、唯我獨革。20多年的歷史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經過了反右、反右傾，直至「文革」無一不是為了消滅異己。到了最後，毛澤東的身邊只剩下那個「妾身未分明」的小女人了。不亦悲乎？

【發表於2012年10月《觀察》網刊】

歧視與偏見的又一鐵證

——再評毛澤東處理地下黨的 16 字方針

爲了證明毛澤東那個『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英明論斷』，因而不惜歪曲歷史，隱蔽真相，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歧視與偏見的又一鐵證！

2012 年我發表了『16 字方針是歧視與偏見的產物』，好幾家網站相繼轉載，說明此文受到廣泛的關注和贊同。(1)

最近收到《五七精神 薪盡火傳——反右運動 55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其中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實例，更能證實：歧視與偏見是如何扭曲歷史、屏蔽真相，誤導讀者、欺騙人民的。

南京，曾經是國民黨政權統治的中心。1949 年南京易幟標誌着蔣氏王朝的最終覆滅。但是南京到底是怎樣『回到人民手中』的呢？真相只能有一個。

幾億中國人民都看過中共的宣傳影片，都看過那激動人心的場面：在激越的衝鋒號聲鼓舞下，英勇的解放軍戰士們奮勇前進，衝進蔣介石的『總統府』，拔掉那面标志着國民黨政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插上鮮艷的紅旗。於是全場爆發熱烈的掌聲、歡呼聲。人們很自然地聯想起毛澤東那氣勢豪邁的詩句：『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另外，在中國軍事博物館裏也

一直展出一幅畫作《蔣家王朝的覆滅》（或曰：佔領總統府）大體也是表現同一個主題。

但，歷史真相如何？真的是這樣嗎？

否！

《文集》介紹：旅美青年畫家李斌在《創作手記》里記述：根據南京解放的歷史資料和當事人及其親友的回憶，南京城的易幟根本未發一槍一彈，兵不血刃。真相是這樣的：由中共中央上海局南京地下市委書記陳修良和劉峰等人領導兩千多地下黨員策反國軍的高層人物，同時說服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釋放近千名在押政治犯，南京警備師長陳宴清『起義』並獻出詳細的軍防圖。也就是說，在中共軍隊進城之前，南京城已經被控制在中共地下黨員和『起義』人員手中。

由此觸發了畫家的靈感：出於對歷史真相的敬畏心理和正義感、使命感，他決定另行創作一幅符合歷史真相的作品。作品中保留了前述畫作的原有構架，但畫的中心部位改為中共地下黨員與解放軍會師——陳修良和中共軍隊 8 兵團司令陳士渠握手。畫中出現 19 位人物，分別是：8 位地下黨員，6 位『起義』人員，5 位 8 兵團主要將領。這些人物都有名有姓，形象逼真。各方人員的安排同樣尊重歷史，人數比例更是符合『和平解放』中各方所起的作用。畫面的背景是晴空萬里，總統府完好無損，毫無戰鬥迹象。此畫名為《4·24 晴空萬里》，又名《南京 1949》。

這才是歷史的真相。（參見該書第 381~382 頁）

明明是『和平解放』，為什麼要表現為戰鬥奪取？明明是雲淡風輕、晴空萬里却要表現為槍林彈雨、硝烟瀰漫？是何居心？

首先是為了符合鄧小平那個功勞簿所排的座次：解放戰爭的勝利，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是第一位的功勞，其次，解放軍英勇

戰鬥是第二位的，地下黨當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第三位的。請注意：鄧小平公開宣佈這個功勞簿排座次，不是在別的地方、別的場合，恰恰就是在南京『解放』幾個月後的 1949 年 9 月 17 日在南京市幹部大會上。臺下就坐着當年臨危受命、冒死策反敵軍的中共地下黨員。這些人的心情如何？不言而喻。

其次，也是爲了證明毛澤東那個『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英明論斷』，因而不惜歪曲歷史，隱蔽真相，移花接木、張冠李戴。

再次，和當年事件主角之一陳修良本人悲壯的人生道路有關。這位從上個世紀 20 年代末期就投身中共奪權事業的『老革命』，時任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是南京城和平易幟的總策劃人。但就在那次『會師』之後，她的職務馬上被降爲中共南京市委組織部長兼婦委主任。如此安排顯然是體現那個 16 字方針中『降級安排』原則。16 字方針中還有一條『控制使用』，她本人却渾然不覺。這位老革命即使在職務被貶時，仍然忠心耿耿地爲新政權的長治久安而殫精竭慮，大膽建言獻策。比如：剛剛打下了南京城，有些幹部公然搶官邸裏面的沙發、給首長搶房子。陳修良看不慣，就組織幹部看《甲申三百年祭》，本意是爲了告誡所有黨員幹部，不要重蹈「闖王進京」的覆轍。但顯然觸犯了某些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懷恨在心，伺機報復。在這些『控制者』的共同排擠下，她只好黯然離開這個爲之奮鬥、爲之貢獻了青春和熱血的南京城。

1954 年，陳修良的丈夫沙文漢出任浙江省省長。陳修良隨之調往杭州，擔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1956 年，她根據中共八大所提出的、正確的政治方針和路線，要求各級領導尊重知識分子，理由是：『士可殺而不可辱』；另外她還要求對民主黨派一定要尊重。這兩條就被某些人抓住把柄，上綱

上綫，說什麼『要搞聯合政府了，要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了』真是駭人聽聞！

根據陳修良和沙文漢夫婦之女沙尚之的文章（見該書第35~45頁）可知性格豪爽的陳修良，向來敢於直言。即使到了1957年，反右的鑼鼓早已敲響了，她仍然放言無忌。例如她說：無產階級不應實行一黨專政，應該允許群眾和多黨監督。這顯然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了；再如她說：斯大林在肅反時錯殺無辜，還有，蘇聯不應該出兵匈牙利等等。這些話顯然就是『反蘇』了。

於是，這位1927年就入黨的革命老戰士，竟然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黨籍，發配到嘉善農村勞動改造。

按照中共黨內宣傳的老規矩：即使地位再高，資格再老，只要政治上被打倒了，過去的一切（包括功勞、業績、名譽等等）都要統統抹掉。君不見那幅《開國大典》的油畫就修改過多次嗎？一會把高崗的頭去掉，一會兒把劉少奇的頭去掉，再過了一會兒又把林彪的頭去掉等等。同樣道理，南京的「解放」當然就不能再提這位老革命的名字了。至於其他地下黨員們的功勞，也都隨之而一筆抹殺了。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成為真理』，其人早已化作烟塵，但其徒子徒孫却延綿不絕。在我們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度里，更是子孫繁衍、人丁興旺。這些人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真相，更不懂得敬畏歷史。在他們看來：所謂歷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乖女孩。毛澤東不是說過嗎：『歷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因而就可以任意揮毫，無所顧忌；更可以顛倒黑白、美醜、善惡等等。

豈不知：謊言即使重複一千次、一萬次也不可能成為真理。

謊言就是謊言，其壽命只能是隨權勢之勃興而旺，也隨權勢之消而滅，曇花一現、徒留笑柄。

只有真相才是長壽的，永恒的，無敵的。

請記住偉大的民主革命家、黑奴解放運動著名領袖、美國第 16 任總統林肯的名言：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

(1)在拙文發表半年多以後，時間大約在 2012 年春節後吧，忽然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一個蒼老還有些沙啞的聲音發問：『請問你是符先生嗎？』『你打錯了！』當我剛剛回到書桌前，電話又響起來。我有些不耐煩了：『你找誰？』『你是古月符的符先生嗎？』這時我才猛然意識到：對方是南方口音，南方方言習慣的發音就是把「胡」讀為「符」。我立刻轉變語氣：『我姓胡，不錯，是古月胡。』『請問你是符顯中先生嗎？』我肯定答復後，對方又進一步追問：『你就是批評地下黨 16 字方針的那個人？』『是啊，你有什麼見教？』這時我自覺心情也有點激動。『哎呀，老弟呀！』然後就是嚎啕大哭，同時夾雜着斷斷續續的訴說。當時我的聽力已逐漸下降，還未來得及購買助聽器，對方發音又是含混不清的方言。但我還是能夠聽清幾個關鍵性的單詞：地下黨、打游擊、1957 年，死去活來……等等。良久，我終於插空建議：『老先生，您別激動，請放下電話，再由我給你打過去，怎麼樣？』這才讓他稍微安靜些，然後就聽到另外一個聲音，是女性的口音：『符伯伯，我爸爸年紀大了，說話吐字也不清了，請你原諒。事

情是這樣：很早以前，他的老戰友李（也許是黎？）伯伯，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搞到了你那篇文章，給他看了，邊看邊抽泣，非常激動。經常口中念念有詞地反復絮叨：終於有人替我們說話了，終於有人……他一定要找到你，但又不會電腦，寫信也不知道地址。再後來那個李伯伯打聽到你的電話，也不敢肯定對不對，他就冒昧打給你。就是爲了向你表示一下嘛。

後來我終於弄清楚：這位老革命曾經領導 Y 省（按：即雲南省）東南一帶百餘人的游擊隊，能同時使用雙槍的神槍手。1947 年司令員犧牲後，他就接替這個位置。但解放後，安排在縣糧食局當一名副科級幹部，心中悶悶不樂、鬱鬱寡歡。到了反右，當然地成爲極右分子，送去勞改。「文革」期間更被打斷兩根肋骨。後來雖然平反了，但沒補錢，身體多病，無錢求醫，只好硬拖了。2012 年已是風燭殘年（87 歲），自感來日無多，但恨沒人伸張正義，還他一個公道，因此「死不瞑目」啊。

【發表於香港出版的《揭露》雜誌第 2 期】

憑我幾十年的政治閱歷，我敢說，表達民意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基礎設施』，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標準。

第七屆全國人大委員長 萬里

對精英人才大量流失的沉思

百分之七十留學生不回國

官媒《瞭望》新聞周刊第 29 期報道，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對記者坦承：目前中國流失的頂尖人才數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學和工程領域滯留國外的平均達到 87%。讀罷這條信息不禁思緒萬千。

1978 年 6 月 23 日，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做了一個「擴大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重要講話。在講話中，他說：「不要怕出一點問題，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好的，個別人出一點問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個，也只佔十分之一，還剩 900 個，甚至跑了 20%，還剩 80%。」

這個預測太過於自信了。事實表明，中國絕大多數留學生並沒有歸來。

據 2008 年 12 月 15 日《學習時報》刊載的文章統計：截至 2007 年，出國留學人數已經達到 121.17 萬人，但回國人數僅為 31.97 萬，大約有 90 萬人滯留海外。1996 — 2007 年間，中國留學人員回歸率僅為 29.5%，70% 的留學生仍滯留海外。另據一些抽樣調查，回流的人員中，已經或快要退休的約佔 15%；各層次訪問學者（即未獲得國外學位者）約佔 50%；在回歸的人員

中，多數更願意供職於跨國公司或外資企業，這實際上是另一種形式的人才流失，因為這些人仍然是在為他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貢獻力量。又根據《美國科學與工程指針 2008》的數據，2002 — 2005 年，在美國獲得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的中國人中有 90% 以上的人計劃留在美國，並有 10% 的人最終獲得了美國公司的雇用職位或博士後研究職位。而獲得博士學位後留在美國者大多數迄今沒有回國。大批畢業於中國一流大學、又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一流學府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人才的滯留不歸，意味着中國一大批潜在的高層次人才的流失。

鄧小平的如意算盤落空

今天看來，鄧小平當年的預測或指望顯然落空了。按照他原先的思路是這樣：派遣出國的學習目的主要是自然科學方面，即使文科也應該局限於某些管理科學，而「階級性特別強」的科目，例如政法方面的學科則應該排除在外。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但拒絕西方的政治、法律、人文科學。

既要通過大量派遣留學生，把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引進來，又必需抵制其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精神污染」和所謂「西化陰謀」，以保持「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文化制度。這是「總設計師」當年的如意算盤。

豈不知，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方方面面，都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各方面、各系統有機結合。英美等國，其科技之所以發達，恰恰是因為早已實現了把權力「關進籠子里」的政治理念，兼容並包、多元共存的文化環境等等多種因素作為「土壤」所培育出來的豐碩果實。拒絕那優質的「土壤」單單摘取其科技成果，

這樣的如意算盤看似聰明，實際却是捨本逐末之舉，更是無法實現的一廂情願。

事實也確實如此。當國門初開之際，改革開放這個「潘多拉魔盒」一打開，西方的科技當然被我們迅速「拿來」了。與此同時，你不想要的東西，西方的政治理念、文化氛圍、社會良俗等等，也以其頑强的生命力，潛移默化，一再衝破當局的嚴密封鎖，不斷地、悄悄地浸染着這個古老國度里的億萬人民。國人有機會「睜開眼睛看世界」之後，突然發現：世界並不像中共所宣稱的那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恰恰相反，而是比我們發展快得多、而且好得多。

「沒有對比就無從鑒別優劣」。看慣了官員們胡吃海喝、任意糟蹋民脂民膏的中國老百姓，如果可以自由選擇的話，難道不是明若觀火嗎？

留學人員選擇西方生活方式

那些出國學習的青年人，除了學習科技專業以外，耳濡目染，切身感受到的東西，更是出乎當局的意料之外。他們通過中外對比，自然而然地得出自己的結論：哪種制度更文明、更合理、更符合人性、更能代表時代前進的方向？哪個社會最適合他們生存和發展、最能夠讓他們施展才華？因此他們絕大多數「用腳投票」選擇了在國外定居和工作。

「用腳投票」一詞原來出自中共黨內最具務實精神的領導人習仲勛先生之口。1978年，習仲勛主持粵政期間，發現外逃現象嚴重，其中不僅是普通老百姓，甚至還有共產黨員、軍人、幹部。他得出的結論是：只靠嚴防死守是解決不了外逃現象的，

必須「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辦法。否則，人民只會用腳投票。」多麼睿智的眼光，多麼務實的措施！

和當年廣東省外逃現象比較起來，大量的留學生滯留國外不歸，對於國家的損失顯然要大得多、嚴重得多。首先是因為這些人都是國家花費了大量教育經費培養出來的民族精英，是國家的棟梁之才。對於急需各種人才的中國大陸來說，是最稀有、最珍貴的人力資源。這些人選擇不歸，僅就經濟損失來說已是無可估量的。相反，對於他國來說，近百萬的留學生，也就是未來的科技大軍；如此龐大的科技隊伍落在哪個國家，那個國家的發展就平添了一支雄厚的發動引擎。其深遠影響十分了得！

其次，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現象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制度大有改進和完善的必要。大量留學人才不歸的嚴峻事實，使得中共的報紙、電臺等傳媒關於社會主義優越性、中國特色等等宣傳顯得多麼蒼白無力，多麼虛偽和空洞。如果一再拒絕進行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造，仍然宣稱和堅持「這個不搞」、「那個不準說」，即使花費再多的人力、物力、財力，甚至不惜巨資在美國的時代廣場搞浩大的形象宣傳牌，甚至請出孔聖人的亡靈駕臨各國，廣設「孔子學院」，肯定都是枉費徒勞。

劉亞洲上將道破「天機」

最近在網上廣泛傳播中國軍隊高級幹部劉亞洲的文章：《美國真正的可怕之處在哪兒？》作者認為：美國是由千千萬萬不愛自己祖國的人組成的國家，但他們都很愛美國。有很多領導人，一邊罵美國，一邊却把子女往美國送。反差巨大！那麼美國可怕之處何在呢？文章歸納為三點：第一，美國的精英體制不可小覷。

他的幹部制度，他的競選機制，能够確保決策者是一批精英。而在中國恰恰相反：有思想的人無權決策，有權決策的人却没有思想。有腦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却没腦子。第二，美國的大氣與寬容。美國人可以把國旗當褲衩穿在身上，美國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燒自己的國旗。這樣自由的國度，你還有什麼理由去反對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偉大力量。文章借用「九·一一」事件中發生的幾件事例來證明美國人民的精神和道德力量。

當年習仲勛有勇氣和魄力大膽改革，留下了千古美名。但不知道他的勇氣和睿智能否遺傳給下一代？作為兒子的習近平又能否繼承這些優秀的精神遺產，勇敢地把中國的改革事業向前推進？億萬中國人民拭目以待。

【發表於《爭鳴》月刊 2013 年 9 月號】

何謂軟實力？「懷柔招安、近悅遠服的能力。區別於強制力、金錢的收買力。內容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價值觀、外交政策等。」

——弗·肯尼迪學院院長約瑟夫·奈伊

爲何否認《鄧穎超日記》？

不合適的人說不合適的話

前些日子網上盛傳「鄧穎超日記」啓封，內容涉及周恩來晚年和毛澤東之間關係惡化的傳聞。最近，鄧穎超生前的秘書趙煒女士公開發表談話，斷然否認這種日記的存在；並且認爲這種傳聞的內容非常「惡毒」云云（參見《北京晚報》1月20日報道）。

趙女士的談話涉及兩個問題。其一是「鄧穎超日記」是否存在？其二是對日記內容的批判與評價。

對於第一個問題，即日記的真實性。趙女士否定的理由有二：

一、「我跟鄧穎超這麼多年就沒有看見她寫日記」。

二、「在總理辦公室工作的人都不能寫日記」。

對此，值得懷疑的是：第一個理由太武斷。按照邏輯學原理分析，其大前提是：我没看見的東西就不存在。但常識告訴我們：人們看不見的東西不一定就不存在。例如：人們用肉眼可以看見水波、光波，但看不見電波、聲波，難道電波和聲波就不存在了嗎？何況寫日記屬於私密性的行爲，一般人都不會大事張揚，而是關起門來一個人私下里寫，盡量保密，不讓任何人知道。趙女

士雖是她的秘書，秘書的任務是為領導人服務，却没有權利事事與聞；領導人更没有必要事事都讓你知道，讓你看見。

其二，在總理辦公室工作就不允許寫日記？是不是有這個規定，我不敢斷言。但大家都知道的事實是：曾經擔任總理的李鵬就寫過日記，寫得很詳細，而且在香港公開出版了。對其內容，內地的讀者也都略知一二。看起來，即使有這樣的規定，那也是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未必人人都照辦。中共歷年來所下發的文件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但有幾個人認真執行的？最後還不是成為廢紙一張？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從以上兩點來看，否認日記的存在是不可信的。即使這位趙女士的身份是鄧穎超生前的秘書，也無法令人信服。相反，這難免使人們懷疑其出面否認的真實動機：莫非這份機密材料觸動了誰的利益？於是我們不能不研究第二個問題：日記內容是否存在「惡毒攻擊」？

為此我特地仔細閱讀了網上盛傳的「日記」內容。

盡管中共當局一貫宣傳高層內部如何團結一致、如何親密無間，但常識却告訴人們：即使是一個人，左手與右手也往往不能得心應手、協調配合；吃飯時，牙齒咬了舌頭的情況也不是沒有。再者古今中外的歷史無不表明：任何兩個人之間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始終如一。經過「文革」的大揭發、大暴露，毛和劉、周、朱、鄧、陳等等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曝光得還少嗎？最令人記憶深刻的是，早在 50 年代末期，毛澤東手持柯慶施所寫的文章，像訓誡孫子那樣訓斥周恩來說：「這樣的好文章，你寫得出來嗎？」

周則服服帖帖地承認：「我寫不出來」；事後還不斷地檢討。「鄧穎超日記」中所記錄的，無非是周不滿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的獨斷專行、倒行逆施。毛澤東在位 27 年間，特別是「文革」期間許許多多嚴重罪行，簡直是罄竹難書，也是婦孺皆知，世人盡曉，而且寫入了中共自己的文件，公之於世。還用得着別人來「造謠」、「攻擊」嗎？

此外，「日記」中還有一段十分尖銳的話，時間是 1975 年 12 月 28 日：「國家很不幸，建國 26 年，還有六億人口飯也吃不飽，只會高歌共產黨、頌揚領袖，這是共產黨的敗筆。」此時離周恩來辭世只有 10 餘天的時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看來周恩來臨終總算敢於說幾句真話了。令人遺憾的是：將近四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有將近一億人口未能脫貧，生活困難。也許正是周的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當局那根非常脆弱的神經吧？

最後，像鄧穎超這樣重量級的人物，其日記的重要性、機密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按理應該由最高權威機構保存或啓封。那麼，日記是否存在，是否解密、啓封等等都屬於黨和國家的重大機密，應該由最高權威機構正式認可或公開否認，而不應該由一個普通工作人員隨隨便便說三道四、混淆視聽。是不是日記某些內容恰巧撓到了當局的歷史舊創，使得這個歷史傷疤再一次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

趙女士忽然站出來否認「鄧穎超日記」的存在，不能不讓人聯想起中國人熟知的成語：欲蓋彌彰！

【發表於《爭鳴》雜誌 2014 年 4 月號】

駁斥李慎明為專制暴君 毛澤東招魂的謬論

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明發表了一篇長文《澄清對毛澤東幾個誤解》，一時間輿論沸騰，毛左們如獲至寶，興奮異常；同時，國內外許多有識之士則紛紛予以反擊。

應該承認：李文的确是『好』文章，好就好在是一份難得的反面教材，讓一切善良的人們看清了：時至今日，毛澤東的陰魂不散，仍然在影響着許多人的頭腦，禁錮着人們的思想。這是當前實現中國社會轉型最嚴重的障礙，不能不予以批駁。

李文在為毛澤東評功擺好時，首先列出毛在位 27 年的六大政績。居首位的竟然是『打贏了抗美援朝和越南戰爭』。且放下『越南戰爭』，先讓我們討論抗美援朝戰爭吧。

衡量戰爭輸贏有兩個標準。其一是所得是否大於對方，或是否實現了預期目標；其二是所失（代價）是否小於對方。

1、金日成的戰略目標是把李承晚集團趕下海去，『解放』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南朝鮮同胞，使整個朝鮮統一於金日成的統治下。結果如何？却未能如願，雙方仍然對峙在『三八綫』兩側。也就是說：毫無所獲。用東北地方人們的俗話，這叫『瞎子點燈白費蠟』。

普通老百姓「瞎子點燈」只浪費一點點「蠟」而已，微不足道。

可是斯大林和金日成裹脅毛澤東玩的那場『瞎子點燈』遊戲，却耗費了上百萬人的鮮血和生命，還有大量金錢和物資。

2、雙方的代價即死、傷人數對比，就更慘了：何方先生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衛生部編印的《抗美援朝戰爭衛生工作經驗總結》里的數字：先後出動志願軍總計 135 萬，戰後回國 37.2 萬。包括凍傷致死、致殘在內共計減員 97.8 萬。另據丹東市抗美援朝紀念館統計數字，志願軍戰鬥犧牲 183,108，負傷者 38 萬多。而美國的死亡人數為 54,246 人（所有死難者的名字均被鐫刻在「紀念牆」上）。（注 1）

虛耗了近百萬人生命為代價，却一無所得。這個戰爭不是贏了，而是輸了，輸得很慘！有位元老級的老幹部一語中的：『抗美援朝是建國以來最大的錯誤。』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別人，恰恰就是毛澤東本人，在這場戰爭結束三年後的 1956 年，在接見外賓時曾多次公開承認：『錯了、絕對錯了』、『百分之百地錯了』。（注 2）也就是說，沒有一丁點兒積極意義，更談不到什麼『偉大成就』。那麼，為什麼當局長期以來鋪天蓋地宣傳說是取得了『偉大勝利』？

如此宣傳有兩個目的。其一是自欺，其二是欺人。自欺就是所謂『精神勝利法』。這個『精神勝利法』的發明人是誰？魯迅筆下的阿 Q！魯迅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筆下創造的人物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經久不衰，代不乏人，其徒子徒孫延綿不絕。『欺人』即欺騙老百姓。如果向老百姓公開承認打輸了，豈不會動搖那個一貫『偉、光、正』的形象嗎？

近年來，當局也感到十分尷尬，盡量回避，不再提起。早已破了產的貨色，竟然被李慎明視若珍寶，挂上頭牌。可見這位『理論家』的武庫里已是黔驢技窮、山窮水盡矣。拍馬屁竟然拍

到主子的『痔瘡』上，真是笨蛋！

《炎黃春秋》今年第2期發表的張澤石的文章《我對朝鮮戰爭的回顧與思考》中指出：『我們根本不知道美國並不打算侵略中國；也不知道我們實際上是在幫助吞並韓國、幫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鮮那個橋頭堡而流血犧牲。』中國有個成語，為他人『火中取栗』，此之謂也。

以上兩篇文章的作者也不妨介紹一下：何方先生長期在外交部門工作，參與機密，知曉許多內幕。張澤石先生則曾經親赴戰場，親自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九死一生。請問：你李慎明當年在哪裏？上網一查，還沒有上小學呢！（注3）那麼，他關於朝鮮戰爭的知識又從何而來呢？完全是來自中共自撰的書本，而且是來自於『毛記』印刷廠出品的書籍。以上兩位文章的可信度都遠比李慎明高得多。兩者相較，讀者應該相信誰？不言而喻。

* * * * *

李文所要澄清的問題之一是：反右運動中沒有殺過一個人。林某是在1968年被殺的，不在1957年（所以不能算反右的過錯）云云。為了批駁李慎明，最有說服力的辦法就是借用李所崇拜的毛澤東本人的話。毛澤東早在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期間，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羞辱曾經是自己長輩的梁漱溟先生時是這樣說的：（注4）『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杆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注5）李文中所言的『林某』無疑就是林昭吧。林昭是1958年補劃為右派，從此成為專政對象，幾經折磨，受盡凌辱，最後被槍殺。一個優秀大學生之慘死，竟然不是反右運動的惡果！如此高論，今天還是頭一遭聽到。真令人大開眼界！

請問：林昭被劃為右派的源頭何在？想當年（李慎明僅僅 8 歲）從 1957 年 5 月 15 日到 6 月 8 日，一個多月時間里，毛澤東用『筆杆子』先後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等一系列文章。從此掀起一股反右狂瀾：全國上下一片肅殺氣氛下，多少優秀的中華兒女紛紛倒下；多少才氣橫溢的青年才俊一個個被劃為右派，從此打入另冊，被視為不共戴天的敵人，被專政機關的鐵拳打得頭破血流。與林昭命運相似者，僅以北大為例，死難的右派師生就有 26 位之多。被處死者：包括被譽為北大才子的沈元、數學力學系教師任大熊（和張志新一樣，臨刑前也被割斷喉管）和胡稼貽教授（死時不足 70 歲）（注 6）至於文藝界、文化界、學術界，各行各業先後被劃為右派者多為各界精英分子，如名噪一時的儲安平、王造時、羅隆基、彭文應、浦熙修、黃萬里、向達、丁則良……這份名單太長，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舉。這些精英的遇難難道不是反右運動的惡果嗎？難道不是毛澤東筆杆子下的冤魂嗎？

按照殺人工具來劃分，有槍杆子和筆杆子兩種。與此相對應，殺人的過程也可以分為兩種：立即執行與緩期執行。所謂緩期執行，即慢慢地、用鈍刀子割肉，一刀一刀地割。兩者相較，這種殺人方式的痛苦指數遠遠高於痛痛快快一刀斃命。但毛澤東却擅長於此，特別喜愛這一手。他喜歡欣賞昔日的對手們，今日是如何在自己的策劃下痛苦地呻吟、輾轉求饒、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從而在心靈深處獲得極大的滿足，視為最高的享受。

專制統治者得勝以後的虐殺心理其來有自：最早的典型應該就是漢高祖劉邦的老婆呂雉，她為了報復昔日奪愛之仇，硬是把戚夫人斷其手足，叫做『人彘』。其後有宋太祖滅南唐，把南唐後主李煜封為『違命侯』。即是一例。後來太宗即位，不僅戲

弄李煜本人，更進一步命令李煜的愛妾小周后定期前往宮中接受宋太宗的『寵幸』。元人馮海粟題詩云：『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李煜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受盡屈辱最終仍然難逃一死。

在毛澤東的筆杆子下，還有一個典型案例：甘肅省的夾邊溝，當年收容了 3,136 人（大部分是右派，也有少量所謂「壞分子」）最後生還者不足 600 人。（注 7）這兩千多人的生命，就是經歷了漫長的、痛苦掙扎、輾轉呻吟之後而死亡。這種被慢慢虐殺的過程難道和毛澤東沒有關係嗎？

* * * * *

李慎明的文章最後寫道：『筆者也曾為當年吃過草籽和榆樹皮而感到自豪和驕傲。』60 年代正是李慎明長身體、因而最需要營養的少年時代，竟然也挨餓，值得同情。但他不去尋找制造苦難的罪魁禍首，竟然還引以『自豪』，却令人懷疑：是不是腦袋出問題了？有毛病吧。請問你知不知道：就在你和全國人民一起挨餓、吃草根、樹皮的時候，毛澤東吃什麼嗎？有的電影中曾經表現：毛主席也和全國人民一道，幾個月都不吃肉。但據何方先生在《黨史筆記》里的可靠記載：那是因為醫生建議：豬肉的膽固醇太高，不利於健康。

那麼，毛澤東在大災禍時期吃什麼呢？請看：三年大饑荒時期的『1961 年 4 月制定的西餐菜譜就有魚蝦 17 樣之多。由汪東興擔任顧問的《毛澤東遺物事典》裏載有 1961 年 4 月 26 日工作人員和廚師為毛所定的菜譜，內有鐵扒桂魚、莫斯科紅烤魚、烤蝦主……共計 17 種。（注 8）即使像李慎明這樣的高級幹部也未必能夠享受如此豪奢的飲食吧？至於普通老百姓更不敢問津了。有的電影里表現毛澤東看見群眾生活困難時感動得流淚。

那只不過是馬屁文人的向壁虛構、閉門造車而已；或者也只是『鰥魚的眼泪』罷了。如果真的同情中國人民的貧苦生活，或者有一點點自責和愧疚之心，何不稍微削減一點那個過分奢侈的菜譜呢？

《黨史筆記》還透露：就在這『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的三年大饑荒時期，各地為領袖大修豪華別墅之多，規模之宏大、設備之豪華，古今中外實為罕見。其中有的是地方領導人主動討好而為，毛自然也就默許；更有的是毛自己提出來要建的，例如1959年6月回韶山時，毛親自向省委書記提出在滴水洞造點房子，理由是為了以後可以來這裡辦公、休息。就是這座「行宮」連修公路、美化環境等配套工程，一直到1962年才竣工。請不要忘記，這正是三年大饑荒時期！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建好的「行宮」毛澤東只是在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什麼叫窮奢極欲、揮霍民脂民膏？這就是典型！（注9）最近網上廣為流傳的毛澤東62處別墅的照片及文字說明無不證實：三年大饑荒時期，恰恰是毛澤東大量揮霍民脂民膏供自己享受的高峰期。

當李慎明了解這一切以後，還會為當年挨餓和吃草籽而感到『自豪』嗎？一個不學無術的人硬要冒充理論家為專制暴君毛澤東招魂，真不知世間還有『無耻』二字。

（注1）《炎黃春秋》2013年第12期第13頁及17頁

（注2）同上，第12－13頁

（注3）李慎明出生於1949年。

（注4）梁漱溟先生與毛澤東同年，但梁是毛澤東岳父楊繼昌的密友，論輩分應該是毛澤東的長輩。想當年梁氏走訪楊宅時，毛澤東經常擔任應門小童的角色。而梁先生對這個小童也不屑一

顧，徑自升堂入室，泰然就坐。這當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為日後的報復埋下伏筆。

（注5）《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07頁

（注6）《北大精神 五七綻放》第205~207頁

（注7）《夾邊溝慘案訪談錄》（黑色文庫23集）第14~18頁

（注8）《黨史筆記》第593~594頁，並見第101頁

（注9）同上書第100、294頁

【發表於《民主中國》2014年3月18日】

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總書記 陳獨秀

爲歷史化妝、整容 莫如與過去切割

古人云：『以史爲鑒，可知興替』。中共歷屆領導人都有過這方面的言論，但實際所做的却是專門宣傳那些杜撰出來『偉、光、正』事迹，大張旗鼓、連篇累牘。相反，對於那些很不『偉、光、正』的事情却諱莫如深。嚴嚴實實地遮蔽起來，不許人們過問，更不許談論、研究。所有出版物更視爲禁區、不能碰、不敢碰的高壓綫。試問：不許研究，如何吸取教訓？更談何防范未來？

轉眼又快到所謂『建國』65周年了。按照慣例：逢五、逢十，都要大規模地熱鬧一番。其重頭節目無疑就是大規模地宣傳那些中國人民耳朵都聽出繭子的陳年往事、『偉大成就』等等。至於吸取歷史教訓麼？只有留給後人了。

前國家主席、中共的副主席劉少奇曾經說過：『成績不說跑不了，缺點、錯誤不說却不得了』（大意如此）。爲了真正『以史爲鑒』，不僅要宣傳那些所謂『偉、光、正』的東西，更應該着重研究歷史上那些失敗、錯誤，甚至是可耻的事情。有位哲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每一個拿破侖，都會有他的滑鐵盧。』那麼，中共執政65年中，有哪些『滑鐵盧』呢？筆者特地查閱了最近幾年來官方所出版的歷史書籍，從中看看這些煌煌巨著是如何粉飾歷史、爲歷史整容的。

一、關於朝鮮戰爭

『正當中國人民從各方面為落實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朝鮮內戰爆發。美國隨即派兵進行武裝干涉，發動對我國的全面戰爭。同時派遣第7艦隊入侵臺灣海峽。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嚴重的外來威脅。』（《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 2011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 第65頁）。首先是籠統地以『朝鮮內戰爆發』六個字來敷衍、搪塞，隨後即諉過於美國派兵干涉云云。根本不說或不敢說清楚：到底是誰先動手，誰打第一槍？因而誰應負挑起內戰的責任？在這裡，不妨介紹一下這本先後修改了16年，幾易其稿的『黨史』權威著作的來歷。該書是1998年由最高史官、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審核定稿，準備在1999年為慶祝建國50周年出版的重頭戲之一。可是忽然被叫停。原因就在於『書稿寫錯誤缺點較多、較細，中央審查沒有通過』。此後由衆多筆杆子花費五年時間、嘔心瀝血編寫而成，又歷經10年漫長時間反復修改，終於在2011年改為慶祝建黨90周年之作。^①

這種籠統、含混的說法在另一著作中做了比較詳細的表述：『南北雙方圍繞着國家統一，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雙方都想借此統一國土，於是在「三八綫」上不斷發生武裝衝突。從50年代初起，磨擦不斷升級。局勢日趨緊張。1950年6月25日，韓國軍隊再次尋釁，已經充分準備的朝鮮人民軍隨即轉入反攻。朝鮮內戰終於爆發。（《新中國成立以來重大歷史事件回顧與思考》2012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章猷才主編，第30頁）該書錯誤地把責任推到韓國一方：是韓國先動手，發動戰爭。

歷史真相到底如何？近年來解密的資料表明：原來是野心勃勃的金日成爲了實現統一朝鮮，做朝鮮半島的國王，在斯大林的慫恿和默許下，在毛澤東的積極參與、配合下，悍然發動進攻。這種行動公然挑戰聯合國權威，突破國際社會共同確定的『三八綫』。因此，以美國爲首的國際社會才不得不進行干涉。而中國之所以參戰，據說是爲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其實只是『援金』，援助那個獨裁的金氏王朝而已。既非保家，更非衛國。毛澤東早就很坦率地承認：打出『保家衛國』的旗號就是爲了動員（應理解爲『欺騙』）全國人民大力支援。②

今天，真相大白於天下。而這兩本著作仍然沿襲陳舊的謊言，顛倒黑白，嫁禍於人，莫此爲甚！

二、關於反右運動

最爲奇特的是《中國現代史論》一書。據作者在『前言』里自詡是『按照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對待重大歷史事件』云云，但對於 1957 年那場『重大事件』却不著一字！（該書第四卷 2010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薛慶超著）難道在這位作者的心目中，反右派運動根本就不算重大事件？因而不值得一提？真是匪夷所思！

其次，是關於被劃爲右派的人數。幾乎所有的歷史著作都是按照官方 1978~1980 年復查時所改正的數字：55 萬多人，或 55.28 萬、552,877 等等。可是按照 2009 年解密後的中央檔案，全國劃右派總共是 3,178,470 人，另有 1,437,562 人被劃爲「中右」（中右分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實際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 55 萬，而是 55 萬的 5.6 倍！③

再者，幾乎所有著作基本上仍然沿襲鄧小平的舊說：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云云。其實，鄧小平談話中還有幾句非常重要的話，被人們故意忽略了。他說：『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

鄧小平斷言：反右派運動的理由在於有人『殺氣騰騰』，所以才要反擊。那麼，幾十年後再復查一下，到底是誰『殺氣騰騰』呢？竟然沒有查出一個人！即使是被『保留』不予改正的那幾位朋友，也不得不承認：（他們）曾經為人民（其實就是為共產黨奪取政權）做過許多好事云云。到底是誰『殺氣騰騰』？查無此人！那麼，所謂『必要性』又何在呢？

其次，鄧小平所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恰恰成了絕大的諷刺：反擊右派以後，『前進』的結果是什麼？大躍進導致大饑荒，餓殍遍野；餓死幾千萬無辜的老百姓，開創了和平時期死亡人數的歷史新紀錄。再前進就是「文革」全國大亂；國民經濟「前進」到了崩潰的臨界點。鄧本人也成了『還在走的走資派』！這難道不是對所謂『必要性』莫大的諷刺嗎？

正因為心中有愧，鄧小平本人在審查、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一卷時，才悄悄地抽掉自己在領導反右鬥爭時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這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該書收錄了作者從1938年至1965年共計43篇著作，却唯獨沒有這一篇，似乎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如此偷偷摸摸銷毀舊作的行為，令人想起那句中國的成語：『掩耳盜鈴』。

三、關於大躍進導致的大饑餓、大災難

對於那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幾乎所有的著作大都采取『鴛鴦政策』視而不見，或故意回避。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鄭謙主編，羅平漢、何蓬著）倒是比較聰明地運用迂回戰術，留下了若干文字。請看：『1954~1957年四年間全國總人口增加了4,437萬，平均每年增加1,109.25萬。1958~1961年總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105萬。按正常年份，這四年增加人口應該大致4,000萬左右。而實際結果，總人口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105萬。』（該書第253頁）瞧！該書作者聰明的地方就在於，不敢公開說『餓死了幾千萬人』，而是大迂回，搞了一道小學生的算術題，讓讀者自己去算，算了後自己得出結論。小心翼翼、戰戰兢兢之態，躍然紙上。可見大陸那些史學家的日子也不好混啊。

對於這場由毛澤東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大災難，《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却為之辯解說：『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結果却出現這樣令人痛心的事情……其沉痛教訓應該認真總結和記取』。真是『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嗎？如何證明？在全國人民餓肚子的時候，仍然堅持糧食大量出口以換取國防尖端技術、建造原子彈，以及堅持大量援助外國（特別是阿爾巴尼亞、朝鮮）等等都是為了讓中國人民『早日過上好日子』嗎？如此不遺餘力地為錯誤辯解的史書，還談何『認真總結和記取教訓』？

這真是『化妝有術，整容技更高』！明明是滿臉皺紋、滿臉雀斑的半老徐娘，一經化妝馬上變成了美若西施、艷比貂蟬的絕代佳人，足以令滿世界的帥哥們為之朝思暮想，為之神魂顛倒，為之傾家蕩產！然而，謊言終難持久。當鉛華洗盡，露出真容，其劣行，其伎倆，不能不令人作嘔！

四、關於六四事件

令人稱奇的是那本出版於 2012 年的《新中國成立以來重大歷史事件回顧與思考》，全書 35 萬字中，竟然沒有關於 64 事件的任何文字記錄。難道 64 事件不算重大事件？莫非作者的日曆中沒有那一頁？真是不可思議！

比較起來倒是 2009 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60 年》（陳述著）多少留下一點記錄：『在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候，黨和政府被迫采取非常措施平息了這場政治風波』。什麼非常措施？則語焉不詳。世人看不明白。當然在槍杆子統治下，筆杆子也只能這樣寫了。難道還敢直截了當地記錄『血洗天安門的大屠殺』嗎？

以上僅僅是牽牽大端，僅舉此四例。可見大陸當局的『國史』完全够不上『信史』。恰恰相反，是違背中華民族優良史學傳統的『偽史』，是力圖掩蓋罪惡、掩蓋真相的遮羞布，是為歷史進行整容和塗脂抹粉的化妝師。

這樣的『國史』，不是教給人們聰明和智慧，而是導致人們愚昧和糊塗。因而經常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抵制，就不足為奇了。

最後，更令人深思的是：這些撰寫史書的秀才們如此這般、不遺餘力地粉飾歷史，有選擇地「遺忘」歷史中某些重要事件，究竟為什麼？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的教授們在討論中央文件時曾經信誓旦旦地表態說：『凡是有損我黨光輝形象的事堅決不想、堅決不說、堅決不寫……』可能這就是答案。啊，原來如此！他們害怕：有些事情寫出來有損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所以才這樣做的。這種心態恰恰說明：這些人陷入

某種認識誤區。

大史學家班固在評論司馬遷傳世之作《史記》時所言：『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歷代治史者無不以這種『實錄』精神為楷模、為榜樣。因而中華民族具有優良的治史傳統，代不乏人：『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即使面臨殺頭風險時，仍然不改初衷，不虛美，不隱惡，絕不賣論取官。在這些標準中最重要、也是最難做到的就是『不隱惡』。許多前輩做到了，而我們這些當代的秀才們却忘記了、背叛了！可悲、可嘆、可耻！

首先我們應該問一問：『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語出《詩經》。意思是：誰造成的災害？到今天仍然成為弊端。）其實，真正『有損我黨光輝形象的』恰恰就是這些事件本身及其責任人。我們今天如果仍然堅持隱瞞下去，就意味着把自己捆綁在應該對醜惡事件負責人的祭壇上，永遠無法脫身，永遠為這些責任人背黑鍋，永遠為這些責任人的罪行背負歷史的欠賬。這筆欠賬永遠也還不清、賴不掉、躲不了！

新一代領導人並不弱智呀，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就如此想不明白呢？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下決心與之切割，一刀兩斷，重建政權的合法性。『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這個「新」字很有意義。新，就是重打鼓、另開張。什麼叫『撥亂反正』？什麼叫『改弦易轍』？就是撥前人、前任倒行逆施所造成的『亂』，改前人、前任是非顛倒、人妖顛倒極端錯誤之『弦』。只有如此，才能給人民群眾以全新的面貌，才能重新喚起老百姓的新希望、新熱情，支持新一代領導人走出昔日錯誤所造成的困局，解開昔日錯誤所結下的『疙瘩』。因此，對於前人、前任一切錯誤、罪行不但不應該繼續為其隱瞞、美化，相反，應該理直氣壯地予以

揭露、批判、研究其根源，總結其教訓。只有這樣，才有利於新一代領導人開新局、走新路、寫新篇、建新功、立新業！

筆者年過耄耋，雖然來日無多。但希望能夠看到這一天。筆者更堅信：一定能夠看到這一天！

①《南方周末》2011年1月27日文章《30年黨史，修了16年》。

②參見《炎黃春秋》2013年第9期何方先生的文章：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和金日成談話時就說：『你如果不提「保家衛國」，他（指中國人民）也不贊成啊！他說，只爲了朝鮮人，不爲中國人，還行啊？所以我說，是爲了保家衛國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衛國，要到那個地方去保，那個地方去衛。你不支持朝鮮人民保衛朝鮮，還能保自己的家？衛自己的國？這樣，戰士就理解了。』所以，毛澤東是爲了推進世界革命，爲了解放全朝鮮，讓中國軍民做出重大的犧牲。

③參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郭道暉先生文章《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

【發表於《民主中國》2014年8月17日】

選擇題：在下列三句話中，哪一句是錯誤的？

- A、歷史，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毛澤東
- B、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劉少奇
- C、歷史，本身就是審判官。——馬克思

陶懋頌：一個中科院院士 爲其洗脚的右派

近年來，境外好幾本出版物都提到一個人——陶懋順。遺憾的是有許多不準確的地方，有的甚至錯得出奇，令人瞠目結舌、啼笑皆非。現舉幾例如下：

1、《北大精神 五七綻放》（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10年）第221頁『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名錄』中，是這樣寫的『陶懋順（女）』還注明：『資料來源：胡顯中提供』。

2、《燕園風雨鑄人生》
(黑色文庫) 2007 年出品 第
327 頁。

關於陶懋顒之死是這樣記載的：『不幸到了8月份他便因肝癌而與世長辭了』。該書作者與陶懋顒同是北大的右派，而且曾經受惠於陶懋顒，也沒有準確記錄其生命最後時光的具體情況。

人物傳奇

一個中科院院士為其洗腳的右派

胡顯中（研究員）

近年來，境外好幾本出版物都提到一個人——陶懋順。遺憾的是有許多不準確的地方，有的甚至錯得出奇，令人瞠目結舌、啼笑皆非。現舉幾例如下。

1、《北大精神五七綻
學社出版公司 2010 年出品
“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名單”
這樣寫的“陶懋頤(女)”
“資料來源：胡開中提供”

2、《燕園風雨鐫人生》
文庫 2007 年出品第 327 頁

關於陶懋順之死是這
“不幸到了8月份他便因
世長辭了”。該書作者更
是北大的右派，而且曾與
懋順，也沒有準確記錄其
時光的具體情況。

3.《揭露》2014年第一
在介紹王書瑤的文章中，
到陶應碩的名字。但又錯
三個字就錯了兩個。

有鑑於此，作為最關心的人，有責任出面澄清一視聽。

最大貢獻是參與翻譯
的“秘密報告”。

陶慧顏作為一位具有

的科學家、教授、博導，
做得非常出色，貢獻同
但作為一名具有正義感、
知識份子，其最主要的貢
翻譯赫魯曉夫那篇震驚世
密報告”。當其時也，由

胡顯中和陶懋頤兩位都是「內的人」。但是他們都被打倒。對於中共來說，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報局的及時披露，蘇共內部出現了一首、反對斯大林專制的勢力，並且揭發令人髮指的血腥屠戮。連葬蘇聯帝國國體了第一鐵土。全出們都歡呼喜躍。翻一的例外是六個中仍然被毛澤東毛澤幕後面，漸漸優越中國人的不幸，高呼共產黨萬歲。

詩云：
“秘密報告”豈
因何不許國人

助教。按照規定，陶曉夫講臺的。但由於陶曉夫

條件，校方破格錄取，且講得非常出色，一時傳為美談。

在中國除特別高級以上幹幹），平先知道這個“秘密”年學生，大學生。

地下黨員，按說都是“體面人”，胡顯中還被判處無期徒刑。只要看不入眼，

慈魯曉夫為
蘇聯暴虐治
新大林統治下
從而為最後
好頭，掘下
一切正義的人
惡頑從英
篇報告時，
決心翻譯
中國的青
先聯絡同
但文件太
請學生中

卻一無所知，
地封鎖在鐵
世隔絕。這
歷史對當年
國人一次狠狠

來她真的把這
我們將它
準備以《
右開始。
折了”。

在劫難逃。

雖然剛到
大學支援，
“順”也早
1958年“反
從此，災難
經被鐫刻

3、《揭露》2014 年第一期第 89 頁：在介紹王書瑤的文章中，不能不提到陶懋頤的名字。但又錯成：陶樊欣。三個字就錯了兩個。

有鑒於此，作為最了解陶懋頤的人，有責任出面澄清一下，以正視聽。

（一）最大的貢獻是：參與翻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陶懋頤作為一位具有突出成就的科學家、教授、博導，在學術上做得非常出色，貢獻同樣相當大。但作為一名具有正義感、時代感的知識分子，其最主要的貢獻應該是：翻譯赫魯曉夫那篇震驚世界的『秘密報告』。當其時也，由於美國情報局的及時披露，全世界都知道了：蘇共內部出現了一個以赫魯曉夫為首、反對斯大林專制獨裁暴虐統治的勢力，並且揭露了斯大林統治下令人髮指的血腥暴行。從而為最後埋葬蘇聯帝國開了一個好頭，掘下了第一鍬土。全世界一切正義的人們都歡呼雀躍，精神為之一振。唯一的例外是：六億中國人却一無所知，仍然被毛澤東集團嚴密地封鎖在鐵幕後面，懵懵懂懂，與世隔絕。這是中國人的不幸，更是歷史對當年高呼『共產黨萬歲』的中國人一次狠狠的嘲弄。

詩云：「秘密報告」世界傳，因何不許國人看？

狐死免悲毛帝懼，群起效尤必翻船。

當時陶懋頤正在北大數學系當助教。按照規定：助教是沒有資格上講臺的。但由於陶懋頤的知識淵博、專業精通，善於表達等等各方面的條件，校方破格讓他上臺講課；而且講的非常出

色，頗受學生歡迎，一時傳為美談。

在中國，誰能最先知道這個「秘密報告」？只有青年學生，大學生。特別是具有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優秀傳統的北大學生。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被輾轉流傳到中國，正是通過北大幾位青年師生的大膽介紹。當陶懋愼從英國《工人日報》上讀到這篇報告時，怒不可遏、怕案而起。決心翻譯出來，讓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青年學生們知道真相。他最先聯絡同在數學系的助教任大熊。但文件太長，為了爭取時間，又邀請學生中的活躍分子、具有「北大才子」之譽的陳奉孝加入。

據陳奉孝在《夢斷未名湖》裏記載：『整風運動開始後，認識了林希翎。她說她能搞到這份報告。中央委員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機要秘書。可以弄出來看看。後來她真的把這份報告拿給我們看了。我們將它與我們翻譯的核對一下，準備以《廣場》特刊發表。後來反右開始，《廣場》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該書第345頁）

雖然如此，他們三人勞動的偉大意義却早已載入史冊、彪炳千秋。當然，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嚴重罪行』也已經記錄在案，在劫難逃。

雖然陶懋愼隨後被調往內蒙古大學支援那里的教育事業。但這筆「賬」也牢牢地糾纏着他。終於在1958年「反右補課」中，補劃為右派。從此，災難開始了，但他的名字也已經被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永遠被後人紀念，永遠被世人緬懷。

順便說一句：中國人民是什麼時候才能一睹那個『秘密報告』的芳容呢？對不起，要等到30年後的80年代，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旗下的《書林》雜誌全文發表。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據說：中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主人就這個待遇？這樣的主

人當得也太慘了、太窩囊了吧？

（二）從教多年，桃李滿天下

東風吹綠了大地，也融化了冰雪。全國右派分子迎來了1978年的『改正』。從此，陶懋頌先後執教於中國科技大學（合肥）、北京計算機學院。此外還擔任北京市海淀區第九屆人民代表，兼任海淀區監察委員，長達6年時間。在他的建議和堅持下，修築了通往京工附中的道路。因此，師生們可以方便通行，即使在下雨天也免於趟污泥水之苦了。

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社會職務是連續擔任第三、四、五、六屆華羅庚少年數學金杯賽的主試委員。承擔出題、審校、批改考卷等等繁重任務。還有：利用自己所長，致力於『分形集合』領域的研究，著有《數學分析講義》、《圖論簡明教程》等學術專著。利用所長，和公安部共同開發『指紋破案』軟件系統。該項工程實用性很強，極為暢銷。

1995年2月辦理了離休手續。但仍然離而不休，堅持在教學和科研戰綫奮力拼搏。由於長時間、超負荷的腦力勞動，極大地損害了健康。以至於忘記了自己的身體保健。當癌癥悄悄地襲來時，他開始感到腹脹、全身無力、食欲下降、消化不良等等癥狀不斷地提醒他，他却没有在意，只是簡單地要一點藥敷衍了事。導致病情惡化，直到1997年6月27日，在妻子的強烈要求下赴醫院檢查。結果令人大吃一驚：『肝胰佔位性病變』，即胰腺癌。此後，每況愈下，9月3日，陪伴他度過63個春秋的心臟終於停止了跳動。一代名師，終於謝幕！

陶懋頌的過早謝世，完全是累死的。主要責任當然在他本

人——太敬業、太執着了。有病不去看醫生，隨便吃點無關痛癢的藥應付。據專業人士告誡：癌癥早發現、早治療的話，治愈率相當高，存活期也相當長。但一拖再拖，到了晚期。即使華佗再世、扁鵲重生，也束手無策、無可奈何了。殊不知：這個世界，離了誰，地球照樣轉動。而你的家庭、太太、子女，一旦沒有了你，就會下場很慘，生活拮据，精神巨創。

其次，他的太太也缺乏應有的關心和愛護。

再者當局也有不容推卸的責任。早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當科技界兩位中年專家蔣築英、羅健夫因積勞成疾而溘然長逝時，在知識界以至全國人民心中曾引起強烈的震撼。官方人士胡喬木曾撰寫『痛惜之餘的願望』，提出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我們為什麼不能更早地注意到他們的病情，在來得及的時候挽救他們的生命呢？我們為什麼不能更多地采取一些嚴格的強制措施，讓他們得到稍為好一些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得到比較接近於必要的休息呢？』在全國人民平均壽命已達到 74 歲的今天，像陶懋頑這樣的優秀人才在 63 歲便匆匆忙忙地為自己的生命劃上了句號。除了他們自己的原因以外，當局在醫療保健等方面缺乏必要的照顧和強制措施也難辭其咎。優秀人才一個接一個地英年早逝，賁志而歿，無疑是我們國家人才寶庫中的惡性損耗，同時更不斷向當局敲響了人才危機的警鐘。

（三）精彩的一幕：他的學生、中科院院士為其洗腳

在陶懋頑病重期間，原北大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陶的良師益友丁石孫先生專程前來看望。陶的學生、學部委員張景中全家特意乘飛機來看望，並為其洗腳。陶懋頑很不好意思地

說：不行不行，學部委員那能給我洗腳呢？張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師生之情溢於言表。

中華民族歷來就有尊師重教的優秀傳統，對老師的敬畏和景仰是每個炎黃子孫共同具有的優良品格。但是，在毛澤東統治下，這種優良傳統不見了，代之以『造反有理』、『知識越多越反動』。學生譏諷老師、毆打老師之風長盛不衰。文革期間，多少校長、教師被打死、打殘，無法統計。師道尊嚴掃地以盡。優秀傳統蕩然無存。道德淪喪無以復加。導致中華民族文明進程的大倒退、中華文化積累的大殞滅、中國文化人的大災難。這是中華民族最大、最慘、最嚴重的損失！是需要幾十年、幾代人堅持撥亂反正才能扭轉和彌補的。

物以稀為貴，在 20 世紀末，竟然出現如此動人的一幕，實在是奇蹟，是張景中先生人格之亮色，也是陶懋順人生中最令人感動、令人稱羨的一幕。（按：過去的學部委員，1993 年改稱院士。）

（四）學友、戰友、難友、諍友

我和陶懋順是 1948 年在江西省南昌市私立心遠中學的同班同學。由於多種原因，我和他性格相投、比較接近。我敬重他具有正義感、學習勤奮、待人誠懇。對於時局也有相近的看法，思想非常投緣。

這個時候，我已經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年末，奉命發展黨員時，于公于私，都應該把他吸收到黨組織里。在和另一位黨員鍾純民（按：劃右派後，被迫害死於夾邊溝）商量後，決定介紹陶懋順和另外三人加入中共。從此，我們就是並肩戰鬥的戰友了。

江西一別，20 多年生死兩茫茫。誰也未曾料到：1957 年那場「陽謀」下，我所在的地下黨小組幾乎全軍覆沒，大都被打成右派。我則以『反革命叛國罪』判處無期徒刑。肉體上承受着苦役的摧殘，精神上更是無日無夜、不斷的折磨。

古人云：『士可殺而不可辱』。錯了，不僅可殺，也可辱。或者先辱後殺之，還可以先殺後辱之。總之，我為魚肉，人為刀俎，千般侮辱，萬般虐殺，都只能逆來順受、忍氣吞聲。一個人到了這般地步，真是生不如死。經過了 20 多年磨難，終於盼到了毛皇帝『駕崩』，喜從天降，大難不死。

1979 年，陶懋頑早已平反，正在辦理恢復黨籍的手續。為了證明這一點，當局輾轉調查到我的存在。雖然那個時候我的身份仍然是『就業分子』（俗稱『二勞改』，也有稱為『就業犯』的），仍然在公安部門的管制下，從事艱苦的煤礦生產。當管理幹部在詢問我的過程中，得知我竟然是中共黨員，甚至還曾經發展過若干名黨員時，頓時目瞪口呆，感到不可思議。他們睜大眼睛凝視良久，似乎他面對的不是地球人，而是一個天外來客，神秘莫測！不過從此以後，他們對我的態度明顯好轉，客氣多了，見面總是一副笑臉。每逢艱苦勞動時，還故意把我支走。這着實讓我『逍遙』了一段時間，直到「改正」後辦理離場手續。

1980 年我正在上訪中。在等待期間，回到黑龍江最北的龍鎮姐姐家中過春節。突然接到陶懋頑寄來的一本雜誌《北京之春》。好啊！這是來自北京的春天信息！我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這本雜誌，深深感到：中國的政治氣候就要發生大變化，中國的前途仍然是大有希望，至於我個人當然平反在望、指日可待。

但好事多磨。直到夏天，我的問題仍然沒有進展。不得不再度進京上訪。恰好陶懋頑也在北京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我們相

約在北大的未名湖畔見面，暢談了一個下午。最後他建議我：寫一份材料給他，他有機會見到胡啓立（時任團中央書記），可以請胡啓立轉交最高決策人。我當然照辦。後來我的問題得到解決，由於我采取多管齊下的辦法，究竟是那一條渠道起了作用？已無從查考了。

1986 年春天，我奉命赴京組稿，在另一位地下黨朋友熊大楞的家中餐叙，我們又見面了。

1991 年陶懋頤擔任第三屆華羅庚少年數學金杯賽的主試委員。順便來長春我家中叙談一個下午。此後我們之間的通信不斷。目前手頭保存的就有將近 20 封。通信的內容廣泛，既有切磋學問，更有臧否人物、研討時局、教育子女等等。我每有新作發表，一定寄給他復印件，請他指教。他也毫不客氣，既有批評、指正，也有鼓勵、贊賞。

我和陶懋頤之間的生死之交，長達半個世紀。當然，其間中斷了 20 多年。但最後階段却變得更加純真、更加醇厚。

【本文寫作過程中，參閱了陶懋頤夫人楊淑敏的文章《深深懷念親人陶懋頤》，該文刊載於《中共南昌城工部紀念文集》1999 年出版。特此致謝。】

【發表於香港《揭露》2014 年 2 月號】

海外緝貪固然好， 首選『衙內』必更佳

中共當局下大決心、出大手筆，實行海外追逃行動。目標對準逃亡海外的貪官及其他經濟犯罪分子，成果累累：一大批逃逸多年的貪官、經濟犯罪分子紛紛被緝拿歸案。等待他們的必將是正義的審判和法律的制裁。據說緝拿不法分子歸案的條件是需要和當地政府分享贓款、贓物。這是世界各國的慣例。雖然在經濟上不可能把贓款全部追回，但仍然具有無可估量的政治作用和積極意義。因此，國人大喜，紛紛表態，擁護政府這一正義舉措。

擁護之餘，又不免多慮。古代大政治家、歷史上第一個改革家商鞅在秦孝公時期強力推行改革，却遇到了攔路虎——太子犯法。商鞅悵然嘆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他仍然以大智大勇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採取果斷措施，終於為秦國的改革事業殺出一條血路。由此可見：任何改革舉措必須先從大人物開始，先拿這些大人物開刀、祭旗，才能起到『殺一儆百』的震懾作用，才能為改革事業開拓勝利的前景。

擒賊先擒王，先向大人物開刀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杜

甫：《前出塞組詩之六》）。無論是國內反貪也好，海外追逃也罷，都是值得借鑒的原則。凡是按照這個順序進行的事情無不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相反，如果顧慮重重，避開大人物，『柿子專挑軟的捏』，那必然導致踟躕不前或者功敗垂成。

例如當年蔣經國在大陸搞的『打虎風暴』，就是因為宋美齡的庇護，不許觸動那位表兄孔令侃，最後不得不虎頭蛇尾、有始無終、慘淡收場。蔣經國本人也不得不飲恨作罷、黯然退出政壇。因而導致國民黨在大陸的民心喪盡、最終慘敗。可以這樣說：蔣介石政權之敗，重要原因之一，就敗在以孔令侃為首的『太子犯法』、無人敢管而不能自拔。

歷史的教訓昭然可鑒，發人深省。如果海外追逃、緝貪先從大人物及其家人，首先是那些『衙內』開始，那麼，國內外的人氣必然迅速升騰，對不法分子的震懾效果必然大大強化。問題就看當局能不能以更大決心，拿出更大的勇氣和魄力來。

從『衙內』開始，當局應有清單

至於那些『衙內』是誰？大家心中都很清楚，網上流傳甚廣，當局肯定也有一份詳細的清單。例如那位在 2007 年就甩出 3240 萬澳幣（折合 2.5 億人民幣）購買位於澳洲的水岸豪宅，並且獲得澳洲永久居民身份者。其人其事，轟動整個澳洲，一時輿論鼎沸。另一位著名『衙內』其父乃是當今朝堂之上炙手可熱的特大人物。曾被揭發擁有百億王國，以『富可敵國』來形容毫不過分。還有就是那位前朝的太上皇之子孫因親沾雨露，頓時就成就了巨額財富。還有那位總設計師的二公子在海外糟蹋了多少國庫的銀子？這些黑幕應該首先曝光，然後認真查處。

以上四者，僅僅是犖犖大端，其餘無名鼠輩尚多。如果中共能够從這些『衙內』們頭上先開刀，拿他們祭旗，那麼可以斷言：今天的反貪大業和海外緝貪行動必將無往而不勝，而且必然發生深遠影響，勢必產生巨大的震懾作用：明明白白地告誡所有官員：『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仍然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挽回民心、黨心，重整形象，開拓前程，在此一舉！

【發表於《明報》『神州論壇』欄目，使用筆名：賈銘】

不用擔心中國學習美國的技術，因為美國可以更快地發明新的技術。最應該擔心的是：中國學習美國獨立宣言、憲法等代表美國價值的東西。當中國開始引進這些東西時，才是中國真正強大的開始。那才會對美國構成實質性的威脅。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弗里德曼

異化的輿論失去監督而成為導向

【內容提要】向最高統治者反映民間疾苦，就是輿論的最初功能，也應該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在後來發展中，進一步產生對統治者各級官員的監督功能。據媒體報道，《焦點訪談》1998年輿論監督的內容在全年節目中所佔比例是47%，而到了2002年則降為17%，究其原因就在於沒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輿論監督目前祇是停留在口頭上。為此，在2004年的人大會議上，長春醫學專修學院院長王維忠和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整形外科主任汪春蘭等代表分別領銜，共有13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呼吁盡快制定《新聞監督法》。令人遺憾的是，言者諄諄，聞者藐藐，來自底層和代表的呼聲雖然持久而熱烈，甚至可以說是『千呼萬喚』，却没有結果。

輿論就其實質來說，應該是人民群眾的內心願望、訴求及表達出來的呼聲。根據何在？從古籍中不難理解：輿字從臼，從車，原是指車廂，後來引申為轎（肩輿）；再引申為抬轎的人。古代又是奴隸的代稱（參見《左傳·召公七年》：皂臣輿，輿臣隸。都是下層勞動者）。這些下層勞動者的利益訴求和聲音的匯集就成為輿論。請看《辭海》的表述：『輿論就是眾人的議論』（第689頁）再看著名思想家梁啟超的定義：『輿論就是多數人意見公開表示於外者』。還有黑格爾的定義：『公眾輿論是人們表達

意志的無機方式』。

由於發自於基層人民群眾，所以其第一個特徵就是草根性、原始性、粗俗性，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更沒有華麗的辭藻。直截了當、開門見山、有一說一。這才是輿論的本來面目。其次是多元性。由於人民群眾包括各行各業，其訴求不可能一模一樣，而是見仁見智，各盡其意。最後是天然的合理性。古代勞動者大都純樸、厚道，心地善良，不可能搞陰謀詭計，更不會搞什麼煽風點火之類。其訴求大都是比較合乎理性。因此，古代的統治者需要經常了解下情，以便調整自己的施政方針、政策、措施等等。為此就不得不密切關注輿論，甚至安排官員專門負責收集輿論。『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向最高統治者反映民間疾苦，就是輿論的最初功能，也應該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在後來發展中，進一步產生對統治者各級官員的監督功能。隨着歷史脚步邁進，其功能也在不斷變化，甚至異化。於是產生了關於輿論功能的不同定位。

正是基於對輿論基本功能的認同，前總理朱鎔基在 1998 年 10 月 7 日專程視察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組時，即興揮毫題字：『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他把『監督』二字作為輿論的第一功能。並且在題詞現場還說了一句擲地千鈞的話：『我也是你們的監督對象。』短短 10 個字，引來滿座掌聲，電視直播次日人們奔走相告。這是自 1949 年以來，中國億萬民眾第一次聽到一位政府首腦公開說把自己置於新聞媒體的監督之下。對朱總理在位期間的是非、功過做全面評價，筆者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個能力。但可以斗膽預言：憑他這一句話，就足以彪炳史冊、名垂千秋。

令人非常遺憾的是，朱先生這句話和這句話所表達的民主

意識、公僕意識，在當時和此後的政治生態下，仍然只是他個人的『一家之言』，遠未形成廣泛的共識。最明顯的證明便是次日該消息見報時，這句最精彩、最震撼人心、因而最贏得人心的話却被媒體刪去了。這至少說明了有權刪掉這句話的官員並不贊同這句話。據說，在朱鎔基視察《焦點訪談》的時候，主管宣傳的某位大員緊隨左右。朱強調『輿論監督』，而這位官員則強調『輿論導向』；朱強調『群眾喉舌』，而他則強調『黨的喉舌』，兩個人有着明顯的原則性『認識分野』。

據悉，事後這位宣傳大員即指示中央電視臺：『這次視察不準記錄，不發文件』。

此後的現實與朱鎔基當年『輿論監督』題詞的精神更是漸行漸遠。據媒體報道，《焦點訪談》1998年輿論監督的內容在全年節目中所佔比例是47%，而到了2002年則降為17%，究其原因就在於在沒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輿論監督目前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媒體有哪些權利？對哪些內容可以進行監督，以及監督方式等都缺乏操作性的規範細則。一方面強調『加強輿論監督』；而另一方面，所有的決定權、解釋權仍掌握在主管大員們的手中，輿論監督便成了『軟監督』，也就是所謂的『用面包棒打人』。為此，在2004年的人大會議上，長春醫學專修學院院長王維忠和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整形外科主任汪春蘭等代表分別領銜，共有13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呼吁盡快制定《新聞監督法》。令人遺憾的是，言者諄諄，聞者藐藐，來自底層和代表的呼聲雖然持久而熱烈，甚至可以說是『千呼萬喚』，却没有結果。

究其原因何在？恐怕根源還在於某些官員特別鍾愛那個『輿論導向』，視為手中不可須臾離開的『通靈寶玉』。

首先，從理論層面來分析，『導向說』的實質是：我導你向，

官導民向。官員是主體，人民是客體。官員如何『導』，人民就如何『向』。在『導向說』理論家的視野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不見了，國家的根本性質即人民民主的共和國當然更無從體現，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中關於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人這一原理也被閹割掉了。人民的公僕一下子變成了高居人民之上，發號施令、任意擺佈人民的政治強人，而國家的主人反而變成了任憑公僕導向、指揮和安排的群氓，聽話的、馴服的工具，這難道不是主僕關係的大顛倒嗎？這難道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大背叛嗎？如果說，人民公僕變成了官老爺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現象，『導向說』就是這種異化現象的理論表達。

其次，如果追溯一下歷史的話，這『導向說』的發明專利權並非屬於當今宣傳主管大員們，而是屬於沉睡在地下兩千多年的李斯。他在上書秦始皇建議燒毀一切書籍的同時，為了解決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他提出：『以吏為師』。也就是一切向當朝的官員學習，以官員的是非為是非，隨官員的喜怒而喜怒，按官員的愛憎來愛憎。瞧！这不就是『導向說』的最原始版本嗎？可以這樣說：『導向說』是『以吏為師』的現代版，而『以吏為師』則是『導向說』的老祖宗。兩者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傳承關係。

再進一步來看，『吏』是為皇帝服務、一切行動聽從皇帝意志的奴才而已，『以吏為師』最終必然是以皇帝的意志為意志，『天子聖明，奴才該死』。於是我們從『導向說』的陰影里，看到的竟然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幽靈。

如果我們再用橫向視角觀察一下，也可以從世界範圍內找到『導向說』的同調。不過很難為情：那竟是希特勒手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戈培爾有句載入史冊、廣為傳頌的話：報紙的任務

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兩者是不是相似乃爾？當然我不希望，今天的中國領導人竟然會以此為榮吧？

最後，再從實踐層面來看，其錯誤和惡果就更加明顯了。幾十年來，許許多多錯誤，難道不都是高層輿論所『導』出來的嗎？例如：在反右派運動之前，在整風、鳴放的座談會上，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時任中國人民大學物理系教師的葛佩琦發表了毫無惡意的批評性意見，經過『導向們』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像變戲法似的，就成了『殺氣騰騰』公開揚言要殺共產黨的反革命宣言書。這幾句所謂『殺氣騰騰』的話竟成為鄧小平做出『反右派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的根據。真是以訛傳訛，謬種流傳，為害深遠。不僅葛佩琦本人葬送了大半生青春年華。牽連許多無辜者不得不為此『不予改正』，永無回歸人民隊伍的希望。再如：在大躍進狂熱中，連篇累牘地發表那些『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令人瘋狂的文字。至於『文革』期間那些鐵棍子、金棍子們筆下所出品、殺人不見血的文字更是不勝枚舉。還有：當年搖唇鼓舌大力鼓吹「烏托邦」的豪言壯語、對中國人民許諾『天堂勝景』的花言巧語等等『杰作』，今天已都已變成了絕妙的諷刺，令人笑不起來的笑料。當然這一切，負主要責任者另有其人，但當時的『導向們』聞風而動、積極響應、步步緊跟所做的一切，難道不是在推波助瀾，從而把災難放大千百陪嗎？回顧歷史，所謂『輿論導向』難辭其咎。

鑒於歷史的經驗，中國人民開始走出愚昧狀態，變得聰明起來。再者，30多年來對外開放，中外交流，人們從中外對比中，自然看得更真切，知所取捨。對於官方的『輿論導向』再也不會照單全收，更不可能照單全信。前幾年有位封疆大吏不

無感慨地說：『現在的老百姓都變成了老不信』。此語頗為幽默，兼具調侃；但反映其心理恐怕半是困惑，半是無奈。

借用當今非常流行的話語：不管什麼『導向』，讓老百姓相信才是『硬道理』！否則，如果老百姓『老不信』，那麼，任你妙筆生花，或者口若懸河，都是無效勞動，只能關起門來自娛自樂，自我欣賞而已。不可能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形象和公信力產生什麼『正能量』，甚至適得其反。近年來當局也多次、公開承認的『信任危機』，就是最雄辯的例證。老百姓『老不信』也無情地宣告：「輿論導向」的失靈；「導向說」的失敗和破產。

從另一方面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最早是安徽、四川等省，不聽『不許動搖集體經濟』的『導向』，明智地聽從了下層輿論的訴求：包產到戶，立竿見影，馬上就解決了幾億中國老百姓的吃飯問題。還有：為了解決千萬知識青年回城難題，不聽『公有制萬能』的『導向』，大膽允許部分青年人搞『個體戶』，於是催生了私有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有益的補充。不僅解決了許許多多下崗人員的生計，更滿足了人民群眾多樣化的需求。

（參見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80年代中國政改夭折內幕》第5~7頁）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千真萬確！通過正、反兩個方面的大量事實，雄辯地證明：只有對來自民間的輿論心存敬畏，擇善而從，不斷調整、完善各項方針、政策，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而不僅僅是口頭上的擁護和愛戴！相反，如果繼續堅持主觀的『輿論導向』，不管人民群眾信與不信，強行『灌輸』，其結果恐怕不僅徒勞無功，更進一步產生逆反心理。近年來執政黨的公信力每況愈下，難道不值得當局深刻反省嗎？

歷史教訓，昭昭可鑒！為了借鑒古人的執政智慧，特引述

著名思想家孟子的三段名言：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離婁上）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上）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下）。

孟子在最後這段話里，設計了君臣關係的三種模型，而主動權完全掌握在『君』的手中。君王想要那種模型，就看自己如何運作了。在今天，「君臣關係」，對於處理『官民關係』、領導與群眾關係似乎不無參考價值吧？

【發表於《民主中國》2016年1月12日】

憑我幾十年的政治閱歷，我敢說：表達民意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基礎設施』，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標準……

六十年了，我們是不是應該說，在民意處理上的失誤，是我們共產黨最大的失誤。這是要寫進史書的。

——萬里

文革：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怪胎

一、前言

北京大學季羨林老先生在《牛棚雜憶》一書中慨嘆：『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發生？茲事體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認為：有。可是他們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歡別人回答。』文學界的泰斗巴金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也未能實現。環顧神州大地，國家出資建立的各種歷史博物館多矣，竟然沒有一座官方設立的『文革』博物館。可見當局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國人徹底忘記那一段令國人憤怒、世人耻笑的歷史。歷時十年，禍及幾億中國人民的如此浩劫，竟然不許回憶、研究、探討。

我們在研究和宣傳中不應該抱着雙重標準：對敵人或假想敵人的錯誤抓住不放、上綱上綫、反反覆復、鋪天蓋地、大肆渲染；而對自己的錯誤却諱莫如深，極力遮遮掩掩，萬不得已時則輕描淡寫、避重就輕、一筆帶過。這種文過飾非的典型例子是，中國人民所熟知的『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其實是一個彌天大謊。謊言制造者的目的在於推卸罪責。事實真相是：毛澤東在極左錯誤思想支配下頭腦發熱，搞什麼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等荒唐決策，導致經濟大滑坡、糧食大減產、餓死幾千萬人的惡果。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人民要鬧事、議會要彈劾、責

任人必須下臺，甚至交付法庭審判。即使在歷史上漫長的專制社會里，皇帝也要被迫下『罪己詔』。可是毛澤東却發明了一個『三年自然災害』的遁詞，把責任推給了天老爺身上。直到上世紀末，才有氣象學家公開當年的氣象資料，原來那是風調雨順的三年。中國人民被欺騙了將近 40 年之後，才如夢初醒。至於當年餓死了多少人，當局一直含糊其詞、語焉不詳。但中國人口的統計數字無情地表明：1959、1960 兩年實際餓死的人數，至少在 3,500 萬以上，超過日本侵華 8 年所造成的死亡總數。楊繼繩先生的大著《墓碑》不得不在境外出版，才使真相大白於天下。

如果我們整個民族人人鉗口、個個沉默，如果 60~70 年代所發生的那場浩劫只能成爲一個未解的斯芬克斯之謎，留給未來的子孫後代，他們將會質問我們：『可敬的先輩們，你們的理性和良知哪里去了？』我們該如何回答？

報紙上經常宣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史爲鑒，可知得失』。難道那場發生時間離我們最近、損失最慘重、傷害人數最多、給國人烙印最深的文化大革命却可以例外嗎？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不應該、不需要研究、總結，並從中吸取教訓嗎？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無疑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文件。其中有專門一節對文革十年事件的性質、後果及原因做了初步分析和總結。

《決議》一開頭便明確指出：『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因此，研究其產生的根源，不可避免要涉及毛澤東晚年的思想。也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發展的必然產物。因此我們只能如實的剖析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才有可能對文化大革命的產生做出正確的、令人信服的解釋。在進行這種研究時，絕對不應該有『爲尊者諱』的感情因素，而

應該抱定對歷史負責、對後人負責的使命感、責任感，冷靜而理智地分析一切。老革命家李銳先生說得好：『《決議》不是對毛澤東研究的終結，而是研究的真正開始。』(1)既然《決議》開了頭，我們自然有責任和義務把這件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繼續下去。

二、極左路線發展的頂峰

《決議》在回顧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時，用極其簡略的文字指出：『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在「文革十年」一節里又說：『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這個結論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左傾錯誤路線並非始於新中國成立，可以上溯到建黨初期。從王明、李立三、根據地的肅清托派運動、審幹中的搶救運動——可以說，源遠流長。正如李銳先生在中共十五大召開前夕向黨中央上書中所言：『左傾是我黨 76 年歷史中的痼疾。』

極左路線在革命戰爭年代表現在軍事上急躁冒進（限於篇幅，不能展開分析）。在經濟建設時期則表現為急功近利，幻想在一個經濟、文化都非常落後的東方大國可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十五年趕美超英』等等。為此而搞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些被老革命家楊獻珍鄙夷地稱之為『叫花子共產主義』(2)。實行的結果只能在全世界範圍內敗壞科學社會主義的聲譽，玷污共產主義的形象。

極左路線在政治方面的表現為宗派主義、關門主義、唯我獨革、餘皆異類。特別是對待知識分子，認為絕大多數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陷入了對人與對己雙

重標準、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本人手不釋卷，終生以書為伴，以書為友。他尤其酷愛讀史，一部3,259卷、4,000多萬字的《二十四史》他不僅通讀過，而且對重點篇章閱讀了兩遍、三遍，甚至四遍。其用功之勤，令人嘆為觀止；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反對別人讀書。他甚至認為：『書讀得越多越蠢』。顯然，在他看來，讀書與思考只應該是極少數領袖人物的事情，其他的臣民不必學習，只要『事事緊跟、句句照辦』便行了。這難道不是典型的愚民政策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看來毛澤東深得其中的奧妙。直到去世的前幾年，毛澤東才開始反思。他承認文革有兩個錯誤：其一是『打倒一切』(3)。應該說：「打倒一切」既是他終身奉行的『與人鬥爭，其樂無窮』鬥爭哲學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使他陷入極左路線一個重要的思想根源。

極左路線在文化方面的表現是文化專制主義，要求『輿論一律』，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只能用一種方式思考，用一個聲音說話。在最具有個性特色的思想領域，偏偏要求消滅個性。

以上從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分別對極左路線做了極為概括的分析。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極左路線能在漫長的歲月裏延續並發展、達到頂峰呢？為什麼許多領導人對左的一套特別鍾情？我們還應該從毛澤東的言與行中去尋求答案。毛澤東說：『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大都忠心耿耿，為黨為國。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他們向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4)

在毛澤東看來，「左」是方式方法問題；右則是階級立場問題。「左」是人民內部是非之爭；右則是敵我之間生死存亡問題。因

此，即使在左毒明顯暴露、引起國人普遍不滿、毛被迫做出一點糾正姿態時，仍然時時不忘反右，或者尋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立即轉入反右（例如 1959 年廬山會議）；或者用「形左實右」的說法來扭轉批判的矛頭。後一種手法，據史料記載共有三次：1964 年針對農村「四清」運動中的偏差，劉少奇建議開會糾左，使運動健康發展。可是毛澤東却說：『不是左，是形左實右』（5）。1967 年批評斯大林的錯誤，他認為不是左了，而是右，即『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歷史時期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6）1972 年批判林彪時，批判什麼呢？如果批判他的極左思潮，勢必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於是毛澤東再一次用「形左實右」來概括林彪的錯誤（7）。從以上的歷史回顧可見：在毛澤東的思想深處，覺得左比右好。左雖然也是錯誤，但錯得可愛，可以原諒；右則不同。鄧小平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左帶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這就是左禍為害長達半個世紀、始終難以扭轉的根本原因。按照其自身發展的必然邏輯，終於發展到頂峰——走向文革。

三、中國歷史上長期實行專制制度傳統的巨大慣性

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中，鄧小平多次談到封建主義影響的嚴重性。在寫作關於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的過程中，他又指出：『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產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足夠的權威。』

《決議》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沒有指出究竟有哪些歷史

原因阻礙了我國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進程，現在可以自由地探討這一點了。其中最大、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別的，正是那位親手點燃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的毛澤東本人對民主的排拒態度。

早在『建國』之前，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關於如何防止歷代王朝興衰周期率的問題時，毛澤東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不無自得地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此話應該看成是他向全國人民所作的政治承諾。可惜的是，一朝權在手，馬上就變臉。曾經是毛澤東的長輩的梁漱溟在政治協商會議上說了幾句逆耳的忠言，毛澤東便勃然大怒，給人扣上反動的政治帽子，並毫不掩飾地明確宣告：我就是『拒諫』(8)。到了1957年，則公開否定民主的重要性。他說：『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什麼人身上，看幹什麼事情。』(9)以上都是公開發表的文字，更有一段對其侄子毛遠新的密語：『階級鬥爭從來就沒有什麼民主可言。』(10)這才是毛澤東的由衷之言！至於監督的問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是中共多次公開昭告天下的統一戰綫政策。但是，在私下里對其侄子毛遠新却是這樣說的：『我們共產黨也要學秦始皇，搞一黨治天下……』(11)這不是孤證，另據解密的資料表明，早在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就打算勝利後立即取消民主黨派。僅僅因為由於斯大林不同意，才暫時未能實施。(12)不過只是把時間推遲到十年以後，即反右派鬥爭之時。1957年8月13日毛澤東在濟南的黨員幹部會議上這樣說：『民主黨派有什麼資格監督共產黨？究竟天下是誰打下來的？』(13)按照他的邏輯：民主黨派沒有參與「打天下」（這個論斷顯然與中國民主革命史的實際不符合），所以沒有資格監督共產黨。那麼曾經

與毛澤東同甘共苦、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甚至是開國元勳、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可以不可以監督呢？毛澤東沒有公開明說。我們只能從他的實際行動中來求答案：

曾經有過救駕之功，因而被毛澤東用詩歌熱情贊頌過的「彭大將軍」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十分委婉地批評了一下，結果如何呢？被罷官、批鬥，最後慘死。又如曾經被毛一再譽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杰出代表』劉少奇在 1962 年 7,000 人大會上，不指名地批評了幾句，其結果和下場是全國人民有目共睹的。準確地說，彭德懷、劉少奇當時只是說了一點對形勢的看法或批評、建議，根本談不上「監督」二字，毛澤東都不能接受，並全力予以反擊。針對這一段歷史，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多次指出：從 50 年代以來，『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這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恐怕不是無的放矢吧。

鄧對毛的感情十分複雜。既不滿其左的一套和「一言堂」作風，又懷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對鄧的處理，總是手下留情（不同於對劉少奇）並多次強調「人才難得」，一再讓他復出，委以重任。因此，鄧小平在批評毛的錯誤時，難免留有餘地。其良苦用心，我們當然可以理解，但是他所說的『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不就是「專制獨裁」的同義語嗎？

專制制度與民主制度最本質的區別在於：權力來自何方？國家大事由誰做主？專制制度的權力來自於繼承，因而國家大事由君主一人獨斷，人民民主制度則來自於廣大人民的授權，因此，可以集中億萬人民的智慧與意志，集體決策。最高決策權力的獨享性、排他性是君主專制制度最本質的特徵。列寧在 1919 年《論國家》的講演裏指出：『君主制是一人獨裁的政權。』『國家實

行君主制時，政權歸一人掌握。』(14)毛澤東在位時不正是如此嗎？當然，毛澤東的最高統治權力也曾受到嚴重的挑戰：1957年有人提出「輪流坐庄」，就是其一；更嚴重的挑戰出現在60年代。當時出現「兩個主席」的提法（劉少奇是國家主席）。羅瑞卿在1960年元旦團拜會上公然喊「兩個萬歲」，他忘記了「天無二日，人無二主」的古訓；「兩個萬歲」的提法明顯違背了最高統治權力不可分享、不可分割、一人獨享的原則。更令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所提出的兩個『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和「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個提法無疑是對毛澤東「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三年自然災害」等遁詞的無情批駁。這一切，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殺機。目標既定，理由自然好找，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反修防修」、「防止資產階級復辟」、「清除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便被陸續發明出來。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即時機的選擇。

毛澤東公然對劉少奇叫板：『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只要動一個小手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聽了此話，任何人都會明白，劉少奇心里更清楚：毛對自己不滿意了，並打算取消他『繼承人』的資格。但劉怎麼想？可能是自以為威信高了，地位鞏固了，你能奈我何？的確，無論是開中央委員會、或者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常委會等等，毛澤東都不可能爭取到大多數來扳倒劉。『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劉只是從君子的角度來估計形勢，而沒有防備小人手段。毛澤東恰恰善於出奇招，善於耍手腕，善於、也慣於不按規則出牌，即使用所謂「群眾運動」，實為運動群眾、利用群眾，假群眾之手去消滅政敵。這種『奇招』果然令劉少奇猝不及防，中招倒下。這恐怕就是早年劉少奇所說的『黨內鬥爭的

黑幕』中最精彩、最驚心動魄的一幕吧？

專制制度第二個特徵就是終身制。終身制是從民主共和制通向君主專制制度階梯上的最後一級。從這一級再往上邁一步，就成為名副其實的君主制。上世紀初年，袁世凱便是從終身總統登上洪憲皇帝的寶座，結果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有此前車之鑒，後人再也不敢邁出最後一步，同時也沒有必要邁出最後一步。終身制不是挺好嗎？何必要那頂皇冠、那件龍袍？招來「復辟」的惡名，遺臭萬年。沒有邁出最後一步，這是毛澤東的聰明之處，更是其狡猾之所在。對此，曾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李銳先生看得十分真切。他寫道：『在毛澤東意識深處，他的歷史觀，皇帝、總統、主席，三者不過是形式不同而已。』(15)曾經在中國人民大學擔任領導職務的李新在其回憶文章中是這樣寫的：『哪裏有領導人實行終身制的民主國家呢？但在中國，2,000 多年專制制度的傳統，在各種條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國家領導人只能是終身制，也就只能出現事實上的皇帝，不管他叫什麼名稱：委員長、總統、主席，其實質都是一樣。』(16)可以說，毛澤東擁有封建皇帝所應該有的一切，僅僅缺少一頂皇冠、一件龍袍。從實質來講，文化大革命正是在反對虛幻的「資本主義復辟」口號下所進行的真正的專制制度復辟。這裡用「復辟」二字，也是從語義學的角度而言的。按照中國最具有權威的訓詁學著作《爾雅·釋詁》的解釋：「辟」者，君也。復辟的本來意義就是恢復君主制。

專制制度第三個特點是指定繼承人（或者叫接班人）。對此，鄧小平曾經指出：『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他一言九鼎、一錘定音，對其性質做了高度概括。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做的效果如何呢？歷史也作了最生動、最雄辯的回答：在中共黨內幾千萬黨員中，在全國幾千萬幹部中，

被毛澤東的慧眼相識、有幸入選者，只有兩個人：『最親密的戰友』林彪、『最忠實的學生』王洪文。前者明文寫入了黨章，後者也已內定。這兩個接班人的下場如何，事實不是已經做了最好的結論嗎？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毛澤東在「知人」方面的智慧如何？無須多說了。更重要的是，還令人想起了漢代劉向的《說苑·臣術》。作者在該書中對考察臣下的方法作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論述。其第一條便是『貴視其所舉』，意思是：評價一個有地位的人，可以從其所舉薦的人身上看出其本人的品格。按照這個原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從林彪、王洪文倆人身上看到毛澤東本人品格的投影呢？這正應了一句中國的古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近年來，許多探討文革社會經濟根源的文章經常用「封建殘餘影響」之類的解釋。不禁使我們想起了毛澤東在1957年批判《文匯報》那篇文章中的邏輯：『殘存的一點資產階級影響，够用嗎？』(17)我們也不妨借來分析文革的情況：「萬壽無疆」的喊聲直上雲霄，「最高指示」的威力無邊，「惡毒攻擊」的帽子滿天飛，致使監獄人滿為患，「早請示」、「晚會報」之類的宗教儀式風行神州大地，「忠字舞」的狂熱席卷全國……搞了這麼多封建時代的東西，一點點封建專制的「殘餘影響」够用嗎？由此可見，『封建殘餘影響』的說法實在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其實說穿了還是「為尊者諱」。這種心態顯然與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作風相違背，也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值得稱道的是，李銳先生的斷語：『民主其表，專制其實。』短短八個字，言簡意賅。李銳還認為『終於導致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無政府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泛濫。』對了，是泛濫，而不是一點點「殘餘」。泛濫必然成災，其為害之烈、為禍之慘，世所罕見。

四、結合——怪胎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以明白無誤的語言向全世界公開昭告：『指導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時間僅僅過去了9年，1958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有了新的提法：『要把馬克思和秦始皇結合起來。』⁽¹⁸⁾這句話值得注意，因為這句話反映了毛澤東治理國家指導思想即治國理念的重大轉變，因而應該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

第一、馬克思主義從唯一的指導地位下降到1/2的指導地位，貶值50%；另一方面，沉睡在地下兩千多年的政治僵尸，被歷史學家們公認為專制暴君的秦始皇，忽然間倍受青睞，上升為指導社會主義國家各項事業的崇高地位。這一變化表明：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馬克思主義不够用、也不管用了，需要其他的指導思想相配合；而秦始皇的專制、獨裁手段却顯得很可愛、很管用。可見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下降了、動搖了，而對秦始皇的感情却升溫了。到了此時，毛澤東還能稱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嗎？

第二、馬克思主義是19世紀發軔於歐洲，20世紀風行於世界最熱捧、最時髦的理論，而秦始皇所代表的則是中國歷史上最落後、最反動專制制度，也是一具早已過時的政治僵尸。把兩者相提並論、結合起來，其結果會是什麼呢？只能產生歷史的畸形兒——一個大怪胎。如果要問其姓名？按照中國父系宗嗣的傳統，只能是姓『秦』！

第三、毛澤東所用以指導實際工作的馬克思主義和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又存在着相當距離。舉例如下：

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是馬克思主義唯

物史觀兩對極其重要的範疇。兩者關係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最起碼的原理。對這兩對範疇中最基本、最起碼的原理，毛澤東恰恰陷入了嚴重的誤區。早在1937年所寫的〈矛盾論〉中，他是這樣說的：『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最近，大陸著名的理論家吳江在其新著〈重新研究馬克思〉裏批評道：『這是用「一定條件」實際上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作用置於同等地位，抹殺了生產力、經濟基礎的最終決定作用與反作用的區別。實踐證明，全部問題在於所謂「一定條件」是憑客觀歷史條件和經濟事實來確定，還是憑主觀意志來確定。一旦政治意志凌駕於客觀經濟規律之上，就為人為地不斷變更生產關係大開方便之門。』⁽¹⁹⁾鄧小平也批評說：『他有一個重大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踐表明：毛澤東特別熱衷於頻繁地改變生產關係，指望在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建立最先進的生產關係。他完全忘記了馬克思的如下教導：『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²⁰⁾硬要催生這種新的生產關係，其結果只能是烏托邦的共產主義，對生產力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

再者，如何劃分階級，馬克思和列寧都有經典的表述。但這些表述對毛澤東來說却是生疏的。他根據什麼劃分階級？不是根據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對生產資料的佔有狀況和對生產成果的分配狀況等經濟因素，而是根據一個人的政治思想傾向來劃分階級、區分敵我。而所謂政治思想傾向又僅僅根據人們的言論中有没有和他的意見不同、甚至相反的話來判斷。因此，如果有人提了一點並非尖銳的意見就變成反黨、反對黨的總路線的階級敵

人。因此，開創了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以言定罪、以言治罪。

再比如：關於『政治』的定義。列寧說：『政治是經濟最集中的表現』並且批評了把政治當成階級鬥爭的舊觀點。（21）可是在毛澤東的著作中却多次強調「政治就是階級鬥爭」，並且把這個觀點強加於列寧頭上。這是誤解，還是故意曲解？只有他自己知道。

最後，關於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馬克思說：『在學校里，教師對於學校的老板，就是純粹的雇用的勞動者。……對雇用他的老板來說，都是生產工人……演員對於觀眾來說是藝術家，但對自己企業主人來說也是生產工人。』（22）列寧也說：『對於專家，我們不應該採取吹毛求疵的政策，這些專家不是剝削者的奴僕，而是文化工作者。』（23）可是毛澤東却始終認為知識分子是依附在資產階級這張皮上的毛，是資產階級陣營里的人。他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敵對、仇視心理，除了政治運作方面的功利性考慮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變態的畸形心理。早年曾經受到過大知識分子（如傅斯年、羅家倫）的輕視，自尊心被傷害所造成的極端報復心理。關於這一點，朱正先生的新著《1957年的夏季》作了詳細的披露，請讀者參閱（24）。這使我們聯想到希特勒，據說希特勒的妻子曾被猶太人誘奸過，於是他對一切猶太人都恨之入骨；一旦大權在握時便推行大規模的排猶運動。在偏執和變態方面兩人如出一轍，何等相似！

通過以上幾個方面的分析，可見毛澤東所用以指導工作的馬克思主義和原版的、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嚴重的偏離，甚至是南轅北轍。正如李銳所斷言：『他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無非是極端僵化的斯大林教條……教條主義只有拼命左傾，口號便是反修、防修。』

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讀，必然導致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誤導。這是毛澤東晚年的一大悲劇。再從另一方面來看，他對秦始皇的熱情崇拜、認真學習的態度。他不無得意地宣稱：自己『超過秦始皇 100 倍。』他從秦始皇的身上學習到什麼呢？張聞天在 1959 年廬山會議期間有過幾句私房話：『他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他從中國歷史學了不少好東西，也學了不少統治階級的權術。』（25）古人說：『知君莫如臣』，還要加一句，知君莫如近臣。張聞天與毛澤東共事 30 多年，對其人、其品的評價大體上是符合實際的。只是此時距離文革發生尚有幾年時間，他的統治階級權術尚未完全、充分施展出來。更有意思的是，在毛澤東身邊最信得過的人不是黨國重臣，而是一個小女子——張玉鳳。張玉鳳曾問毛澤東：『為什麼不選總理為接班人？』他回答說：『總理雖好，缺少這個。』同時用手做一個砍殺的動作。（26）看來他非常看重的正是「這個」即秦始皇的鐵腕手段。

從以上分析可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錯誤思想發展的頂峰。具體說來就是（一）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誤讀，導致極左錯誤路線；；（二）對以秦始皇為代表的專制統治權術的迷戀與運用。兩者相結合才產生中國現代史上這個怪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遺傳基因借助以秦始皇這個政治僵尸為代表的專制傳統，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上演了一幕君主制度復辟的鬧劇。

五、幾點啓示

其一、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是一位最激進的反封建鬥士。他大半生時間都致力於推翻專制制度，從專制制度的壓迫下解放中

國人民並取得了成功。這樣一位成功地摧毀了專制制度的勇士最終却未能戰勝盤踞在中國大地上長達 2,000 多年專制傳統的慣性作用，未能超越他曾經深惡痛絕的專制遺風。相反，却成了專制制度傳統的俘虜，被這一傳統所戰勝、所改造。這是他本人的悲劇，也給中國人民帶來大災難。由此也證明專制制度的傳統力量是何等的強大、深厚，它毀掉了一個偉大人物的後半生，毀掉了他的一世英名，而且差點兒毀掉了一個好端端的『新中國』。看來，反對專制制度傳統的任務遠未完成，而且任重道遠。

其二、打敗『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使毛的威望盛極一時，如日中天。正如黨內『德高望重』的元老陳雲所說：『如果在 1956 年去世，他毫無疑問是中國人最偉大的領袖。』(27)遺憾的是，毛一直以爲這種威望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資源，因而無限度的支取、濫用。最後甚至不惜代價的「透支」，終於出現了嚴重的赤字——從威望的頂端跌落到谷底。跟隨毛澤東多年的田家英早在 50 年代末就曾經憂心忡忡地慨嘆：『獨斷專行，晚節不終』並留下了一副對聯『隱身免留千載笑，成書還待十年閑。』可惜的是，秀才的忠告根本不起作用，田家英的警示却不幸而言中。由此可見，任何偉大的人物，即使建立了蓋世功勛，也只有繼續爲人民作貢獻的義務，而沒有任何索取的權利，更沒有權利向人民「透支」信譽。

其三、針對斯大林晚年的錯誤，毛澤東曾經十分清醒地指出：『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28)但是幾年以後他却比斯大林走得更遠。由此我們不能不以五體投地的佩服重溫唐代詩人杜牧在其傳世名篇《阿房宮賦》所留下的千古名句：『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

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此外，通過毛澤東上面那段話也可以看出，他當時已經意識到西方發達國家有某些因素可以使我們避免斯大林式的災難，同樣也可以避免中國的「文革」，因而值得我們重視與學習。那麼，英、法、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究竟有什麼機制，能夠引起畢生與西方世界作長期鬥爭的毛澤東的如此重視，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並認真研究、吸取和借鑒嗎？

資料來源

(1)(6)(15)李銳着《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80頁、264頁、313頁

(2)《百年潮》1998年第6期第34頁

(3)(28)〈鄧小平文選〉（2）第305頁 第293頁

(4)(8)(9)(17)〈毛澤東選集〉（5）第423、115、368、323、437頁

(5)(7)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70年〉（中共黨史出版社）第546頁、第584~585頁

(10)(11)(26)青野、方雷着《鄧小平在1975年》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18、46、48頁

(12)(13)(24)朱正着〈1957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68頁、第87頁、第83~84頁

(16)蕭克等着〈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第18頁

(18)薄一波着〈若干重大決策及事件的回顧〉第706頁

(19)〈隨筆〉（廣州出版）2002年第4期第52頁並可參閱李

銳着《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 232~233 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第 83 頁

(14)(21)(23)〈列寧選集〉(4)第 49、51 頁第 370~371 頁、
(3)第 786 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 分冊第 443
頁

(25)李銳着〈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第 100、275 頁

(27)(美)莫里斯·邁斯納着〈毛澤東後的中國〉四川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第 573 頁

【發表於『共識網』2016 年 3 月 28 日】

企圖兼有智慧和權力，極少獲得成功；

即使成功，也不過是曇花一現。

——愛因斯坦

細說文革史，重評毛澤東

——中國人面臨的必答題

最近，官媒《環球時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文革已被徹底否定》。該文認為：對於『文革』，官方早有結論，而且中國社會看待『文革』的共識遠遠大於分歧云云。

果真如此嗎？我看未必！

研究和評價『文革』，首先繞不開的最大問題就是對毛澤東的評價。衆所周知：毛澤東是『文革』的發動者、領導者。『文革』則是毛澤東晚年經過長期醞釀、精心準備的一大杰作。直到晚年，毛仍然念念不忘、並無限深情地回顧平生兩大功績之一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可見『文革』在其心目中佔有何等重要、何等『崇高』的位置。

環顧今日中國社會，對這位大人物的評價到底有多少『共識』呢？遺憾的是：共識幾乎沒有，分歧則多多！可以說是人言人殊、議論紛紛。褒之者尊其為中國人民的保護神、救世主。據說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仍然處在黑暗中摸索云云。貶之者則認為：毛是中國歷史上所有專制帝王權術之集大成者，是遠超過秦始皇千萬倍、最暴虐的暴君、昏君。其統治中國 27 年的罪惡滔天、罄竹難書。

瞧！褒貶之差，竟如南轅與北轍，恰似針尖對麥芒！請問《環球時報》評論員先生：你所謂的『共識』何在？

該文作者還認為：官方早已有了權威性的結論，即誕生於1981年中共11屆6中全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評論員先生要求所有中國人都按照這個文件的精神來思考。殊不知：這個文件本身就值得置疑，而且其生命力和公信力都已經是『明日黃花』了。

遙想當年，集中了黨內外4,000多位高級幹部（按：實際參與討論的人數應為5,600人）充分發揚民主、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其中許多意見真是披肝瀝膽之言、振聾發聵之聲，更是民間所欲言而不敢言者。今舉幾例如下：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張香山說：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因此，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

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在發言中列舉了毛主席的片面性和十大錯誤：其中包括：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不懂政治經濟學，不研究經濟規律，196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1966年又開始搞四個大破壞等等。

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李韻伯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

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說：主席後來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論，認為個人意志可以創造一切，可改變客觀經濟規律，改變黨和國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變歷史發展的趨勢，走上追求絕對權勢和個人意志的王國、唯我主義的道路。實際上是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什麼變成機會主義者、專制主義者，必然性是什麼？只有觸及本質問題，才能解釋。不能用（草稿中的）驕傲情緒、主觀上要反修防修來概括，否則群

衆不滿意，我們這些正統派也不誠服。胡克實選舉例說，毛澤東出爾反爾的事情很多。

著名作家夏衍概括毛澤東的錯誤是 16 個字：『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裏藏針。』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則言簡意賅地概括毛澤東的性格特徵是：翻雲覆雨、任性生變的『權變』謀略。

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說得更直白，他認為毛澤東是歷史上最大的暴君，連朱元璋也不如他。

最後，許多參會人員要求重新撰寫這個文件。在重新寫的過程中，應該解放思想，要擺脫一些人為的思想障礙。要明確毛澤東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或者把毛澤東的錯誤思想說成不屬於毛澤東思想，這個說法對不對？再則決議草稿為把毛澤東同林彪、四人幫區別開來，而說什麼存在的路線一條是『極左』（林、四），一條只是『左傾』（毛）。這種通過文字遊戲來區別兩者的論斷顯得太勉強了。再如把明明是毛澤東個人的錯誤寫成是全黨的錯誤等等。認為原稿講第二段『我們黨在大部分時間執行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這個估計顯然與事實不符，因而是錯誤的。原稿以這種錯誤估計來寫這段歷史，不能不處處文過飾非，為毛澤東的錯誤路線及其造成的災難後果開脫。

大家認為毛澤東這階段的主要錯誤在於：1. 以階級鬥爭為綱；2. 左傾空想的社會主義。因此，大家認為這段歷史必須重寫。

【以上資料引自《炎黃春秋》2010 年第四期郭道暉的文章《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文章作者是親自參與這次民主評議活動，並擔任全國人大小組的秘書，負責整理本組討論簡報和其他有關工作，有機會旁聽本組的討論和閱讀外組的簡報，得悉討論

的具體情況。特別是黨內高層老幹部敞開思想、自由發言，對黨史和毛澤東的功過的評論，給作者留下深刻印象】。

請聽聽：這些都是發自那些曾經和毛澤東並肩戰鬥、出生入死幾十年的戰友們！『知君莫若臣』，他們經常出入毛的左右，有機會、有條件近距離觀察，因而對毛澤東的評判也比較符合實際。如果說：個別人因為私怨也許會走向偏激、極端，但如此衆多的高級幹部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側面，異口同聲，對同一個毛澤東進行的抨擊和判斷，應該承認：可信度是比較高的。

問題在於：後來根本就没有重新寫，《決議》也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集中大家智慧和意見。恰恰相反，按照長官意志，集中以鄧小平、胡喬木等幾位黨內大佬認為正確的意見。因為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爲了保毛澤東那面『旗幟』，也就顧不得什麼『實事求是』了，更顧不得什麼『群眾滿意不滿意』了。

如果說：『文革』是毛澤東晚年最後的大杰作，那麼也可以說：主持制定這個『歷史決議』則是鄧小平復出後的第一件杰作。他不是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也沒有按照黨內多年實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而是按照功利主義的標準來決定對會議上發表的各種意見進行取捨。取其符合己意的，捨其不合己意者。如此操作的結果，就不是盡最大努力取得『共識』，而是通過強制手段壓制不同意見，壓制分歧而勉強通過的決議，根本不可能反映全黨、全民的意志。當然也不可能獲得全民的衷心擁護和口服心服。正因為如此，幾十年來，分歧不僅沒有被消滅，相反是在不斷發展、發酵、積累。直到今天，就呈現『分歧遠大於共識』的狀況。

因此，可以這樣說：這個文件即使在當時，也僅僅是官方發佈，但缺乏群眾基礎、因而缺乏公信力的空頭文件。『毛澤東思想不包括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這種既不合邏輯，又不符合實際的斷言，純系文字遊戲！

時至今日，更無法統帥全黨、全民的意志。

走筆至此，門鈴響起，舊友來訪。當我忙着切西瓜、洗櫻桃以招待客人時，客人却穩坐在我的電腦桌前閱讀起來。當其閱讀完畢，憤然作色曰：你這是『妄議朝政』呀！夫朝政者，有在朝衮衮諸公爲之謀劃，爲之操作。何容我等山野村民置喙？君不聞古訓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你我之輩，平民百姓。能够做到『修身、齊家』足矣。何德何能，竟敢越位『妄議』起來？

我接着問：可否容我一辯？友人曰：可！

辯曰：『妄議』二字就意味着『尋釁滋事』，甚至意味着『顛覆』。罪在不赦！豈敢、豈敢！在下一介寒士，腦瓜皮比紙還薄。借我 10 個膽，也不敢『妄議』！

『妄』者，據《辭海》釋義有二：一曰胡亂，二曰虛妄，不實。所謂『妄議』乃毫無根據地亂說。按照這個解釋，本人以上文字，決非『妄議』，乃有據可查之言，有理可辯之論。

公開否定 1981 年中共 11 屆 6 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者，並非始於我。最早否定這個文件者，不是別人，恰恰就是當年堅持毛澤東思想大旗不能丟的那位大人物——鄧小平自己。

歷史的最大諷刺就在於：恰恰就是這位曾經堅持必需肯定毛澤東歷史地位的權威人物鄧小平，在他的生命之火即將熄滅之時（1993 年 1 月 15 日），也許是人之將死，天良發現；也許是在世界進步潮流反復激蕩下『與時俱進』、認識提高的結果，竟

然說出了一番令人震驚的話：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針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對毛澤東一生功過的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的評價……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

鄧小平此話是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公開說的。當時在座的有：當年在位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還有內定下一屆最高領導人胡錦濤。而且第二年7月胡錦濤與另一位元老萬里的談話中也曾表示：這個問題是『遲和早要解決好的』。他還說：『我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似乎有着充分的信心、決心。但是接着又說：『當前的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大的共識』。

以上資料引自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該書出版於2007年7月的香港。再版於2008年6月。雖然在境外出版，但很快就風傳至內地，那些高幹們、高知們幾乎人手一套（兩冊）。閱讀之、議論之、圍繞此書而爭論之，一時蔚然成風。該書出版至今，時間過去了8~9年，未見當局發表任何辟謠聲明，更未見權威機構對其嚴令禁止。該書的作者辛子陵先生的人身安全也仍然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安然無恙。

從以上種種迹象看來，該書的全部內容已被當局默認了。

換而言之：鄧小平這個講話應該是存在的，絕不是任何人敢於憑空捏造、造謠滋事。

鄧小平的内部講話說明了：

- 1、當年那個《決議》不是實事求是的，是違心的；
- 2、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是不科學的，是違反唯物主義原則的；
- 3、今後的任務就是重新評價毛澤東。具體時間定在『下個世紀初』，要求是糾正錯誤的評價。

鄧小平此言既出，12年前的那個《決議》的權威性何在？至少『價自減半』矣！（當然，關於徹底否定文革的結論仍然是正確的，其餘部分則不言而喻了）。

鄧小平把希望寄托於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江與胡二位。具體時間是『下個世紀初』。這個『初』字意味着什麼？其下限在何年？按照人們約定俗成的規矩：所謂『初』，應該是指一個世紀的開頭10年。如果再寬限的話，最多也只能延長幾年罷了。如果到了2020年，還能夠被稱為『初』嗎？

歷史老人的脚步跨進了新的世紀，又向前邁進了16年。鄧公那個講話以來，總計經過了23年，將近1/4個世紀了。中國最高領導人換了一茬又一茬。却始終不敢面對這個並不輕鬆的話題，不敢接過鄧小平留下的『燙手的山芋』，更談不到主動去解決了。

於是就產生這樣的局面：大家心照不宣，誰也不再提起此事，讓這個最敏感、最無奈的話題一代又一代地往下傳。即所謂『擊鼓傳花』遊戲是也。他們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把問題推給下一代。自己則力求平安着陸、到點交班。爲了保證這一點，就極力地維穩。爲了維穩，不惜掩蓋矛盾——於是便出現了所謂的『共識』。

其實哪有什麼『共識』？完全是一廂情願罷了。

世界上的事情本來就是復雜的、多元的。指望用某一個結論（即使是非常、非常權威性的結論）來統一十幾億中國人的思想，根本不可能。英國偉大的戲劇家莎士比亞有句名言：『一千個觀眾眼里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中國偉大的思想家魯迅先生在評論《紅樓夢》時也曾經說過：『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換而言之：一百個讀者眼里就會有一百個王熙鳳、賈寶玉……

還有，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也曾經說過：『你們贊美大自然賞心悅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却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即只準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歷史的諷刺在於：馬克思當年這個話是抨擊德意志書報檢查制度而發的。時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在馬克思的故鄉早已拋棄那個臭名昭著的『書報檢查制度』。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們這個一貫尊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東方大國，却變本加厲地實行着這種違反憲法關於言論自由條款的書報檢查制度。謂予不信，請看現實：比較敢言的《炎黃春秋》本來準備刊發5篇紀念『文革』50周年的文章。結果被有關當局下令禁止。經過反復協商，才準予發表其中一篇。以至於延期兩天才得以出版。

對於歷史上最荒唐、最血腥、最野蠻的那段『文革』歷史，難道只允許一種聲音、一個結論嗎？

猶有甚者，當局今天所堅持的那個文件，原來竟是既不科學、又不實事求是，因而缺乏群眾基礎，更缺乏公信力的。也是掩耳盜鈴、欺騙中國人民的大謊言，更是被當時的主持人自己早就否

定了的陳詞濫調！如此文件，還能令人信服嗎？

此外，環球評論員還在文章中說：『中國人前所未有的「獲得感」是真實的』。請問作者：你在作出如此斷言之前，採訪過那些爲了微薄的工資而在工地上揮汗如雨的民工們嗎？採訪過那些因爲被強制拆遷而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上訪者們嗎？還有那些失學的兒童們、失業的大學生們，長期待業、下崗的工人們嗎？你問過這些下層民衆有沒有『前所未有的』『獲得感』嗎？這使我又想起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的話：『人類的感情並不相通，窮人沒有開交易所折本的煩惱，石油大王不知道北京街頭撿煤渣的老太太的心酸，災區的災民大約不會去種蘭花，賈府里的焦大也不會去愛林妹妹』。

作者所謂『前所未有的』『獲得感』的人們當然有，但絕不會是全部，也不是大部分，可能就是極小部分。到底佔多大的比例？恐怕就是那些佔據財富絕大部分、寶塔尖端極少數人罷了。

爲了杜絕『文革』回潮的可能性，爲了讓我們年輕的下一代、以及千秋萬代的子孫們都牢記歷史教訓，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如實地記錄下那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血淋淋、慘兮兮的『文革史』。同時，更有責任對於這場鬧劇的始作俑者——毛澤東給予正確評價，還其本來面目，準確記其功罪，同時，從中吸取慘痛的歷史教訓。

認真記錄文革史、重新評價毛澤東，乃是民心所向，世界潮流所趨的大戰略、大智慧、大政治。做好了，就可以團結全體海內外的炎黃子孫，萬衆一心，同心協力，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把世代所魂牽夢繞的中國夢變成現實！

時不我待！現在是 2016 年，距離鄧小平的指示：『下個世紀初』的時限早就超過了。如果在朝的『肉食者們』個個都畏首

畏尾、無所作爲，任意拖延下去，何以告慰鄧公在天之靈？

再者，難道普通老百姓就只能聽之任之、無所作爲嗎？如果當年小崗村的農民們不敢跨越禁區，還會有今天『包產到戶』的合法性嗎？官方不願做、不敢做的事情，不等於老百姓也不允許做。因此，每個中國人也都有權利對「細究文革史、重評毛澤東」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中國人民應該擁有針對重大歷史事件進行思考、進而表達的權利。沒有表達權的思考權是沒有意義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共 17 大的政治報告里，第一次引進『表達權』的概念。不過，現實中仍然沒有公民任何表達的機會，所以，認真落實表達權仍然是個任重道遠的難題，仍然需要上下互動、群策群力地不斷推進。

【發表於《民主中國》2016 年 6 月 29 日】

一個執政黨，執政了六十年的執政黨，總應該有起碼的反思勇氣吧。這實際上是一種責任，是執政黨的責任。

這反思，肯定會引出許多不同的看法來，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氣氛緊張，搞一些封殺動作，這顯得我們共產黨人太沒有氣度了。

在我看來，老百姓的看法，民主黨派人士的看法，專家學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這四類人的看法，尤其應該好好聽聽，封殺不得。

——萬里

毛澤東『進京趕考』 的成績如何？

1949年3月23日上午，在乘車進北京的路上，毛澤東對周恩來說過『進京趕考』的話。看來，那個時候的毛還是比較清醒的。『進京趕考』因此成為許多官方媒體及個人回憶錄所津津樂道的話題。

據說：中國老百姓是國家的主人翁。這個話如果當真，作為主人翁，是不是有權問一句：在這場世紀大考中，毛澤東們的成績怎樣？得分幾何？是否及格？

首先應該明確：大凡博士、碩士畢業論文答辯，都應該邀請外單位（其他高校、研究機構等等）的著名專家參加，而不應該是本單位關起門來自評。同樣的道理，如果想了解某人的真實業績，也必須傾聽外單位、外省以至外國、各界、各方面人士的評價。而不應該僅僅根據體制內那些專門投其所好、溜須拍馬『唯唯諾諾之輩』的奉承話。

為了引起國內外各界、各方面人士的關注，本人這篇短文就算是拋磚引玉之作罷。

一貫好戰，四面樹敵

歷朝歷代的開國之君大都面臨長期戰爭所留下的殘垣廢墟、民窮財盡、國庫空虛等等的嚴峻局面，因而大都采取息兵罷戰、以舒民困的政策。目的是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也使國家從凋弊的困境中恢復元氣。從而迎接一個新的經濟繁榮、民富國強時代的到來。

毛澤東在 1949 年奪取全國政權後的所作所爲，却是個極其罕見、令人遺憾的例外。爲什麼？

毛澤東生性好鬥：『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正是他青年時代的座右銘，也是他畢生從事的事業，更是他的人生哲學。

『與天鬥』、『與地鬥』都需要多方面的科學知識，更需要請教各方面的知識分子。顯然，這是畢生以強者自居、耻於下人的毛澤東所不能容忍、更不能接受的。最後那條『與人鬥，其樂無窮』則不同，更多需要的是權謀。權謀恰恰是毛澤東最精通、最擅長、最拿手的專業。毛澤東可以說是這方面的行家里手，是其特長和強項。『揚長避短』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所有人理性的選擇。

對於毛澤東來說，只要一說到打仗、鬥爭，就像打了雞血一樣，熱血噴涌、激情四射。

打仗和鬥爭都會死人，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毀滅於瞬間。這個後果毛澤東當然是知道的。但這阻擋不了其實現雄心壯志的決心。即使付出幾億中國人的生命代價，在毛澤東看來都無所謂的（毛澤東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地宣告：不怕打仗，甚至大打、打核戰爭，寧肯犧牲 3 億中國人，也要換來一個所謂『紅彤彤的新世界』。）。

1949 年『進京趕考』不久，就面臨戰爭與和平的選擇。那

個時候，中國已經歷了幾十年的戰亂（軍閥混戰、八年抗戰、三年內戰等等），民窮財盡、殘垣斷壁。百業俱廢、萬方待興，正是需要休養生息的時候。爲此，特別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在面臨戰爭與和平的抉擇時，絕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拒絕戰爭，堅決、明智地選擇了和平。不管他金日成想要統一整個朝鮮半島、做朝鮮王的美夢；也不管斯大林想把戰火燒到亞洲，以吸引美國的軍力轉移東方，從而緩解歐洲的緊張局勢的如意算盤。中國人民需要的是休養生息、養精蓄銳。絕不做爲人作嫁衣、火中取栗的傻事。

可是毛澤東却不這樣看，他的興奮點並不在此。

毛澤東不顧大多數領導人的明智選擇，獨斷專行決定出兵，美其名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爲此損失了近百萬中華兒女的生命。最後還是在原來那個『三八綫』兩側停戰。停戰三年後，毛澤東在接待外賓時，不得不公開承認：『錯了，絕對錯了』、『百分之百地錯了。』（注1）

毛澤東在『進京考試』的第一場考試中，不僅『絕對錯了』，而且留下三大『負資產』：

1、明明是爲人作嫁衣、火中取栗，明明是他自己想當亞洲共產黨的小頭目，才不得不屈從斯大林，爲之效勞，却冠冕堂皇地打出『保家衛國』的口號。今天，解密資料表明：美國根本就没有打算進攻中國，那麼，這場戰爭和中國人民何干？保誰的家？衛哪個國？毛澤東後來不得不承認：『打出「保家衛國」的旗號就是爲了動員全國人民大力支持。』（注2）

『動員』二字說得好聽，其實就是『忽悠』，也就是『欺騙』，欺騙了中國人民幾十年。直到今天，當局仍然在如此宣傳，並且作爲開國以來的一大政績來吹噓。

2、開啓了與世界最發達、最先進的美國爲敵、自外於世界大潮流、大趨勢，愚不可及的閉關鎖國政策。最近《環球時報》發表新疆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高波的文章寫道：『新中國成立後，新興政權面臨敵對勢力的封鎖和圍堵……』這種說法完全是顛倒因果。請問高教授：爲什麼人家要封鎖和圍堵？其因有自：早在1948年毛澤東就公開宣告：『要一邊倒，倒向蘇聯』。特別是在毛澤東一意孤行地卷入朝鮮戰爭後，美國聯合16個國家，並以聯合國的名義宣佈：中國是侵略者，因而聯合出兵朝鮮就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師出有名、有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全世界都在反對中國。中國長期背負『侵略者』的惡名。由此，長期被迫孤立於世界大家庭之外。得不到必要的經濟和科技交流，更談不到什麼外援。於是不得不提出一個口號：『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億萬中國人民跟着毛澤東倒了霉、受盡了苦和累。

3、另一個惡果是留下了一個『流氓加無賴』的金氏獨裁王朝。直到今天全世界仍然在爲這個流氓、無賴政權的種種倒行逆施而備受困擾：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窮得叮當響，還要大力發展核武器。弄得全世界不得安寧。特別是作爲近鄰的中國東北地區的人民，首當其衝，受害尤烈。這個金氏王朝專門把核武器試驗基地設置在緊靠近中國東北邊境的寧邊。寧邊距離我國邊境最近處爲100公里，距離北京800公里，距離上海1,000公里。而核輻射對人體的有效殺傷半徑高達1,400公里。也就是說：一旦發生核泄漏事故，或者遭受核打擊，我國東部大部分城鄉都在核輻射的範圍內，尤其是東北地區的人民必將付出慘重的代價，甚至死於非命。毛澤東爲了追求世界霸權、實現其全球領袖的夢想，遺禍子孫，僅此一項，其罪就不可恕。此外，大量朝鮮難民越境，引發黃、賭、毒三大惡果，加上環境污染等等，都是無法估量的

人爲災害。

『進京趕考』的第一場，考試成績如何？答曰：一敗塗地，慘不忍睹！

從朝鮮戰爭開始，此後又多次進行對外戰爭：最近網上有篇評論文章寫道：『二次大戰以來，和自己周邊國家發生邊界戰爭最多的國家就是中國，例如對印度的邊界戰爭、對蘇聯的邊界戰爭、對越南的邊界戰爭和海戰等，加上介入朝鮮戰爭以及對金門的炮擊，中國可以說打遍了左鄰右舍，四面樹敵，這在全世界是極爲罕見的。』這位作者所言，除了對越南的邊界戰爭外，都是在毛澤東的決策下進行的，而且都是得不償失的敗筆！

我們今天一再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將要和平崛起。但言者諄諄，聽者却反映冷淡。爲什麼？因爲你這個國家一貫好戰，打遍了左鄰右舍。誰還會相信你的和平崛起諾言？全世界的老百姓不能不感到恐懼：中國一旦實力強大起來，全世界都將『穀鯨』啊！在一連串的對外戰爭中，值得一提的是 1969 年對蘇聯的邊境衝突。當時的蘇聯打算動用核武器對中國實行『出其不意、外科手術式的打擊』。在面臨核武器打擊的危險時刻，中共中央未雨綢繆，提前實行疏散。把中央領導人全部轉移，離開北京，分別至全國各地。毛澤東就立刻移駕去了武漢，住進風景如畫的『東湖賓館』。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毛澤東曾經說過：『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一旦真的面臨死亡威脅時，他自己却溜之乎也，跑得比兔子還要快！什麼叫『身先士卒』？什麼叫『臨危不懼』？毛澤東早已忘得乾乾淨淨。他自己先躲到安全地方，北京城里那幾千萬老百姓怎麼辦呢？只好聽天由命，也許就成爲核武器的犧牲品。

幸虧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機：當蘇聯把自己的打算告知美國，希望美國保持『中立』時，得到的反映却不是同意，更不是支持，而是譴責！美國政府並且嚴峻地警告：一旦蘇聯對中國核打擊，美國就向蘇聯本土 134 個城市、軍事要點、交通樞紐、重工業基地進行核打擊。勃列日涅夫得知後氣急敗壞地咆哮：『美國人出賣了我們！』

幾十年來，中國官方和媒體經常地、一貫地、連篇累牘、喋喋不休地宣傳『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如果美國真有所謂『亡我之心』，當年正是千載難逢的良機。不用一兵一卒，也不用一槍一炮，只要袖手旁觀、借蘇聯的核武器來達到『亡我之心』的目的。豈不是坐收漁人之利？那個年代，如果中國還有能力進行反擊，就讓兩個共產大國互相廝殺，殺得兩敗俱傷。然後『不戰而勝』，稱霸世界，豈不是水到渠成？

從美國力阻蘇聯動用核武器打擊中國的往事，可以斷言：所謂『亡我之心不死』，純屬主觀臆測，也許是另有所圖吧。

如果當年不是美國反對，整個中國大地早就成為蘇聯核武器下的一片火海。還會有我們今天的一切嗎？

毛澤東對外事外行，內事是不是就內行呢？

1、毛澤東掌權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鎮壓反革命』。

大規模地殺人，通過殺人以立威。更為奇特的是：不是按照某人的罪行該不該殺，而是下達殺人的指標，強令執行：例如上海應該殺 2,000 人，某省應該殺 1,000~1,500 人等等。僅 50 年代初那次大規模肅反，就殺了 70 多萬人。其中也許有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但絕大多數都是不該殺，甚至是無辜的。

如此大開殺戒，實為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創舉」！

最近筆者查閱有關資料得知：在 50 年代鎮壓反革命高潮中，被錯殺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就多達 38 位。其中絕大多數是早已經放下武器，並且『起義』或投誠後返鄉閑居或經商者，甚至還有辛亥革命元勳、討袁護法名將。其名單見文後附錄（注 3）。此外，筆者孤陋寡聞，還從媒體縫隙中有限透露的資料得知幾個具體案例：著名愛國人士金庸之父查樞卿先生就是無辜被殺的冤魂之一；還有著名的抗日將領、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王纘緒也是。由於這兩位是著名人士，其名聲在外，無辜被殺後的影響太壞，且有後人不斷申訴，當局才被迫予以平反。至於那些默默無聞的等閑之輩，不過如同踩死一隻螞蟥。還有那位在『反饑餓、反內戰』運動中因為拒領美國救濟面粉的朱自清教授，當年受到毛澤東高度讚揚：『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他的長子朱邁先（原是中共秘密黨員）竟然也是在鎮壓反革命高潮中被處決，罪名是『匪特』。朱自清先生地下有知，當作何評論？

還有一位幾乎被錯殺的大恩人、大功臣不能不說。此人名叫莫雄，原是蔣介石的親信、江西省保安司令。1934 年蔣介石以避暑為名，在廬山召開極其機密的高級軍事會議。會議決定對中央蘇區實行第五次圍剿——『鐵桶計劃』，即派出 150 萬大軍四面包圍、步步為營，最後『畢其功於一役』，全部消滅紅軍。如果該計劃如期實現，整個蘇區早就被消滅了，哪里還會有此後的長征，更談不到發展、壯大了。

當 150 萬大軍逐步縮小包圍圈，準備『瓮中捉鱉』之時，才發現紅軍早已轉移，人去山空。蔣介石聞報大驚。震怒中下令徹查。查來查去，最後不了了之。蔣介石哪里知道，泄密者恰恰就是自己的親信莫雄。此人早就是中共的密探。散會後立刻派人

把如此重大機密情報送到蘇區負責人手中。

救命恩人莫雄立了大功。可是 1950 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却被打成『反動官僚、惡霸地主』，準備槍殺。面臨如此奇冤，朝中衮衮諸公，竟無一人敢於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就在被處決的前夕，終於有位要員叫古大存的，曾經是莫雄的部下，擔任過參謀長。出於良知和信義，斗膽作證，證明莫雄曾經冒死挽救整個紅軍的大功勞。這才幸免一死。但古大存本人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再加上為『反動分子』辯護，從此一蹶不振。而莫雄先生在此後歷次運動中仍然免不了被批鬥，『文革』期間又升級為『江南第一大特務』，最後含冤而死。（注 4）

毛澤東如此瘋狂地殺人，極大地「透支」了執政黨的信譽。從 70 年代末開始、直到新世紀，都在不斷地平反。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其中就有 50 年代那場殺人運動所留下的大量積案。用現代文明語言來說就是：留下了一筆永遠還不清的『負資產』。如果用粗俗的語言來說：就是拉了一褲襠的臭屎，讓他的繼承人不得不悄悄地為之擦洗。繼承人只好捏着鼻子收拾這一爛攤子。為什麼『悄悄』地擦洗？而不敢公開宣揚？當然是為了維護那個名存實亡的所謂『光輝形象』。

豈不知《朱子家訓》里早就深刻地教訓後人：『惡恐人知，必是大惡。』

2、『與人鬥』的下一輪就是反右派。

關於反右派運動的文章多矣！筆者本人早在 2007 年就寫作《應該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繼之又在 2012 年寫《槍杆子里出政權與反右派運動》參加由香港五七學社主辦的反右派 55 周年紀念活動。（注 5）

在這裏僅僅提供一條質疑：鄧小平堅持反右派運動是必要的根據何在？據說是『當時有人殺氣騰騰』。但經過復查，根本就沒有發現任何人有所謂的『殺氣騰騰』，也就是說：查無此人。僅僅有一位名叫葛佩琦的中國人民大學講師、老共產黨員在發言中情緒激動了一點。結果被《人民日報》斷章取義地標以『要殺共產黨』。雖然葛佩琦當即寫信要求更正，但被置之不理。這位葛佩琦先生本人的右派帽子後來也被改正了。既然沒有人『殺氣騰騰』，再堅持反右派運動必要性的理由就不存在。爲什麼仍然繼續堅持『必要性』的說法呢？真實的原因在於：鄧小平本人就是反右派的積極分子，而且是領導反右派運動的干將。他和毛澤東在這場倒行逆施中負有連帶責任，一損俱損。爲了維護自己的形象，才昧着良心地堅持反右派的『必要性』。

再者，在這場『陽謀』中，毛澤東把幾百萬民族精英打倒了，並在隨後的苦役和饑餓中又一個個消滅了。但他勝利了嗎？沒有！他和他的黨付出了更爲慘重的代價——執政黨的信譽、威望毀於一旦！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信任、擁戴，從此大幅度的下滑，降低到幾近冰點。因此，有位詩人斷言：這是一場沒有勝利者的鬥爭——兩敗俱傷。

3、緊接着就是大躍進。

根據官方的說法：大躍進的初衷是爲了更快地擺脫窮困落後的局面。那個著名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如此表述的：『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

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該文件所提出的辯護理由有二：其一是經驗不足；其二是急於求成。總而言之，動機是好的。

這種說法對不對？能否取得老百姓的認可呢？恐怕很難。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1957年底，毛澤東挾反右的餘威，率團赴莫斯科參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赫魯曉夫在會上首次提出，社會主義陣營應以中蘇為首。『為首』二字給毛澤東極大的刺激和誘惑。能够成為國際共運陣營之『首』，在毛澤東心目中既是夢寐以求的欲望，更是一種『舍我其誰』的雄心。但為了表示謙虛，毛澤東仍然表示，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還不够，『為首』的資格不足。毛的潛臺詞是：如果他治下的中國將來取得了足够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在國際共運陣營里就可以名至實歸地坐上『為首』的席位了。

被『為首』二字、世界共產主義陣營領袖的美夢所激勵和誘使，毛澤東從莫斯科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中國的經濟實力平地拔高，以填充他的『實力』。沒有技術條件，就靠『人定勝天』的口號和吹牛、瞎干、蠻干。這就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真正動機。可以這樣說：中國的老百姓因此淪為毛澤東『為首』夢的墊腳石和犧牲品。而最慘重的代價則是全國餓死三千多萬災民（絕大多數是農民），整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其實，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里的『為首』，對當時貧困落後的中國人民來說，並不意味着什麼福音。相反，可能成為巨大的包袱。因為其他共產黨國家是並不對『為首』的國家『納貢』，而是不斷地索取。為了滿足其他『兄弟黨』無窮無盡的援助要求，

中國老百姓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包袱。大量的對外援助也加重了當時的經濟困難。只有一個人能從『爲首』中得到好處，那就是毛澤東，因爲『爲首』就意味着他可以滿足自己的世界級領袖的野心。

就在全國人民陷入大面積、深度的饑餓、大量餓死人，以至於餓殍遍野的時候，毛澤東本人的消費欲望並沒有相應節制。相反倒是日益奢侈、豪華。僅各地興建的『行宮』就多達 61 處。而絕大部分正是在三年饑荒中所興建。例如：1960 年建於河南鄭州的省委第三招待所。地址選在遠離市區的黃河附近。當時正值全國大饑荒，但當地的官員們照樣大興土木，用靠高徵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民脂民膏興建的這個宮殿群，將永遠向國人和世界人民證明：毛澤東們是如何窮奢極欲的。這個行宮除按當時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人數以每人一個套間蓋了一幢大樓外，還別出心裁地給當時中共的七位領袖每人建了一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主席規格面積逐級遞增，以毛的別墅最爲寬大考究。毛的臥室里還專門修了一條秘密地道，以便毛遭遇萬一情況時逃跑。當年建成後因信陽事件曝光，中共中央再沒來鄭州開會，尤其是那幢主席別墅永遠緊鎖大門，建成後從未有人住過。又如：代號爲 414 工程的上海西郊賓館圈地 1133 畝，是上海最大的花園別墅式國賓館。也是始建於 1960 年 9 月。園林、花木、房屋修建，連同女服務員，100 多人長年爲它『服務』。20 年間，毛澤東總共只住過幾天，而 100 多人的工資外加維修費用，恐怕一年不下百萬。

再如：在餓殍遍野的 1960 年 5 月中旬，毛澤東在湖南與張平化談起韶山，說那里有個滴水洞，地方很好。張平化心領神會，聞風而動立刻開工，修建韶山滴水洞行宮，代號 203 工程。整個

滴水洞地區封鎖保密。參照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樣，再吸取蘇聯建築保暖防寒的優點，修建了以三座大樓為主體的建築群。毛澤東住的那棟樓有主房、副房、會議室、餐廳、娛樂室等，同時還修通了韶山沖到滴水洞的公路。後來又增修了防核打擊的防空洞。滴水洞工程建於大饑荒年代，從1960年下半年開工到1962年，一、二、三號主體工程相繼完工。

最後，還有廬山的行宮。僅廬山一號的建築面積就是當年蔣介石那座「美廬」的5倍。同時，美廬仍然歸毛澤東使用。如此奢靡，大大超過了歷代的封建帝王。

4、最後就是那場曠古未有的『文革』

爲了紀念文革50周年，幾個月前我寫作《文革——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怪胎》。在這里再補充一點：怪胎之怪，不僅僅在於政治領域，而且擴展到人們生活的一切方面。例如在家庭倫理方面：逆天理、違人倫、毀孝道、滅親情。

動物世界，特別是高級哺乳動物中，都存在基於血緣關係而產生的親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漫長歷史更證明了骨肉親情的重要性。親情中最主要的則是父母對子女的痛愛和子女對父母的敬愛。這種愛是任何感情都不能代替，也無法超越的，是天然形成的人倫關係。歷朝歷代、古今中外，都不能否定更無法超越。還有的皇帝以孝治天下而聞名於史（例如漢文帝）。

由於這種親情的延伸、擴展，在整個社會還產生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正如《孟子》所云：『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當歷史發展到毛澤東時代，這一切都被顛覆、被摧毀。首先是親情被虛置、被否定、最後被批判。請聽聽「文革」期間特別流行的那首歌吧：『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

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這還不算，猶有甚者：歷次鎮反、肅反中，血腥鎮壓、濫殺無辜。其子女還必須和父母『劃清界綫』，要堅決站穩革命立場，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綫一邊。甚至公開聲討、譴責父母種種所謂『惡行』。這種做法徹底顛覆了人類最基本的人倫道德，根本違背人類最樸素、最深沉的感情。同時，也違逆人類借以維系的天理——普天之下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大道理——愛父母！早在春秋時期，孔聖人就教導人們：『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利用子女當衆揭發、批判、聲討父母『罪行』的做法，受傷害最大的當然是身陷其境的父母。其他一切無關人的批判、聲討都可以東風馬耳，充耳不聞。但親生兒女的發出的批判、聲討不能不對他們產生難以名狀的震撼作用：摧毀了作爲父母的最後一點點自尊心、自愛心，掐斷了老人對人世間最後一絲留戀。『我還活着幹什麼？不如死了算了』。許多父母就是在子女的惡言惡語的聲討中，下決心從此永遠告別人世。例如老舍先生就是因爲有家回不得（閉門不納）在走投無路的窘境下，只得邁向太平湖，了此一生。

其次，受傷害最深的則是子女們自己。他們能不能作另一種選擇：保持沉默？不行！在幾百、幾千人、幾萬人的批鬥大會上，衆目睽睽，幾乎所有人都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這些子女們。看看你是什麼表現？是不是、能不能、敢不敢和『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的父母劃清界限？敢，而且這樣做了。說明你具有進步的要求，列入『可教子弟』的範圍，給予寬待，讓你解脫。否則，說明你和反動父母一個心眼，一條心，因而給予嚴厲對待。何去何從？普通人都不能不權衡利弊，做出違心的選擇。這樣做了，

問心無愧嗎？當然不是，而是有愧於心，愧對生我養我的父母，愧對列祖列宗啊！即使換來暫時的人身安全，但心靈深處必將是晝夜不安、寢食難寧。愧疚心理必將伴隨其終生，永遠無法解脫。

受傷害最慘烈的則是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由此而摧毀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所共同信仰、共同遵守的信義道德。更摧毀了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互愛、互敬、互讓等等和諧相處的人際關係和與人為善、助人為樂的優良品格。今天之所以假冒偽劣橫行、人們互相利用、欺詐。其根源蓋出於此！

一個民族優秀傳統的創建需要經過幾千年的長期积淀，而摧毀她只需要一瞬間！『文革』10年恰恰就是這樣的『瞬間』。總之，『天下苦毛久矣！』

因此在他死後，尸骨未寒，妻子和親信全都被抓，遺詔和安排全都被廢。顯然，他的繼承人所做的這一切，就是對他最徹底的否定，最雄辯、最深刻的評價。

那麼，毛澤東進京趕考的成績到底如何？

評判成績有兩種方式：中小學大都實行百分制，大學和公務員考評則採用四級評分制：優秀、良好、及格、不及格。

什麼樣的國家領導人可以評為優秀呢？開創一代新風，留下輝煌業績。如美國的華盛頓、林肯、羅斯福；英國的丘吉爾首相；俄國的彼得大帝等是也。在中國歷史上也有『文景之治』、『貞觀盛世』、『康乾盛世』三大標杆。例如：那位被毛澤東在詩詞里譏貶『稍遜風騷』的唐太宗在位24年，留下了一個『貞觀盛世』。毛澤東在位27年，留下的是『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唐太宗成功的最大原因就在於：虛懷若谷、從諫如流。最著名的例

子是重用魏徵，聞過則喜、言聽計從。據魏徵自己說：『君明則臣直，只有明君才能容得下諍臣』。作為對比，毛澤東容得下誰？一個個敢於批評的人都被關、被殺、被自殺等等。因此，李世民最有資格被評為優秀。

還有『宋祖』即宋太祖趙匡胤。也被毛澤東的詩詞譏貶為『稍遜風騷』。他的突出貢獻是，在開國之初就立下誓碑：

1、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不得連坐支屬。

2、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3、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這塊誓碑表明趙匡胤的明智和大度。第一條是善待前朝遺屬。第二條尤其值得後人學習的是：寬待知識分子，寬待其中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人。

有了如此寬容、大度的君主，自然營造出寬松的環境，文人們才能敞開胸懷、開誠佈公，對當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統治者也的確有君子之風和充分自信，善於聽取臣民的各種意見。廟堂之上，君臣可以就政策利弊進行反復爭論，不必擔心被打成『反黨集團』。市井之中，布衣可以自由言談、評論朝政得失，不必害怕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被冠以『妄議朝政』、『顛覆國家政權罪』之類的罪名。中國歷史上許多朝代都有文字獄，尤其是秦、東漢、元、明、清等朝代更是『赭衣塞途』、『道路以目』的恐怖時代。但有宋一朝却没有這方面的記錄，堪稱絕無僅有！正是因為有如此寬容的政治環境，才能培育出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局面。據英國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千年史》的可靠記載：宋朝的人均 GDP 已達到 600 美元，經濟總量已佔全球的 21%，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注 6）所以趙匡胤也可

以評為優秀。

有資格被評為『良好』的領導人應該是順從世界潮流、人心所向，大膽實行改良；或者繼承祖業、並發揚光大之，同樣留下良好的業績。例如海峽對岸那位蔣經國先生。他明了世界大潮流、大趨勢，毅然開放報禁、黨禁，開啓了臺灣政治的新時代——民主轉型。其意義非同小可。如果還有人認為：中國人素質太低，不能實行民主政治的話，那麼，請看海峽對岸！

歷史上的漢武帝也可以歸入『良好』之列。漢武帝劉徹也曾被毛澤東的詩詞譏諷為『略輸文采』。他在位 54 年，最大的功績在於開疆拓土，數十年堅持對匈奴用兵，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實力，使漢朝的勢力延伸到今天新疆以西，直到今天的中亞，西南達到雲貴川，東北及於的遼吉黑，南方包括海南與福建，初步奠定了現代中國版圖的框架。外交方面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开辟了流傳千古的絲綢之路，促進了東西方經濟與文化的交流。劉徹被認為是一代雄主，因而被後世謚號為『武』。

但由於連年用兵，致使國庫空虛，民間多有怨言。劉徹晚年通過認真的反省，有所覺悟和悔意，因此毅然頒《罪己詔》。詔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劉徹是中國歷史上敢於公開認錯、懺悔的第一人。

談起下『罪己詔』，毛澤東多次說過：『歷代皇帝下罪己詔，沒有不亡國的』。所以，『我是不下罪己詔的』。

『罪己』和『亡國』有必然因果關係嗎？沒有！劉徹下「罪己詔」，亡國了嗎？不但沒亡國，反而獲得當世以及後人的諒解，從而獲得更多的民意支持。使漢祚得以延續了 300 多年（歷經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將近一個世紀。再經過劉秀中興，

東漢又延續了 200 多年）。

『罪己』就是普通人所說的『自我檢討』，表明此人具有擔當精神，勇於負責、承擔責任。從而讓整個國家擺脫困境、走出低谷。因此，表現了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不敢下罪己詔，說明正是缺乏這種精神。再說得明白些，就是要無賴！

由於劉徹能够醒悟自己的過錯，公開承認錯誤，向全國人民痛悔罪愆。因此可以被評為『良好』。

『及格』二字適合於中等成績的領導人。雖然沒有輝煌業績，但能够守成。兢兢業業，對得起列祖列宗，也對得起老百姓。沒有發生大災大難，人民可以安居樂業。雖然平平庸庸一生，但沒有留下惡劣的記錄。歷史上的大多數皇帝都屬於這個檔次。可以說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剩下那頂『不及格』的帽子留給誰？非毛澤東莫屬！

此人於 1935 年所作的《念奴嬌 昆侖》里曾這樣寫道：『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對毛澤東自己的千秋功罪，誰來評說？

最有資格評說的應該是他的繼承人。值得欣慰的是：據最近消息：中共政治局以高票通過了王岐山發起的議案，要求將毛澤東紀念堂遷離天安門廣場；習近平表態稱建毛紀念堂是個錯誤，並將在本屆或下屆解決。

有詩曰：放眼五洲風雷疾，獨夫難逃千夫指！

注釋：

【注 1】《炎黃春秋》2013 年第 12 期 12~13 頁

【注 2】《炎黃春秋》2013 年第 9 期何方文章

【注3】辛亥革命元勳鄧玉麟、夏之時、討袁護法老將何海清、宋鶴庚、起義軍長陳春霖、投誠軍長徐經濟、投誠將領尹作幹、葉幹武、鄧士富、列應佳、關仲志、起義將領甘清池、曾憲成、何際元、唐伯寅、劉晴初、潘峰名、方滌瑕、王育成、項麗源、楊健民、周伯英、林芝雲、糜藕池、趙俊圖、趙鴻厚、唐憲堯、曹森、梁順德、彭永年、覃守一、焦達梯、謝靈石、抗日將領周址、宋士臺、陳應龍、因病退職的北伐少將孫天放、抗戰勝利後即告老還鄉的中將林伯民等共計38位。

【注4】參見胡顯中、岑超南共同主編的《精英是怎樣被毀滅的？》第1單元第4章第50~53頁，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12年出版）

【注5】參見香港五七學社2012年出版的《五七精神 薪盡火傳》第69~82頁

【注6】參見《廉政瞭望》2016年第11期陳忠海的文章

【發表於《民主中國》2016年8月23日】

一場暴風雨，右派知多少？

——為反右派 60 周年而作

時事滄桑，轉眼間反右派運動 60 周年了。關於這次浩劫的性質、背景、內幕、人事變幻種種，許多學者及當事人寫了海量文章，進行了很有價值的探討。本人愚見還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似乎尚未搞清楚，因而值得認真探討：被『陽謀』誣陷，並打入另冊的受害者到底有多少？

在 1957 年那場『陽謀』中，被劃為右派者到底有多少？先後看到好幾個數字：最早看到的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作者戴煌）第 17 頁的記載：『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達 552,877 人，佔國家幹部總數 953 萬人的 5.8%……』。長期以來，許多學者都是按照 552,877 這個數字進行研究。豈不知這句話里有兩個限定詞：公職人員，被改正的。除了『公職人員』以外呢？還有多少大學生、其他自謀職業者？甚至還有中學生被打成右派者（或反動學生、壞分子等等），並不在其內。另外，這裏是指被「改正」的，那些一直沒有被「改正」的又有多少？已經死亡而又沒有任何親友為其申請落實政策，當局也無法主動為其復查，因而永遠未能『改正』的，更不知凡幾。

直到前幾年，被解密的資料顯示：1958 年 5 月 3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的『階段性成果』：

『定為右派分子 3,178,470 人，列為中右 1,437,562 人』。於是人們又根據這個數字來確定，即 3,178,470 人。和前面那個被『改正』的數字相比，增加到將近 6 倍。3,178,470 人是不是最後的定論呢？否！

這個數字是 1958 年 5 月 3 日公佈的，而且只是『階段性成果』。毛澤東喜歡以詩言志。他曾寫道：『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他還具有『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堅韌意志。為此，不斷進行『反右補課』就是理有固然、勢所必然了。許多人戰戰兢兢地躲過了「反右關」，剛剛喘口氣兒，暗自慶幸，又被『補課』補進右派行列。於是，人們發現了一個右派『新品種』——補劃右派。

『補劃右派』有多少？

筆者孤陋寡聞，僅在朋友圈子里，就知道有 6 位：

1、在青年時代就着手翻譯醫學權威性經典著作《希氏內科學》、在醫學界享有盛譽、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政協常委的王賢才先生就是『補劃』右派。據王先生說：和他同時被『加冕』的還有 3 位。

2、筆者的老同學、老戰友陶懋頤。陶和我是南昌心遠中學高一同班同學。1949 年後，我步入社會；陶則繼續升學，1951 年高中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數學系。1952 年北大、清華、燕京三所大學合並為兩所，凡是學工的並入清華，學理的都並入北大。此後陶懋頤就在北大數學力學系就讀。畢業後因成績優異而留校擔任助教。按照北大的規矩，助教沒有資格上講臺，只能做一些教輔工作。但由於陶懋頤精通專業，且知識淵博，善於表達、深入淺出，口才獨佳。校方破格讓他上臺講課。

果然，他不負衆望，教學效果突出，頗受學生歡迎，一時傳爲佳話。

擺在陶懋順的面前的，似乎是一片光明、輝煌燦爛的遠景。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場曠古未有的『陽謀』即將在神州大地上演。他的『罪行』說來非常簡單：參與翻譯赫魯曉夫那篇「秘密報告」。本來已經調出北大，赴內蒙古支援的陶懋順也在『補課』時被補劃爲右派。

3、早在新世紀初，常住香港的熱心人士自發組成了專門研究 1957 年『陽謀』的『五七學社』。該社主要成員之一陳瑜林先生原來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生。也是在『補課』中被補劃爲右派。陳先生於 1992 年移居香港。從事寫作，成果頗豐。

以上只是個案。總計『補劃』了多少右派，仍然是個高度機密。不過，我們還可以從另外的渠道來推算。

根據丁抒所著《陽謀》一書第 17 章，即有一例：據 1990 版《南陽縣志》第 39 頁載，該縣於反右運動中已抓了 892 名右派，從 1958 年 7 月開始，『又在工商、文教、衛生界開展向黨「交心」運動，再劃「右派」272 人。』

最近筆者在香港『五七學社』負責人武宜三先生積多年心血所收集的資料並刻錄成光盤《1957 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D 區中發現：當年曾領導反右運動的北大歷史系學生支部書記郭羅基的一篇文章說：『到 1957 年 10 月底，北大戴帽子的右派有 526 人，反右補課又增加了 173 人，總共 699 人……』郭先生的文章提供了一個大致比例，即補劃的右派大約佔原劃右派的 1/3。再按照前述《陽謀》一書所提供的例子來計算，補劃右派 272 人，佔原劃右派 892 人的比例大致也是 1/3。按照這兩個實例來推算，全國的右派總數應該是在 3,178,470 的基礎上，再增加 1/3，則總數應在 400~450 萬範圍內。

此外，還有明令不劃右派、不拿國家工資的中學生，以及工人、農民、工商業者中被扣上『壞分子』的，又是多少萬？根據張英於《反右 50 周年祭——實際錯劃『右派』800 萬人》一文的揭露：『據上世紀 70 年代末民政部負責人和法院院長告知，我也早已在媒體上披露：還有被扣『壞分子』帽子的工農右派 340 萬人！（『工農右派不戴右派分子帽子』，這是當年毛的最高指示，請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79 年，中共中央依據胡耀邦主張給『右派』改正，法院對工農右派即『壞分子』也就按改正『右派』精神予以改正，並由民政部『做善後工作』云云。）

兩者相加大致符合張英文章的標題：『實際錯劃右派 800 萬人』。

研究實際錯劃右派 800 萬，遠遠超過所謂 55 萬的陳說。這個結論有什麼意義呢？當然有！

首先，可以據此推算右派分子接近準確的死亡率。最先人們所說的 55 萬是胡耀邦主持下『改正』的數字；這個數字大體代表了幸存下來的右派人數。為什麼說『大體』呢？因為有個別被『改正』者本人早已死亡，是由其直系親屬代為申訴而獲得改正的。筆者本人就是在上訪期間，在中央統戰部接待室外面排長隊時，認識了一位中年女性（因為她聽我回答工作人員詢問時知道我也是來自長春的，就攀談起來。她就是東北師大著名右派徐乃祚教授的女公子）從她口中得知徐教授早已亡故。

現在，排除個別情況，姑且以 55 萬幸存者來計算：如果右派總人數是 3,178,470 的話，則死亡率是 82.65%（幸存者為 17.35%）。如果實際右派人數為 800 萬的話，死亡率就應該是 93.13%（幸存者為 6.87%）兩者相差 10 個百分點以上。實際情

況如何呢？在這裡舉兩個比較典型的例證：

根據 2005 年 4 月 28 日的《文學報》，頭版文章《翻開一頁塵封四十年的歷史》的報道：兩位作家所采寫，集中於甘肅省夾邊溝一個勞改單位勞改的 3,000 多名『右派』，饑餓、被虐致死者超過 80%。後來又有楊惠顯先生的《夾邊溝記事》問世，該書所揭露的情況也進一步證實了這種慘狀。在很短的幾年里，死亡率就已超過 80%。再經過漫長的 20 多年勞累、饑餓、批鬥、折磨，死亡率超過 90% 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惡果了。

另一個例子是新華社資深記者戴煌根據親身經歷寫成、於 1999 年出版的《九死一生》第 25 章的記載，在遼寧省錦西煤礦勞動的 1,200 多名右派分子中，直到作者本人「死裏逃生」離開時，已經死了 1,001 人。其死亡率也接近 90%【注】。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補課』，爲了完成上級佈置的「補劃」任務，基層黨組織領導人絞盡腦汁、冥思苦想，『發明』了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手段，並因而產生了奇奇怪怪、荒謬絕倫的右派新品種。如果說：以前的右派都是輕信毛澤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許諾，熱情幫助執政黨整風、大膽鳴放的積極分子（當然，這些人到了毛澤東們的嘴里和筆下都成爲『赤膊上陣』、『猖狂進攻』的壞蛋、惡魔），那麼後來補劃的，大都是老謀深算、老成持重，對老毛的話持半信半疑的態度，謹言慎行，明哲保身者。因此，在『補課』時，很難再發現誰有什麼明顯的『罪行』。這說明什麼？說明這種人『隱藏』得很深。怎麼辦呢？當然就需要「深挖」！

如何『深挖』？於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最常見的是：號召大家向黨交心。當然所交的都應該是『黑心』，而不允許自我美化、表功。下一步則是運用高倍顯微鏡，從交心材料里尋尋

覓覓，終於找出了符合要求的『罪證』。此外，還有的人在看法字報時，心有同感，情不自禁地稍微點頭，被人發現舉報，於是便有了『點頭右派』。也有的人在看法字報時，不以為然，稍微搖了一下頭，被人發現舉報，於是就有了『搖頭右派』。還有一種更為稀奇的情況是：上面下達一個『補劃』的指標，於是大家圍坐討論：應該補劃誰？眾人面面相覷，三緘其口。其中某位因為內急，不得不上廁所。好了！大家一致通過：就是他！等這位朋友從廁所裏出來，回到座位上。組長宣佈：大家一致通過：補劃你為右派。於是就有了『撒尿右派』。

值得注意的是：『撒尿右派』並非個別現象。在本文初稿徵求意見的過程中，就收到武宜三先生的反饋。武先生在其所掌握的海量信息中，篩選出兩則：其一是吉林大學物理系的劉家政（女，1935年生），另一位是山東省益都縣城民辦中學物理教師楊文祥（1930~2007年）。前者是因為『撒尿』，後者則是因為『拉肚子』。都是在上廁所時，被一致推舉為『右派』的。

還有的情況是：奉命押送若干名右派前往某地交差，但途中跑掉一個，於是這位押送人便被填補這個空缺，這就有了『充數右派』。更令人拍案驚奇的是：竟然有一位12歲的右派，因為年紀小，改稱『右童分子』。瞧，又一個新品種。還有的情況是：實在找不出什麼『罪證』，於是搜查日記，從中摘取只言片語，無限上綱。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如果說以前所劃的右派，大多數都屬於『錯案』（即當事人確實存在某些言論或行為，但領導人誇大其辭、無限上綱，做出了錯誤的結論）。那麼「補劃」的右派中，更多的則屬於『冤案』、『假案』（即根本就是無中生有，或者虛構的『罪狀』）。這些右派新品種真是五花八門，說明基層組織大有創造精神和聰

明的頭腦。

這些『往事』的價值在於：留給未來的作家們十分豐富、萬分精彩、無限生動的原始資料，足以寫成大部頭的中國文網史、中國羅織大全等巨著。實在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的極佳素材。

反右派運動過去了一個甲子，親歷其境的當事者也大多死亡或失聰、失憶。現在的中青年們很難知道當年那場政治狂飆的真相，更難以了解其細微末節。在這樣的情況下，反右運動勢必成為說不清、道不明的謎團。再加以當局刻意隱瞞許多關鍵性資料，歷史似乎真正成為一個大大的黑洞。

如果再隱瞞若干時日，所有的知情人統統死光了。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歷史必將被人為地『虛無』了。這豈不是天大的遺憾？又如何對得起那些含冤而逝的亡靈？如何向我們的子孫做交代？因此，乘我們這些健在者還走得動、寫得出時，抓緊行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力求有所作為，把歷史的碎片盡量保存下來。交給未來，讓未來的人們去研究、去處理。我相信：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定會比我們這一代人更加聰明、更加理智；更有計謀、更有勇氣來完成一部不加掩飾的反右派運動全史。

筆者三生有幸，也曾榮獲『右派』桂冠；當然也曾經歷九死一生，兩次休克。所幸上蒼保佑，硬是從死神手里把我『奪』回來。我想：為什麼那些無辜的難友們一個個都含冤而逝，唯獨極少數能夠存活下來？估計在冥冥中有上蒼的好意安排：為了讓這段慘無人道的歷史真相被真實地留存下來，應該保留幾支筆，讓這些人寫！

本着這種歷史的責任感、使命感，凡是存活下來的人，都應該義無反顧地執行上蒼賦予的神聖使命：寫！

謹以此文與衆難友及其後人、子子孫孫們共勉！

【注】在本文寫作的過程中，又有友人賜告：據當年遼寧省《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顧雪雍親歷，在戴煌離開此煤礦不久，這200人還是陸續死光了；也就是說，錦西煤礦這1,200個勞改犯，是全部被餓死的。死亡率達到100%。顧雪雍就是在這1,200人快死光的1959年被補充去的勞動力。不言而喻的是：全中國絕對不止一個錦西煤礦。以此類推，全國右派的死亡率超過90%，決非虛言。

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是和人性不相容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頁

當年的『罪證』 今日的『文物』

——丁西之難幸存者的回憶

一位吉林大學校友送給我一個大信封。打開一看，令我驚訝不已。這件禮物馬上把我的思緒帶回到 60 年前那些暴風驟雨、驚心動魄的日子，那個徹底改變我人生道路和生命軌迹的年代，那段令我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的歲月。

1、被收藏了 60 年的文件

這是 1957 年 7 月 10 日由『東北人大』（吉林大學的前身）校刊編輯室所編印的文字稿。題目是《讓我們在階級鬥爭的風暴中受洗禮》。副標題為：范政同志向本校全體同學所做的報告。

「范政同志」何許人也？時任中共長春市委宣傳部部長。他受吉大團委書記張德中的邀請，向吉林大學兩千多名師生做反右派鬥爭的總結報告。當其時也，范部長在臺上口若懸河、談笑風生、妙語連珠。我在臺下却如坐針氈、無地自容，恨不得地下出現一條裂縫，讓我鑽進去才好。

爲什麼？不僅因爲我已被全校師生大會批判過多次，幾乎是鐵定的「極右分子」，過街老鼠。更爲難堪的是：這位范部長

在報告中多次提到我的名字。當然，不是表揚，而是嚴厲的批判。

在這份文件的第二部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如何向黨、向人民進攻的？』其中第六頁有如下文字：『還有一個胡顯中……』
『胡顯中著《縱論國是，兼評鳴放》一文，並有舊體詞大字報數張問世。還替胡風大喊冤。』在該文件的最後部分再次提到我的名字：『你們和胡顯中、李受恒作過戰，這很好。』、『李守恒、胡顯中……你們也應該總結一下，接受些教訓。記住：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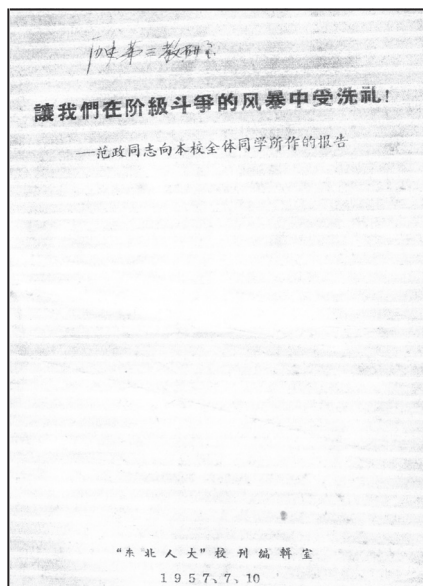
瞧！在這份洋洋灑灑數萬言的報告中，好幾次提到我的名字，而且是作為反面人物來批判，同時也作為「敵人」來規勸。

那個時候，我已人格貶值、名譽掃地，成為「國人皆欲殺」的「階級敵人」。我所能做的只是『舊帽遮顏過鬧市』、『躲進宿舍成一統』。

當年每個人都讀到過這份報告。我清楚地記得：曾細心保留着。但在 20 多年的勞改生涯中，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命懸一綫，小命幾乎不保，哪還有心思管這些身外之物呢？

王教授送的這份文件封面上寫着『歷史第三教研室』。恰好是這位有心人收藏了它。讓我們今天看到了一件『出土文物』，真是稀世之寶啊。

在聽完這個報告之後不久，我被帶進長春市公安局『談話』。



這一談，就是 20 多年，再也没回來。直到 20 多年以後回到學校時，已是作為『改正右派』的身份。

那麼，當年在臺上侃侃而談的那位范政部長的後來的命運又如何呢？

2、左派變右派

且說當年那位范部長，少年時代就顯露出衆的才華，享有『神童』美譽。其父是老革命家、曾任北平地下黨市委書記的李常青。在 1938 年『武漢保衛戰』的誓師大會上，在著名人士郭沫若講話之後，范政作為少年學生的代表登臺演講，一時掌聲雷動。小小年紀就已『小荷才露尖尖角』。他雖然沒有上過大學，但堅持自學，終於成才。尤其擅長寫作，成為多面手。理論著作和文藝作品都碩果累累。其中最負盛名的是劇本《吉鴻昌》，演出後轟動一時。說他「才華橫溢」，毫不過分。

再者，他青年時代就投身革命，31 歲就擔任市委宣傳部長這個要職。可以說是少年得志，前程似錦。在他的面前展現的無疑是一條飛黃騰達、直上青雲的金光大道。

令人萬萬想不到的是：風雲突變，反右風暴席卷神州大地。多少才華絕代的知識分子一個個落馬，被掃進『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里。「范政同志」也未能例外。

頗有戲劇性的是：就在他做完這個報告後不久，他那居高臨下、志得意滿的快意，那經久不息的、熱烈的掌聲等等，還沒有來得及仔細品味和充分享受。隨着反右鬥爭繼續深入，他這個地地道道的革命派，一夜之間忽然也變成了「可惡的右派分子」。偉人說過：團結 95% 的積極力量，打擊 5% 的敵對勢力。這位「范

政同志」一下子就從 95% 滑進入 5% 的行列。比變戲法還要快，真是令人大感意外。也說明天意難測啊！

更令人唏噓不已的是，這位老革命竟然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據說：罪魁禍首竟然又是那個『四人幫』。

我還清楚地記得好幾位類似范政的人，他們都是當年反右派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響當當的左派。例如侯放先生，時任馬列教研室講師，被校領導指派親臨大批判會場以加強對我批判的火力。在我被捕不久，竟然也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勞動改造多年。在落實政策後，我們還見過面，彼此握手一笑而已。上世紀末，突發腦溢血而亡。他最後的職稱是副教授。還有一位李學斌，曾經在《長春日報》上發表關於批判我的長篇報道，一時風光無限。後來也被打成右派，又因為想不開，竟然在大連蹈海自殺身亡。如果說：我的被劃為右派，屬於冤案，那麼這些響當當的左派人物，竟然也被劃為右派，豈不是更大的冤枉？走筆至此，忽然想起老革命家李銳先生的詩句：『水暖先知猶遭劫，只因佛法大無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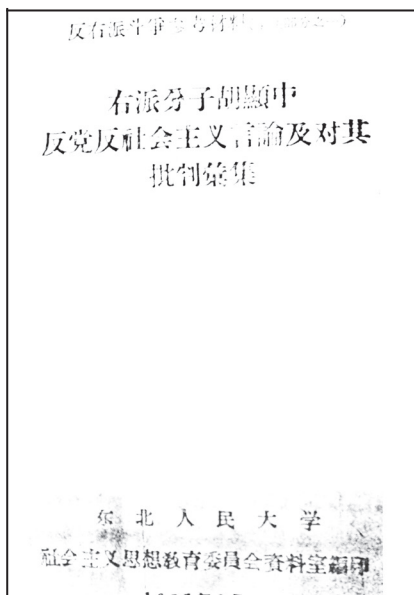
3、當年的「罪證」，今天的「文物」

最後還應該『交代』一點：當年范部長講話中所提及我的兩項「罪行」：其一是寫了《縱論國是，兼評鳴放》一文；其二是「替胡風大喊冤」。有位朋友私下里問我：你還保留有這兩篇文章的原件嗎？答曰：人都被折磨的骨瘦如柴，弱不禁風，哪里還有精力保存那些東西？早沒了。朋友連連嘆息：可惜，可惜呀。我又說：不過我手頭還有一份復印件。朋友緊追不舍地盤問：哪里搞來的？我回答：不是「搞來的」，而是官方「賞賜」給我的。

事情原委如下：1980 年落實政策時，按照政策規定，應該當着本人之面，銷毀全部右派檔案。此時，我忽然提出一個要求：可否發還我自己保存？經「55 辦」（全稱應該是「落實政策辦公室」，因為這個政策出臺的文件被編號為 55 號文件，故簡稱「55 辦」）幾位幹部研究後，認為如此辦理，也無不可。於是就把檔案里的全部「罪證」都發還我本人保存。

我還清楚地記得當年那一幕：那位李老師（Lifzh）親手把全部『罪證』發還給我時，陪我走出辦公室。在走廊的盡頭，他對着我的耳朵用非常微弱的聲音說：『好好保存它吧！今天看來，你那些意見都是正確的。只是說得太早了，早 20 年。』在被迫害的漫長歲月里，在被折磨得萬念俱灰的時候，在各種刑罰加身、如萬箭穿心之時，我沒有掉過一滴眼淚。但聽到這位李老師的話時，實在禁不住熱淚盈眶，立刻伸手握住對方的手，緊緊地相握，還用力地抖了好幾抖。

那個時候，政治氣候還是『乍暖還寒』、『最難將息』。說這樣的話，要承擔相當大的政治風險。但按照一個法律學者的良知，又不能不對我說。所以他只得用耳語說、悄悄地說。（當時“55 辦公室”有 3 位工作人員：只有這位 Lifzhi 老師是法律系的講師，因而具備法律學有關知識和法治觀念。）



三、縱論國是，兼評“鳴放”

胡昱中、金家鄧

一、歌功頌德和“反現狀”

我們是青年人，和過去的青年人不同，生活在幸福的時代。有了共產黨、有了革命的老前輩和勤勞的勞動人民，才有了今天美好的生活。過去很多小說家、詩人、音樂家、畫家、通過各種不同形式歌頌過今天的美好的生活，歌頌了黨的偉大，歌頌了勞動人民的勞動，這些都是合乎人情的。過去不是歌頌太多，而是歌頌的不夠。雖然開國以來出現了很多文藝作品，但這些作品很大一部分受了庸俗社會學影響，犯了嚴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不能動人的、深刻的反映現實生活中的美好的東西。所以我們的作家、藝術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們應該花費更多的精力去創造出無愧於我們時代的深刻而動人的作品來歌頌今天的幸福生活。這是我們的作家和藝術家們應盡的義務，也是我們對他們的希望。

但是，生活好似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有合理的東西，也會有不合理的東西；有好的地方，一定會有它的陰暗面；我們生活中有歌頌和歌頌，也有逃避和歪曲。把生活描繪成只是鮮花和“万壽”是不符合現實的，是有意迴避現實。只會歌頌，不會批判；只會說“好”，不會說“壞”。而且只允許別人說好，不允許說壞，這影片有意迴避現實的表現。遺憾的是竟在過去嚴禁這樣做是對的。生活，在那些人的意識中就成為了完美無缺的東西了。他們根本沒有思考到生活中發生的一切，即使看到了缺點，也沒有去積極的干預它。造成這些社會風

一、胡風等人是反革命嗎？

胡昱中

目前全國“鳴放”高潮中大家似乎有一個默契：都避而不談胡風問題。對二年前我國政治生活中如此重大事件，輿論界表示了如此的冷淡與漠視，可驚亦可嘆！（注一）

我認為胡風問題必須在報紙上公開討論，如有其他重要材料亦應公布。胡風問題所以有必要在全國範圍內公開討論，首先是因為當時把他們當作反革命來審，是在全國範圍內公開進行的。當今“大鳴大放”之際，黨又提出“有錯必糾”的政策，本該在政治上按照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和社會主義法學的原則，還他們一個本來面目。在藝術上按照馬克思主義美學原理，對他們文藝觀點做出公正評價。其次，進行公開討論所以必要還有更為重大意義，因為當時把他們當作反革命來審，部分地是根據他們的言論、觀點。方今黨提出在政治上廣開言路，藝術上百花齊放之時，為消除顧慮，有必要澄清這個問題。因為“前車之鑒，後事之鑒”，“明哲保身”呈奉旧的处世哲學，但由於階級社會中政治風雲，人物沉浮幾經反復，在人們思想中必然有驚戒心。

我認為：根據已經公布的材料看來，胡風等人不是反革命集團，他們是這樣一個文學上的流派：在藝術觀點上有錯誤成分，在文學活動中有日益嚴重的宗派活動。但是他們的文藝思想並非完全反動，特別是他們活動性質並非反革命性質。為了集中論戰後一個命題，對前一問題我們暫時置而不論，或者假設他全部是反動的。（注二）

我認為清或反革命罪，必其是依舊D權霸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為目的。①有了實現這一目的進行了或準備進

又過了若干年，我再復印一份寄贈給中國革命博物館保存。為了表彰此舉，中國革命博物館特地寄來『捐贈文物證書』。

其實，這份文件並不是原件。原件發表於《東北人大》校刊，早已灰飛烟滅了。這是當年由『大辯論』轉向『大批判』時，校黨委為了推動運動，把我的全部『罪行』編印成冊，作為『活靶子』，發給每一個師生。他們未曾料到：事情走向反面：却成為足以證明反右派運動不合理、不合法的鐵證。

我忽然冥想：如果范政先生能夠活到今天，會

捐贈文物证书

胡昱中 同志

承惠贈“反右派斗争参战材料”一份。

为表彰您热爱祖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积极支持我馆工作的崇高精神，特发此证。



如何看待這一切呢？他本人不在了，但可以找出一個相似的人來作為參照。幾年前，友人 jin 先生曾經邀請我和另一位吉大校友在一起餐叙（當然還有另外幾位作陪）。席間東道主忽然問這位當年參與領導吉林大學反右鬥爭的風雲人物：今天如何看待當年那些事情？他回答得十分坦率：

『我如果不劃他右派，我自己就會成為右派』。

妙哉此言！妙就妙在：1、實話實說；2、如實地說出了那個年代政治生活的必然邏輯：你不整人，就必然被別人整。為了證實這個「必然邏輯」，還可以舉出老革命家楊獻珍的個人經歷為例。這位老革命家當時的職務是中央黨校校長。他在主持的黨校反右運動的初期，竟然沒有抓出一個右派分子。最高層領導人不得不御駕親征：劉少奇和鄧小平親自來到黨校，找楊獻珍談話。鄧小平在談話中厲聲斥責他說：我看你就像個右派！（引自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第 30 頁）

當時全社會只能有兩種人：整人的和被整的。誰也不可能置身事外。這就是當年政治生態下的社會環境！

【發表於《明報》月刊 2017 年 10 月號】

【附錄】

沉痛的悼念 深切的緬懷

——追思李健、張自旗二位南昌地下黨領導人

2015年9月30日，南昌地下黨城工部總負責人李健以90高齡在福州去世。相隔僅一個月，11月1日，地下黨城工部領導成員張自旗在江西萍鄉去世，享年88歲。筆者曾經在他們二位的領導下，經歷了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環境，終於迎來了『解放』。翻檢舊照片，無限感慨。深感有必要把二位的事迹如實寫出來，留存後世。

1、李健平生做了兩件大事

上個世紀40年代，爲了響應中共中央『開辟第二戰綫』的號召，在福建省委的委派下，在福建省委委員、贛南特派員黃衣禹的具體指導下，李健從福州啓程，赤手空拳來到江西。他的使命就是創建江西省的地下黨組織（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重建」，因爲原來江西省就是全國最早的蘇區。但由於蔣介石的五次圍剿，幾乎掃蕩殆盡。到了40年代末，已經沒有中共的組織了）。經過李建一年多時間的鬥智鬥勇、艱苦拼搏，除了在江西省部分農村發展了一些黨員以外，更爲重要的是在江西省省會南昌建立

了『閩浙贛邊區南昌市城工部』。成員人數將近 600 人。大部分是大中專院校的學生，還有部分中學生，和部分社會上的自由職業者。這些人的共同特點就是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倒行逆施嚴重不滿，積極探索中國的出路，希望中國成為真正民主、自由的共和國。李建的作用就是把這些人發動起來，並進一步組織起來，成為黨的骨干隊伍和預備幹部。在發展組織的同時，還為中共湘贛邊區工作委員會機關據點羊嶺山送去黃金 40 餘兩、銀元 300 多塊、短槍 20 多支以及許多生活用品、進步書刊等等。這件事可以說是『有功於黨』。

第二件大事：大智大勇，保護了這些同志

風雲突變，就在革命形勢大好的情況下，福建省委內部却發生了一起所謂的『叛徒』案。事情原委如下：

黨的地下組織任務之一便是籌集經費以支援游擊戰爭。當時的福建省委城工部認為『變敵人的資財為革命的資財乃是城市游擊戰爭的特殊形式』。早在 1947 年 7 月，國民黨福建海關查扣了一批布匹和棉紗，總價值大約相當於黃金 200 兩。城工部通過海關的內綫關係，里應外合冒領出來。這件事被稱為『布變』。其中一部分布匹臨時存放在城工部副部長孟起家里。孟起家的女傭人無意間將消息泄露出去。孟起以刑事犯的罪名被逮捕，家也被抄。敵人在孟起家中發現了黨的文件，因而發現了其真實身份，孟起後來在南京雨花臺就義。

孟起被捕後，省委城工部部長莊徵曾經提出三條營救方案，其一是『假自首』。由此引起上級組織的懷疑，立即調莊徵上山審查。在審查過程中沒有實事求是地認真核實，而是依靠刑訊逼供，認定莊徵出賣了孟起，定為內奸，並於 1947 年 9 月末處死，這可以說是福建城工部冤案的遠因。

1948年初，又發生了阮英平失蹤案。閩浙贛省委常委、軍事部長阮英平帶領一名警衛員化裝成商人，從寧德往福州。在中途遇到國民黨保安團的巡邏隊，二人失散。阮英平自己隱蔽到洋中鄉大窩村村民范起洪家。范的鄰居周玉庫見阮英平的襪襠里有金銀首飾，就唆使范起洪聯手謀財害命。他們哄騙阮英平說：『國民黨兵來了，快隨我們上山躲避。』在山上，他們乘阮英平不注意，將其殺害，這是解放後調查所得的事情真相。但當時的情況是，警衛員陳書琴尋找三天沒有找到首長，便回到福州，向負責交通聯絡的蘇華和城工部部長李鐵報告。李鐵給他路費命令他回到出事地再找。陳書琴在途中遇到叛徒，被拘禁在旅店。當晚逃脫，回去再找李，李派一位熟悉寧德的同志再次尋找。同時，閩東地委派出游擊隊發動老鄉四處尋找均無果而終。

阮英平是閩東紅軍領導人之一，改編為新四軍以後擔任旅政委，1947年被華東局派回福建領導軍事鬥爭。他的失蹤使省委領導感到震驚和懷疑。陳書琴為什麼丟下首長單獨回到福建又說不清首長失蹤的原因和經過？陳書琴被拘禁在旅店，竟然能够逃脫？為什麼幾次去找李鐵？而派陳書琴給阮英平當警衛員的正是這個李鐵，李鐵當時已經調任省委宣傳部長，為什麼還要關心並且直接處理這件事情？許多的疑點集中在一起，再聯系到前面所介紹的『莊徵事件』，就認為陳書琴和李鐵都是壞人。省委書記曾鏡冰輕率地決定成立審查城工部的委員會，並且立即逮捕李鐵及在省委機關工作的城工部幹部。在審查工作中，大搞逼供信，錯誤地認定城工部已經是被敵人控制的『紅旗組織』。尤其嚴重的是，省委輕信了在刑訊逼供之下得到的所謂『五一節』前後殺害各地委領導幹部的假口供，要求各地在五一節以前緊急處理（即殺害）城工部的骨幹。在未經請示黨中央和華東局的情況下，

李鐵及城工部的幹部共計 127 人，一律被當作『叛徒』、『特務』處死，由此鑄成了千古奇冤。

事情到此並未結束。案件進一步牽連到江西省的地下黨組織。因為 1947~1948 年福建省委奉中央的命令向江西發展組織。江西的地下黨組織就是在福建省委指示和領導下發展起來的；黃衣禹的贛南特派員身份也是由福建省委任命的。

在這危急關頭，黃衣禹表現了一個老革命家的成熟和機敏，他經過深思熟慮以後，作出了一個大膽而穩妥的決定：沒有把江西地下黨的同志調上山，而是切斷與江西地下黨組織的一切聯繫，讓他們獨立作戰，『在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來證明自己。』

但是，極左勢力仍然沒有放過李建和南昌市城工部的地下黨員。1949 年 4 月中旬的某一天，湘贛邊工委派交通員陳國琛突然來到南昌找到李建，交給他一封信。內容是準備成立『軍政委員會』，請李建上山。並且要求攜帶黃金 50 兩。據李建的回憶：

『我考慮了一星期，感到其中疑點很多。奉命切斷聯繫將近一年，沒有區黨委老黃的親筆信和指示；對於福建所發生的事件沒有傳達和說明。這個『軍政委員會』起什麼作用、負什麼任務？請我上山的目的是什麼？我不明白……再者 按照秘密工作方式，交通員應該去聯絡點聯繫，約定時間、地點才能會見；把一個地區負責人的姓名、地址交給交通員，這是很不尋常的做法。還有：我們是地下黨，不是執政黨，活動經費是從群眾中一點一滴募集而來的，提出要黃金 50 兩，數目巨大令人吃驚。我上山後，南昌市城工部許多地下黨員的組織關係交給誰？事先都沒有研究、安排……愈想愈難以理解，於是警惕起來。我打發交通員回去，臨時捐募了 3 兩黃金給他帶回……後來才知道：所謂成立「軍政委員會」根本沒有這回事，只是爲了誘騙我上山加害而已。由於

自己的警惕性，幸免於難，南昌地下黨組織也得以保存並整體投入戰鬥，保護地方，配合解放。（參見《中共南昌市城工部紀念文集》（1999年出版）第21頁；《江西黨史通訊》1987年第七期所載李健：《進入江西》一文）。

李健不是憑空猜想，而是有根據的。就在福建省委城工部錯案發生後，江西地下黨派往山上送槍支、黃金、銀元等等重要物資的5位幹部均被殺害（魏品團、陳振阜、楊尊文、吳志福、吳植佛）就是證明。俗話說：『官不打送禮的』。這幾位同志冒着極大風險，把當時急需的武器、黃金等等重要物資送上山來，理應熱情萬分感謝。相反，却予以殺害。看起來，那些人簡直是嗜殺成性，殺紅了眼。完全可以斷言：如果李健輕率上山，必死無疑。如果他們胃口再大一點，還可以要求李健把南昌城工部的骨幹人員，甚至全部成員一律召集上山，然後一起殺害。那必將再次上演一年前那場127人被害的慘劇。因此，李健憑着自己多年地下工作經驗和智慧，果斷決策，幸免於害。同時也避免我們城工部的所有成員被害的慘劇，讓我們僥倖存活下來。所以說：南昌城工部是那場冤案中唯一幸存下來的一支隊伍。萬幸，萬幸啊！

李健保護了自己，同時也保護了這支親自創建的革命隊伍。可以說是『積德於民』。

這兩件大事，乃是李健人生的兩大亮點。可惜的是：1949年以後，他的聰明才智，他的一腔熱血統統被『速凍』起來，因而乏善可陳。

據同一個黨小組的羅時烽說，李健被安排在江西省郵電局當一名科長，我頓時驚訝不已。並據理反駁他：你是不是聽錯了？李健可是南昌地下黨的總負責人呀！怎麼會呢？不可能！

這個疑團直到幾十年後才揭曉：直到 21 世紀初，才知道真相：原來上面有個『16 字方針』其中第一句就是『降級安排』。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也被降為組織部長。何足怪哉？

『降級安排』降幾級？降一級，還是降若干級？各個地方大有操作的空間，可以任意操作嘛！

但李健自己心里如何想的？我們下面的人無法猜測，也無需猜測。好在他幾十年來，他一直謹言慎行，才得以平安地躲過了所有的政治運動，得以壽終正寢。這又是值得慶幸的了。

2、張自旗在鳴放中『一言不發』也被打成右派

張自旗是李健所培養、發展的地下黨員。由於工作出色而被安排為南昌城工部核心組織——學生工作委員會的宣傳委員，負責領導全市的中學學生運動。此乃他在南昌地下黨里的最高職務。

在此期間，他的公開身份是當地《中國新報》國際新聞版的編輯。時年 20 歲，是報社裏最年輕的編輯，也是最出色的編輯。

和今天不同的是：那個年代，可以私人辦報。在南昌市的衆多報紙中，《中國新報》網羅了一批思想比較活躍、資歷比較深厚、文筆比較優秀的報人，因而在當地發行量最大，讀者面最廣，長期享有『江西大公報』的美譽。該報副刊《文林》的編輯是洛丁，張自旗與其私交甚篤。在洛丁因事告假期間，由張自旗代理一段時間。張自旗就利用這個機會，結識了一些中學生作者。並從中篩選幾個值得培養、提高的對象。經過一段時間的培養，決定發展四人為中共地下黨員：

鍾純民（心遠中學）羅時烽（南昌一中）熊國模（南昌二中）

胡顯中（心遠中學）。

1949年3月27日，李健突然來到報社找張（這種情況實在罕見。地下工作的規矩應該是：約定下次見面的時間、地點，沒有特殊情況不可親臨此人住所或工作單位找他），張自旗預感到有突發情況。果然，不出所料。李健告知：根據情報，你已被國民黨特務重點關注，必須馬上離開南昌。張當即要求上山打游擊去。幸虧李健行事穩重、考慮周全。否定了張的要求，決定讓他去自己的家鄉——萍鄉。那里有一個『中共萍鄉特別支部，擁有一支武裝隊伍。幾十年後再回首，對李健這種安排心存感激，幸虧沒有讓他上山，否則又多了一個冤魂。

張自旗離開南昌之前，也曾經突然光臨我家（以前從來沒有這種會面方式），只說了一句話：『我有新任務，以後會有人來聯系你，聽他的指示。』當即匆匆而去。幾個月後，有一位中正大學（現改為南昌大學）化學系的袁孝鵠來到心遠中學找我，他就是我的新領導人。

『解放』後，張仍然從事自己的老本行：辦報。不過此報非彼報也。那個年代（包括所有民主國家都是如此）報紙就是報道新聞的，與今天的報紙大相徑庭。張自旗只能在心中暗暗自嘲道：我是在辦『沒有新聞的新聞紙』。

張自旗雖然明知這種工作的無聊，但爲了保平安，也不得不因循照辦。

1957年，領袖搞了一個『陽謀』。許多見多識廣、老謀深算的政治人物都不免深陷其中。

張自旗却心中有數，下決心『一言不發』。他以爲如此這般，就可以平安過關吧？

錯了！

沒有言論，那就從你的行為、你的工作中尋覓，發現問題。

在某個周六萍鄉礦黨委副書記高陵（女）召集張自旗與張漢輝二人來到辦公室談話。要求把已經排好版的報紙版面全部撤掉，重新排版，要求馬上另排大鳴大放的稿件。張自旗表示不同意見：『煤炭部已發文件通知基層報紙不搞大鳴大放』。高陵不聽，堅持要求按照省委指示，搞大鳴大放。二張不得已，只好奉命行事，勒令排字房連夜加班，拆毀原來的版面，重新編排大鳴大放的稿件。

星期一，正在準備開印時，高陵駕到。又下達新的指示：不搞大鳴大放了，還是照舊辦理。出爾反爾，輕輕鬆松一句話，讓這些人從事無效勞動一晝夜。

浪費時間、精力都是小事。嚴重的是：經過這麼一折騰，張自旗的罪狀不就出來了嗎？『搞大鳴大放，意圖向黨進攻』。如果遇到一位敢於擔當的領導人，就應該挺身而出，承擔責任。但高陵沒有這樣的「膽」，更沒有這樣的「德」。她連一句公道話也不說！

從此，張自旗陷入右派泥潭！自 1958 年 2 月開始了長達 20 多年的勞動教養生涯。從每月 105 元工資降為 16 元生活費。妻子被迫離婚，後來抑鬱而死。兩個幼小的女兒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

20 多年來，他在安福縣養過小兔，采過煤炭，挖過鐵礦，修過公路。還燒過木炭，種過水稻，做過磚瓦，還被派往鄱陽湖修過水堤，還曾經往返 20 里地從山上搬運木材到廠部，幾乎因勞累過度而倒在荒山野嶺。他自己的體重才 80 斤，可他必須挑起 70 斤重的木炭，不是走平坦大道，而是從山上一步一步走下來！山路崎嶇，一步不慎，必將滾下山來，跌個粉身碎骨！

更為可怕的是：山中經常有猛獸出沒。他還親自目睹一名同伴（女教養分子陳來娣，因為丈夫性無能，發生婚外情）被老虎吞噬。因而成天膽戰心驚。說不定哪一天、哪一隻老虎來襲，也會把他當成豐美的晚餐。

他所受的苦難、屈辱，真是一言難盡！（以上內容見張自旗著《撥動記憶的琴弦》2011年11月出版）

除了張自旗本人，包括被他介紹入黨的四名中學生，也都在不同的單位，不同的地方被劃入右派名冊。還有：經常向《中國新報》副刊投稿並被採用，因而和他多有來往的心遠中學學生胡康新，也未能幸免。經胡康新的牽綫，中國民主同盟南昌市地下組織負責人、心遠中學國文教師廖伯坦一度與張自旗見面聯絡，達成共識。廖老師也被無情地加冠『右派』。借用羅時烽生前的話來說，就是『全軍覆沒』。

* * * * *

李健、張自旗：二位先走一步，我這個不爭氣的部下隨後就到。不過在此之前，只要一息尚存，就感到自己有責任、有義務，把二位平生事迹，二位的理想與追求、貢獻與業績，以及坎坷與委屈、苦難與訴求等等，如實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流傳後世，訴諸歷史。是非功罪，自有公斷。

【發表於境外的網刊《周末文刊》】

早年的引路人張自旗兄 千古

自幼受啓蒙如沐春風亦師亦友；
痛失師友，唯向冥冥蒼天一哭；
旗幟今安在歧路彷徨且悲且憂；
求解悲憂，獨立茫茫大地三思。

您的學生和難友胡顯中敬挽

八十自壽

古稀才度又耄耋^①，八十光陰如夢蝶^②；

所幸眼明心更亮，手握朱筆未停歇。

①人生七十曰「古稀」；八十—九十謂之耄耋。

②套用馬致遠曲『百歲光陰一夢蝶』；

又借用《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蝴蝶……俄然覺』。

桑榆晚景 為霞滿天

——《中國老年報》第二屆《人生第二春》徵文

一介寒士，六旬初度。奉命離職，歸去來兮！是為「人生第二春」之始也。從此，擺脫公務之纏身，更無案牘之勞神；有超然物外之喜，與世無爭之樂。一切人事恩怨，置諸腦後、束之高閣；所有是非功過，留待後人、任其評說。

既有斗室，足以容身；更無雜念，修心養性。坐擁書城，以書為伴，以書為友，得其所哉！吟誦詩詞之雅趣，閱讀佳作之妙諦，每有所悟，常沾沾自喜，或拍案叫絕、掩卷三嘆！或擊節贊賞、反復吟誦。捧讀經典：孔曰愛民富民，孟曰民貴君輕，俱是可圈可點之筆，不刊不朽之論。若夫管、商、荀、韓，諸位哲人，宏論迭出，高見紛陳，足以令人新耳目、廣見識、啟心智、開七竅。

若有所感悟，即發而為文。筆鋒所向，貪官污吏，坑蒙拐騙，或朝堂之失，政策之偏，俱是批評對象、抨擊目標。或有客問：如此勤奮，孜孜矻矻，所為何來？則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黍離》）雖身居草野，當心懷天下。古人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社會之治亂、民族之盛衰，無不關乎我輩切身利益，豈忍袖手旁觀？責任感所驅，使命感所遣，責無旁貸、義不容辭耳。

常以書會友，俱是無職無權、飽學多識之士。切磋學問、縱論古今，抨擊時弊、臧否人物，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慷慨激昂，或細聲慢語。每入佳境，常開懷大笑，或會心相覷。盡興而歸，終日回味，興致盎然，何其快哉！

新世紀以來，爲了與時俱進、適應新潮流，掌握新科技，分享海量信息，乃不顧年邁，毅然學習電腦技術。歷盡艱難，幾多辛苦，終有所成。每當電腦啓動，顯示屏前，靈感天降，文思泉涌；思之所至，手即應之，此乃「得心應手」之謂也。每遇疑難，或需資料，點擊「百度」，瞬刻之間，海量信息歷歷在目，任我選取、閱讀、下載、引用。文章既成，網絡投稿，雖萬里之遙，瞬間可達。方便快捷，令人驚嘆。科技發達，豈虛言哉！

若再申請 qq 號，安裝攝像頭，更可與遠方親友對話談心、交流思想，探討問題，問候健康；天涯海角之友，頓時出現，音容笑貌俱在眼前。唐代才子王勃詩曰：『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此乃古人之主觀體驗、虛擬情境而已，於今則爲客觀現實矣。每當與親友在綫交流、對話，欣欣然喜不自勝，美滋滋何其樂也！

最後還有一項活動：旅游。最近一次是今年春節期間，在女兒、女婿的安排和陪伴下，從新加坡乘游輪經馬來西亞之檳城，到泰國之普吉島。異國的山水風光，令人流連忘返；他鄉的人文景觀，無不嘖嘖稱奇。此番旅游經歷，既陶冶情操，更開闊視野。歸來以後，清理照片，繼而評論得失、比較優劣，不亦樂乎？

讀書兼寫作，足以修身養性、調適身心。會友並旅游，更可擴展眼界、胸懷天下。子女孝順，盡享天倫之樂，其樂融融，其心怡怡。如此豐富多彩的晚年生活，恰如孔老聖人所云：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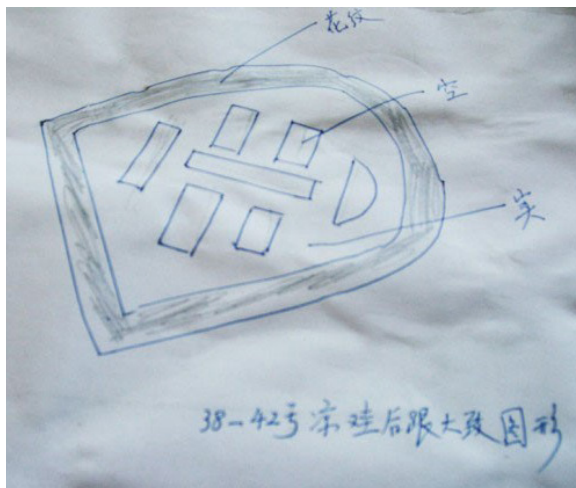
【發表於《中國老年報》2014 年 6 月 4 日】

親歷「文革」期間的 『涼鞋』事件

『文革』高潮中，在北國春城發生過一樁具有轟動效應的所謂『涼鞋』事件。長春市的紅衛兵造反派竟然在涼鞋鞋底的花紋上發現了一個『毛』字，這還了得？竟然把偉大領袖踩在腳底下，難道不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嗎？

一時間，階級鬥爭的弦突然繃緊。

80年代當我平反、分配工作後，在與同事們閒聊中得知：那個時候在全市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有紅衛兵小將把關，對過路行人進行檢查。發現穿這種鞋子的人，先行批判、訓斥，勒令認錯；并把鞋脫



下來，光着脚走回家去，成為當時長春市區一道十分獨特的風景綫。

同事們得知我當時就在這種涼鞋的生產廠勞動時，自然好奇地打聽當時「里面」的情況。

生產這種涼鞋的不是普通廠家，而是位於長春北郊的『新生塑料廠』。中國人都明白：所謂『新生』二字，就是強迫勞改犯從事勞動的場所，對外美其名曰『新生某某廠』。這種廠家的優勢在於：幾乎不需要勞動力成本，因而整個成本比較低，甚至低得多。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 $C+V+M$ ，在價值總量不變的條件下， V 的絕對值很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計，那麼， M 即剩餘價值的量自然非常大。大批勞改犯用自己的無償勞動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剩餘價值，成為巨額財富，這是建國初期進行原始積累的一大泉源。

紅衛兵小將們發現：生產出這種涼鞋的竟然是一些「牛鬼蛇神」，更是氣急敗壞地認為：這種情況雄辯地說明『階級鬥爭新動向』、「階級敵人極度囂張」，竟然變着法兒污蔑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因而更加需要嚴抓狠打，需要「誓死保衛」。

首先被問罪的是，設計這種涼鞋模型的技術員紀德新（勞動教養解除後留場就業的）。每天晚上都要把他拉出去，到市中心的人民廣場進行批鬥，結果被鬥得鼻青臉腫。人們當時估計一定會槍斃。

其次，模型設計出來以後必須先交設計室制圖、描圖，然後才加工成品。而在設計室描圖、制圖者是名叫李曉亭的犯人，也被關進小號（就是禁閉室）反省、交代問題。

其他犯人呢？法不責衆。一律停產學習。

本人當時就是在這個車間勞動，不過是操作中小型號模型，即童鞋、坤鞋生產的，而出問題的都是大型號的涼鞋（38~42號）。大小型號模型的區別在於：大號鞋模型較重，需要體力較強的犯人操作，有時候人手較多時還爲之配備一個助手。而小號鞋模型較輕，通常只需要一個人操作，另一個人掐料供應。模型的輕與重是區別之一。但另外還有一點：既然是小型號模型，每個班次的生產定額就要高，甚至高得多。因此需要手脚不停地忙乎。同樣是累得很。每天8小時勞動下來，可以說是精疲力盡了。

涼鞋事件讓我們這些犯人獲得天賜良機，可以好好地休息，無不暗自慶幸。因此，大家見面都笑咪咪的，但不敢明言，只是「心照不宣」罷了。我們這些本來應該不斷地提供剩餘價值的犯人，却飽食終日，不勞而獲（雖然所獲不過是可憐的三餐伙食）。最賠本的應該是「上面」——勞改隊。

所謂「學習」就是讀報。一個人讀大家聽。讀報者是硬任務，而聽報者却無法考查。聽不聽在你，你可以天馬行空、神游天外，也可以閉目養神，甚至打瞌睡，但切不可打呼嚕。我記得曾經若干天盡是讀楊成武的《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佔《人民日報》兩個整版），後來突然不讓學這個，改學別的文章，原因是楊成武也被打倒了。這時我倒想仔細研究一下，那篇文章有些什麼地方是反對偉大領袖的，但報紙很快就被收繳上去，再看也看不到了。

停產好幾個月，天天學習也不是好辦法。上面就想出一個新招：組織大家排演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主持其事的是位張管教。他懂戲，還能拉二胡；還特別邀請京劇團的某

師傅來輔導。排練幾個月，到了春節，竟然在犯人中演出。與此同時，另一個車間——開關廠雖然沒停產，也抽出人力專門排戲，排什麼？《奇襲白虎團》。這個春節兩臺戲輪流上演，好不熱鬧。

接下來本來還計劃再排練《紅燈記》，據說都已經联系好了京劇團的另一位旦角前來專門輔導李鐵梅這個角色。

突然被叫停。

據說是當時的「軍管」下令叫停。理由是：牛鬼蛇神不能演革命現代戲，沒有資格。當時負責文藝方面的是一位賈幹事。他當着犯人們發牢騷說：牛鬼蛇神不能演革命現代戲，那讓他們演什麼？難道讓他們去演《西廂記》？話雖然這麼說，但也只能背地裏發發牢騷而已。那個時候，他也得看軍管代表的臉色行事，因為軍管是偉大領袖派來的，代表領袖意志，當然就代表真理。

好在涼鞋事件的熱度早已下降，人們漸漸淡忘了。於是恢復生產，那個技術員紀德新也沒槍斃，仍然搞他的模型設計。李曉亭也放出來，沒事了。當犯人們問起那件事情時，他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這個事情，提起來就是千斤，撂地下就只四兩。』好一個千斤與四兩的比喻。仔細想來，許多事情難道不都是如此嗎？什麼反革命？什麼右派反黨？就看你從哪個角度觀察了。從「保衛領袖」的角度來看，當然嚴重得很，該殺該關；可是從老百姓的角度看來，卻不值一提，小事一件而已。好！好一個「千斤、四兩」的比喻。

人們還可能會這樣思考：既然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精神原子彈，而且是永遠不落的紅太陽，那麼就應該成為全國人民的保護神，怎麼反過來還需要那麼多人去『誓

死捍衛』呢？甚至捍衛到領袖的腳後跟上，豈不是太滑稽了？

不過，即使有這樣想法的人，也只是想想而已，未必敢於公開說出來；即使公開說出來，此人也未必能夠活到今天，早已經被專政的鐵拳砸得粉身碎骨了。

這場鬧劇如何善後呢？就是把全部的成品從倉庫里取出來，每人一把小刀，用小刀把鞋底的花紋削去一大塊，怎麼看都看不出『毛』字了。還有就是所有居民只要持有那種涼鞋，一律可以舊換新。

停工、停產的損失誰來買單？天曉得。

遙想當年，那些威風凜凜、豪氣萬丈的紅衛兵小將們，今天都已長大成人，估計也該是六十歲上下了吧？不知道當年參與其事者還能否記得？如果還能記得，能否公開站出來說一說：撫今追昔，心中什麼滋味？還有，那個可憐的、倒霉的紀德新的身上、臉上，是否留下過閣下您那青春有力的拳腳的印記？

【發表於《南方周末》2013年10月31日】

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不可能復辟資本主義；要復辟就只能復辟封建主義，搞法西斯專政。

——胡耀邦

一個『右派』眼中的『文革』

【作者簡介：胡顯中，男，1932年生，江西南昌人。1948年在南昌心遠中學讀書期間加入中共地下組織——閩浙贛邊區南昌城工部，並於1949年初被任命為心遠中學黨小組長，發展黨員4人。1957年畢業於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的前身）經濟系。因在1957年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大鳴大放』中寫了《胡風等人是反革命嗎？》、《再論胡風問題》、《縱論國是，兼評鳴放》等文章，被認為是當時國內否定毛澤東發動的反胡風運動第一篇公開文章（後被校方收入《毒草匯編》，平反以後又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由此被打成『極右分子』。又因打算出國謀生而被以『反革命叛國罪』判處無期徒刑，後經上訴改判為有期徒刑10年。又由於不安於改造而逃跑兩次，被加刑三年。1970年9月，距離刑滿還有2個月，又因為『惡毒攻擊』而延期釋放。在超期關押5個月以後，『寬大釋放』但『戴反革命帽子』，留場就業……直到1980年，被吉林大學最後一個宣告『錯劃』、『改正』，稍後法院宣告平反。後在母校經濟系工作，1985年調入吉林省經濟學團體聯合會，主持創辦《經濟縱橫》雜誌，並任副主任，1992年評為編審（正高職稱），次年離休。】

前不久，我所寫的《細說文革史》，重評毛澤東乃是每個中

國人的必答題》在境外發表後，看到網上有人建議：作者本人何不率先說說自己在文革中的親歷、親聞？

這位讀者所言，很有道理。因此，寫成此篇。

幸災樂禍

文革來了！文革要打倒什麼人？當權派！許許多多的當權派當年正是『反右派』的領導者、急先鋒、骨幹力量、積極分子。當那些曾經權傾一時、呼風喚雨的大人物匍匐在地，低頭彎腰接受批鬥時，我這個曾經被他們批鬥過的『右派』，忽然感到一陣陣的快意！好呀！你們也會有今天！謝謝造反派，你們爲我們這些『右派分子』出了口惡氣！

我清楚地記得：報紙上點名批判周揚時，正是我最開心的時刻！做夢都在發笑，終於笑醒了！周揚是毛澤東派駐文藝界的奴隸總管，反胡風鬥爭時的大功臣、大英雄。《我們必須戰鬥》那篇殺氣騰騰的講話讓多少人心驚肉跳。僅僅過了11年，這位奴隸總管也被拉下了馬。特別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聲討周揚的文章中，有許多罪狀幾乎就是當年批胡風時的翻版。歷史老人真會開玩笑。太幽默了！

文革期間的許多時候，我都是在如此開心的狀態下度過的。我既是昨天的囚犯，又是今天的看客。

這叫『幸災樂禍』嗎？不！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讓那些經常整人者、熱衷於整人者，也嘗嘗被整的滋味。從而反省自身，激發天良，恢復人性。

還是那個周揚，文革後復出，就像換了一個人：懂得反思，懂得同情，終於親自登門向當年挨整的胡風先生表示歉意：『這

麼多年，你受苦了！』並且進一步提出『異化』概念及理論。又受到胡喬木之流的無情批評，因而鬱鬱以終。

獄里獄外

『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分爲幾種情況。當年在處理『右派』時，最輕的處分是留在單位里勞動改造。其次則送勞動教養；最嚴重的是逮捕法辦，也就是蹲監獄。

但在文革期間，許多地方和許多時候情況恰恰相反，輕與重倒過來了：在原單位改造者，是所有『革命群眾』的『敵人』，人人均可對你羞辱、謾罵，甚至毆打。文革高潮時，這些倒霉蛋大都要『陪鬥』。身受皮肉之苦自然不在話下，有的甚至落下終身傷殘。

其次，教養分子的日子也不好過。我的兩位同學（物理系的李芳綿、經濟系的王永鐸），就是在教養隊里受不了那種超負荷的勞動量，設法逃跑，然後被抓，判刑。原因在於：教養隊大多設置在農村。而農業勞動仍然是手工作業，全靠人力。勞動時間之長、勞動強度之大，都是其他行業無法比擬的。許多人就是受不了超負荷的勞動和極端惡劣的生活條件而進一步『犯罪』，走進監獄的。

和『教養』不同，我是一步到位——直接被長春市公安局的兩個便衣『請去局里談話』。這一談，就是23年。在監獄裏，由於是工業生產，勞動量相對比較輕，勞動時間限定在8小時（三班倒）。僅這兩點就比教養隊里好過一些，尚能勉強承受。管理方面當然從嚴，但嚴而有章法，不像教養隊裏，管教幹部可以隨意處置。只要你老老實實、不亂說亂動，完成勞動任務。管教幹

部不會難爲你。

因此，當年最嚴重的處分，在文革期間，反而成爲對『右派』來說最寬松的待遇。當社會上造反派鬧得最凶的時候，都不許『衝擊監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被關在監獄里的『右派』，反而受到了『保護』。沒有『陪鬥』之苦，更無沒完沒了的『加班』、『突擊』等等超額勞動。

『涼鞋事件』

還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不妨寫下來。我所在的長春鐵北監獄（對外叫『新生塑料廠』）生產一種塑料涼鞋，被檢查出了嚴重問題——涼鞋鞋底的花紋居然被認出是個『毛』字。這還了得！居然敢把偉大領袖踩在腳底下！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些『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紅衛兵立刻采取以下的措施：

一、派出衆多紅衛兵小將在大街小巷，攔截行人，專門檢查其鞋底。發現穿這種涼鞋者，一律勒令脫下鞋子，先向偉大領袖請罪。然後拎着鞋子光腳走回家去！恰好這批涼鞋中有不少女式鞋。可憐那些時髦女郎不得不咬着牙、光着腳走回家，那腳底的細皮嫩肉被烈日烤燙的地面磨得叫苦不迭。幾十年後，當我回到吉林大學經濟系工作期間，在聊天時恰好有位女同事當年就是親身經歷了如此這般的尷尬。最後她萬分感慨地說：紅衛兵好厲害啊！不聽不行。

二、查處那種涼鞋鞋底模具的設計者，竟然就是解除教養不久的『就業分子』。這更證明了是階級敵人蓄意攻擊偉大領袖的陰謀！何其毒也！於是當晚便把他拉到長春市中心區的人民廣場進行萬人批鬥大會。次日，我們都看到此人鼻青臉腫。一連數日都是如此這般。

大家估計：肯定要殺頭。後來總算保住了命，照樣搞他的涼鞋設計。不過，挨打算是白打了，皮肉受點苦罷了。

三、勒令生產廠家——『新生塑料廠』立刻停產整頓。

由於發生了這起『涼鞋事件』，被迫停產。犯人們每天的任務就是學習。所謂『學習』實際上就是集中起來，一個人讀報，大家聽着。聽不聽？全權在你自己。你可以天馬行空、自由思索，也可以閉目養神、養精蓄銳。當然不允許打盹兒。即使打盹兒，但千萬不能打呼嚕。既然是學習，總該有個人讀報吧？讀報，本來是個很愉快的差事。但反反覆復地讀一篇文章（我記得好像是楊成武那篇《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吧），實在枯燥、乏味。但誰也不敢擅做主張換另一篇來讀，只好硬着頭皮讀吧。好在文化人不少，大家輪流讀，每天能攤上半個小時，就差不多到點了——下課。

那個時候，我已經『改造』將近10年了，還沒有享受過如此『飽食終日、不勞而獲』的日子。心里偷着樂！

且慢！切莫高興得太早，受苦的日子還在後頭呢！

『涼鞋事件』讓我們『逍遙』了好幾個月。最後怎麼辦？模具當然是要改的。問題是倉庫里那些存貨如何處理？一人一把小刀，在鞋底上某個部位削去一小塊。似乎就顯不出那個可怕的『毛』字了。還有就是：凡是保存這種涼鞋的，不論新舊，一律以舊換新。

至於一切損失嘛，當然是國家買單了。

險遭加刑

1969年，還有幾個月我的刑期即將屆滿，就可能平平安安地活着走出監獄了。但，人生之路往往充滿許多變數。命運之神往往會安排某些挫折、困頓。所謂的『出頭之日』到來之前，還將經受一場更嚴重的災難和痛苦。

突然爆發的珍寶島事件，使國內局勢驟然變得高度緊張。爲了戰備需要，當時中央有一個『一號令』。其內容大家只知道關於領導人分別疏散轉移至全國各地，但還有一條：『牛鬼蛇神』一律下放農村，不得在城市滯留。

於是，在1970年3月末，我們這些牛鬼蛇神被轉移到吉林省最大的勞改基地——鎮賚縣四方坨子農場。那里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犯人們如果想逃跑，即使一天一夜，也未必跑得出大草原。更爲要命的是：大草原里野獸出沒無常。如果有人敢於單獨行走，那必然成爲野狼的美餐。

就在這茫茫無際的大草原里，由於農業勞動的時間長、強度大，實在承受不了，以至於傷病纏身。但勞改幹部們却不理解，認爲是『泡蘑菇』、消極勞動對抗改造，被多次批鬥、捆綁、游鬥示衆，最後折磨得奄奄一息時，從1分場被轉移至8分場。這個時候，距離我的刑期僅僅剩下半年了。所以8分場也不強求於我，讓我住入『病號監』。

好事多磨。病號監有個家伙竟然偷偷地吸煙，被看守發現，上報領導。場領導一怒之下，命令病號監全體出工，不許在監舍里窩着。當我跟隨大隊一瘸一瘸地、艱難地走到工地時，已是疲憊不堪，更無力勞動了，只得向帶隊的幹部請假。如實說明自己的左腿脛部有一個大瘡口。

說起這個大瘡口，本來只是被鐵鍬碰破一點皮，如果及時抹點紅汞、碘酒什麼的，也許就沒事兒了。但當時8分場根本就

沒有醫務室，於是越來越嚴重，以至於化膿、生蛆……周圍皮膚也隨之而潰爛、紅腫。

這位幹部姓吳，就叫吳隊長吧。他問我：你那個傷口多大？面對這個問題，可以有多種回答，可以說：有雞蛋那麼大，或者用手比劃一下……可是，鬼使神差，我一抬頭，看見吳隊長胸前那個閃亮閃亮的像章，竟然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有你那個像章那麼大！同時用手指了一下他的胸口。這個回答幾乎毀掉了我年輕的生命。

在現場，吳隊長似乎尚未感覺有什麼不妥，仍然在猶豫間。稍遠處一位張幹事聽出了問題的嚴重性，馬上快步走過來，咆哮着：『你這個混賬的東西！』當胸一拳，就把我打倒在地，接着不斷地用大皮靴猛踢、猛踩，在我的身上留下多少傷痛，已經記不清了，只是覺得昏昏沉沉地就失去知覺了。

如果我的生命力耗盡了，也許就像一條死狗一樣，被扔掉、喂狼！

奇怪的是：我的生命力竟然如此頑強，幾個小時以後，竟然蘇醒過來！當我醒過來時，已身處『小號』。所謂『小號』就是禁閉號，是一種監獄內部的處分方式。我感到全身酸痛，而且被戴上背銬，所以動彈不得，只是不斷地咳嗽，引起鄰室犯人的注意。他們紛紛發問：醒過來啦？你真行呀，大半天的時間，你還是活過來了。

到了開晚飯時間，伙房送牢飯的敲我室的小窗戶：開飯了！要求我拿飯碗伸出去，好讓他盛飯菜。可是我什麼都沒有！這位朋友實在是好心，馬上去找來看守，爲我打開手銬，然後不知從什麼地方找來兩個碗，一雙筷子，就算是我的餐具了吧。如果從今天講衛生的觀點來要求，應該問一下：這兩個碗原來是誰的？

他有没有傳染病？碗洗了嗎？消毒了嗎？等等。但在當時，實在不敢問，也不必問，有碗可以吃飯，就是最大的幸運了。

仔細一算：從上午8點多鐘，一直到晚間5點多鐘。我竟然在昏昏然的情況下掙扎了將近10個小時。吃了那些所謂的『飯菜』，竟然恢復了精神。肉體痛苦雖然依舊，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死不了！

死不了，就得受活罪！監獄當局決定：準備加刑，罪名當然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如果加刑，至少5年。在那種惡劣的生活條件下，在繁重的勞動折磨下，我還能挺下來嗎？很難！那就必然痠死在監獄里。

《三國演義》里，曹操敗走華容道，本來是必死無疑。但却碰到了那位多情多義的關羽！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從此，才有了那句『天不滅曹』的古話。

我也碰到了一位關羽式的人物。他就是吉林農大畢業、分配到四方坨子農場5分場管教科的劉容寬先生！人如其名：『容寬、容寬』！既有容，又寬厚！至今想起，仍然肅然起敬！

恰在此時，8分場被撤銷，全體犯人轉移至5分場。我的刑期已滿，但不釋放。這叫『延期改造』，就是準備加刑。這位劉幹事就是負責處理我案件的主管人。當他翻閱了我的全部檔案以後，決定救我一命！

在那瘋狂、惡劣的極左環境下，他如何救我？

多年後，我親自拜訪他。交談時他坦率地告訴我，他當時提出：該犯說此話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存心惡毒攻擊，另一可能是病痛折磨導致思想錯亂，說錯了話。再根據該犯在『延期改造』中的表現，遵紀守法，還是可以從寬處理的：予以釋放，戴反革命帽子，強制勞動，以觀後效。

就這樣，在延期 5 個多月以後，我被『釋放』了。

70 年代末期，當我回到吉林大學申請『改正』右派問題時，第一件事就是和劉先生通電話，一則表示萬分感謝，再者了解一下他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文革剛過，曾經風靡一時的『讀書無用論』隨之被人們拋棄，轉而興起一股學習熱潮。劉先生本來讀的是農業技術專業，可現在却從事政法工作。因此需要補課。按照他的提示，我特地找到法律系資料室，買了好幾本內部發行、有關政法的參考書寄給他。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劉先生如此大恩大德，區區幾本書算不得什麼報答，只能說是一點心意罷了。實在是微不足道啊。後來聽說他也調回長春，在公安廳勞改局擔任副處長。我那時已經退休，仍然前往看望，交談甚久。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麼要救我？他說：你被打成右派的時候，我還在讀高中。我並不知道什麼人應該成為右派。但是，我最敬重的語文老師被打成右派。於是我明白了：右派並不一定都是壞人。看了你的檔案，才發現你這個右派，和其他右派根本不一樣。你 16 歲就參加我們黨的地下組織，那個時候，當共產黨是準備殺頭的呀，怎麼能說你反黨呢？不可能嘛！其中最大的冤枉就在此。這次你說錯了話，如果再次加刑，豈不是再次蒙冤嗎？我無法為你解脫右派帽子，但決不應該讓你再次蒙冤。所以，在我職權範圍內，盡量為你開脫。還有：釋放後繼續戴帽，強制勞動，也是一種處分。不一定要繼續判刑嘛！

不久，聽說他去世的消息，實在悲痛。好人不得長壽！蒼天太無情！在此，謹向這位劉先生的英靈表達最誠懇的謝意和敬意！

盼望『駕崩』

文革後期，我和另一位『右派』——東北師大中文系的聶浩有過一段悄悄話。聶浩非常苦悶：如此下去，中國將要走向何處？我說：請放心，兒子總比老子壽命長，老子先死，兒子不就解脫了嗎？他當然懂得此話的意蘊。他又說：他會指定接班人的。我說：赫魯曉夫不也是接班人嗎？怎麼樣？最後我們得出一點共識：前途取決於壽命（如果早死，就沒有前途了）；壽命又取決於健康；健康又取決於心情。心情樂觀，身體就健康，就會長壽，就會等到那一天！『誰笑在最後，誰笑得最好』。爲了笑在最後，就必須活到最後！

此後，我們很少交談，正是爲了避嫌，可以說心領神會、心照不宣吧。總之，我們心中都有一種企盼：盼望那位『老子』早早歸天！因此，我們對於監獄里組織的看電影活動特別感興趣。但興奮點不在於當局希望我們看的所謂『主旋律』、『正能量』，而是希望從紀錄片中看到：那位紅太陽的步態、臉色、神情如何？當我們看到那位大人物步履蹣跚、臉部肌肉鬆弛、口中不斷流涎時，心情格外高興！

出頭之日，爲期不遠矣！像我這樣企盼紅太陽快快隕落的人，到底有多少？毛澤東 1962 年曾經發話：『右派想翻案？等我死了吧。』可以斷言：這些『右派分子』及其親屬們大都希望老人家早一點『駕崩』，還有那些地、富、反、壞分子，當然也無不懷着同樣的心情。在高喊敬祝偉大領袖『萬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幾億人當中，竟然有相當部分是虛情假意、言不由衷。這些人實際都在盼望紅太陽快快隕落。這種情況，領袖自己聽了感覺又會如何？他真的會相信嗎？

『感謝』文革

到了文革結束之後的70年代末期，我們紛紛回校辦理『改正』手續時，都住在吉林大學招待所（東中華路）。該所專門有一個房間是供我們這些上訪人員免費住宿的。房間號是105。既然免費，當然所有的服務項目都沒有，需要我們自己動手（打掃衛生之類）。上訪期間，每月領取30元生活費（當時大部分職工的工資也就是40~60元左右吧）。住在同一招待所的還有許多落實政策回校的人，經常在一起聊天。忽然有位朋友說出一句大實話：『你們這些老右，應該感謝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因為文革打擊了曾經掌握生殺大權的大人物。讓這些大人物也嘗到了被批鬥的滋味。讓他們天良發現，以己度人。才想到給你們改正、平反。』

這位朋友說的是大實話。此外，還可以舉出另一個例證。在招待所期間，每天早晨我一定在招待所門外、東中華路一帶跑步鍛煉。經常見到原吉林大學副校長佟冬先生（後擔任吉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也出來散步。在交談中他坦率地承認：過去整你們時總是從革命大道理方面考慮，認為你們這些學生太不懂事等等。到了文革期間，我自己也挨整時，才對你們當年挨整多少產生一些理解和同情。今天你們總算活着回來了，也的確難為你們了，這20多年是怎麼活下來的？真不容易呀！

看來，正如那位朋友所言，我們這些『右派』，還真的應該感謝文革。沒有文革，那些位高權重的人，只會講黨性和服從，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人性』、『同情心』等等，根本不會、也不敢對上級領導的指示有任何懷疑。恰恰是文革，給予這些人一次大大的教訓：應該眼睛朝下看，多聽聽下面的意見、建議，而不

應該一切『唯上』、『唯書』、『唯文件』。

謝謝文革！這就叫物極必反，毛澤東發動文革，從而把整人的那一套招數發揮到極致！使更多的人挨整，嘗到了挨整的滋味，從而產生大面積的懷疑情緒，懷疑領袖是否正確，離心傾向越來越強烈，盲目迷信的人越來越少了。這就為此後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打下了群眾基礎。

文革是一場曠古未有的大浩劫。在這場浩劫中，領袖把幾乎所有的人，包括各級幹部先後打倒，學生和各界群眾先後被整，因而得罪了幾乎所有的人。最後身邊沒有一個信得過的親人，除了那位『妾身未分明』的小女人。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不亦悲夫！

【發表於四川出版的民間刊物《昨天》第80期】

國家的偉大不在於它的領土甚至它的歷史，而是民主傳統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還在受窮，國家就難保不發生社會動蕩，直至政權垮臺！

——俄國偉大的思想家普列哈諾夫

孟子民本思想新探（節錄）

孟軻的仁政學說出發點就在於以民爲本位的民本思想。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或代表其全部思想的精髓，只能是那句人們耳熟能詳的話：『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盡心下）。『民貴君輕』可以說是其政治學說的核心所在。

孟子認爲：「民」是諸侯立國之本。『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盡心下）三者之間，人民是核心，土地是人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政事則是圍繞着人民所發生的各項管理活動之總和。孟子提出諸侯之三寶，實質上就是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肯定人民作爲歷史主體的地位，高擎人民這面大旗、高唱人民爲主旋律的時代最強音。在這一點上，孟子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是無與倫比的。

孟子所生活的戰國時期，正是諸侯爭霸、群雄逐鹿、戰火頻仍、生靈塗炭的年代。血與火的洗禮激發了當時思想家們的思考能力。他們從許多小國旋生旋滅、幾個大國屢勝屢敗、或興或衰的動蕩局面中不能不認真探索、思考：在列國紛爭中，決定其成敗、興衰的力量是什麼？這是時代的主課題。每個思想家都不可能回避，必須直面，必須回答。

孟子是如何回答的呢？『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

這段話表明：孟子的答案非常明確：民心的向背決定社稷的興亡、江山的得失。為什麼？

最能說明這個觀點的是孟子與弟子萬章的一段對話（萬章上）。那是師生之間討論堯、舜禪讓這一歷史故事所闡發的觀點。孟子認為：天子不能以天下授與任何人，只有『天』才有這個資格。但是，『天不言，以行與事視人』，上天默默無語，又無視覺與聽覺，根據什麼決定人間大事呢？只有傾聽民意。孟子借用《泰誓》的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樣一來，所謂「天意」就是民意的集中表達、最高代表。在此，孟子把神話色彩濃厚的天道觀改造成現實世界里的人道觀，並延伸出人民本位的仁政思想。從而否定了當時流行的君權至上、受命於天的神話，把最高權力從君王手中奪過來，回歸於人民之手。

因此，孟子告誡各國的統治者，為了爭取民心，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盡量滿足人民的要求：『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梁惠王上）『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提出了『以人爲本』的仁政思想。無奈當時社會狀況却是戰亂頻發、民不堪命。面對如此社會現實，孟子憂心如焚、痛心疾首。他嚴正指出：君者，爲民父母。可是當時的老百姓却過着『終歲勤苦，不得以養其父母……老稚轉乎溝壑』（滕文公上）的悲慘生活。當目睹『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種種慘狀的時候，孟子發出來憤怒的質問：『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爲了讓人民能够安居樂業，孟子在不同的語境中先後提出了四大經濟綱領。首先，反復宣傳其給民以『恒產』的主張。所謂『恒產』即長期保有的財產。在當時條件下，主要是指土地。

孟子斷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滕文公上）。如果没有維持生存最低限度的生產資料——土地，就會鋌而走險（『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從而危及社會穩定。因此，他主張『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梁惠王上）孟子還根據當時生產力水平，提出了『恒產』的具體數量標準：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他並且非常具體地描繪了在一定數量土地基礎上人民安居樂業的美好景象：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梁惠王上）。這就是孟子爲我們所設計的理想社會藍圖，也是其實現『平治天下』雄心所規劃的施政綱領和仁政內涵。在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和認識水平的基礎上，能够提出這樣一個全方位的政治理想，說明孟子對仁政的構思之精密、追求之執着、想象力之豐富，在當時無疑是出類拔萃的創見。孟子認爲：只要實現了這一點，即滿足了普通勞動者起碼的生存權利，『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也是孟子爲當時的諸侯們所謀劃的『得天下』戰略方針的具體化。從這個綱領來看，也可以看出他對廣大勞動者最迫切的願望之深刻思考與謀慮。

其次，要嚴格遵循農業生產活動的各項客觀規律，首先是季節性、時間性。孟子書中多次強調要『不違農時』。上面所引那段見梁惠王所述的要點中，兩處提到『農時』的概念：馴養家畜要『無失其時』；種植田畝要『勿奪其時』。此外，還有『斧斤以時入山林』等等。這些農時的規定是農業生產活動所必須恪守的。不僅對於普通勞動者來說，關乎一年溫飽的大事，對於統

治者來說也同樣應該牢記。因為在實行『力役之徵』的時候，切不可索取無度，更不可耽誤農時，影響耕種的收穫量。

第三是實行『薄賦稅』。『輕徭薄賦』本來就是儒家學說中一個主要內容。『斂從其薄』是孔子的原話。到了孟子手中，這一思想發展為制度化的主張。孟子提出：『取於民有制』（滕文公上）。「有制」就是對統治者規定索取的制度化、規範化，不能任意誅求，以至於侵佔勞動者賴以維持生存的必要勞動部分，從而避免破壞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須的、起碼物質條件。孟子所提出的『取於民有制』具體來說有哪些制度呢？

在稅種上，他主張實行單一稅制。『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盡心下）。顯然，就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程度來看，孟子沒有提及『貨幣地租』的概念；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兩項都屬於『實物地租』範疇。而『力役之徵』則是『勞力地租』。他認為：如果只採用一種方式徵稅，勞動者的生活還勉強可以維持下去，如果同時採用兩種方式徵稅，就會出現餓殍現象。如果三種全都採用，那就不得了：父子離——家破人亡。

採用一種方式，哪種方式最好呢？孟子主張：『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滕文公上）

……

其次，取於民有制還包括在徵取的數量上應該有一定的標準。他主張實行「什一稅制」，即徵取勞動產品的十分之一。在前引的井田方案中，他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而助的標準適用於『野』即廣大農村。『什一自賦』則適用於城市和近郊。兩者相差無幾，大體上維持在十分稅一的比例。這對於當時諸侯間戰事頻發、徵斂無度的現象無疑是一種理想化

的方案。但却為後世留下了一份極為珍貴的思想遺產。歷代進步的思想家在專制社會下的封建統治階級橫征暴斂時，無不以孟子的什一稅制作為有力的精神武器，迫使當局稍微收斂一下貪欲，以舒民困。

第四、前面說到孟子主張單一稅制另一種涵義是只對農業生產課稅，其餘經濟活動一律免徵。當梁惠王向孟子諮詢『王政可得聞歟？』時，孟子假托周文王的政績作為仁政的樣板：『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徵、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關市只對來往的商旅實行稽查，並不徵稅。這無疑是對工商業的優惠政策。這種辦法的激勵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孟子在另一篇中指出：『市廛而不徵，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徵，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公孫丑上）。這段文字生動地說明：在商品經濟極不發達的古代社會，孟子却能够超前地發現了吸引各界人士的最有效辦法——實行各種優惠政策。這一點對於現代人來說無疑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以上介紹了孟子主張對廣大的『民』施仁政的部分。現在讓我們看看孟子是如何看待君王等統治階級的。前者說明孟子是為何、如何「以民為貴」。現在要說明的是為何、如何「以君為輕」？

孟子首先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指明一條『王天下』的秘訣：『仁人無敵於天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征而北狄怨，東面征而西夷怨。曰：奚為後我？』（盡心下）可是當時的現實政治局面却與孟子的理想背道而馳：『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離婁上）面對諸侯各國爭霸、生靈塗炭的局面，孟子嫉惡如仇、痛心疾首。他憤怒地斥責這些戰爭販子們是天下

的罪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告子下）在孟子看來，禹、湯、文武三王都是以德服人的聖賢，而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等等全靠以力爭霸天下者，則是背叛三王之道的罪人。

孟子還對梁襄王當面痛斥：『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梁惠王上）因此，他主張：『善戰者服上刑』，即對發動戰爭、窮兵黷武、制造人間悲劇的好戰狂人處以極刑。其反對侵略戰爭，反對殘暴統治者的立場是何等鮮明！

孟子反對諸侯對外爭霸的戰爭，同時也反對對內橫徵暴斂。他繼承並發揮了孔子『苛政猛於虎』的思想，把苛取於民以遂私欲的統治者比作強盜。當萬章問他：當今諸侯與殺人越貨的強盜有何區別時，孟子正色回答：『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萬章下）顯然，那些巧取豪奪、橫征暴斂以供自己享受的諸侯們都是『非其有而取之者』的強盜。他們與真正明火執仗的強盜唯一區別僅僅在於犯罪手段不同而已。強盜是『以刃殺人』，而過量徵取勞動者租稅的統治者則是『以政殺人』。在孟子看來，『以政與刃』無以異也』，沒有什麼區別。因為其實質都是對善良老百姓的戕害、殘殺。

出於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和關注，孟子還尖銳地抨擊當時社會貧富嚴重對立的狀況，並且進一步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在位的統治者。『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他認為：為民父母，應該對人民抱有起碼的同情心。『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相反，『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公孫醜上）對人民出於『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的處

境却無動於衷，這樣的國君，簡直是毫無人性，實際上已經變成「殺人以政」的強盜、食人的野獸！孟子對當時諸侯各國統治者的抨擊達到了當時條件下最尖銳的程度，也反映了其思想中人民性的精華，是其繼承孔子仁學思想並發揚成仁政思想的生動體現。

對於那些不同情、不關心人民死活，只知爭霸和享受的統治者，應該怎麼辦？孟子在不同的場合提供了幾種答案。

（1）『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有一次鄒國和魯國打仗，鄒國的官兵傷亡很大，老百姓睁眼看着官兵戰死而袖手旁觀、無動於衷。鄒穆公向孟子請教如何懲罰那些見死不救的庶民，孟子回答得十分精彩。他首先指責鄒穆公：荒年你的老百姓大批死亡、逃散，可是你的倉庫里裝滿了糧食，你的官員既不報告，更未賑濟災民。這就是『上慢而殘下也』。由此，孟子針對統治者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反求諸己』（即反思）的要求：『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上）

由於自己的過錯，却不能「反求諸己」。結果必然是：老百姓對你的官員也照此辦理。這就叫做『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梁惠王下）因此孟子規勸鄒穆公『君無尤焉。』（你不要怪罪別人了！）最後，孟子乘機教訓對方：『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在這裡孟子提出了一個待人接物中非常著名的原理：『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注）爲了具體說明這個原理，孟子還不厭其煩地列舉三種情況：『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如寇仇』（離婁下）。孟子在這裡設計了君臣關係的三種狀態，每一種狀態的主動權在君，取決於君的選擇。任何選擇的最終結果都必然會『自食其果』。此外，孟子還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梁惠王下）。這句話曾經受到歷代有識、有為的政治家、思想家高度評價，奉為圭臬。例如宋代的范仲淹在其傳世名篇《岳陽樓記》里寫道：『予嘗求古仁人之心』。被范仲淹所探求的古仁人之中無疑包括了孟軻在內。何以見得？請看接下來范氏是這樣寫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顯然是受到了《孟子》中『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思想的啓發，並且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與民同憂樂的高尚情懷。

（2）仿效伊尹流放大甲的辦法

公孫丑請教伊尹流放大甲的故事：『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回答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盡心上）孟子認為：只要是出於公心、爲人民解除倒懸之憂、爲社稷消弭累卵之危，完全可以這樣做（流放君王）。同時孟子也沒有疏忽，不能給爭權奪利的野心家以借口搞政變。所以他又告誡那些心術不正之人，切不可篡位謀私、以暴易暴。

（3）撤換君位

如果國君不以民爲貴，危及社稷時就應該果斷地廢棄之（『變置』），『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萬章下）這是當着齊宣王說的。以至於引起『王勃然變色』。孟子却不慌不忙地說：『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可見孟子

仗義執言、大氣凜然、面對權勢泰然自若的神態。一個正直的思想家敢想敢說、無私無畏的偉岸形象躍然紙上。

(4) 誅殺

對於屢教不改、屢諫不聽的君王，則可殺之。那麼，誰來執行呢？孟子認為：行仁政的君王有權殺之；臣下也有權殺之，普通庶民也可以殺之。因為這樣的人不配享有君王的尊號。當齊宣王問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坦然答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下）孟子的意思很明白：殷朝的紂只能算是『一夫』，而不配享有君王的尊號。因此殺掉他根本不算弑君。在先秦眾多思想家中，孟子那滔滔雄辯、妙語連珠的口才是無與倫比的。在此便是一例。他利用概念轉移的辦法，就把『弑君』的罪名從善良的臣民頭上摘掉了。

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孟子對待人民是如何看得重，相反，對君王又是如何看得輕。這就是其核心思想『民貴君輕』的具體闡釋。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學術界長期對孟子下述言論持批評態度：『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滕文公上）批評者指出：君子是指統治階級，因而這段話顯然是為統治階級的剝削行為辯護。這種意見所依據的大前提就錯了：君子未必都是指統治階級。細心翻檢《孟子》全書，『君子』一詞出現 70 多處，其中有兩處是用於『古之君子』、『今之君子』相對比（公孫丑下）按照東漢經學家趙岐在《孟子章句》里的解釋，『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古之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

在孟子看來，真正的聖賢明君必須是『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離婁下）『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上）可見在孟子看來，真正的君子必須行仁政，以「定四海之民」為樂，以「親而仁民」為務（盡心上），才能夠做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才有資格『為民父母』。具體來說，孟子為真正的君子規範了許多條標準或要求：

1、要有高度的責任感。應該像夏禹王那樣『思天下有溺者，如己溺之也』、『思天下有饑者，如己饑之也』（離婁下）。就是要推恩及於四海。孟子曾以辛辣、尖刻的語言嘲諷那些在位的統治者『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孟子主張統治者應該行仁政，應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他還強調：真正的君子應該學習大禹捨己為人的高尚情操和偉大胸懷：八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滕文公上、離婁下）

2、要以身作則。君子「治人」以德教為主。而德教又必須從自身做起。『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上）『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相反，如果『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離婁上）。理由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滕文公上）

3、要認真對待人民的要求，按照民意來處理軍國大事。在政治上要由人民推舉賢人。當左右大臣和諸大夫認為「賢」或「不可」、「可殺」時，都不要聽。只有當國人皆曰賢，或不可，或可殺時，再進行考察。根據考察的結果，『見賢焉，然後用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總之要認真聽

取與尊重人民的意願。在經濟上則應盡量滿足人民的要求『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離婁上）。『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梁惠王下）做到了這一切，就可以實現上下一心，精誠團結，衆志成城，才可以實現『王天下』的偉業。

4、在經濟上保障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首先要保證勞動人民有從事正當生產的物質基礎——恒產（即上述所引的『百畝之田、五畝之宅』）還應該注意『勿奪其時』、『省刑罰、薄稅斂』，讓勞動人民能够休養生息、努力進行生產勞動，增加社會物質財富，最終達到至治之極的境界：『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盡心上）在普遍豐富的物質財富基礎上，還要『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即合理安排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通過以上大量言論的分析考察，可以斷言：孟子所主張的『君子』、『勞心者』、『治人者』乃是道德高尚、人格完美、心系人民、以天下爲己任，以行仁政爲宗旨的堯、舜、禹式的好公僕。而絕不是嚴重脫離人民、私欲膨脹、精於搜刮民財的『今之君子』。後者勢必遭到人民的唾棄，落得個獨夫民賊的千古罵名。

綜上所述，孟子着重發揚孔子的仁學思想，進而構築自己的仁政學術體系。在中國思想史上聳立起第二座豐碑。

（注）孟子這句名言今天已經演變爲成語『出爾反爾』，但原來的意思也改變了。成語的意思在時代演變中發生變化，以至於古今意義不同的情況非此一例。

【發表於2014年10月臺灣出版的《孔孟月刊》第53卷第1期】

【未刊稿】

一個震撼人心的嚴重問題

——從溫家寶總理的內疚談起

正當舉國歡慶建國 60 周年、歌功頌德之聲響徹雲霄的時候，我們突然聽到一個非常清醒、非常冷靜、非常務實的聲音：

溫家寶總理在教師節前幾天赴北京 35 中學聽課並與教師們座談，溫總理的即興發言後來登在 10 月 12 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上，題目是《教育大計 教師爲本》。在文章中作者沉重地回顧：『我多次看望錢學森先生……他轉過話題就說，爲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句話他給我講過五六遍。最近這次我看他，他還在講這一點。』接着溫總理坦率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雖然也培養了不少的人才，但是『確實很少像李四光、錢學森、錢三強那樣的世界著名人才。每每想到這些，我又感到很內疚』。同時，溫總理在文章中也肯定了「我們的學生是很優秀的」。既然如此，那麼問題出在哪里呢？根源何在？

據我看來，答案應該就在錢學森的頭腦中。何以見得？錢老既然對國家領導人談過「五六遍」可以斷言：這個問題在錢老心中早已是深思熟慮、考慮多年了。以錢老這樣大科學家的智慧和見識，不會沒有一個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答案。只是考慮的到

自己的身份，以自己威望之隆、地位之尊，不便當着國家領導人的面把這層窗戶紙捅破而已。那麼，答案是什麼？其實，每個中國人的心中都明若觀火。借用一句民間的俗語：這叫「禿頭上的虱子，明擺着！」只是在當時乃至今天的政治氛圍下，每個人都不敢說真話、說心里話，不得已只好『口欲言而囁嚅』罷了。

再從歷史來看，這又是個老問題。早在 1997、1998 年兩位華裔科學家（朱棣文、崔琦）先後獲得了世界最權威的諾貝爾獎的時候，就深深地刺激着每個中國人的自尊心，激發出一種迫切的民族危機感。許多國人相繼發出疑問：既然海外 5000 萬華人中，先後出現過 6 位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琦），此後幾年，又有兩位華裔科學家相繼獲得諾獎（錢永健和今年的高錕先生）。這就雄辯地證明了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聰明、最勤奮的民族，炎黃子孫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人種。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在一個擁有 13 億人口的中國至今仍然沒有出現一個諾獎得主？

問得好，問得有道理！只是那些議論僅僅在民間傳播和流行，一直沒有得到高居廟堂人物的重視和回應罷了。

在今天的新形勢下，由國家最高領導人在談話和文章中公開提出來，而且用的是如此嚴峻的口吻，並為此表示了「內疚」。則是從未有過的，頗令人耳目一新，更令人感到問題的緊迫性和嚴重性，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

早在 30 年前，在國人萬眾鉗口之時，有位海外的科學家，也是諾獎得主就曾大膽建言。在北大校慶 100 周年的集會上，1986 年諾貝爾獎得主、著名的物理化學家李遠哲先生對北大師生語重心長地說：『獲（諾貝爾獎）獎與否關鍵問題是需要一個肥沃的土壤』。對了，即使是最優良的種子，如果播撒在貧瘠甚

至是惡劣的土壤里，也難以發芽、成長。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李遠哲先生所說的『肥沃的土壤』應該理解為科技人才隊伍得以成長和發展的良好環境。再具體地說就是，要讓自由的空氣托起創新思維的雙翼，才能在科研的天空任意翱翔；無獨有偶，獲得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的華裔科學家錢永健在回答記者時說：『我是在美國出生並長大，我不是中國的科學家！』錢先生的話不留情面，說得很難聽，讓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領導人聽起來很不舒服。但却是『實話實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爲了治病救人，不能不喝下這杯苦口的良藥；爲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不能不認真地聽取這位科學家的忠告。

如何營造「肥沃的土壤」呢？幾十年的實踐雄辯地證明：首先應該排除一切干擾，特別是來自政治方面的干擾。長期以來，我國奉行的是「政治掛帥」，政治領導一切（當然包括科學技術在內）。在這種體制下，爲了政治的需要，當然也可以衝擊一切、否定一切、取消一切。而所謂的「政治」實際上又演變成少數人，甚至是某個領導人的個人的喜愛、偏好。用長官意志統帥科學的結果必然違背科學規律的瞎指揮。只要隨便翻閱一下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報紙、雜誌，那里面充斥着許多天方夜譚式的大話、空話、假話，其中就有不少是出自科學家甚至是著名科學家的手筆。他們違背了科學家應有的良知和社會責任，爲的是緊跟政治需要、迎合領袖的偏好，結果是留下許多荒誕不經、荒謬可笑、荒唐無稽的文字垃圾。既貽笑大方，更遺笑後人。這方面的教訓太多了、太深刻了、太沉重了。

強調所謂「政治掛帥」的人並不了解：科學、文化、藝術、軍事、經濟、法律……各個領域都有自己獨特的規律，不應該更不可能由政治包辦起來、統帥起來。例如在政治、軍事等領域里，

講究紀律、服從，要求整齊劃一、令行禁止、步伐整齊，一切行動聽從指揮，不允許個人搞自選動作。而在科學、藝術、文化等領域里恰恰相反，不但允許，而且要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允許獨辟蹊徑、標新立異、花樣翻新，要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允許不同的聲音互相辯難、質詢，允許七嘴八舌……

其次，在政治方面，必然要遵循自己的規矩，要強調分清敵我，要有「意識形態」方面的界限；甚至還會帶有「冷戰思維」的殘迹。但對於科學、文化、藝術來說，這些要求恰恰是扼殺創造力的枷鎖，是一種嚴重的束縛。因為從政治角度考慮，可以有中西之分，甚至敵我之界。但是對於科學來說，却没有國界，更不應該有什麼敵我之分。例如：美國的科學技術比我國發達許多，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我們向他們學習乃是天經地義的好事，但是拿到政治家的辦公桌上，却可能變成重大嫌疑，如果要維護國家的榮譽和自尊心，經過反復考慮、權衡的結果，就有可能被否決。

在排除了政治干擾以後，我們才有可能談論具體辦法，即如何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政策方針等問題。

第一，允許失敗，寬容失敗

科學研究是對未知領域大膽的探索和求知，充滿風險和不可預測的因素，更不可能十拿九穩、穩操勝券，既有成功的希望，更應該有失敗的思想準備。古今中外的科學家，在每一次享受成功的喜悅之前，哪一個沒有品嘗過失敗的苦澀？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的吳文俊、袁隆平兩位院士就坦然承認自己失敗多於成功。「失敗多於成功」，這是科學發現、發明、發展的普遍規律。例如：愛迪生發明電燈之前，爲了尋找耐高溫的材料做燈絲，先後試驗了金屬、木材、石墨等 1,600 多種材料，都失敗了，經過無數次

的實驗、失敗，最終找到了理想的材料——碳化精絲。後來又找到了更好的材料——鎢絲。在青霉素發明之前，治療梅毒的惟一特效藥坤凡納明，在試制的過程中，經歷了 605 次失敗，通過不斷失敗、不斷改進，最終試制成功，因此該藥又名 606。中外科科技史上的無數事實證明，失敗是成功之母。不允許失敗，實際上也就是堵塞了任何探索的通道，關閉了成功的大門。允許失敗、寬容失敗乃是向一切勇於探索、大膽創新者頒發的綠色通行證，也是杰出人才成長所必須的首要條件。

允許失敗還包括允許科學家在很長時間內拿不出什麼成果。因此，評價科學家的標準不應該急功近利、只爭朝夕，而應該讓他們有充裕的時間來不斷證明和充實、完善自己的科學設想，發展自己的科學理論。為此，目前的職稱評定機制必須大膽地、大刀闊斧地改革。

第二，允許懷疑，鼓勵懷疑

科學研究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也是對現有的、傳統的事物、制度、理論、思想進行拷問、質疑，甚至否定、揚棄、改造的高級精神活動。因而必然要從問題開始、從懷疑入手。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提出：『疑是思之始，學之端』。想當初，李政道、楊振寧就是首先對物理學的經典理論——宇稱守恒定律提出了質疑，並在理論上推導出推翻這一定律的理論——宇稱不守恒定律。後來經過旅美華人女物理學家吳健雄試驗證實，因而他們二位獲得 1957 年諾貝爾獎。從另一方面說，真理是不怕懷疑的，害怕懷疑、不準懷疑，那不是真理，而是宗教的教條。害怕懷疑是神經衰弱、缺乏自信心的表現。晚年毛澤東總結自己從政、治學 60 多年的人生體驗，告誡後人：『讀書，一要讀，二要懷疑，三要提出反對意見。讀了書不敢懷疑，不能提

出反對意見，算是白讀。』可見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前人的所言、所書，都是可以懷疑、允許懷疑的。令人遺憾的是，在他最後的幾十年政治生涯中，却不允許任何人對他的話提出任何不同意見，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諷刺，更是一大悲劇。

第三，允許不同聲音，包容不同意見

中國歷史上歷來有倡導『和而不同』的進步思想。認為治理國家一個思想、一種聲音於國事無補。一種聲音，表面上看來完全一致，高度統一，但實質上不利於國家的進步和民族的發展。中外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例子。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說（即地動說）因為否定了延續千餘年的地心說，違背了人們的『天靜地旋』的直覺經驗，摧毀了『天尊地卑』的傳統觀念，所以在教會統治下異端，為教會所不容。可是，後來的實踐證明哥白尼的日心說是正確的。恩格斯高度評價：『從此自然科學便開始從神學中解放出來。』又如德國的氣象學家、地球物理學家韋格納（1880~1930）倡導的大陸漂移學說，最初也遭到幾乎所有學者的非議，目為異端。可是在他死後30年，他的「大陸漂移學說」風行全球。

在社會科學領域里，這樣的實例就更多。有許多新思想、新觀念、新理論在開始的時候，也曾經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例如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在當時『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理論面前，曾被一些人譏笑和反對。鄧小平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等等理論在『凡是派』的眼中當然更是不可思議的「異端」。可若沒有這新思想、新觀念、新理論，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輝煌成果嗎？所以害怕和禁止不同聲音必然導致停滯和僵化，必然阻塞任何研究、探索之路。

今年的諾貝爾物理獎3位獲得者之一的高錕先生又是一位華裔科學家。他的研究成果是『有關光在纖維中的傳輸並應用於

光學通信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早在 40 多年以前，高先生最初公佈自己研究的新發現時，因為違背了當時用電來完成通信任務的慣例，受到科學界權威人士的公開嘲笑，被認為是『痴人說夢』。就連自己的妻子都不相信，斥責他說：「你騙誰呢？」通過時間的檢驗和實踐證明，這項成果終於被運用，科學的理想變成了現實，發明家高錕被尊稱為『光纖之父』並獲得了遲到 40 多年的諾貝爾獎。這個最新的例子再一次雄辯地證明一條規律：凡是新思想、新發明、新理論在剛開始的時候，往往被認為是無稽之談，是痴人妄想，是異想天開等等。所以應該允許人們想象力的自由馳騁、自由探索和表達。到底是科學創見、真知灼見，還是痴人說夢、無稽之談？應該通過實踐來證明或證偽，而不應該由任何權威人物來判斷。即使是非常杰出的領袖人物，這樣的判斷大多時候必然會成為失誤，甚至成為笑柄。

上世紀初年，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曾經說過：『中國人最不能容忍異端。長此以往，很容易養成一種正統的暴力，對異端采取非常殘酷的態度』。因此，蔡先生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十分明確地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采兼容並包主義』的治校原則和『自由精神、兼容並包』的辦校方針，才把北大建設成一個思想自由、學術繁榮、人才輩出的著名大學，並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包容不同意見也就是允許不同學術觀點互相交流、爭鳴。

我國在 20 世紀 50 年代曾經有過短暫的百家爭鳴，可惜的是，那只是曇花一現，瞬間便變成了『引蛇出洞』的『陽謀』，留給中國人民的是苦澀和辛酸的記憶。

有人擔心：允許懷疑、允許不同聲音的存在，可能會造成混亂、破壞穩定局面。這實在是杞人憂天。當人人都敢於創新、參

與創新的時候，一定會激發更大的積極性、創造性，更有效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從而有利於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豐富多彩。這只會使億萬人民產生更強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使社會政局更加穩定而不是相反。

人們都知道，養魚首先要預備足夠的、無污染的清水。同樣道理，要培養千千萬萬杰出人才，首先要營造一個有利於人才成長的大環境。允許失敗、允許懷疑、允許不同聲音就是這樣的大環境。這種大環境具備了，各種人才包括杰出人才就將源源不斷地涌現，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各方面的事業必將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在這個大環境尚未達到理想狀態之前，僅僅在口頭上、書面上千百遍的反復號召，其效果恐怕只是緣木求魚罷了。

傑出人才和一般人才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他們無不表現出對於對客觀世界追根問底的濃厚興趣，因而敢於揮動智慧的長矛，在科研的廣闊天地里，大膽的向一切未知領域進軍。為此就需要一個允許自由思考、自由發表與交流、自由爭論的民主氛圍。爲了營造這種可貴的氛圍，各級領導人應該有傾聽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意見的政治雅量和胸懷，不要動不動就扣帽子、打棍子，甚至動用刺刀和警棍。著名作家馮驥才有一句名言『用刺刀捍衛的真理不是真理，用刺刀推廣的學術也不是真正的學術』①。創造性的靈感火花只有在足夠的民主與自由空氣中，才能充分的燃燒，並迸發出絢麗的光和熱。

作家章明在紀念五四運動 80 周年時曾撰文指出：『民主和科學，民主是第一位的。有了民主的溫床，科學才能萌發成長。沒有民主，哥白尼就要違心的認罪，布魯諾就要被燒死，愛因斯坦就要被迫逃離祖國，馬寅初就要受到無端地圍攻……』②歷史

的教訓太多、太深刻了。

在有了這樣的『肥沃土壤』大前提下，當然還要不斷地施肥，培育、鋤草。所謂「施肥」就是不斷地增加科學技術、教育、文化發展等方面的資金投入。「培育」就是營造充分尊重科技人才的大環境（包括科學的分配政策等）。「鋤草」就是不斷地排除不利於杰出人才成長的各種言論、制度、政策等等。而這一切都必須要在具備了『肥沃土壤』這個大前提下，才談得到，才有意義、才會出效果。

在本書即將付印之時，又讀到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對“錢學森之問”的思考成果。他認為：創造力等於知識乘以好奇心和想象力。那麼如何提高每個學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呢？錢教授建議：大學應該創造一種更加寬鬆的環境，盡力保護和鼓勵學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③從這位著名教育家的思考成果中，必然邏輯應該是：不要再搞什麼“五不講”、“七不準”之類的清規戒律了，讓自由思考之風吹遍全國的校園、課堂，解放全體師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① 《雜文選刊》2000年第3期第2頁

② 《隨筆》1999年第4期第6頁

③ 《光明日報》2017年5月30日

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歷史考察

——兼議「吃飯」與「砸鍋」

一、知識分子吃誰的飯？

知識分子是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中獨特的一支。『士農工商』，從春秋戰國時代就是如此。管仲開創「四民分業」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延續這種職業劃分的格局。當然，最初的『士』是專門指武士。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統治階級的需求不斷擴大，日益多元化。除了安全需要以外，更進一步擴展到物質和精神多方面的需求，因而催生了文人身份的『士』。『文士』的任務仍然是為統治階級服務，不過主要是為了滿足統治階級精神方面的需求，例如決策諮詢、教育子女、衛生保健、宮廷娛樂等等。文士階層後來成為『士』的主流。

在漫長的專制制度下，整個國家都是皇帝的私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知識分子當然不可能例外，也是皇帝的臣民，在人格上完全依附於皇帝：『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即使像大詩人李白那樣狂放不羈，公然聲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名士，也不得不屈從於皇帝，為宮廷娛樂而寫詩。例如：當唐玄宗面對名花與

妃子特別高興時，詩興大發。召李白立刻進宮，命他寫詩記盛，李白當即從命，寫下了著名《清平調》三首。雖然他內心也許是痛苦的、委屈的，但畢竟寫下了這樣的「遵命文學」，留下了一份頗為尷尬的記錄。

那麼，有沒有堅決拒絕為皇帝服務的知識分子呢？有，不多，其結局也很悲慘。大家都知道，『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二人就是典型。因忠於殷朝舊主，拒絕承認新興的周朝。於是只能跑到首陽山靠采薇而食。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二人采薇的首陽山也是在「王土」範圍內，於是只好餓死。

為了不至於餓死，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不得不依附於皇帝及其統治機構。於是就產生了所謂『頌聖』文化（「頌聖」二字是借用著名學者資中筠先生的話，她說得比較客氣。如果實話實說，就是『拍馬屁』。由於拍的是皇帝的馬屁，所以應該認為是最高級『馬屁』），開展了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頌聖』競賽，看誰頌得別出心裁、花樣翻新，從而得到皇帝的賞賜更多，俸祿更厚。臣子們的心思都花在絞盡腦汁歌頌『天王聖明』，哪里還敢於批評當今皇上？

社會在不斷發展，時代在不停地進步。到了今天，這種局面早該改變了，事實上也的確在改變。今天人們講究所謂『政治文明』其中就包括了新的國家觀念。不能繼續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一套了。

其實，古代的大政治家姜尚就曾說過：『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參見《六韜》）。但長期以來，這種聲音被掩蓋了）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公開倡導：『天下為公』，天下或國家不再是某個君主的私產。由此，這種觀念才普及、逐漸深入人心。現代政治理論告訴人們：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國

家領導人不過是爲人民服務的公僕。任何具有現代意識的領導人或者領導集團都不應該把知識分子當成自己的私產或家奴，可以頤指氣使，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當然更不可能說出「知識分子既然吃我的飯，所以就應該老老實實、服服帖帖地爲我服務」這樣有違時代精神的話。

那麼，知識分子到底吃誰的飯呢？公元10世紀五代十國時期後蜀皇帝孟昶曾經頒發一道詔令，其中就有『爾俸爾祿，民膏民脂』8個大字；後來的宋太宗鑒於前朝失敗的歷史教訓，將《頒令箴》縮寫爲4句16個字：『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刻石爲銘，便是著名的《戒石銘》。孟昶和趙匡義都能大膽地說破社會現象背後的實質。表現了二人與衆不同的清醒、超越前人的洞見，同時也爲後世留下了一份可貴的精神遺產。一千多年前的皇帝竟有如此清醒的認識：原來所有臣民的『飯』都是來自『民脂民膏』！

現代社會是市場經濟、契約社會，知識分子既然是社會分工體系中一支獨特的人群，也是市場經濟下某種交易的主體。他們的使命就在於：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爲整個社會服務，從而換回一份報酬。比如醫生、律師、教師、藝術家等等。當然，也有專門服務於政府組織的公務員，是整個國家機器運轉中必須的螺絲釘。尤其在中國，目前仍然是「強政府、弱社會」格局，因而產生一個龐大的公務員隊伍。這些人吃的「飯」雖然是國家財政撥付的，但那不過是「轉移支付」，其源頭還是取之於民——所有的老百姓都是納稅人。歸根結底、追根溯源，這些人吃的是納稅人的飯，是按勞取酬的結果。

還有一部分退休人員，不上班、不工作，却領取一份退休金，看起來似乎是『不勞而獲』。這算不算是國家財政或某個領導人

的恩賜呢？也不是！

在古代社會，小農經濟條件下，『養兒防老、積谷防饑』老年人只能依靠兒孫們供養。在現代社會，則實行社會養老辦法。舉目全球，哪個國家不給退休人員發退休金？尤其是在中國，幾十年來一直實行低工資制度，也就是說：當年並沒有領取全部勞動報酬，而是被扣除了相當大的部分，作為積累用於擴大再生產。年老退休後，自然應該領取一份退休金作為補償。這種制度設計在世界範圍內，既是普遍的；對於中國來說更是必要的、理所當然的。

二、砸鍋乎？補鍋！

知識分子除了本專業的職責以外，還有一種社會責任，或者說是一種天職。那就是心懷天下、關心民瘼。舉凡廟堂之失、社會之弊、民間疾苦等等無一不在知識分子視野之內，無一不引起知識分子的關注。所見所聞，所思所慮，發而為聲，書而成文。鞭撻醜惡、拾遺救弊，甚至批評時事、議論朝政。在古代社會，即使是專制制度下，只要不是昏君、暴君當朝，這些行為都是允許的。不僅允許，甚至在皇帝身邊，還設有專門挑刺的『諫官』，或名為『拾遺』。唐朝的名相魏徵曾擔任『諫議大夫』一職。由於敢直言進諫，甚至和皇帝唐太宗當面爭吵起來，惹得皇帝很不愉快。但由於唐太宗的寬容大度、從善如流，君臣仍然和諧地相處，因而開創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段令人津津樂道、心往神馳的佳話。

到了現代社會，大家都講究政治文明。除了極個別的例外，在大多數的國家，批評當局的言論應該認為是很正常、完全合法

的行為。既是國家憲法所明文規定的公民權利，更是當今世界普遍承認的天賦人權。不但應該允許，甚至是應該受到鼓勵。即使言辭激烈、過火一點，只要其限於言論，沒有任何行動，都不至於受到迫害，更不會入獄坐監。

這種行為也不應該看作是砸誰的鍋的問題，恰恰相反，不是『砸鍋』，而是補鍋。誤把知識分子大膽提意見的行為說成是『砸鍋』，這種誤解的根源在於：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冷戰思維』、『敵對思維』。所謂『敵對思維』就是把所有提意見者都看成專門挑刺、搗亂的『刁民』。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的古訓，人人都懂。但真是的實行起來，却需要當政者具備虛懷若谷的雅量和胸懷。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 16 個字是早年毛澤東所諄諄教導、反復提倡的。可惜的是他本人却言而無信、自食其言，因而被中外人士譏諷為『葉公好龍』。其實當年那些給共產黨提意見的人，絕大部分都是出於忠心耿耿、一片苦心。個別人言辭激烈一點，也是出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根本就沒有人想推翻共產黨的統治，取而代之。但由於神經過敏、杯弓蛇影、風聲鶴唳，誤把人們的善意當成敵人，進行錯誤地批判，並嚴懲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由此而埋下一大隱患，產生一大遺憾，也留下一大慘痛的、苦澀的教訓。給國家各項事業，更給他自己的名聲留下不可彌補的損失。殷鑒不遠，昭昭在目。此後繼位的各屆領導人都能夠吸取其教訓，及時改弦更張、大力撥亂反正。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接班之初就大力倡導廣開言路。他說：

『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黨外人士而言，要敢於講真話，敢於講逆耳之言，真實反映群眾心聲，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希望同志們積極

諫諍言、作批評，幫助我們查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習近平說得好！似乎繼承了乃父的開明之風。

三、君無戲言

古人云：君無戲言。

我相信：習近平一定會珍惜自己的聲譽和千秋萬歲名。爲了實現「振興中華、再造輝煌」的雄心壯志，爲了圓那個「中國夢」——

他一定會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絕不會自食其言、「葉公好龍」。絕不會重蹈毛澤東的覆轍。

何以見得？習近平和毛澤東根本不同，首先在於：家庭出身不同：毛澤東出身於農民家庭，農民的理想就是『造反有理』、『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從陳勝、吳廣到黃巢、太平天國，無不如此）。而習近平則出身於開明的高幹之家，從小接受父親的熏陶、耳濡目染，懂得天下之大道，人間之正義，並且認真身體力行。

其次教育背景不同：毛澤東是「綠林大學」培養出來的，是山大王。（「綠林大學」四個字不是我的「誣蔑」，而是毛澤東自己不無得意地自表；「山大王」則是魯迅先生對馮雪峰所言，對毛澤東的評價）；而習近平則是清華畢業的。清華是中國名校中首屈一指的最高學府。清華出了多少名人？在這里不必細表。如今又出了習近平這樣的國家最高領導人。無疑是清華之幸，能否也成爲全中國之幸？且看今朝！

【此文寫成後，生怕惹禍，一直未敢外投；也沒有哪家刊物敢於發表。】

中共宣傳中的三大謬誤

1943年9月1日中共的《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今天國民黨的新聞統制政策》文章引用希特勒的名言『利用報紙，可以使人民視地獄爲天堂』來抨擊國民黨壟斷新聞媒體的錯誤做法。文章寫得漂亮：思想深刻、邏輯嚴密、說理透徹、文筆犀利。如果有人打算編一本《今文觀止》的話，此文應屬首選。歷史的諷刺在於：幾十年後，中共宣傳部門不僅繼承了當年希特勒和國民黨的衣鉢，而且發揚光大之。在宣傳手段方面，早已推陳出新『與時俱進』，不僅利用報紙，而且利用包括廣播、電視、網絡等等在內的一切新聞媒介。

可是在宣傳內容上却已黔驢技窮。反反覆復，無非是老調重彈，沒有什麼創新。再從效果來看，更是徒勞無功，雖然宣傳機器不遺餘力地對老百姓進行『導向』、洗腦，結果是公信力、影響力每況愈下。原因何在？

老調重彈，在不斷地重彈的老調中排列前三位的是：

1、中共宣傳機構經常告誡自己的黨員和人民，時時刻刻不能忘記：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要警惕西方國家『西化』、『分化』陰謀云云。

西方國家有沒有『亡我之心』和『西化』、『分化』陰謀，我們後面再談。首先倒是應該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有沒有『滅

資之心』、也就是『赤化』全球的「陽謀」？答案是肯定的。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裏就毫不掩飾地聲明：『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這二位老前輩還公開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聯合起來幹什麼？當然不是去旅游、開晚會、跳舞等等，根據全世界共產黨共同的黨歌《國際歌》宣告，要展開『最後的鬥爭』以便做『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英特納雄納爾一定要實現』。共產主義實現的前提，當然就是要埋葬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毛澤東更抱有同樣的野心。根據最近胡錦濤一個內部講話：『他的目標是，整個地球要由我們黨來制定統一計劃，統一安排，用今天的話來講，這就是中華世紀』。如果說這僅僅是個內部講話，且真實性尚未得到證實。那麼，讓我們來看看另一個證據：

『詩言志』，毛澤東稱霸全球的政治野心還可以從他本人的詩詞里看出端倪：1963年元旦，『待詔詩人』郭沫若爲了逢迎討好，填了一首《滿江紅》，最後一句是：迎東風革命展紅旗，乾坤赤。幾天以後，毛寫了一首和詩，其最後一句則是：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瞧！這一主一奴的詩詞唱和，不是把他們的政治野心暴露無遺了嗎？要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赤化」，也就是把妨礙其稱霸野心的一切勢力全部消滅乾淨。老毛妄想成爲全世界共產主義教父和全球霸主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嗎？

再從實踐來看，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輸出革命的老手。這兩個大獨裁者輸出革命最突出、最慘痛的例證就是1950年支持金日成發動朝鮮內戰，企圖一舉消滅南韓政權，實現全朝鮮的赤化。

結果是犧牲近百萬中國老百姓的生命和大約一百億美元的代價，毫無所獲。至於毛澤東的自選動作就更多了：例如大力支持過東南亞許多國家的共產黨，特別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的共產黨或勞動黨。支持共產黨當然是爲了鬧革命，即推翻現政權。毛澤東最杰出的學生則是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喬森潘、英薩利等人，這幾個殺人魔王在 1975~1979 年短短四年時間裏，在一個 700 多萬人口的柬埔寨大約殺害了將近 200 多萬人，因此而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揚。

至於發達國家例如英國，成立於 2004 年的英國共產黨，黨部的會議室內懸挂着毛澤東像和中國共產黨的黨旗，在聲援中國時更是不遺餘力，公開抨擊政府當局的對華政策。最近並發起『別糾纏中國』運動，支持中國爲實現世界多極化的主張。公開發行《無產者報》和《挑戰》雜誌，連續刊登評論文章，向英國公衆宣傳世界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就』。

美國共產黨也有自己的公開出版物：《人民世界周刊》、《政治事務》月刊、《生機》季刊等，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在他們總部辦公大樓里，甚至可以懸挂美國的死敵、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的照片，還有美國共產黨副主席賈維斯·泰納在天安門城樓前的留影，還有一幅諷刺美國總統布什的漫畫。他們的領導人賈維斯·泰納在 1972 年還參加競選美國副總統。他們的政治上反對極右勢力共和黨，主張是擴大國內民主、提高工人階級的待遇等等。這位領導人幾年前還曾訪問中國和越南，回國後盛贊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法國共產黨由於在二戰中英勇抵抗希特勒的進攻，從而贏得了很高的聲譽，戰後黨員數量高達 50 萬，1946 年，它成爲左翼第一大政黨，從 1944 年至 1947 年，連續 4 屆參加聯合政府。

1972 年被認為是法共的轉折點：喬治·馬歇當選全國書記以後，提出『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開始提倡『有法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75 年開始清算斯大林思想，1979 年放棄馬列主義，改提『科學社會主義』。近年來，這個曾經舉足輕重的左翼大黨、西歐規模最大的共產黨組織，在法國政壇所佔的比重却每況愈下，2007 年的總統大選，女黨魁布菲作為總統候選人，僅獲得 1.93% 的選票，是法共在二戰後所參加 11 次總統大選中得票最少的一次。其機關報《人道報》日發行量僅 5 萬份，在 11 家全國性大報中排名第 10 位。

在日本，1946 年日本共產黨首次投入選舉便取得 5 個衆議院議席，到 1949 年的選舉時，日本共產黨一度增加到 39 席，1979 年再增加到 41 席，是日本共產黨建黨以來衆議院席次最多的一次。日本共產黨當然也有自己的機關報——《赤旗報》，不過發行量少得可憐，讀者更寥若晨星。此外，在西方各國的大學里，可以公開學習、宣傳、研究、討論馬克思主義……

在這裡就產生一個問題：為什麼西方國家的政府敢於讓共產黨合法存在並開展活動？難道就不怕「赤化」，不怕共產黨推翻現政權、消滅資本主義制度？那些大大小小的資本家難道就不怕自己的財富被『共產』？美國和英國政府為什麼不把本國共產黨打成『中國間諜』或『古巴間諜』呢？

首先，這就叫『政治文明』。最近幾年來中共在重要文獻中也學會了使用『政治文明』這個詞兒，不過寫在紙上很容易，口頭上說說也無妨，但要真正實踐起來，則需要具備政治家的胸懷、雅量和現代文明意識。其次，『君子動口不動手』西方的共產黨都已放棄暴力主張，只搞宣傳；而他們的宣傳內容也是『曲高和寡』沒有什麼市場，很少有人相信。（在發達國家

里，中產階級佔人口的絕大比例，真正的無產階級數量很少。藍領即無產階級的經濟待遇和生活水平也今非昔比，早已衣食無憂、並擁有自己的住房和小汽車。這一切，曾使 70 年代末出國考察的老革命家王震將軍大為震驚。因此，誰還會相信什麼「剩餘價值」、「剝削」等老掉牙的理論？）他們對於自己的社會制度抱有充分的自信心，共產黨的任何宣傳也不可能動搖，更不可能顛覆自己的統治。那麼，難道就不怕『和平演變』嗎？問題在於：老百姓會相信共產黨所宣傳的那一套嗎？共產黨在世界各國，尤其是前蘇聯和東歐搞得怎麼樣？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業績」又如何？這一切，難道不是活生生的教訓嗎？「不怕貨比貨，就怕不識貨」，通過世界各國對比，「誰個劣，誰個不劣」，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啊！正是因為具有充分的、高度的自信，相信自己制度的生命力，不會受到任何反對黨派的哪怕一丁點兒的威脅。作為參照例證，請看美、英政府對待恐怖組織、恐怖分子如拉登之類勢力則毫不手軟、必欲除之而後快。對國內的共產黨却放任其活動，何也？因為這些勢力根本就成不了什麼氣候，因而不屑一顧。

再來看中國，即使西方國家真的有什麼『亡我之心』，什麼『西化』、『分化』陰謀，怕什麼？中國共產黨不是宣傳『三個代表』嗎？既然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還會相信西方的宣傳來反對自己的代表者嗎？那麼，為什麼還要喋喋不休地宣傳什麼西方的威脅？兩者必居其一：

或者連宣傳機構自己也不相信真的有什麼『西化』的威脅，那只是用來威嚇和震懾老百姓的：誰要是提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等現代國家行為準則，就用這根大棒打壓下去，理由非常冠冕堂皇：這些東西都是西方的『分化陰謀』云云，立刻就

會產生懾服作用，於是萬人鉗口、萬馬齊喑，統治者則可以高枕無憂矣。回憶我在被「專政」的歲月，曾經做過馬車夫的助手。經過長期觀察我發現：馬車夫手里總是不斷地搖晃着那根長長的馬鞭，還不時打個響鞭「啪、啪」。最初我以爲那只是好玩而已。豈不知他那是一種威懾：時時警告四匹馬，只能老老實實地拉車，不許搞自選動作。否則，鞭子就真的打下來。今天看來，當局念念不忘的所謂『西方威脅』云云，正是他們手中時時搖晃的「鞭子」，廣大的人民群眾不過是鞭子威脅下循規蹈矩拉車的馬而已。

或者連他們自己也未必相信什麼『三個代表』的說教，更不相信關於共產主義天堂的許諾。他們自己心里十分明白，根本就不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僅僅代表既得利益集團極少數人的利益，因而害怕廣大人民起來反對自己、動搖自己的統治地位。前蘇聯領導人中，有個勃列日涅夫曾經說過一句大實話：『共產主義那是糊弄老百姓的。』這位前蘇聯總書記特別可愛之處就是，能够摘下自己的假面具，說出了真相，也就是說了一句真話、人話。比那些成天假裝正經、言不由衷地說假話、打官腔的領導人要高明千倍，可愛萬倍。既然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爲什麼還要向人民群眾宣傳呢？答案只能是：愚民。孔子有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現在可改爲『己所不信，何宣之民？』

當然，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的真偽問題應該歷史地分析：在革命戰爭年代冒着槍林彈雨衝鋒陷陣的戰士們，在國民黨監獄裏和刑場上寧死不屈、視死如歸的勇士們……這些人的確是出於真心信仰共產主義，真的願意爲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所以才前赴後繼、拋頭顱、灑熱血。這些人、這些事，真是可歌可泣，驚天地、泣鬼神！可是在今天，那些高喊革命口號、高談革命理論的人有

幾個是出於真心實意？那些領導人當中又有幾個是真誠的實踐『三個代表』的？鬼才相信！

2、一旦發生群體性事態，宣傳機器立刻把責任歸之於『敵對勢力』、『幕後的黑手』所煽動、操縱、策劃的結果，被煽動的則是『不明真相的群眾』云云。

這是當局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其實這種思維方式恰恰反映了中共自己歷史上曾經運用過的手段。早在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奪取政權的鬥爭中，中共就是經常這樣幹的。1947年毛澤東所謂開辟『第二戰綫』，就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發動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挑動群眾和國民黨政府對立，唯恐天下不亂。從而使國民黨後方不斷起火，蔣介石腹背受敵、如坐針氈【注】。想不到今天中共却借口別人如何挑動群眾云云。其實，這兩者之間有着根本的區別：當年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群眾鬧事，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打倒蔣介石反動派，取而代之。今天大量群眾性突發事件的性質則不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教授最近的研究成果，群體性事件絕大部分都是出於維權的性質，屬於利益之爭，沒有政治目的，並不是要求共產黨下臺，相反，恰恰是在維護中共統治的前提下，要求中共主持公道和正義，來裁判當事者和對方之間紛爭的是非曲直。（見《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于教授文章）

恰好筆者剛才收到一則消息，雄辯地證明以上的觀點。據香港出版的《信報》7月9日以《江西官民糾紛 鎮政府被砸》為標題報道：『江西修水縣日前發生嚴重官民糾紛，官方昨天坦承，確有百餘名群眾衝撞修水縣港口鎮政府和派出所，打傷

多名警察及官員』事情的起因是：香爐山鎢礦尾礦庫下游的港口鎮洞下村村民對移民搬遷補助不滿所致。政府同意給予平均每戶 30 餘萬元的補償，但群眾提出按照每人 20 萬元（相當於每戶約 100 萬元）的搬遷補助，並按九江城區安置價評估補償。在條件未得到滿足的情況下，部分群眾多次到北京、省、市進行上訪陳情。途中受到政府官員勸返。

當群眾行經港口鎮丁字路口時，開始聚集並圍堵過往車輛，數名婦女躺在路中央，少數群眾還向民警和官員丟擲石塊，現場一度失控。當晚九時許，群眾再度聚集並衝撞港口鎮政府和森林派出所，用石頭、磚塊打砸辦公樓門窗、燈具、用具等，打傷多名公安幹警和鎮村幹部，砸壞數輛警車。

這是誰煽動的？誰策劃的？沒有，沒有人能夠煽動、策劃這樣的事件。純粹是經濟糾紛、利益衝突。是政府逼出來的，即官逼民反。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敵人，既不是西方什麼『亡我之心』和國內的什麼「敵對勢力」，恰恰就是自己內部那些貪官污吏，那些迷信武力、欺民虐民的酷吏和警察。現以楊佳為例：殺人償命，本來的千古不易的道理，楊佳連殺 6 人，可謂『罪大惡極』了吧？可是網上却一片叫好！捧為英雄。為什麼有如此的反常的輿論？因為他殺的不是老百姓，而是警察！可見那些虐民的惡警在人民心中是什麼形象了。不是別人，正是這些敗類，敗壞了中國共產黨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聲譽和威望，離間了黨群關係，削弱了廣大人民群眾對黨的向心力。如果無視這些敗類，却把注意力放在虛構的什麼西方或國內的敵對勢力上，那可真是頭痛醫腳，開錯了藥方。

在這裡還可以引用法律出版社 2008 年出版、副教授高中的專著《國家安全與表達自由研究比較》一書中的箴言：『許多官

員形成思維定勢，有人激烈抨擊政府官員和政府的內外政策，就會有損政府的尊嚴和信譽，進而危及執政者的安全和國家安全』。作者認為，這是一種『權力異化』、『國家異化』的必然產物。作者還斷言：『一個能够被批評浪潮所吞沒的政府，肯定在執政理念、執政模式、政治與法律制度建設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相反，『在任何一個宣稱「主權在民」的國家，領導人接受批評是其不可回避的道德責任。』

還有必要指出：《約翰內斯堡原則》中規定：『任何人都不得因為批評或侮辱本國民族、國家或其象徵性標志、本國政府及其機構、本國公職人員或外國民族、國家或其象徵性標志、外國政府及其機構、外國公職人員而受刑罰。除非這種批評或侮辱意圖在於或者有可能引起即將發生的暴力』。『一個不允許老百姓批評的政權，肯定不會受到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支持和信賴。』

3、當前官方宣傳中最大特色就是『報喜不報憂』，對成績大張旗鼓、連篇累牘，甚至是喋喋不休、反反覆復、沒完沒了，而對於缺點、錯誤則盡量隱瞞，縮小。借用魯迅先生的話，這就叫做『瞞與騙』的伎倆。中共運用『瞞與騙』伎倆最典型的『傑作』應該算去年關於『輝煌 60 年』的宣傳了。在這 60 年當中，『文革』10 年早有定論：中共 11 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明明白白地寫着：『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請你們聽清楚了：『文革』是一場『內亂』，根本就不是什麼『輝煌』政績。而中共宣傳機

構却公然違背中央早已做出的定性，不顧事實、閉着眼睛瞎說，用『輝煌』二字來概括，試問：你們置這個權威性文件於何地？看來是宣傳部煽了中央全會的耳光！以小犯上，該當何罪？按家法：兒子敢打老子，該打屁股。按黨章：下級公然和上級的《決議》唱反調，就是反黨，應該撤職查辦。此外，在這 60 年當中，三年所謂『自然災害』餓死 3,755 萬人，也算是『輝煌』政績嗎？還有：1957 年搞『陽謀』，把 300 多萬社會精英人物打成敵人，也是『輝煌』政績？1989 年血洗天安門廣場，以至於中外嘩然、一致譴責。難道這也算『輝煌』政績？總的算下來，10 年加 3 年、加 1 年、再加 1 年，共計 15 年，佔 60 年的 1/4。毛澤東經常用 9 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比喻，那麼，1/4 應該是幾個指頭？非常抱歉，我的數學成績很不好，不會算，還是請宣傳部門的秀才們自己算一算吧。

在國門緊閉、中外隔絕的時代，僅僅「和我們自己過去比」從而沾沾自喜，尚可安撫人民群眾於一時。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謊言有效，但也有限』。只能欺蒙群眾一時，而無法長期欺蒙，更不可能永遠欺蒙。特別是改革開放的今天，老百姓都學會了睜開眼睛看世界，通過中外對比，例如從前的東德和西德，今天的朝鮮和南韓，還有我國大陸和臺灣……同文同種，人是同樣的人，地也是同樣的地，可幾十年以後，却是一貧一富。誰優誰劣，立刻顯現出來。人民群眾還會傻乎乎地相信當局那些自我吹噓的所謂『偉大成績』嗎？中共不是經常宣傳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通過二戰以後 60 多年的實踐，反復對比，全面考核，這個『唯一標準』不是早已做出了絕對公正的裁判嗎？

最近有位學者撰文說：『中國民衆的教育程度越高，對其

它國家政治文化了解越多，中共獲得國內民衆心理認同和政治支持的難度越大』。（見《南方周末》2010/6/24f31 版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正漢文章）尤其是在互聯網廣泛應用的今天，再企圖喋喋不休地吹噓什麼偉大成績、光榮歷史、一貫正確云云，恐怕是徒勞的。不僅如此，可能適得其反，使人們越來越反感，產生逆反心理。

『國家軟實力論壇』的主持人德國漢學家、歌德學院中國總院院長阿克曼接受專訪時談到：軟實力的關鍵在於『信心和信任極為關鍵』『德國成功的一點就是非常開放，自己主動反思，並且不諱言在別人面前反思自己的歷史』、『蘇聯沒有受到經濟制裁就崩潰了，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關鍵是人民不再信任這個國家的政府。』（《瞭望東方周刊》第 23 期）

有了蘇聯的前車之鑒，當人民群眾不再相信中共宣傳機器謊言的時候，將會發生什麼後果？已是不言而喻了。

【注】本文定稿後，又讀到鐵流先生的回憶錄第一部《翻天覆地》第 286~288 頁揭露中共在奪取政權過程中不擇手段。爲了存真，現一字不易地引用如下：『40 年後人們才搞清楚：所謂「沈崇事件」的真相。（爲了避免引起名譽權糾紛，以下省略幾百字。）善良的人們，能想得出如此高明的計謀嗎？同樣的事例如爲了搞臭蔣介石，就指使一個名叫「唐人」的無耻文人寫了一本名爲《金陵春夢》的書，寫得活靈活現……偏偏又遇到「文革」，唐人的女兒在北京讀書，紅衛兵要她交代「你爸是蔣介石什麼人？」他女兒說什麼人也不是。紅衛兵說：蔣介石一舉一動放個屁他都知道，不常在他身邊，不是他的心腹，能知道嗎？不老實交代整死你！她只好向父親求救。住在香港的唐人只好公開承認是受人指使瞎編亂寫的。中央文革小組

立馬制止，不準再鬥唐人的女兒了……主要是怕唐人再交代下去，「泄露天機」就麻煩了。爲了「革命需要」他們有什麼不可以幹？南泥灣大種鴉片又是一個事實。

關於中共在延安時期種植鴉片的事，除了鐵流先生在該書第154頁的揭露以外，本人手頭還有一份資料可爲佐證：《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春季號第136頁~141頁發表向繼東先生的文章《正視歷史需要良知和勇氣——讀〈延安日記〉》。可見這不是孤證，足可采信。

我一直就不同意『輝煌五十年』、『輝煌六十年』的提法。這不符合事實的。大躍進困難時期那三、四年，『文革』動亂那十年，總不能說是輝煌吧？宣傳用的詞，也要講究精準，要符合基本事實。你不把那幾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會扣掉的，歷史學家也會扣除的。普通黨員也會那麼做的。在90年代的那幾年，我說過不止一次，政治宣傳離事實太遠，那叫什麼？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蠻的宣傳！

——第七屆全國人大委員長 萬里

自信何須維穩？維穩談何自信？

近年來，當局不遺餘力地、大張旗鼓地做了並繼續做着兩件事：一曰宣傳所謂『三個自信』，其二、不惜一切代價、采用一切手段維穩。前者大概屬於宣傳部門的中心工作，後者估計是政法部門的頭號任務。

人們自然會理性地思考一下：這兩者能否結合、配合，並統一起來，共同發揮所謂『正能量』？

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互相掣肘。

所謂『自信』，多達三個，最近又增加一個，叫做『文化自信』。任何「自信」都不能局限於上層官員們的主觀願望，需要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同，才能產生凝聚力。當局如此全面、廣泛（「不留死角」，「從娃娃抓起」等等）、鋪天蓋地、連篇累牘的宣傳，對象是誰？當然是全中國的老百姓。宣傳目的不僅要『入耳』，更要求『入腦』、『入心』，即深入每個人的腦海里、靈魂深處，務必使全體人民都跟着「自信」起來。從而增強國人內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達到『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這樣做的前提必須是：相信人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自己人』，是熱愛祖國、維護穩定的『良民』，是聽話的『順民』，而不是存心搗亂、挑刺的『刁民』。否則，這種工作就難以開展；即使開展，也難以奏效。豈不是徒勞無功的『白費蠟』？

維穩的前提則恰恰相反，是把絕大多數老百姓當成壞人、刁民。因而處處設防、人人嚴管。例如：按照國家大法——憲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但，令人遺憾的是，當這些人真的履行憲法賦予自己合法權利，表達一下自己的觀點，或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時，却被認為是『別有用心』、『破壞穩定』的『顛覆行爲』。必立刻取締而後快，全面封殺而後安。於是，無辜的老百姓一夜之間就成了『敵對勢力』。

更有甚者：目前中國官員貪污成風，貪官人數之衆多、涉案金額之巨大、作案手段之惡劣、情節後果之嚴重都可以說是雄冠全球、堪稱世界第一。對此，最高領導人也不無憂慮地承認：『病入膏肓，已無淨土』①。

那麼，人們有理由進一步思考：這些敗類是從哪里來的呢？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或地下冒出來的吧？難道是『西方敵對勢力』出於亡我之心不死，派遣進來的嗎？查無實據！莫非是國內的「反黨分子」爲了顛覆現政權而故意教唆、培訓而制造出來的嗎？無迹可尋！那麼，這些敗類到底是從何、如何產生的呢？其實大家心里都明白，實話實說吧！

唐代傑出的文學家蘇軾在其名篇《范增論》里說得好：『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今天貪污成風現象恰恰就是原來的制度有漏洞，正是這種漏洞百出的制度才不斷地制造出大批量的貪官污吏。在衆多貪官污吏中，原來都是好苗子、聽話的乖孩子。許多人都是經過層層篩選、再經過各級黨校精心培養，認為合格、優秀，才委以重任。但一旦步入官場這個大染缸，就像變戲法似的，馬上就被『染』黑了。那麼，人們有理由追問一下：這個大染缸，這個大批量制造貪官污吏的制度，難道也值得『自信』嗎？此其

一；其二：爲了改進這種制度，『官員財產申報法』應該是比較可行、有效的措施之一，也是世界各國的實踐所反復證明爲有效的辦法，因而被譽爲『陽光法案』。官方也曾經信誓旦旦地宣告：需要建立這種制度。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有的公民出於杜絕貪污、爲國分憂的動機，打出橫幅，要求官員公佈自己的財產時，實際上是在聲援最高當局、壯大聲勢。但却忽然成了『刁民』，被『維穩辦』抓起來。如此『維穩』豈不是『把好心當成驢肝肺』？

總之，真正的自信首先就在於：相信人民，相信人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善良的老百姓，他們的所作所爲無非是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已。因此，絕不是存心和當局『對着幹』的刁民，更不是『西方敵對勢力』出於『亡我之心不死』而指派來的搗亂分子。同時也應該相信自己統治是鞏固的，而不是紙糊的，不是弱不禁風的林黛玉。據筆者回憶，早在延安時期，中共領導人習仲勛就曾對貼反動標語一案作如下指示：

『貼這麼個標語就能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啦？共產黨對自己這麼沒有信心？』

瞧！什麼叫自信，這才是真正的自信！如果我們都能學習這位革命老前輩的開明、務實精神，情況必將大大改觀。

隨着觀念轉變，思想煥然一新，行動自然隨之改弦易轍：沒有必要花如此大的力氣、如此高的代價去搞什麼「維穩」。『維穩』的結果恰恰適得其反，激化矛盾，越維越不穩；維穩隊伍越來越龐大，維穩經費與日俱增；其後果則是怨聲載道、監獄里人滿爲患。在國際上也有損泱泱大國的威望，令世界矚目，信譽掃地。

得耶？失耶？智乎？愚乎？

目前來看，似乎很難改變當局維穩的慣性思維。既然堅持『維

穩第一』，那麼，所謂的『自信』又從何談起？

一個真正「自信」的國家，首先應該取得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同，應該是通過人民理智選擇的結果。而人民自己選擇的標準又是什麼呢？無他，就是孔子所說的：『近者悅，遠者來』，即對內具有牢固的凝聚力，對外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但對照現實情況，却很難令人樂觀。請看那些精英們是如何選擇的：據 2007 年《中國人才藍皮書》公佈的數字：中國 28 年來海外游學人員回歸率僅為 25.77%。也就是說：超過七成留學人員滯留海外。通過有關部門賣力宣傳說服，近年來情況略有好轉。但總的情況仍然不容樂觀。大量大學生、研究生滯留海外，實際就是「用腳投票」（此語也是出自老革命家、中共高級幹部習仲勛先生之口）。

其次，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員們也大都把自己的子女千方百計地送往海外，或經商，或求學。最近還有大量成功的企業家移民並轉移資產到海外等等。這些人無疑屬於精英人士，他們大量移民海外，帶走的不僅僅是大量金錢，還有更寶貴的知識、經驗、技能等等。

由此，我們又想起了孟子那句名言：『故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雀者，鷃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見《孟子·離婁上》）是誰把大量精英人才驅趕出境，遠離家鄉、遠離祖國，奔走於異國他鄉，為異邦效力？特別是為最發達的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效力？結果是：為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錦上添花！而對於迫切需要人才的祖國來說，無疑是釜底抽薪！

這一切，恰恰就是那些『維穩』人士所造成的惡果。

走的人們已經用實際行動表明：對自己的國家已喪失「自信」（別說三個，連一個「自信」都沒有了）。孔子教導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嘛！（見《論語·泰伯》）

留的人未必不心動，只是由於財力、能力、學歷等等因素所限，或暫時未能成行，等待時機而已。這麼多的中國人一個個向往他鄉異邦，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麼？

那些所謂『三個自信』的發明人、鼓吹者將如何回答？

維穩、維穩，其所造成的惡果之一，恰恰是破壞炎黃子孫們心中『自信』的最大殺手，是揮向『三個自信』頭上的一記重拳！打在這些人臉上的一記耳光！

『三個自信』云云，幾年來，雖然當局不遺餘力地大力宣傳，却没有成爲一呼百應、朝野共識、上下共鳴的大合唱，最終變成了宣傳部門少數人自娛自樂的遊戲而已。

借用當代最流行的語言來說，『維穩』才是『三個自信』最嚴重、最凶狠的『敵對勢力』。

爲了維穩，「自信」已經成爲一句空話；

繼續維穩，「自信」必將成爲欺人之談！

①參見《廣角鏡》2014年第504期第37頁：2014年6月26日習近平在聽取中紀委巡視組的匯報之後，神情非常嚴肅地說出這8個字。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孔子

《長恨歌》

——白居易的一大敗筆

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成名甚早。據說那首人人耳熟能詳的《離離原上草》就是詩人 16 歲時的作品。當時被京都文藝界權威人士顧況所擊節贊賞、拍案叫絕，因而名聲鵲起。其詩作甚多，據現有資料，共計 3,000 多篇。白詩特點之一是通俗易懂，婦孺皆能吟誦。據唐宣宗在挽詩中云：『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可見一斑。挽詩所舉的兩篇是其代表作，即長詩《長恨歌》、《琵琶行》。

《琵琶行》最爲人們稱道，吟誦不絕。《長恨歌》的藝術性當然也不錯，但從思想性來看，令人詬病之處甚多。

第三、四句：『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就與事實不符。請看年表：

楊玉環生於公元 719 年。734 年，15 歲時就被唐玄宗的第 18 子壽王李瑁納爲妃子，已經爲人妻妾了。

3 年後唐玄宗最喜愛的武惠妃（即李瑁之母）病故。雖然後宮佳麗 3 千，但武惠妃所留下的心靈空缺却無人能够填補。8 年後，李隆基偶然遇見楊玉環。頓時被她那『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天生麗質』所傾倒；被她那『芙蓉如面柳如眉』的花

容月貌所征服。李隆基心中幾乎枯萎的激情又重新燃燒，以至於喪失理智，不顧人間倫理道德，更不顧廟堂議論鼎沸，於公元745年納兒媳楊玉環為貴妃。此時的楊玉環26歲，顯然，已不再是『初長成』的妙齡少女，更不是『養在深閨人未識』閨中玉女，而是有夫之婦。此其一；

其二：這一年唐玄宗已是油盡燈枯的糟老頭子（61歲），而楊氏却是青春少婦。這種年齡相差懸殊的老少配，談何『愛情』？所謂『愛情』應該是建立在年貌相當基礎上的兩情相悅、雙方自願。李、楊的結合是出於『愛情』嗎？肯定不是！是什麼？是交易！權與色的交易！就李隆基來說，老牛啃嫩草，當然是愜意得很；但對楊玉環來說，真的出於自願嗎？顯然不可能，而是身不由己、無可奈何的屈從。因為對方是生殺予奪的皇帝，違拗不得。

其三：老夫少妻、年齡懸殊還不是李楊「愛情」的要害之處。要害何在？這對夫妻並不是普普通通的男女，而是公公和兒媳的結合、是父霸子妻的亂倫行為。（李隆基考慮過親生兒子李瑁心中的感受嗎？）即使是在封建社會制度下，也是極其荒謬絕倫、傷風敗俗的醜聞。對此，詩人的筆觸却不置一詞。這，是普通的疏忽嗎？是無意的遺漏嗎？恐怕都不是。

在專制制度下，皇權大於一切；皇族的利益高於一切。任何一個皇帝的醜聞都是整個皇室家族的奇耻大辱。『一損俱損』，為了維護皇帝家族的神聖性，保持皇家頭頂上那個虛假的光環，任何醜聞都切切不可外泄，不能讓普通老百姓與聞。因此必須作為最重要的國家機密、絕密，永遠不得公開。更不允許任何人說三道四、指指戳戳。大詩人白居易當然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他可以抨擊玄宗施政中某些無關宏旨的得失，但絕不敢冒險去捅這個大馬蜂窩，不敢觸動那個令皇族整體蒙羞的醜聞。雖然詩人

也寫了大量反映民間疾苦的詩篇，但涉及皇帝及其先帝爺的穢聞，還是選擇『繞道走』。

雖然唐玄宗李隆基早已歸天，歷經肅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適）、順宗（李誦），白居易生活的時代已經是憲宗臨朝。憲宗是李隆基孫子的孫子。但仍然是唐朝——李家的天下。先帝爺的醜聞必然損害整個李家王朝的集體聲譽。爲了保持本朝政權的聲譽和合法性，當然要千方百計地維護先帝爺的名聲，對於爺爺的爺爺那段令人不齒的穢聞，仍然需要繼續密封，不允許任何人涉及。這，可以說是任何專制政權的『潛規則』，是不許觸動的『高壓綫』。

大詩人白居易顯然明白這個道理，決不敢去觸動那顆危險的「地雷」，不敢違逆皇朝的禁忌。那麼，他可以選擇不寫這個敏感的題材。萬萬不應該用自己生花妙筆去極力美化這種有傷風化、敗壞人倫的醜行。

白居易作爲唐朝著名詩人，留下大量詩歌。《長恨歌》一詩中許多膾炙人口的名句，都是無可置疑的精神遺產。但由於上述缺陷，不能不極大地損害了該詩的整體價值，因而顯得黯然失色。

這，也許是大詩人的一大敗筆吧？

或者有人認爲：大詩人本來是打算揭露父霸子妻醜聞的，但寫着寫着却被李楊愛情火花所吸引、所感動，因而改變初衷，歌頌起來。此說實難苟同。評論文章和詩稿，恰如法官斷案，不是根據當事人最初的動機如何高尚，而應該根據其實際行爲的合法與否，評判優劣。唯一根據應該是詩作本身的價值，而不是詩人最初的寫作動機。

【此稿先後向多家媒體投稿，均不被採用。但出於自信，決定保留，留待後人評判】

後 記

今年是丁酉之難 60 周年，作為那場災難中的幸存者，一直在思考：應該有所作為。既是為了紀念，更是為了揭示真相，還歷史以全貌，給後人留實錄。

經過思考，決定把 10 年來所發表的作品集中編印成書。一來盤點 10 年來孜孜矻矻所取得的成果，沒有虛度年華，聊以自慰；二來老朽已是風燭殘年，朝不保夕。隨時都可能去見閻王爺。留下一點痕迹，算是我這個『右派餘孽』給社會留下的『微痕』吧。

首先應該說明的是：本書的書名原來計劃是《妄議朝政又十年》。在即將付梓時，忽然感到這個書名不妥，很容易惹禍：當局三申五令不許『妄議中央』，你偏偏來個『妄議朝政』，豈不是變着法兒和領導對着幹？豈不是『頂風作案』？當局豈能輕饒了你？難道不是自己找死嗎？死倒不足惜，反正活這麼大歲數了。怕就怕他們像對待鐵流那樣，不讓你痛痛快快地死，而是反反覆復地折磨你，叫你受盡磨難，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中國古代雖然一直是專制社會，但畢竟講究一點人道精神，例如『七十不打，八十不罵』之類就是不成文的規矩。鐵流先生那年已 81 歲了，依然吃那個苦。可見今天根本就不講那一套。管你七十、八十的，只要觸犯紅綫，一律不客氣。在維穩已經成為『常態化』的今天，更不受什麼年齡的限制。從『維穩』出發，

每個人都有可疑之處，每個地方都有敵情。你這個『妄議朝政』恰好主動送上門，豈不是自找苦受嗎？

爲了把風險系數降到最低，必須把凡有可能觸犯當局的文章一律取消。不是因爲尊敬，而是因爲恐懼；不是出於信仰，而是出於利害。於是避其鋒芒，改換書名。換個什麼書名呢？爲此苦思冥想、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來了。就是現在使用的七個字。其中『縱論國是』，是個老題目。早在 60 年前，大鳴大放期間，在寫了『胡風是反革命嗎？』之後，第二篇文章就是『縱論國是兼評鳴放』。我還記得：當年有位中文系的老教授李老師（Lmuzhi）私下里評論：『他不說縱論國事，而說縱論國是。一字之差，就大有文章。不說其他系，單說中文系的學生，能够理解「國是」二字含義的恐怕不多。』

就憑這句話，右派帽子從天而降。罪名是：公開贊賞右派學生胡顯中。其實，我和這位李老師互不相識、素無交往。只是從校部大樓滿走廊的大字報里才知道這件事。

根據這位李教授的年紀，恐怕早已作古了。今天我再一次使用這四個字做書名，也是爲了緬懷和紀念：李教授，我所尊敬但從未謀面的李老師：承蒙謬獎，十分愧怍。殃及無辜，深感歉疚！所幸您當年曾經贊許的『縱論國是』四個字，已變成了一本書。當您在天堂看到此書，也許會頷首微笑吧？

這位李老師並不是因我而受牽連的唯一無辜者。當年因爲各種原因，不同情節而受我牽連的老師和同學，多矣哉！有的同學只是私下里同意我的某一個觀點，或者對於我在寡不敵衆的形勢下，仍然孤軍奮戰、舌戰群儒，表示贊許等等。這些同學恐怕大部分都早已仙逝，而我這個肇禍者，反而成了『老不死』的東西。孔子曰：『老而不死是爲賊』。不勞而獲，不勞而食，白白地消

耗社會資源，非『賊』而何？

說到『死』，在某些極左人士看來，我早就該死了。早在60年前，當我被市公安局的便衣人員請到局里『談話』以後，再也沒有回校。據前幾年才相識的一位校友W君告知：在我被送公安局的次日，在校部大樓（現已改為圖書館大樓）大禮堂的正門，貼出一份大字報，用了四整張的大白紙，寫了四個斗大的字：叛國者殺！據說有幾個反右積極分子正在大字報前眉飛色舞、談笑風生。這些人在批判會上無法說服我，正說明『批判的武器』失靈，只好乞靈於『武器的批判』，便可以一勞永逸地讓我永遠閉嘴。他們也就可以不戰而勝了。這些人能不興高采烈、彈冠相慶嗎？

所幸這些人暫時還不是法官，只不過嘴上痛快痛快而已。於是我便僥幸『漏網』了。雖然『漏網』，但判處『無期徒刑』，距離死刑也僅一步之遙。

到了60~70年代，文革狂飆驟起，多少生命在『叛國投敵』的罪名下飲彈而亡（那位北大歷史系的高材生沈元就是一例）。如果我在社會上，不是血濺刑場，就是死於紅衛兵的亂拳、亂棍之下。但幸運的是：那時我被關在監獄里，反而受到『保護』（當局有令：『不許衝擊監獄』）。我又一次『漏網』了。

到了1971年，在勞改農場里，被反復批鬥、折磨，曾經兩次『休克』，不省人事。如果一直沒有醒過來，下一步就是死亡。就會像一條死狗一樣，扔到野外，讓那些野狗和狼群享受一頓豐盛的晚餐。

可是我偏偏醒過來了。這，首先應該感謝我的父母，二老給予我頑強的生命力。其次應該感謝上蒼的憐憫與同情。

僥幸活到今天，多謝上蒼的恩賜。但已是風燭殘年。自然

規律不可違，也應該考慮和安排後事了。

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是父母安排的結果。但采取何種方式離開這個世界，却有選擇的權利。人類比其他動物高明之處在於：能夠主動安排自己的死亡。

當今厚葬成風，而我國人均土地資源稀少。因此，我決定死後不佔用一寸土地，連火化的能源都省了。早在 2012 年 2 月 21 日，我就在白求恩醫大解剖科簽名申請捐獻遺體。到了那個時候，送進解剖室，任他們『碎尸萬段』、『千刀萬剮』，得其所哉！這，也可以算是我對社會的一種回饋，對醫學事業最後的奉獻吧。

不過，在我被人送進『白求恩醫大解剖科』，任人『千刀萬剮』之前，還有千言萬語需要表達。這些千言萬語經過濃縮，就是這本書。這是一個耄耋老人最近（也許是最後）10 年思考的成果。

60 年前我第一次『縱論國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幾乎犧牲了生命。但歷史老人最後還是給我做出了公正的裁決。當年的所謂『罪狀』，今天已成為國家珍藏的『文物』（參見本書第 212~214 頁）。因此，我衷心地感謝歷史，敬畏歷史，相信歷史。

今天我又一次『縱論國是』，是否需要付出代價？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天威難測！但不管付出什麼代價，歷史最終一定會還給我公道。也許會再次上演 21 世紀版的『罪狀變文物』悲喜劇吧？正是堅信這一點，才不避千難萬險，想盡千方百計，樂此而不疲。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在五七學社武宜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開始整理自己的舊作。原來以為：這件事情輕而易舉，不過把舊作整理、編排一下而已。但實際操作中却遇到很大的麻煩：10 年來所發表的成果，在電腦里竟然大部分找不到，不翼而飛！

奇矣怪哉！

编号: _____



中国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申请登记表

姓名	胡显中	性别	男 (男/女)	出生年月	1932.10.05
血型	(A/B/O/AB/RH+/RH-)			身份证号码	22010319321005XXXX
学历	大学毕业			职业	编辑
志愿捐献器官(组织): 眼角膜(✓) 心脏(✓) 肺脏(✓) 肝脏(✓) 肾脏(✓) 胰腺(✓) 其它(所有器官) (用✓选择, 可同时选多项)					
是否捐献遗体	是(✓) 否()			登记地点	白求恩医大肝胆科
联系电话				直系亲属姓名	妻 女
地址	长春市			亲属联系电话	
邮编	130022			直系亲属是否知情: 是(✓) 否()	
E-mail	hxz1005@sina.com				
其他	以上资料是否保密	是(✓)		否()	
	是否愿意配合宣传	愿意(✓)		不愿意()	
	是否需要宣传资料	需要(✓)		不需要()	
本人郑重承诺: 我志愿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者, 在身故后愿意无偿捐献以上所选器官(组织), 用于需要移植的患者或医学事业, 请尊重我的决定。					
志愿者签名:			2012年2月21日		

声明: 填写此表格仅仅是为了完成您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的意愿。您可以随时通过书面形式撤回已做出的捐献意愿。没有您的同意, 我们不会将您的个人信息传播给第三方, 除非我们依法必须交出。

85619466 牙立伦

原來是我自己把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移動到另外的 U 盤里保存。一些紙質媒體所發表文章的贈刊也都秘藏起來。

如此折騰所為何來？

近年來，經常有本單位領導或公安人員大駕光臨。或問訊，或規勸。我預感到：也許什麼時候當局派人來清查、抄家。古人云，『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為防萬一，只能先行轉移和秘藏。

那麼，U 盤藏在哪里？這種秘藏行為發生在好幾年前。時過境遷，雖經反復記憶，硬是想不起來。於是翻箱倒櫃，把衣櫃里的所有衣服一件件拿出來，一個個口袋都摸一遍；再把書架上的書籍，一本本取出來，翻一遍。除了意外地發現幾張舊照片，朋友的來信以外，根本沒有那個 U 盤的踪影。官方還沒來抄家，自己倒先抄了個底朝天！我無奈地自嘲：『庸人自擾』！

在千方百計找不到那個 U 盤的情況下，只好求助於網絡：上『百度』搜尋。但許多文章在百度里只有標題，點擊一下，顯示出『抱歉！無法顯示』。還是枉然！

於是把秘藏的紙質媒體贈刊全部找出來，重新打字。在網刊上發表的，則求助於原刊的主編發回來。還有的既無原刊，又無法搜尋。只好付諸厥如了。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物。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連古代羅馬神話故事中的維納斯女神不是也失去了雙臂嗎？但這個缺陷並不影響她的美麗和溫柔，更不會失去人們對她的仰慕與熱愛。維納斯仍然是全世界人民所共同遵奉的美與愛之神。

令我進一步思考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庸人自擾』的事情？究其根源在於：恐懼！

在去年 7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誕生 95 年的紀念大會上，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在講話中強調：『面向未來，面對挑戰，全

黨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說得好，好極了。問題在於『不忘初心』的『初心』是什麼？

在自由派作家笑蜀先生所編輯的《歷史的先聲》一書里清清楚楚地記載：1945年9月，中共七大剛剛開過，面對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採訪和探求，毛澤東把將來要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作了展開的說明：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国的合作。』

毛澤東在上述講話中信誓旦旦地承諾的話，就是中國共產黨當初真正的『初心』。理由是：毛澤東的話是一個準備執政的黨對全中國億萬老百姓所發出的莊嚴承諾，更是面對全世界人民的政治表態。言必信，行必果。信譽乃是一個人、一個黨派在今天的世界上立足所必備的操守和品格。不講信譽，言而無信、背信棄義，在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今天，必將寸步難行。

毛澤東所遵奉和承諾的『羅斯福四大自由』是什麼？

答曰：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何時能够兌現毛澤東當年所承諾的『初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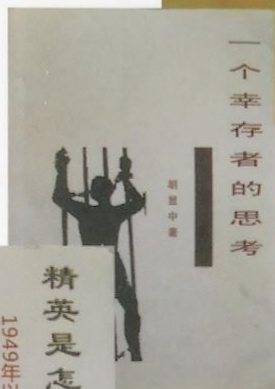
這是個『天問』。

作者

寫於『丁酉之難』60周年的6月8日



胡顯中，男，1932年生，江西南昌人。1948年在南昌心遠中學讀書期間加入中共地下組織——閩浙贛邊區南昌城工部，并于1949年初被任命為心遠中學黨小組長，發展黨員4人。1957年畢業于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的前身）經濟系。因在1957年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大鳴大放』中寫了《胡風等人是反革命嗎？》、《再論胡風問題》、《縱論國是，兼評鳴放》等文章，被認為是當時國內否定毛澤東發動的反胡風運動第一篇公開文章（後被校方收入《毒草匯編》，平反以後又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由此被打成『極右分子』。又因打算出國謀生而被以“反革命叛國罪”判處無期徒刑，後經上訴改判為有期徒刑10年。又由于不安于改造而逃跑兩次，被加刑三年。1970年9月，距離刑滿還有2個月，又因為『惡毒攻擊』而延期釋放。在超期關押5個月以後，『寬大釋放』但『戴反革命帽子』，留場就業……直到1980年，被吉林大學最後一個宣告『錯劃』、『改正』，稍後法院宣告平反。後在母校經濟系工作，1985年調入吉林省經濟學團體聯合會，主持創辦《經濟縱橫》雜誌，并任副主任，1992年評為編審（正高職稱），次年離休。



胡風是反革命嗎？

縱論國是 兼評鳴放

縱論國是續新篇

——紀念丁酉之難60周年

胡顯中◎著



ISBN 9627934577



9 781234 567897

定價：港幣80元